

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 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

——1938 - 1952

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

论文作者：李 康  
学 号：19631804  
系 别：社会学系  
专 业：应用社会学  
方 向：组织社会学  
指导教师：王思斌教授

1999年6月

# 目 录

提要	3
英文提要	4
<b>第一章 风雷渐至：？—1938</b>	<b>5</b>
1. 五大家	6
2. 会首、二县长与费小人	10
3. 世纪初叶的村外历史	13
4. 清末民初冀东乡村组织演变	14
5. 多方混战的冀东大地	16
6. 来了“民众”、跑了财主	19
7. 革命啦！	22
<b>第二章 风云乍起：1939—1946</b>	<b>26</b>
1. 初期混乱下的控制争夺	26
2. 突破治强恐怖	27
3. 村里架起炮楼子	29
4. 建立两面政权、发展群众组织	31
5. 总得出个支应人	33
6. 谁是村里的老革命？	35
7. 正确发展党组织	39
8. 两面政权下的村庄负担	41
9. 减租减息	43
10. 长期战事下的乡村经济与政治	44

11. 基层动员与教育-----	46
12. 土改前夕的乡村状况-----	51
<b>第三章 风潮怒涌：1946—1948-----</b>	<b>54</b>
1. 反奸清算-----	54
2. “我党不能不表示同意”-----	55
3. 首轮土改过西村-----	58
4. 复查前的缓和-----	60
5. 妇女的发动-----	61
6. 掀起复查高潮-----	63
7. 法大纲出台-----	67
8. 寻找偏向的起因-----	69
9. 该怎么诉苦？-----	71
10. 搬掉大石头-----	73
11. 西村初期复查-----	74
12. 当家作主开会忙-----	75
13. 当道的石头搬下去-----	77
14. 积极肯干的站出来-----	78
15. 老干部一时落败-----	82
16. 四法警-----	83
17. 告状告来工作组-----	86
18. 划下成分好参军-----	88
19. 认识老区的特殊性-----	90
20. 重塑党的形象-----	93

21. 和平即将到来-----	96
22. 压在心头的愤怒-----	99
<b>第四章 风波不定：1949—1954-----</b>	<b>103</b>
1. “对政府全不忠实”-----	103
2. 该死的林志-----	104
3. 土改结束？-----	106
4. 组织起来-----	106
5. 清理内部敌人-----	110
<b>第五章 风烟无尽：1955—？-----</b>	<b>112</b>
1. “一定要实事求是”-----	112
2. “还是咱们贫下中农的带头人”-----	114
3. 却道天凉好个秋-----	116
<b>附论：革命编织下的历史风貌-----</b>	<b>120</b>
1. 村庄民众中的革命-----	120
2. 土改实践中的革命-----	123
3. 革命编织下的精英 - 民众关系-----	125
4. 历史：记忆、时间、权力-----	127
5. 历史：事件、叙事、分层-----	129
表一：西村老党员一览表-----	131
表二：土改结束划定阶级成分时阶级比例对照表-----	131
表三：西村抗战时期主要干部-----	132
表四：西村土改高潮时期主要干部-----	132

表五：土改前后西村土地占有变动情况-----	132
表六：归远十区各村土改时平分情况-----	133
附一：主要参考文献（公开出版物）-----	133
附二：内部参考档案资料-----	140
附三：口述录音资料索引-----	142
附四：所涉人物简要谱系-----	143
后记-----	148

## 提 要

从 30 年代末开始到 50 年代初，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民主建政、土地改革、合作化等运动，共产党对乡村社会进行动员，乡村社会对此做出反应。在这种双向过程中，出现了多种权力技术和组织发明（开会、诉苦、汇报、查证、扎根、群众团体）。共产党利用政党组织和新型群众组织取代旧式科举制成为村庄精英更替的新型途径，在实现村庄与国家的沟通的同时摆脱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陷阱，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和对乡村社会的治理。

本文通过对冀东某村庄数十年间（尤其土改前后）在经济活动、社会关系、政治参与、组织意识、自我认同等方面的变化，考察农民由村内谋生转向持续参与村外制度的过程，考察世界历史、意识形态、现代国家等观念渗入农民心中的过程和演变。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和政治组织本身发生了巨大变革。精英构成类型、组织方式乃至活动方式；农民对政治社区的认识和政治行为的性质也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本文着重考察了激发这些原来外在于历史的农民参与全新的政治关系的特殊原因和动机。革命者通过宣传、组织或符号操纵，不仅在外在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和社会制度上，在乡村基层社会建立了新型统治，而且还细致地努力建立起足以治理常规行为模式和日常心理认同的权力技术和组织机制。在这些特定的权力技术和组织机制下，大量原本不关心政治的农民日益主动地成为新制度的一员。农民不再是突发性地参与，而是持久参与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党充分培植和利用农民不断增强和自觉化的组织能力和被组织能力，把农民并入比村庄更大的社会，奠定强大的系统性体制。

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村庄向外开放的过程：村庄新精英会反过来利用国家为了更好地控制基层所发动的新的组织机制，为自己在村庄中建立更加稳固、更具合法性的地位，以国家共同体为背景的新式的村庄共同体还将延续下去，精英的活动逻辑仍将带有部分传统活动的性质。

本文直接采用了大量口述资料，在书面文献的采纳面上也有所拓展。写法上虽然大致以时间为顺序，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史，而是随时穿插日后的回忆，对比其中的差异，突出历史的不同层面、写法和记忆积淀，以及这些差异的归同。

关键词：土地改革 基层组织 村庄革命 大众动员 口述历史

# Resume

From the later years of 1930' s to the beginning of 1950' 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wo wars, the CCP succeeded in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in vast rural areas by means of many successive movements, such as taxation & rent reduction, Land Reform and Collectivization. With the increasingly automatic reaction on the hand of every village, so many new kinds of power technique and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emerged from this mutual constitutional process. The Party utilized Party' s and various new mass organizations (which had gradually become new approach to get a powerful status like 'elite' ) to achieve well-controll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village and the State (and the Party), where eschewed the pitfall of 'involution of state' .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efficient governance on rural society were founded.

Basing on the investigation on a village in northeastern Hebei province, this dissertation analyses the great change in economic activities, social relatio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rganizational awareness and self-identity, etc., during these years (especially around the Land Reform). From these, we focus on the transition of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continually external institutions, on the penet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uch grand conceptions as world history, ideology and modern nation-state. During the period, rural society and grass roots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were also undergoing great reform. So much qualitative changes had taken place on the way of elite' s constitution, organization and action, and on the villagers' recogni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essence of their political behaviors.

The dissertation emphasizes the particular causes and motives that stimulate these villagers, who originally outside the History, to participate the wholly new political network. By propagandism,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and symbolic manipulation, Revolution founded its new governance in rural society not only in external institutions on politics, economics, law, military and society, but also on new power techniques and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s to govern routine behaviors and daily psychological identities. The Party took every efforts to nourish and use the peasants'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and awared capacity of organizing and being organized, through which to found a totalizing system.

Meanwhile, there could not be a simply opening process on the behalf of the concrete village. The emerging elite would make the new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bestowed by the State as an instrument to found new status for themselves in the village more firmly and legitimately. The village-level commun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ate-level community will last.

The dissertation uses directly a great amount of oral history materials and many memoirs, formal village history, folklores, and testimonies through many later political movements. One of its aims is to reveal different levels, narratives and sedimentations of history, and to relate their convergence mechanism to the governmentality as the deepest and most sophisticated power regime.

Key Terms: Land Reform

Local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Revolution in Village

Mass Mobilization

Oral History

# 第一章 风雷渐至

？ — 1938

闲来无事去赶集  
人家骑马我骑驴  
回头看见推车的汉  
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知足歌》（归远民谣）

归远<sup>1</sup>县地处冀东北部山区，始建于后唐，康熙年间升县为州，1913年改为县，隶属直隶省津海道。1928年南京政府撤销道制，划归河北省。33年归入南京政府新设的蓟密区专署。

西村所在区域长期属于归远十区（具体名称虽多有变化，但大致划片相仿，村民也习惯如此称呼），素称“五山、六梁、十道沟”。西去40里便是归远县城，往东30里则是定东县西境大集镇四卫所，地当要道。据考明代始建时为驿铺，后来迁徙或逃荒之民沿驿道两旁陆续定居，日久成村。东边连着就是东村，行政管理区划上曾分分合合。虽说俩村间简直说不上有啥地理分割，可来往（包括通婚）的确较少，以致现在当问起东西村啥时候分开，还有老多人说“从来就是两个村”，“起首就不是一码事儿”。村庄北接应家谷，西连康平村，鸡犬之声几近相闻。往南两里是南岭，岭上东西两谷。从前有些逃荒的在村里整治不下房子，就到谷里搭个小窝棚，荒山野岭的倒也好办，自各刨点地，栽点树，一年年糊弄着把日子过起来。打土改分地开始，慢慢有家户往山下村里搬，到50年代，又是全村入社，又是大炼钢铁，最后是修上了水库，也就全搬光了。再往南，翻过山就到了八区姚家谷。八区地势险僻，战争年代一直是老区根据地，所以翻过南岭的这条小道其实很繁忙，曾经是递送公文信函、转送伤员粮草及干部兵员转移的路线。往北远些地方是茅山，从土匪到游击队，不管哪杆子队伍都喜欢在那儿安营，也是村民砍柴的去处。东边四卫所边上有个大名胜景忠山。明嘉靖年间蓟州总兵在山顶建三忠祠，供祀诸葛亮、岳飞、文天祥，取景行义，得名景忠。旧时每年农历4月18日和10月15日大行庙会，每次庙期前后半月，京津一带乃至内蒙、关外，远近香客云集。山脚下搭台唱戏，各乡花会一路逶迤闹来，声势之盛与京郊妙峰山并称。

西村就这么蹲在两山之间的狭长平川地带，50年代前，夹杂几处瓦房大院的两大排低矮茅房护卫着东西驿道穿村而过，迎来送往了不知多少春秋。这条道是娶亲、逛集、赶花会、上县城的必经之道，为村庄带来许多热闹，却也引来了一路路兵马。它们名目繁多，胜败不定；有的半日内劫掠而过，直奔城池，有的数年间安营扎寨，挖沟筑垒；凶善好坏虽是难论，人财负担却少不得。进退之间，村庄就这样不经意地见证了治乱兴衰的大势。道北中心上，相隔不远有俩小庙：一座是五道庙，是死人报丧、停柩之处；另一座是菩萨庙。不知从啥时候开始，两座庙日渐萧索，不时有些过路穷汉胡乱歇夜；一些打算在村里落脚、等人来雇的逃荒户，一时糊弄不起小草房，就在破庙里安营扎寨起来。庙前三棵大槐树，树帽子老大，成了村民聚集歇息的好处所。所以这庄最早叫三棵槐。解放前树下设有赌局，歇晌时多有来此赌上两把的。常有砍柴的路过，手痒下场，兴许就输了上午的柴钱，也就只当晦气，下午再赚回那半日辛劳去；而村东头大院里的黄家财主偶尔也来凑个热闹，反正是图个下场痛快，又管和谁赌呢？40年代后，这几棵树下慢慢成了开会的地界。庙也无声无息地荒弃，一点点盖起了房屋，现在的村民只知道停柩的地方越挪越偏，送葬的戏班越吹越远。三棵大槐树也被伐去盖学校了。<sup>2</sup>

<sup>1</sup> 出于研究规范考虑，本文所涉部分县、区、村名和西村村民姓名皆做了技术处理。

<sup>2</sup> 有关近现代华北村落外观及庙宇分布的一般情况见从翰香 1995P70-6 王福明专章。华北村庙有着特殊意义。约从 19 世纪后半期开始，围绕村庙的建立、维护和祭祀，村落内部发展出自治组织。乡村组织是在村落发展到一定阶段、规模（原有官方组织不足以维持和调节村落内部生活秩序）后才产生的。但西村几座庙即使曾兴

西村与其他村有许多地界与“行政”村界不符的插花地，其中与东村相互插花很多，与康平村也不少，与应家谷较少（据说该庄较穷，没啥财主，欠外庄地多，在西村地少），与姚家谷因隔着南岭，没啥插花地。48年土改时全村约1800亩地，皆自分。<sup>3</sup>

西村地当要冲，又因东西两村相连，较易腾房，故早先赶会的在此歇脚，少不得演上片刻；唱皮影的也常来。景忠山赛会时村村不同，竞相斗妍，什么少林会、小车会、毛驴会、摔跤会、旱船会等。按西村人自己说法，西村龙灯会满县出名。耍龙灯时各人自有专擅，当下还有村民津津乐道“林银的龙头、黄龙春的龙尾巴”，向访谈员比划象腾跃高桌之类绝活。东村财主黄祥清（村民对其甚是礼敬，尊称谷四老爷）酷好皮影，自置有影箱。西村除了来村演出的皮影，自己会唱的倒也还有几位。许多老年妇女和少数男人一辈子未去过庙会，但可以晚上在村里看影看个痛快。<sup>4</sup>间或还有些新奇玩意儿。1915年生的冷向仁在被我们问起小时候有啥好玩事情时，还清楚地记得外面有来跑马戏的，“妇女把自己拴在马上，在街上来回跑”。

## 一 五大家

打打杀杀老林家  
心闲无事老黄家  
吹拉弹唱老支家  
描描画画老董家  
尖曲孽道老冷家

——西村村谣

至少从本世纪开始，村里形成了林、黄、支、董、冷五大姓。上面这首口耳相传的歌谣便是好事者不知何时谱出的五大老户的面貌。黄、林两姓人口众多，但也较杂，包括数门大族和一些杂户，大族中一般也再分有些支脉。而支、董、冷三家较纯，原本都只一大家。除被定成地富的黄家大院里那支黄30年代起陆续迁出村庄外，其他至今一直较稳定。村民在访谈时，常会以谁跟谁是不是一码事、是不是一个黄（或林……）来表示远近，很清楚旁人（即使与自己非同姓）之间的亲疏及个中意义。虽说如此，我们很难直接从访谈中推出意义的具体所在，因为“没有事情”。不过，即便多年浸淫在阶级话语和政治逻辑中，如今的老村民在讲述当年土改定成分、分地及其后一些政治运动时，依然隐约体现出家户间亲疏感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至少从30年代以来，西村基本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宗族势力。许多人家最初是从外地逃荒而来，故此几乎全无族祠、族坟等说。偶尔几家老户迁自本县，还多少留有合族祭祖（或派代表回原庄参加仪式）的记忆，也多随战事之起而趋于衰亡。至于族谱，我们在西村遍寻不得。只有村干支国说收有一近些年另修的家谱，但几番寻找不得。此人文化不低，细心周全，尚且如此。一般村民态度可见一斑。

先来说说“心闲无事”的老黄家。虽然黄姓很杂，光大家便有宁河黄、罗秀庄黄、黄老庄黄等三、四家，但一般只指原先村东黄家大院财主家，也只有他们才似乎配得上“心闲无事”。至少就经济势力而言，日本人来前他们曾是村中首户。后来叙写历史时因为阶级话语的推导，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村里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首户。20年代分家前主持家业的是绅董黄思善，占了全村1700多亩地中的1300亩（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75P2），照书上意思一点儿也

---

盛过，其实况及有关组织活动也已不可详考，只留下一些求雨方面的大概记忆。

<sup>3</sup> 不含本村地主在县内其他地方的地产。一说最多时2100亩。此处差距或在于是否包括其他村子的人在西村的土地。后一部分土地土改时是否确实返回原村待分不可一概而论。

<sup>4</sup> 庙会是最容易想到的村庄“公共事件”。方惠容1997P24注提出，最初想把景忠山一年两次庙会期作为西村公共时间，但发现村民常无法准确说出某事是在庙期之前还是之后，故推出庙会并未构成所有村民年周期中重复事件序列更替的标志事件。但问题在于，方试图以假想中公共时间标准来定位被访人日常生活情节，已预设了公私之分。在谈所谓“公共”领域前我们首先需考虑公私之分的产生，及公共时间及事件如何开始必然成为私人时间及事件的定位标准（其实这是方文贯穿全文的论点之一）。同时，日常生活情节与私人生活事件之间尚有相当距离。可以考虑私人生活出现与公共领域凸现之间相互构成、强化的关系。

不思善，只想着如何剥削村里穷人。分家后家业最大的是黄龙林，在县城开了钱粮布店三处买卖，人称米蛀虫、黄三趁，一是有三处趁钱买卖，二来他正好也排行老三。村里的黄家场面并不太大，不养骡不经营车，就养活驴和起租子。积极分子贾秀英 48 年土改高潮时被工作队发展入党，后任妇女主任、妇女大队长，在她眼里，地主确实可恶，剥削逃荒来的父兄，但是：

地主也没俩老婆的。也没使唤（丫头），就伙计，打更的。护院也就一个，没管家。没修炮楼子。那院墙比一般的墙都高呀。那比较着在咱们庄里算是地主，在大城市谈不上地主。婊子面拔将军不是？<sup>5</sup>

他们那时候生活好，他们要攒钱置地，也就当家的吃点细粮（黄宗平）。

穷家主的媳妇钱周氏则认为那些富家主非常“歹毒”：

富家主他不搭咕穷家呀。穷家主那点地，他今几个也画圈，明天也画圈，画来画去就画他手里去。置他手里去。穷家主把地出给他了，有限点钱……先头那财主家，冬天他不干别的，就是成天的上穷家主画圈去……这就作一天伙计，背着锨杈子给俩钱，日头没了，上午不让上家，早起在家吃一顿饭，晌午了给送饭去。后晌不是，这就没饭了，给你俩钱，去你的吧，扛着锄头走了，后晌没饭……财主家地主可歹毒了。那叫妈的，早起吃顿粥，撮咸菜。这晌午做顿干饭，点两块豆腐，这算中了。

不过，无论是干部、积极分子还是普通村民，普遍看法是本村地主实在算不上什么恶霸大地主。大院固然不是高门深院，过日子的气派也很是小儿科。正史里说的炮楼、护院是 30 年代土匪多起来后才有的，狼狗也只是比村里其他狗更凶一点。当然也有大家非常痛恨的，如思善儿子老六黄继亭，人称贼六子，村民还记得他许多坏事。但几十年后的访谈显然不同于当年的诉苦，反多了些轶事性质：

贼六子的贼就是忒坏的意思。起粮的斗进出不一样。秤要买东西加铁片，卖东西就把铁片撤了。四几年跑县城，由县城跑北京，文化大革命又被逮回来（董印）。

贼六子大伙都恨。他大哥的地和他的地是一块儿从东村置过来的。黑间儿他还上地里挪他大哥的界石。那晚上我们在看树，说地当间儿是谁呢？那时候是春天，他口袋里背着种子，一点点给你种上（冷向仁）。

思善的儿孙辈到土改时大多已离村，其中黄延清后来“在唐山日本航空部队里当秘书”；黄延平在邻县买了个警官，这两位日后与西村还大有干系。土改时在村接受批斗的只有俩孙辈：“肉头”黄延田和“歪脖子”黄延藩。东村地主也姓黄，据东村我党老办事员冷向清说：

黄祥清家后来被定的地主，照西庄黄家还穷。那会儿地主跟一般人处得还中。他们家人缘不算忒不好。这儿没有护院的。住的是瓦房，四排，就一个儿子（按：故分家压力不大）。

思善同门同辈中还有一位叫黄思忠，35 年左右 94 岁时过世。其妻家兄弟为京城翰林，思忠独子黄继清也是秀才，51 岁就过世了，而他四个儿子中，长子、次子分别于 36 岁、32 岁去世，皆无子，家产分归四子季英和三子叔英。据 65/4/7、6/5 查证：1920 年前思忠主持家业，有 250 亩地，37 间房，雇 10 个工，19 头牲畜及羊群等。后因季英抽大烟陆续折卖，25 年分家时只剩 85 亩地，除思忠留 40 亩养老外分作四股，叔英分得 15 亩。次年叔英以 27 岁之身过世，留下 8 岁的独子宗藩。别看这家似乎人丁不旺，但正是叔英留下的这个儿子，日后主宰西村数十年，西村也因他成为远近闻名的典型。如果没有他，本文许多故事不会以这等面目发生；如果没有几十年来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来回告状、查证，本文许多材料也就根本不会存在。

据宗藩两份自填履历，他生于 1919 年 8 月（58/12/12）或 10 月（60/1/15），家庭出身为农人（58/12/12）或贫农（60/1/15），本人成分贫农。具体出生日期无所谓，许是阴阳历换算原因；而出身是含糊的农人还是具体的贫农就大有讲究了，我们日后将看到围绕宗藩家世展开的种种争斗，此先不表。土改前他家有瓦房 2.5 间，地 9 亩，勉强维持生活。土改后房不变，

<sup>5</sup> 本文引文若只注人名（或据上文可直接推出出自谁人之口），均采自 96、98 年西村实地访谈的口述录音整理（参附三），省略之处未能一一注明，而添加之处只限于笔者以括号形式所作说明，以便理解背景。若出处以年/月/日形式出现，参附二。若引文出处以人名加年份形式出现，参附一。

地 14 亩，达到当地中农水平。而据 65/4/7、6/5：他家以其父过世后那 15 亩地为基础，至 39 年增至 22 亩，至 47 年土改时实有 27 亩。这就绝非贫农了。季英一家境况又如何？

黄季英抽大烟败了，正房 5 间、厢房 6 间还有几十亩好地都抽了。败了后把闺女卖到黑驴沟。媳妇死都埋不起，使卷席埋了。宗平、宗智两孩子都小，十来多岁就扛活。法大纲不让抽大烟了，抽要活埋，黄季英烟也忌了，俩孩子也成事了，都学打铁。分房子分地（董印）。

为啥败家？那三七六二五八，都赶一块儿了，该着败家。三年死了十来口。一看爷爷奶奶都没了，就剩他自各，还干啥呀？连吃带喝花吧。爷爷就败家，赶到他败个小尾巴（黄宗智）。

咱家定没落地主，后来落实政策定的贫农，其实是雇农。那时贫雇农都一样讲（黄宗平）。

正应了村民林起明说自家那句话：没耽误受穷。季英赶土改前抽败了家产，连没落地主都没挨上，虽然后来父子流离外村，总算有门手艺，更没受皮肉之苦。解放后宗藩成事，宗智回村打铁，宗平则在邻县打铁，以公家人身份退休回村。总之，这一家终于没落到大院里亲戚（据说正在五服上，故成为查证焦点）那般下场。

“打打杀杀”的老林家据说 480 年前打宁河县迁来，分三大门。因年代久远，人丁杂多，又无家谱，只能分出个大概。大门出了开大车店的林增，生下十个儿子，又在村西大道南北盖起大院，南院住家，北院开店。林增被唤作林老福，因他创下偌大一份家业，人财两旺；又被唤作林老虎，原因见下。俩称呼音近义通，竟不知孰实孰讹。林忠是我们访谈时他仅存的孙子：

爷爷开大店。大车由唐山那边过来，总不断。客人总住个三四十口子，管饭，多少钱说不好。口外都知道林家店。有的客人从口外带来大烟，因为这儿有金山寺刑警局，就寄放在我们这儿。父亲老九。哥们多，有开店的，扛活的，做买卖的，还有抽大烟的。<sup>6</sup>哥十个绝了五个。只有九房人多，到现在 70 多口。我这辈 20 多个剩我个了。后来没有车了，不拉脚了，就关门了。爷爷给父亲他们分家，把店分给我们了。父亲好交朋友，让人拐骗，出了地，又病了，把房子也出了契，四十上岁就没了……

一家的盛衰，原来真可以几句话就叙述完的。下文会知道为何道上逐渐没了赶车的，先看看当年林家村里的盛势。日本人来前，林起洲父亲和大爷（即大伯）分别在陈家谷和县城有买卖铺子，爷爷是林老福的三子。他至今还甚是自傲：

一直到北蒙，只要一提我太爷林老福，大家都知道。有钱没钱，你只要提他，没问题。另外那阵儿县里这县政府、警察署什么的我太爷都会维持，对这店都挺好的，不敢上这敲诈来。对庄里我太爷也有威信。

支瑞万从土改开始就负责提人上刑，横了一辈子，这个多年的民兵头说：

老林家人厉害着呢！老社会他们那老哥十个那时候，谁也不敢和他们打架。一窝都上，拿锨拿镐，菜刀，铲子，就和你死着干。现在好了。

不管有多少人，到三四十年代确实是衰败了下来。林家大院其实就是开店，地只有百八十亩。31 年生的林起友小时还在店里干过几天，他是林忠的亲侄，当了几十年大队长。按他的说法，要不是爷爷后来被坑骗，肯定是富农。爷爷死时只有店，连埋的地都没有，还是林忠妈妈给林起洲爷爷磕的头，好歹算埋在他地里。

二门虽没有大门这般齐整，但几乎出了各色精英人物：前后会首、八路情报站长、游击队小组长、著名匪头、贫农团头目……再没他们这样复杂的“立场”和“下场”。在我们叙述的这几十年里，大门的“哥十个”已退出舞台，真正在前台“打打杀杀”的是二门人物。

其他三家我们一笔带过，因他们在三四十年代既无黄家财主的“经济”实力，也无老林家的“社会”势力。在这篇谈“政治”的文章里，这些“文化”人物似不应有多少地位。话说回来，又怎么可能替当年的村民区分出这些范畴？“吹拉弹唱”的老支家是音乐会主力，三四十年代出有“四大吹”，其中一位据说还是四下乡里总教头。还出过当年村里数一数二的唱影好

<sup>6</sup> 当时冀东大烟盛行，市镇中许多日人和韩人开设面馆。农村中抽大烟的也不少，林家大店显然是从长城外走私烟土到内地的一个站点，林忠说：“庄上也有抽的，那时候好买，庄上就有卖的。我六大爷儿子就抽，两毛钱一泡，一泡抽一顿，上午一泡，顶事一天。抽大烟没有过好的，都穷了，都败家了。‘不抽大烟不算阔，抽了大烟就挨饿’。黄家地主不抽”。

手。虽然有些一辈子只知闷头下地干活的老实人在谈起村里闹会唱影的主角时，颇为不屑地说这都是些“玩家”、“扔货”。但无论如何，在如今村民作为传说讲述的昔日故事中，这些人为逝去的晦暗不明的生活增添了亮色，传说的讲述者似乎很乐意和这些“有意思”的人同享一脉村庄历史。<sup>7</sup>“描描画画”的老董家和“尖曲孽道”的老冷家特点不象其他三家那么明显，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是为了凑成一曲村谣。最早向我们讲述这村谣的正是董家人，他们很出了几位好记性的有心之人，本文许多不见于正史的资料，比如三四十年代的房屋座落、各户家底乃至野史逸闻，都来自几位董姓受访者。“尖曲孽道”是土话，含意丰富，往好了讲是持家心细，会过日子；照损里说则是心重，爱算计，抠。奇怪的是老冷家当年日子最硬（家底最厚）的冷恒合人缘倒是最好，而比较抠心眼的家户却是穷得谁都不怕，后来在掌权较长又最招人厌的三个村干部中，冷家就占了两位。

对五大家的介绍就此打住，下文历史叙述中重要人物将陆续登场。我们再次强调，至少在三四十年代的西村，几乎体现不出典型意义的家族势力尤其是以家族本身为单位的具体活动。学术界大多认为这是华北农村的普遍现象。华北平原村落多为明初移民所建，历史较短，流动性大，缺乏南方那样历史悠久、结构严密的氏族组织（从翰香 1995P115）。华北单姓村少，阶级分化一般不甚明显，人多地少，几无家族财产。普遍贫困之下，家族活动尽量简省乃至趋于停止。同族成员间虽仍感亲近，但无经常性公共活动仪式，战乱年代尤是，即便曾有过族祠、族坟、族谱等，也渐渐形同虚存，随岁月流逝而不知所终。与此同时，许多村内经济协作或互助并不在同族同门中进行，许多人并不愿与贫穷族人合作。当家族成员间经济差别发展到不能或无力互助、而又无必然利益驱动族内大户建设及维持家族活动以赈济族内穷户时，家族势必趋于分解。其实，在村落中会因互助换工、人缘地缘（邻里）、社会阶层相近等因素形成许多“家庭群”。如家族成员更多是通过非家族性的介入或协调满足物质生活、生产协作、交往诉讼乃至社会活动等各方面需要，则其对家族的归属感不会很强，家族对其成员社会生活的制约面不会很广，在村庄生活中的协调能力和凝聚力也不会很高，这又反过来使家族成员更多求助于非家族性力量。久而久之，家族成员间的结合会变得松弛，以致家族本身有名无实乃至名实俱失。一些调查发现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中族长渐成历史概念。即使一些同姓比例很高的村落也无所谓族长，续谱活动极为少见。甚至连清明祭扫时合族吃寒食所赖坟田也逐渐被分析变卖。满铁调查中 6 个村庄无一家族设有共同的谷仓、学校或祠堂，或在自然灾害时赈济，平时也无援助贫困族人惯例。按秦晖的总结：关中模式地权分散，多自耕农，多行雇工制，基本属自然经济，宗族组织不活跃；太湖模式地权集中，多佃农，多行租佃制，商品经济，宗族组织发达。华北村庄尤其西村基本符合关中模式，只是有些地区商品经济较发达（参黄宗智 1986P247；秦晖 1998；秦晖、苏文 1996；魏宏运 1996P365 以下尤 P373；杨懋春 1980P37-9 等）。

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家族势力在华北村庄不起作用，或许会对判断日后村庄历史尤其政治生活的走向形成误导。可以考虑：以往对家族势力的理解是否只在相当程度上依照华南、江南等地研究而言？而对华南、江南这方面的认识是否也存在刻板印象？华北村庄本世纪以来历经义和团、军阀大战、日本入侵等战事，家族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否会产生变化，以求适应新的外界环境及人们的意识？对尚未接受真正具有冲击力的外来政治力量考验的村庄而言，如何在缺乏事件冲突的平静生活中判别家族认同这类范畴？杜赞奇指出，如若在研究华北普遍存在的多姓村乃至杂姓村时能摆脱一族统治村庄的旧思想，会发现家族虽未拥有巨额族产、强大的同族意识，但仍起到具体而重要的作用。即使当外界环境剧烈变化，如日军较彻底地推行大乡制（见下），家族势力一时会被排挤出政权组织；但此后也可能向村外发展，以适应跨村界的大乡制（杜赞奇 1994P82、102）。而柯鲁克夫妇在描述一个普通村庄的土改过程时则如此评价家族势力变化：祭祖活动乃至意识渐渐淡薄，家长制被削弱，村政府负责收税，村办小学开课，互助

<sup>7</sup> 赵树理小说《福贵》中，聪明伶俐的福贵因生活所迫，去城里给大户人家办丧事时当吹鼓手，被村里族长视为合族耻辱，村民也看低他。但在西村，音乐会吹手至少不是贬词。有关河北乡间“音乐会”组织的严密性及其（比起吹打班）较高的地位，参乔志强 1998P728 以下。

组解决农忙季节缺少劳力和牲口问题，故家族组织日渐失去曾担负的作用，家族忠诚慢慢让位于阶级团结（柯鲁克夫妇 1982 节 1）。总之，家族势力的作用及变迁问题势必落在外来力量对村庄的渗透及村庄的反应上，要看外来势力的实际性质。

三四十年代村东头东西村合有一工夫社，给人打短的天不亮就带上干活家伙，早晨聚齐等邻近雇主来雇。此处原是一土高台，两侧多有炸果子、摊煎饼、卖零肉之类摊点。在村里，支柱林父亲开香油坊，支瑞亭漏粉、摊煎饼，钱家海家开小铺，林起华家甚至在外村有买卖，这几家后来都被划成了上中农或中农。而象黄得兴老俩口和他兄弟黄得发这样人开的油盐酱醋铺子，就只是维持生活，后来都绝户了。此外，像董印等许多人有时也“客串”烙烙煎饼。个别如黄俊满曾跟大车去天津做南岭果品买卖。在村里大白活<sup>8</sup>阳有志说来，土高台两侧的摊点是繁华的集市，一直到 49 年（这正是建国的年代）都满街买卖。他似乎只顾向访谈员和一群听众展示自己对村中旧事的熟知，却忘了话头提起时是在塑造村庄过去的困苦生活。董印则说：

东西村桥头没集市，大土坎是老黄家砌的，当胸那么高，两边是台阶。下面有沟。工夫社都是老黄家包市。外庄来得多，早起日头出来以前都来，日头出来就下市，没人了。治安军来以后庄里就没有小铺了。

当年冀东农村外出当佣工者一般在农忙时每天清晨汇聚一特定地点待雇。雇主是邻近经营地主及自耕农中的富农和中农。双方口头议定条件后，佣工即随雇主到农田干活。雇主监督短工劳动并提供一天三顿饭食，支付现金工资。因农忙时用工较多且急迫，短工待遇优于一般年工（参乔志强 1998P214 及上文钱周氏口述）。故冀东短工多于长工，日后土改时村中较少长年在一家干活的雇工，土改定成分时未另划雇农。黄臣说：

我父亲不扛活，扛活让别人拴着。我们是散跳，不打工的时候上山割柴禾，不让人家管着。一天弄的也兴够一家人一天吃喽，对付着活着。你要是做长工，人家给你一炮，你花没了就没有了，干绷绷给人干活，你就是想上哪儿去你也去不了。

冀东男性村民这种好流动的特点有其客观的背景。华北成年男子年可耕 15-30 亩地，而据 30 年代冀东四县考察，户均土地 17.55 亩，人均 2.34 亩，最高的归远也仅 3.2 亩。三四十年代各县均有 10-20% 家庭或人口根本无地、租不到地或不能受雇而被迫外出谋生。加之冀东地邻京畿，当东北与华北之要冲，交通方便，商品经济较发达，闯关东与习商成风。自耕农转化为部分或完全脱离土地所有，贫农每年以部分时间外出佣工，许多村民与村庄整体关系逐渐松弛。村中剥削关系通常藉租佃、雇佣劳动和高利贷等“正常”关系进行。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黄宗智 1986P30、66、254；魏宏运 1996P139-52）。

农民单靠农业生产原本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须靠乡土工商业补充支助，华北农村形成一种自然的循环或交换流动模式。一些人在农村社会等级结构中向下滑，留下空间由另一些上升小农填补，维持乡村阶级结构金字塔。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大转型打破了这种动态平衡，洋货冲击，税赋日繁，兵患连绵，商业手工业凋敝，灾荒承受力下降，农村经济总体趋于崩溃。农民整体上已无法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出现急剧的大规模下向流动，上下层农民皆难维持原有社会地位（参乔志强 1998 P233 以下）。如黄宗智分析满铁调查 9 村，1890-1900 年有 19 家占地百亩以上富户，至 30 年代仅存其 3。总之，整个经济背景都决定了冀东大地上很难孕育出较强的家族势力。

## 二 会首、二县长与费小人

现下村民提起闹会唱影，常说的便是老会首景二爷。他就是林奎父亲林景河，兄弟行二。会首管什么？演皮影时全村凑分子、招呼唱影吃住，闹花会时负责招待过往，少不得也是派往派吃，按支柱林话说，“就跟当下支部书记似的”，但没听念叨过谁家有个矛盾会首去管。支

<sup>8</sup> 相当于京话里的侃爷，他熟知村中掌故，富于表达，能掌握说故事甚至在当事人在场时替之说故事的权力和权利，村人也乐意听他讲，因为那会“更有意思”。

瑞万就很佩服林景河，当年支家音乐会众好手与老会首之间的关系显然不错，庙会把大家串接在一起，使大家能够各展所长：

林景河是我们庄老会头。会头管会。啥都管，谁也怕他。他也不打你，也不骂你，就说把你说服了。后谁都干吧。林宝干过。我干过。没会了就没叫会首的了。当下就是轮着干了。死人了找治殡的，娶媳妇的找先生啥的。那算啥了？

支焕生于34年，他家里太爷支满也当过会首，大爷就是开铺子的中农支瑞亭，交际甚广，也是大佛教头目（下文会提到这种“名分”的意义）。支焕家倒是贫农，也顺利入党提干，但不知是仍有顾忌还是确实不知，他并未直接提到自己太爷和大爷的角色：

过去当会头的也没人开工资，找帮人娱乐娱乐。会头心里有数，谁家穷的，去了给点儿就中。要是中等户，富农，就多要点。那时候都讲粮食。到我们家来，使那小碗，挖一碗，倒上两口就中了。他就背着口袋，各家挖上点。大的就得使牲口了。

我们不太清楚支满和林景河孰先孰后，其实一个庄也不是只能同时有一个会首。由于会首不只是管闹会唱影时敛钱，所以四十年代前村里还有别的会首，比如支瑞万提到的林宝，其父林诚存也是老会首，诚存长孙林起明说：

庄上现在有红白喜事了，就找我给落（音烙）忙去。我们是分文不取，就是帮忙。我再忙也撂下。原来是我爷爷操办这事儿，操办一辈子。他是办好事的，有钱家他不去，都是最穷家他给落忙去。过去人不是最穷吗？人死了，也没粮食，也发送不起。一粒粮食都没有那个户，庄里就是他操办去。不用找，他都是自动地去。一去就问：“发送得起发送不起啊？”“发送不起！”“不怕，拿着口袋，跟我去啊！”他就领着，过去这财主、二等户这户，他就领着绕那么一圈。进去二等户家吧，“发送不起了，给搭点米吧！给磕个头儿！”就给开五升米，孝子就磕个头。一圈，一口袋米，也就是150上斤吧。二等户以下都没粮食吃，他也不去。他是敛完了粮食，给找板，找木匠，连杠带木头带绳子，啥都给服务了，那东家最满意了。那时候当街还有卖棺材的，特别方便。回来花二斗棒子，60斤，买一付板，找木匠给钉上，当天就给埋了。小米是连客来，带拾冢的，干饭，熬点白菜，饽饽。这就给埋葬了。因为这个，老爷子特别办好事，人人都喜欢他。喜事不大操办。实际我也不是林宝培养的，我叔叔想着把他儿子培养，弄两回不好。你总而言之呀，咱们这个为人民服务，还是好事不是？反正我没拿钱，给我们也不要。你说咱们这么大庄，也不找张的李的。因为这事儿咱们人情好，没人骂咱们。林宝他爸爸那人情可好！我们办的是一样的事儿。

这段话清楚地概括了一个会首世家的继替。诚存的地位或不如景河那般正式、体面乃至显赫，但会首本非一正式职事，而诚存老爷子的作用更切近普通村民，使缺乏家族赈济习惯的西村能更润滑地运转。没有谁规定当诚存上门敛米时富户们必须给，但在没有太强大的外来力量冲击之前，人人都喜欢的事情是必然会维持下去的，正如它必然会以某种方式、借助某个似乎是勇于出头的人创造出来一样。林宝是解放后干这事的了，不过毛主席老人家在的时候，大家一切从俭，加之村里其他正式官职齐全且管事，他并无太多作用。80年代以来丧事开始奢华，讲究仪式，他也就愈发重要起来。林宝的权威也许兼具其个人的魅力和乃父的信誉，但他自己的儿子办了几次丧事没弄好后，侄子起明偶然被推到前台，并自然而然成为第三代执事者。<sup>9</sup>此外，在诚存之前还有一位办红白喜事的会首，村民只记得他外号叫狼咬。支焕说狼咬手艺全，连操办带厨子都会，还有文化，自己父亲就在他那上过冬学（而诚存父子都不识字）。

不管红白喜事和闹会唱影孰轻孰重，总之日本人来后庙会不闹了，皮影唱得也少了，红白喜事操办起来自然也不会太铺张。林景河和支满同于40年过世，狼咬更悲惨，次年据说是因饿得受不了服毒自杀，死前还用最后俩钱在集上吃了个“饱”。听听董印的概括：

---

<sup>9</sup> 林宝下过矿，当过民兵连长，总在我们预想不到的地方，以既非干部又非主事者的身份出现在许多村民的讲述中。他似乎是村里与之年龄相仿的那批人的小头目，一个喜欢搞出点事的有趣的人。遗憾的是准备访谈他时他过世了。此处重点在解放前，故不详述林宝和起明的作用。必须指出，起明并非因更熟谙仪式才挤掉（如果认为这种获益纯在于人情的职事值得去拼争）林宝之子的，因为他改革了丧事中许多具体做法。可对比景军有关熟悉典仪的老人在重建孔庙的过程中重获权威的分析（Jun1995）。

有八路军起就没会首了。老会首就是给村里办事，交个税啥的，就跟干部一样。一庄有一两个会首。林宝他爸爸干过，村里有个啥红白喜事都是他张罗。办事员不管红白喜事。会首就是按户凑钱，过去都是按地亩数摊。（他们都不是有钱人家，是吧？）那可不？（那为什么有钱人家不干脆呢？）那不干。老黄家财主没当干部的。有钱有势的他弄那个？费远盛是有求他管，平时他不管——人家是有钱的。（那当会首的有什么好处吗？）也就是给点好处费吧。群众按地亩摊啊。地多就摊得多。（那他们也去找地主摊去？）那可不？东村会首是张保第，外号叫庄主，那是一庄之主嘛。他是中农，以后不干了，就给日本采金公司踩线去了。（那老会首是大家选的还是自各当的？）那时候没说选的，就是自愿当。（谁愿意当谁就当？）那可不？都是一张罗就干呗。（有没有大家有意见的会首？）咳，是当干部的没有说群众都满意的。对他好就觉着同意了，对他不好就觉着不同意了。（有没有不同意的？）那他也不敢说呀。（那以前当会首的和地主有什么矛盾吗？）那——没有。这庄地主没干过（会首）。

董印的话掺杂了日后对共产党干部和政策的印象。会首和正式干部的权威基础不同，前者来自村民，后者来自政权或政党组织，故村民不可能也无须对会首抱有如董印所说的那种畏惧态度。就连他自己也说，象地主这般有钱有势的不“弄那个”。会首确属自愿的，“一张罗就干”，也确实视家底决定敛钱数额，但董印所谓按地亩摊及好处费的说法，显然混入了日后乡保长收取辛苦费和共产党合理负担政策的记忆（当然也不能断定会首就一定不是如此）。他提到东村会首，是因闹会时东村也得出一人联络。不过所谓庄主并非外号，下文会看到那是晚清以来的正式职事。至于他说的费远盛，那是庄里另一位即非地主又无正式职事的头面人物：

费远盛抽大烟，是二等户，外号叫二县长，费知县。他们院叫县衙门。能说能干，有文化，会写呈子打官司告状。老黄家这么大势力，他敢叫仗，官司打赢了，一直打到天津。黄家地主都怕他。老费家就费远盛一家可以，就是打官司告状，走大烟，富起来的。东院老费家哥几个都连抽带耍弄穷了。那时候庄里打官司不少，土地房子纠纷，打架斗殴讹人，穷不是？那有架不是？（董印）

原来是我们一向说的村里包打官司的讼棍。费竹林是上任村长，其父曾是费远盛的长工和养子，据竹林说费家原本在东西村都是大户，但太穷，人丁不旺。只出了费远盛这么一个无赖人物。大伙都说他的发迹是替口外朋友卖300斤烟土，没给人家钱，从此有了继续讹人而不怕被告的资本。阳有志说费远盛曾骗了外村果农的货，自己卖了却没给人钱，别人告到县衙：

那时是大六月，来了俩班头，打听谁是费远盛，那人说就是我。俩人说就是你呀？好！就把手枪掏出来了，说有人把你告了。费远盛说是，我坑了人家，挨抓是应该，说你们大老远的30多里地到我家门口，当差的也是辛苦不是？咱们到家点一炮松快松快随便聊聊。让家去了。这是个小锅子，一边一个大烟灯，一边一个大烟枪，这是行李，那搁一枕头，往这一靠，俩么就靠上去了。抽足了，一人闹一块大烟土。“这是客气啥！”一人给块大烟土还不算，就这么一个红包，全是现大洋，说这个回去给县长，有两个小红包。你们两个是喝酒去，走吧！回去把衣裳换换，咱们走吧。我见你们县长去！这俩班头当真了：做啥去？家呆着吧，没你事儿了。班头走了，把他扔下了。县长把这大红包一得，啥事儿没有了，官司了了。这人是一不做买卖，二不置地，三带不（正经）挣钱的。为啥说他手眼通天呢？那是有名望。都说是家里有事了，挨欺负了，再恶、再不好办的事儿，他这一到归远县那儿一说，官司赢了。要不管他叫二县长呢。这人吧，咱们在这儿说，虽然是死要坑人家，但他待庄里还是不错的。他人好就好在这几了。不管咋说，庄里谁有大的小的难的，推着官司遇上麻烦事儿了，只要找着他，他都能给办喽。当地能办，他一说就化了；遇上大官司了，他上归远县长那儿也化了。

阳有志在一群人的簇拥下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讲述中旁人不断哄笑并装扮班头应声，显然这场戏常演不衰。讼棍、官府和捕役之间权钱交易的丑恶，缺钱少势的劳苦百姓任人鱼肉的悲惨，在富于戏剧情节的村庄掌故中化作了讲述的轻快、聆听的愉悦和对愚弄捕役及其代表的官府的心驰神往。费远盛靠着对外的无赖、对上的打点和对内的袒护混得有滋有味。是否确如董印所说曾与黄家财主打官司已无法考证，但村民皆称地主都有求于他，当年想必有一番较量。

日本人来后慢慢听不到了他的声息（也没当汉奸），土改更终结了他的好日子。费竹林说：

费远盛解放前不下地，雇工夫，贩大烟，法大纲以后那都完了，分地以后他穷得要命。（分没分房子？）他房子根本（按：即原先）就不多，住的是草房，都吃了去。

但多年的护庄仍然给他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他的下场在所有被斗地富中相对最好：

都说土改 48 年那时候把大地主都圈起来了，就是让交财产不好好交，净挨烙、挨吊、挨揍啥的。费老四你说谁捆他谁烙他来着？村里宗藩、黄荣他们这些村干部都不降伏（按：即无所顾忌地对付）他，帮着拉着他。就没收他财产得了。根本都没捆过他，不搭理他（阳有志）。

费家还出了一个象费远盛一般“不正经”的人物，好几本正史提到了他，因为这是典型的狗腿子，跟着地主收账、划地、写契，他叫费泰，因个矮，心眼又卑琐，得号费小人：

费小人尽给地主溜须拍马，能说，识几个字。黄家地主置地买房都找他（董印）。

他想必便是上文钱周氏说的给财主“画圈”置地的那家伙，但并未在东西村舞台上演出过啥重要角色。在会首、讼棍、大车店主、财主等组成的乡间权威网络里他只是个跟班。我们且慢说这些人物是非正式精英，虽说他们没一个有正规职事。这些精英和非正式组织形式的产生与西村地主和家族势力不强有直接关系。一般而言，地主控制资源范围越小，资源越不重要，资源垄断程度越低，农民之间就越有可能产生负担风险、互助合作和相互依赖的社会组织。<sup>10</sup>

那么，日本人来前，西村所在的这片土地上到底有哪些正规职事？闹会唱影之外，是否发生了些足可作为重大事件记载的事情？

### 三 世纪初叶的村外历史

回到以世界历史为背景、阶级斗争为脉络、重大事件为血肉的正史层面上，归远何能是世外桃源？归远农民又怎能不和他们劳苦的同胞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县志的编纂者们很负责任，不仅忠实地叙写下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浪潮于 27 年无例外地在归远点燃的火种，而且记录下本世纪此前那些岁月里归远农民留下的“可歌可泣的革命行动”。百年前的 1900 年，义和团风潮波及归远。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一队侵略军东进开抵归远城，在州官协助下捕杀团民，烧毁团所。<sup>11</sup>归远就这样被推进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1908 年，以尚店村秦二雄等为首的 28 村村民因反抗加派果木捐起事。州官虽派兵杀害秦二雄，但乡民继续聚众 3000 多人，迫使州官答应免加果捐，并为秦立祠树碑。1909 年归远州始设巡警局。次年因州官增派警务捐，以三官庙村杨秀等四人为首的 50 余村农民联合反抗。州官诱捕前三人，秘密解送省会保定，后杨遭杀害，余二人判刑。1919 年 6 月，在五四运动浪潮中，县城内省立五中也响应全国学联号召上街游行。当然，我们已无法从村民记忆中推测这些斗争当时与西村的关系了。<sup>12</sup>

西村本世纪首次遭遇大战事是在 22 年 10 月的直奉大战，奉军溃退过境。<sup>13</sup>25 年奉军驻防县城。26 年秋，县府设官产局，强行加征“旗地变民地”捐，官绅勾结，层层加码，限期交清，农民大愤。27 年 2 月，中共玉田中心县委书记张明远等来到归远城西组织农协，<sup>14</sup>发动农民抗

<sup>10</sup> 参米格达尔 1996P33-5。另杨懋春 1980P46 介绍了村中有手艺、乐于助人、参与公益、协助正式权力系统、不谋私利、深孚众望的人如何成为“布衣领袖”。

<sup>11</sup> 义和团与归远关系详见高纯秀 1989。历次农民起事记载均据归远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0。

<sup>12</sup> 位于县城东边的西村虽未出现较大规模的义和团实际活动，但直到半个世纪后的 48 年 6 月，西村所在地区的红眼队暴乱及前后出现的许多会道门组织中仍多有义和团式服饰、口号、信条和仪式，甚至直接以“义合（和）团”为名。

<sup>13</sup> 西村地当要冲，过军不断。最早是奉军，其后先后有国民军（国民革命军）、民众（便衣队）、日本子、治安军、八路军（极少与解放军相区别）、满洲队、顽军等。

<sup>14</sup> 共产党对于在农村基层以农协等形式组织农民的重视及早期对此作法的党内外争论已众所周知，但以往研究材料多集中于南方尤其湖广一带（参 Hofheinz 1977；Marks 1984）。李大钊 1925 曾言：“乡村中旧有的农民团体多为乡村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全为一乡绅董所操纵，仅为乡村资产阶级所依为保障其阶级利益的工具，不惟于贫农疾苦漠不关心，甚且专以剥削贫农为事。在此等组织中，贫农几无容喙的余地”。故乡村农运第一要务便是唤醒贫农阶级组织农协，此为保障贫农阶级利益的唯一之途。27 年底《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 1981P184-98）宣称：“中国各省的土地关系并非一致相

捐。4月，农协会员约5000人组织起来进发县城。县知事迫允请示上方缓征此捐。此即史载共产党在归远最早的一次群众工作，较之十几年前的两次斗争，此次可谓组织起来的农民一方在与官府的对抗中大胜。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大规模农民起事都是针对国家的抗捐斗争而非针对地主的抗租斗争。共产党乘胜前进，于次年春建立中共归远县委（秘密）。同年夏，国民革命军47军开抵归远，国民党接管县政权，建立县党部，废五色国旗，改挂青天白日旗。

#### 四 清末民初冀东乡村组织演变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从乡级组织层级结构、组织者来源、身份、职能及地位等方面，可大致将近代冀东乡级组织演变分为三时期。1900年前为非正式组织时期，有清一代政权只建到县一级，县衙通过吏役和以里保、地保、乡保之类职事为代表的乡级组织间接控制乡村，但控制力十分有限。乡保等非由国家直接任命，也非一受薪职事，而只是由当地真正领导人即在村士绅（多为各庄会首或首事）推举，作为地方领导层与国家权力间的缓冲。保状评语多为“家道殷实、为人公正、老诚练达”，实则常由中下之户甚至无业游民充任，因乡保地位低下且差务繁重（如催办钱粮、承办差役、稽查匪类、编排户口），一般庶民地主不屑出任。光绪初年始行县、堡、村体系，村有村公会，另有会首、村正、村佐、村长副等。一般学者据此认为：当时村落系自治性社区，更多是相互遵守共同契约的同意的权力，而非强制统治的横暴权力（费孝通语）。不存在现代政权机构、以自治组织自我管理的乡村似乎就是社会的体现，而处在“上层”的国家更乐于控制而非实际管理民间社会。但萧公权等学者也提出：尽管国家所谓里甲、保甲、乡约等基层制度只是流于形式，政府缺乏直接组织和干预乡村社会生活的能力，但不能就此说帝政下的地方乡村享有较高的自治。

就其具体起源而言，村落内部发展起三种自治组织：旨在宗教活动的庙会组织，旨在应付差役的公会组织和旨在看护稼禾的青苗会等经济协作组织。但实际生活中会社、公会和经济协作组织并无绝对界限，许多村庄以一种组织为主要形式而兼具多种职能，且三种组织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一是其领袖多为村中富户，是捐款修庙的大施主，自然成为庙会组织领袖，而这些人田地较多，摊差较重，又是看青主要对象，故必然也是公会或青苗会会首、首事；二是经济基础相仿，都是公产（庙田或公田）或公积金（会员捐献或摊款）；三是以村庙为共同活动场所，是乡村中集体活动中心、各组织议事场所，春祈秋报、惩罚小偷等都在庙中进行。<sup>15</sup>不过在19世纪末，青苗会渐渐兼具其他职能而成为乡村社会中最有权威的自治组织。

1901年始袁世凯在直隶试办警政，实行区董警长制，“公务”范围扩大，村长取代地保，与村首事共同负责。有必要注意一点，此阶段官府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利用青苗会筹款设立巡警并兴办学校，进而从青苗会中衍生出村长、村副。实行警政后警长地位提高，但乡绅仍可通过经济杠杆间接操纵。至民初乡级组织由警区向自治区（或行政区）过渡，

28年初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河北成立村政研究委员会，按南京政府法规并参山西村治办法，结合本省实际，颁布自治规划条例，重划区域，实施县区乡闾邻之层级结构。29年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始行区长制，村公会趋于消灭。同年冀东各县组织编村委员会，改堡为区，区公所设区长一，办事员和区丁各二。施行小乡制，百户之村编为一乡，不满百户者选邻近村合为一乡，内大村为主村，余者为附村。主村设村公所并出一乡长，附村各出一乡副，并配有监察、息讼、会计、户籍等专职委员会或干事。也有的村权力机关以董事会形式出现。学

---

同的……南方各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绝无疑义的是佃农及半佃农（粤桂鄂湘闽浙等）。北方有几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都是自耕农（晋直）。殖民地域的土地关系又有特殊的情形（吉林黑龙江等）”。以上两例表明，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各地农村阶层分化和土地关系差异颇大，出身河北的李大钊虽明确用阶级对立观点来看村庄关系，力陈组织贫农的必要性，也并未详及土地关系，村中权贵对村政的把持方为首要弊端。

<sup>15</sup> 且看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中的生动描述：“抗战以前的八九年，这龙王庙也办祭祀，也算村公所；修德堂东家李如珍也是村长也是社首，因此老宋也有两份差——是村警也是庙管。庙里挂着一口钟……打这钟也有两种意思：若是只打三声——往往是老宋亲自打，就是有人敬神；若是不住乱打，就是有人说理。有人敬神，老宋可以吃上一份献供；有人说理，老宋可以吃一份烙饼”（1980P71）。

者多有认为，编乡（或编村）打破了封闭自治的村落社会，使村庄（或村落联合）成为最基层行政单位，标志着乡村政权的真正建立、国家政权进一步深入和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加强（参从翰香 1995 中王福明专章；费孝通 1985；Gamble 1963, 1968 首章；黄宗智 1986P236-7；Kung-chuan Hsiao 1960，尤 P505 以下；李景汉 1986；魏宏运 1996P27-9；朱德新 1994）。

不过，由于法规计划与实际执行差异甚大，加之军阀割据、日本入侵、共产党根据地或游击区区域不稳定等因素，故各种建制（尤其各具体下设委员会）是否真正普遍存在于村庄颇可怀疑。至少西村几无这些委员会的痕迹（国民党在抗战结束前对此地算不上有何实际控制）。至于会首，我们或可问西村会首是否来自于上世纪的自治组织？是否可归入正规的基层政权体系？为何编村改制后依然存在？真正的行政功能由哪方承担？等等。但这样问在一定程度上有误导性，关键是要搞清楚：村庄中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功能是否恰恰在二三十年后才逐渐形成。

1917 年县巡警局改警察所，29 年又改公安局，其中管辖西村的二分所（局）驻在离村 15 里的金山寺。若问及村民日本人来前的地方管理，第一反应就是金山寺有警局子，但警察并不常下村。如抓赌一项本是少数明确归警察管辖的事务之一，但除非村民举报，否则即如林起明（其父系惯赌，当街设明局）所称，警察来村“看见当街有赌，也瞅瞅，看看热闹”。访谈时村里最年长的黄龙雨（1906 年生）说：

我 15、6 岁父亲死的，那时候这庄归二分局管，庄主是甲长，是派的，不记得谁了。二分局人经常来，庄里甲长也管，收钱粮官租。不派工。日本人过来就不交了，打烂了。

黄龙雨不愧是世纪老人，他在访谈中说起什么事情，都能在与别人同样多的言语中跨越更大的时段。这段话也是如此。他是这村里唯一主动向访谈员提起甲长、庄主之类职事的人（绝大多数村民说的乡保长是日本人来后才设的），否则我们几乎以为西村除了会首，就不存在上述清末乡村正式组织体系的痕迹了。西村到底是一个保还是甲，具体行政名称是什么，这些也许并无多大意义。比如，上文董印曾说东村会首人称庄主，而东村的冷向清则说：

乡长这就叫会首。谷四老爷是学董，管这学校一切事儿。庄里有啥事儿他也管。一个是屋里有钱，再一个是他比别人聪明点儿。甲长比保长小得多，是保长下设的，给保长办事。闹日本前，乡保长主要是给那边办事的，国民党那边。有些大事就归二分局管。庄里有啥不平稳事儿喽，打架斗殴啥的，归二分局管。警局子里人来得很少，一般的村里就能办。警局子里人来喽，都上谷四老爷他们家吃饭去。

这下倒好，乡长、庄主、会首、学董、警局子统统掺和在一起，让研究者无可分辨。其实这种状况很自然，有组织体系和被访者经历两方面的原因。正式的行政组织建设到最底层本多流于形式，或混同于村庄原有非正式职事，况且西村一无很强的家族势力，二无水利之类促成全村乃至联村组织的外在需求。而由于绝大多数被访者在日本人来前尚未当家，国民党在西村一带统治时间不长且实际效果较弱，故很难从村民回忆中挖出清末以来的村庄正规职事（倒是象闹会唱影和红白喜事这类活动更容易引起当时还是青少年的他们的注意）。黄龙雨生于清末，加之少年时父亲即过世，故较早以主事者身份了解家中交粮等“公家”事。当然，即使西村确有甲长和庄主之类职事，也可根据村庄大致状况推断：在官府控制较弱、家族势力不强、娱乐活动不少的西村，正式职事很易与非正式职事相混融，反正日后各项国家行政职能此时在村庄还大多不见其踪影。除了钱粮官租，便是慢慢开始起步的警政和学政。

说起念书，解放前读书最多的当然要算是黄家财主的子女，<sup>16</sup>不过他们读书后一般不回村，不被视为村里人。如今七八十岁的村民一般记得自己在东西村交接处的三官庙上学。家里开香油坊的支柱林（22 年生）自述 7 到 11 岁在本村私塾念书，从《百家姓》直念到《诗经》，在普通村民中就算是念书最多的。但说起字眼最深的却不一定是他。有一位解放前在县城商号当了多年伙计，能写会算；还有一位老会计会算谷堆体积，这些都是被村民认为学问特大的。支柱林那种诗书学问似乎太过玄妙，当不得饭吃。林忠（23 年生）自述七八岁在村里念书，课本

<sup>16</sup> 据全国农业展览馆综合馆 1960：解放前仅地主黄延藩、黄洪臣（谷四老爷之子）上过中学。再下一代中，黄延田次女后做到南开大学教授（村民一般管大学老师都叫教授）。

皮上是孙中山像，听讲过三民主义，就这他也是在村口听人讲孙中山，不免自豪地回想起的。除此之外，他再也想不出几十年前学到什么东西了。黄延青清楚地说出自己40年在三官庙上学，学的是国家的书样，课本书，私塾的东西不敢教，怕挨抓。冷向清（20年生）则说：

这庄有初小，我读了四年，是国家课本。有三民主义，论说文范，尺度，国语，常识。当时是东西村、黑驴沟、应家谷几个村一起，就三官庙。老师国家也给派。西村也有自己老师，叫黄立仁。那阵儿就是几个老师轮着教。我由9岁开始上，花不多少，国家办，就是个人书费，笔墨砚台。不用给老师钱。（您还记得三民主义讲什么吗？）记不得了。民生，民权，还有啥呢？记不好了。以后人家家里有钱的就上八区玉皇庙高小，这庄有那么两三个，别人都上不起。

西村村民当时只要家里不是困难得出奇，一般还都上过一两年。当然，女童是不上学的。但因连年战乱，隔三岔五歇学，加之生活日趋艰难，故许多村民学的东西“都就粥喝了”。综合其他文献可大致推断：28年国民党接管县政权前村里有私塾，后虽创办新式国民小学，但私塾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依然保留了一段时间。正史载1919年创办西村初小，30年统计有22名学生，款项来源系基金和田捐。<sup>17</sup>也许在30年建新式小学时（该年全县各小学均准确统计学生数，上报校款来源，必有统一调整）沿用了10余年前办的半私塾学校。支柱林28至31年前后上的是私塾，林忠30年左右上的是国民小学，到黄延青40年上学时，这一带应是日本人制定的课本，故他会说上的国家书样，以往内容自然是不敢教了。

富农黄立礼和东村酷爱皮影的谷四老爷都曾任过学董。而自设“学堂”的各色“先生”有不少，除了会首狼咬，还有周家先生，<sup>18</sup>富农钱惠和黄立仁：

黄立仁教过书，文化程度深。教书日子不长，就在他家里，三间厢房，腾出来教私塾。我就跟他念过书，跟我一辈的好几个呢（董启）。

## 五 多方混战的冀东大地

从20年代到30年代日本入侵前，冀东连年深陷军阀大战动荡，匪患猖獗。县志载27年时县境内有十多股土匪到处绑票，农村富户纷迁城内。次年大部土匪被奉军收编，开拔外地。余下残匪及新起小股土匪多在日本来时以抗日为名合聚大股，后被八路、日伪等收编或剿灭。西村当匪的仅有名的就有林海河（传曾聚众千余，后归编八路。探家时被日本逮去处死）、黄金太（归编八路，战死后成为烈士）、麻子五（被八路处死）、钱起华（被八路活埋）等。中上户或家居祖传好房者多挨过绑。故20年代后村里多年不曾新盖瓦房，有钱人家也不敢露财，怕成为土匪夜间进村劫掠的目标：<sup>19</sup>

这周围都闹匪，我们庄尽挨绑的。我还挨过绑，绑去五天，我爸55块现大洋赎的，董海是80块现大洋赎的。董启挨过，冷向魁、周棉挨过，都冲着瓦房，东西院俩瓦房绑的。冷向魁在东院住的是草房，就是给周棉做伴，把他也绑去了，被绑到××寺才放回来，没钱赎不是？周棉也是跑回来的。就是董海那时十来岁，跑不了了，赎回来的。80块那不少，一亩地才多少钱？不是咱庄的匪，是马拐子的匪，好几百人，住北边大茅山。以后日本进关给剿了（董印）。

我九岁上学被土匪绑了。不认识。没拿钱赎，亲戚关系说情。呆一宿放出来了（黄延青）。

到庄里来，谁惹得起他们？饿了叫你下点饭，恨不得叫他们吃了快走。地主家他们也去（冷向仁）。

<sup>17</sup> 据归远县文教志编纂委员会1991整理。有关壬子、癸丑学制下1912年颁行之初小、1916年颁行之高小及48年华北区颁行之解放区小学等类型具体课程和课时表，参同上书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91。对学校课程安排的分析是研究国家、政党向村庄渗透的上好途径，下文略有涉及。村东三官庙原为求雨所用，30年代开始被废弃用作校址，50年代初曾修缮，后在村西开阔地另建新校。

<sup>18</sup> 老爷子周焕是双重先生，卖药兼教书；长子周任后被定中农；次子二先生周棉卖药；三子三先生周在教书。

<sup>19</sup> 许纪霖等1995P385-6；奉军等多由土匪招募而来。霍布斯鲍姆指出：民间土匪就个体而言算不上政治或社会的叛逆者乃至革命者，而只是拒绝服从的农民，象征社会危机和紧张。土匪活动本身只是在特殊环境下逃避社会的自救形式（转据贝思飞1992P2-3；另P40图示冀东北部属传统匪区。P211以下：绑架目标几乎总是富人，一般富裕之家自知迟早会被绑架，始终预备一笔赎金。许多富裕家庭经历数次绑架后几乎败落为穷人）。

刚一闹匪就快卖（牛）了。那会儿村里有个二三十头牛。治安军来的时候村里都没牛了。我家（上中农）没遭过绑票，冷向权他大哥（即冷向魁）被绑过。他们家生活不富裕，那会儿挠到谁是谁，不管贫富。让绑去，你几天几天赎去，花钱。没钱赎，日头多了他一调查没钱，就把人放回来了。有钱的得花钱上那儿赎去，不花钱你回不来（冷向有）。

从住大院的地主、住瓦房的董家兄弟，到生活小康的黄龙春（子黄延青），到没趁啥的冷家，一概在土匪视线之下。如此情势，人心惶恐，大牲畜也保不长久。后来被定富农的董启家就是为赎回董启把几头牛卖了。逼急了也有敢反抗的，但毕竟力孤。支瑞万说：

当匪还有富的？没办法才当匪去呢！过不了了家里，没饭吃了，当匪去。都有枪。我们庄有个钱家江，搁我们庄那算二等户。他俩就撕掇起来了，跟匪头子麻子五。枪准着呢，麻子五三个枪：一个冲锋式，一个二把，一个三号。和他要钱他不服，他说我这门也不算忒富的户不是？比外面穷人强点，吃上点饭了，他和我要多少多少钱？麻子五“咣”的一枪，给他打回去了，没打着肉，就跑喽，半天没敢上家。他不敢上家不是？他有枪他没枪不是？从成立民兵以后，我们庄发下枪来了，这才不出这个事了。后来都没了，日本子也收拾他，八路军也收拾他。好歹给收拾净了。都尽弄死了。

有枪才是硬道理。反正得活着，又没有稳定的家族势力和政权统治来“告诉”年轻人应怎么活，两亩三分田不是自己愿意守就守得了的。经济、政治、社会、道德，一切都注定使四乡勇武好斗或机敏善变的小伙子们各寻出路，自称一辈子胆小怕事走正道的冷向义说：

那时候有许多不学好的，胆大的，四处诈财。都不爱下地，还要吃点儿。一时兴八路军了，还没大部队，他就想着加入，四处搞枪。那阵儿净听人念叨这些事儿。八路军哪有枪？都是这么夺来的。

冷向义这里直接谈的是 38 年扯便衣队。当时许多村民确实闹不清八路、便衣队与土匪的区别，听听受过高等教育、站得比一般村民高得多的林起远的解释：

四爷（林海河）是让日本刺刀挑死的。有一段他自各干来着，有点杀富济贫的意思。敲老财，你有钱我就敲你。最后让林奎、包森他们收伏了。归队后当了八路军。之后又让日本逮住了。据我父亲说他们都属于一开始手里有枪，杀富济贫，敲老财，绑票。后一段由于咱们这边开展了革命工作——还有个麻子老五因为不愿意归队，最后让咱们这边八路军枪毙了——剩下就都归队了。归队也时间不长，那阵日本经常清乡讨伐，（林海河）探家时候就死去了。这他们家属当烈属就不好说，因为关系失落了，咱们党也没有挺正规的档案。在地方上一开始已经造成了群众不好的印象，（虽说）加入了八路军，可是时间太短。

也难怪，冀东很早即卷入中日战事。国民党、共产党、日本、土匪及各种民团武装在这片土地上相互作战。33 年 1 月，国民革命军第 29 军宋哲元部陆续移防归远等县，3 月爆发长城抗战，该部经西村去喜峰口抗战。次日日军攻克长城冷口，旋攻克定东县城。而 29 军在长城抗战的同时也抓捕了中共归远县委书记，县委停止工作。5 月中旬 29 军奉命撤退。访谈中村民一般称国民军作风最好。若再追问八路军如何，多答曰“八路军当然好”。董春说：

以后日本进关，国民军那待不了，那武器哪中？都退下去了，面也扔，给养也扔，扔哪都是。不征粮食，都给钱，公买公卖。不住家里。那印象就是最好的，你跟着老人打听都知道。

国民军装备奇缺，步枪无刺刀，只好依西北军特点打造大刀。士兵因背步枪上下山地行动不便，也只愿多带手榴弹，提着大刀，便于杀敌。两军白刃相接，日军飞机大炮反倒无法使用（参何基泮 1987，何当时与张自忠在四卫所设前方指挥所）。与奉军不同，这是第一支让村民觉得是自己人的队伍，高昂的士气和积极的宣传至今还留下许多传说：

那是炮打喜峰口啊。“国民军人不善，全仗大刀手榴弹，远的枪崩近了手榴弹，不远不近是大刀片”——编的这歌。有一本歌，一本谣书，还有一本啥书，这是国民军弄的（冷向义）。

5 月 16 日日军占领归远县城。31 日《塘沽协定》签订，归远划入冀东 22 县“非军事区”。6 月，左家坞附近 53 村“联庄会”青年两千余人以民团头目为首截击日军。<sup>20</sup>7 月中共归远县

<sup>20</sup> 事见中共丰润县委办公室 1995。左家坞位于西村以南百里，西村村民嗜酒者如冷恒合常骑毛驴上该地打酒。

委重建。同月河北省指示冀东特委在西村以东山区组织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创建新苏区与红军”。一些县委书记乃至整个县委反对此项“左”倾计划，为此被特委书记斥为“右派”，撤销职务，解散县委。34年日本派遣由东北、内蒙一带土匪组成的伪东亚同盟军某团进驻归远。<sup>21</sup>是年冀东各县裁撤区公所，各县府内设自治指导员，专办全县自治事宜，县令转达则由各区警察分所负责。12月，西村北部邻县某村自卫团总孙永勤组织民众军，举旗号“天下第一军，杀富又济贫”。<sup>22</sup>转年1月下旬，冀东特委决定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西村东部山区武装暴动，成立冀东红军游击队，三日后遭敌围攻，大部被捕，归远故未起事。5月，孙永勤接受冀东特委建议，改“杀富济贫”为“抗日救国”，已发展至5000人的民众军也组编为抗日救国军，<sup>23</sup>并向归远县长何孝怡要求补给，何不但以《塘沽协定》中“停战区”规定为由拒绝，且受国民党授意诈命孙率部集于茅山“剿匪”。20至25日，日军与归远县保安队一起围攻孙部于茅山一带，孙等殉国，仅1400余人突围。

这支村庄民团武装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并被赋予抗击敌侮的民族重任后，最终如此收场，一时间各方争相为之定位。共产党与各界许多群众指控国民党与日方勾结。日方则将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与民众军搅在一起：35年1月孙永勤匪团在热河停战区内扰乱治安，5月在日蒋协剿下失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1982上）。天津《大公报》5月26日反控孙部入长城后在侯家寨（西村西北50里）等地“纵火焚烧、奸淫掳掠”等。6月4日何应钦答复日方：孙匪部窜扰归远附近时，“军分会即令河北省政府令警团协同围剿，业已将其消灭。至谓曾受归远县接济一层，已令河北省政府转饬严查，如果查有实据，自当照律惩处”（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等1983P123、136）。6日何孝怡因“身体多病、在平休养”辞职，终成替罪羊。10日、27日《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相继签订。国民党河北省政府退往保定。10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归远某村开会时遭敌围捕，特委与县委均遭破坏。

10月4日，河北省政府通过编组保甲规程，决定清查户口，推行保甲。20日香河汉奸暴动，蓟密停战区督察专员殷汝耕11月24日通电全国宣布冀东22县自治：“国民政府施政已历八年有余，其间多为专政党利计，毫无善施，秕政百出不符民意。我等于兹应奉孔子之道，以谋实现新乐土。现今共匪已迫近邻省民众将遭涂炭之苦，殷汝耕今应战区四百万人民之要请，

---

共产党早注意到乡村普遍逐渐陷入秩序真空时农民有自组织倾向，故提出应努力渗透，团结他们，引导其行动方针，使之服从革命政党领导。李大钊1925指出：随着帝国主义造成军阀土匪扰乱范围扩大，直隶热河等处保卫及民团运动均甚普遍。奉系军阀崩溃后各处民团运动一时极盛，革命青年应结合起来到乡村助农民改善其组织。29年初中共就农民运动策略通告：**农民根本是要求组织、喜欢组织的群众，绝不能认为农民只是要求斗争、暴动而非要求组织**。农村中出现数以千计的原始的组织和农民自动的小组织，概因农村破产和各种矛盾反映到农民意识上令其感觉有组织的需要；这些组织只要有群众（基础）的，不是完全反革命性的，我党都应参加进去，宣传土地政纲，渐次削弱豪绅富农影响，夺取组织领导权，逐步变其为革命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1981P270-4，黑体为引者加）。

<sup>21</sup> 冷向仁、冷向义等曾提及有蒙古那边的军士来村，说话都听不懂。

<sup>22</sup> 据公孙匄1987：孙自幼习武，家为村中首户，系土匪劫掠对象，故其大伯始组民团。此文详叙孙部如何剿灭邻近土匪。但在西村村民记忆里，闹民众与土匪横行混杂一处。民众起义虽不会直接影响社会地位或生产关系，不会直接促使各社会阶级联合，但起事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动员，促使人们改变对个人行动的社会作用的想法。费正清、费维恺1993下P45-53：农民中结社群体既有合法如由有声望名流领导的宗族和村社；也有合法与否不明确如联庄会和民团；以至明显非法（但有时被容忍）如教派、秘密帮会和帮伙。社会动乱会催生新的组织。但三四十年代前农村动荡很少旨在政府和社会的革命性重建。此例还可看出新型地方精英与民众的积极互动，即地方精英如何利用与民众的庇护关系来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找到自己的新位置。

<sup>23</sup> 有关共产党抗战阶段对华北旧会道门组织的利用方针，可参Perry1980和Wou1994。前者第六章分析了共产党与土匪、秘密会社等传统集体行动形式的区别；至于共产党革命运动与叛乱、秘密会社、土匪乃至宗教在功能上的连续性，参Wolf1969P113-9。贝思飞1992P325 尤P336以下叙述土匪、日军入侵与共产党关系及共产党对土匪态度的转变。共产党利用土匪和民间组织之厉害是其敌手都承认并图效仿的。日本防卫厅战史室1982上P103：共军派出政治指导员潜入土匪、败残匪、民团匪进行赤化、收买乃至改编。对反对的匪众（含国民党组织的零星部队）则予以肃清。同上下P216-20介绍日本对华北秘密会社的态度和行动：村庄内部早有自然产生的民团、乡团之类保卫组织（保甲系政府为维持治安而设之行政辅助机关，本质上有所不同）。此种民众自卫组织有时会结合宗教信仰发展为各种秘密结社组织，对土匪实行自卫，反抗军队暴行，兼及反抗政府横征暴敛、征用民夫，也有部分加入土匪和军队。中国事变（即芦沟桥事变）后各地秘密结社对待日军、共军和中国政府态度各异，“但其自卫意识极强，一般不会主动采取敌对行动，也不会积极协作”。

断然蹶起，以谋自救。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举联省之先声以谋东洋之和平”（据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等 1983，黑体为引者加）。次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殷自任委员长。30 日，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华北自治。12 月 11 日国民党任命宋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张自忠任察哈尔政府主席。26 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改任政务长官。国民党政府迫于同日撤销其一切官职并通缉之，颁行两月的编组保甲规程也同告夭折。就 35 年底冀东情势而言，落入日方之手已无可挽回。

## 六 来了“民众”、跑了财主

此段时间西村也混乱不堪。从日本逐渐占领冀东开始，到 38 年冀东抗日大暴动高潮，随着局势趋于混乱，地主逐步将贵重家业迁入城里，将村内房子留与同族贫苦亲戚看守。至于收租，会下乡来收，但村民多回忆不起他们带着大棒子队，气势汹汹回村收租的情景（许多村史作此描写）。当然，不能排除现被访人当时年岁皆小，不经手此类事务的因素。

赶到一乱了，有匪了，大院就修上四个炮楼子，雇人黑间站岗。三几年开始闹匪，匪乱得多了，再有八路军，就都跑了，日本还没来呢。有钱的象三趁早就走了（董印）。

地主闹匪时都跑了。咱们这穷主儿有没房住的，（地主说）上我那儿住去吧，不花钱，花钱他住不起。给他看房子看院里去咧（冷向义）。

强万和真正是财主家的亲戚，他就是这个时候和母亲一起迁来西村的：

就我大姨家，闹便衣队，他们是富农（按：实为地主），阶级高，住不了，就搬县城里。房子多，说你们就住这儿吧。我姨也没收我们钱。地主是怕两方面，日本、便衣队来了也抢，小拨大拨的土匪也有绑票的，他担心不是？地那时候是起钱粮。每年收，收不上也就拉倒了。

出名有出名的难处。管它是孙永勤的民众军还是傍其旗号的散股“爱国”土匪，甚至连那点颜面都顾不得的土匪，村民一概指作“闹民众”、“扯便衣队”。应该说后者指 38 年的暴动队伍，但许多村民并不太区分，或说并不认为这些队伍有相当的区别。几十年后，这都成了天下（起初村民眼里的“天下”也委实有限）开始大乱、财主开始逃跑的时间标志。董启称那年北茅山闹民众，不论穷富，见人就绑。全村人跑返。<sup>24</sup>但在 70 年代的村史里，地主离村的重要原因是 32 年西村水灾，农民绝收，发生吃大户事件（《硬杆子精神放光芒》编写组 1975，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1975 说是 33 年），费远禄三兄弟（或为费远盛的三位穷兄长）、林海、黄荣等十来人去城里威胁米蛀虫放赈。两本书的时间前移，使得天灾人祸与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顺利地联系在一起。民众军毕竟是抗日救国的，不太可能胡乱劫掠。更有意思的是，现许多村民说吃大户事件发生在 38、39 年，或系与日本正式入侵、冀东抗日大暴动和治安军进驻西村等有关记忆混淆。而解放后出生的阳有志则更说是百团大战时地主纷迁县城，后八路军打归远，又迁往唐山、北京。35 年才出生、48 年迁入西村的朱柱说得如临其境，更为“经典”：

毛主席的农村社会阶级分析就是这样。地主是光吃粮，光起租，不劳动。但究竟多少算地主？富农也雇工，他自己也劳动，就是占有土地剥削量多，自食其力的少。不见得有些地主富农就是趁几百几十亩地，就是因为他这生活方式，就依靠剥削生活。毛主席咋分析的？他们一等跑上海，二等跑长沙，三等跑县城。他们就在土改前擦县城去了。贼六子跑北京去了。

地主及其代表的士绅势力离村其实是个长期趋势。冀东农村社区内部其实存在相当程度的社会垂流流动，三五代继替盛衰甚为常见。废科举后乡村士绅与官僚阶层的制度纽带被割断。

<sup>25</sup>转为西式教育后，乡绅及其子弟要继续充当社会精英，只有进入城市接受新式教育。但他们

<sup>24</sup> “跑返”是地处拉锯区的冀东群众在战争年代创造出的一个词，因系口耳相传，故书面写法随理解而有所不同。许多书写为“跑反”，似以坚壁清野之类行动表示对从日本鬼子到国民党顽军各种反动势力的反抗。而西村有村民解释为“跑饭”，即晚饭煮好来不及吃，敌人要来，趁天黑前跑南岭。方惠容 1997 采纳了这种极为生活化的解释。本文理解系就全冀东情况而言，指随时准备在敌人袭扰时避出家门，躲往山区或远僻村庄，短则一宿，长则十数天，探敌走后再返回。村民也称此为“跑敌情”。

<sup>25</sup> 不过必须指出，华北士绅构成本就不同于江南等地，故西式教育（科举制废除）对村庄士绅的影响不能简

一旦在城市里接受了新的知识与价值观念，就不愿回到在感情、观念和行为方式等许多方面格格不入的农村。原来诗书传家的“耕读”精英大规模流失，豪强、恶霸、痞子一类开始占据底层权力中心，乡村社会关系恶化（参米格达尔 1996P55；史靖 1988；许纪霖等 1995P17-8 等）。

地主离村的原因与结果其实牵涉到整个村庄组织形态乃至村庄与外部各级政权的关系，与上文讨论的家族势力、经济背景也都紧密相关。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是一个整体过程。我们注意到，西村南部左家坞、北部孙永勤起事地及东部四卫所一带都有较大规模的联庄会、伙会等地方民团组织，但西村附近未有此类记载。不同类型村庄面对国家、政党、军队、外寇等外来势力的冲击会有不同反应，这是许多学者早已研究过的。关键在于如何提这个问题，在什么角度上划分村庄的类型，确定外来势力的强度。

周锡瑞通过研究义和团运动在冀鲁农村的传播方式，对比了乡绅地主力量强大、村社组织严密的社会结构与较平等、村社很开放的社会结构，认为地方社会环境不仅决定了新组织的兴起，且直接影响其具体形式。黄宗智则针对施坚雅的开闭模式（社会安定时村庄趋于开放，不稳定时村庄出现看青、自卫组织，趋向自闭）提出批评：在华北农村，共同体的结合力因小农半无产化和外来压力的增加而趋于瓦解，村庄在外部动荡状态下不是关闭，而是原有政治结构崩溃及权力真空。民国时期的政府有能力把权力伸延入村，但缺乏直接派任领薪人员入村的机器，须借助庄内人来控制。各村庄对这些新压力的反应随村庄内部结构而不同。紧密内聚的村庄多团结起来应付外界，甚至集体武装起来保护自己利益。高度分化松散的村庄则多听凭为外界权势服务的投机分子摆布。半无产化的村庄则在官僚机构与村庄社团的拉锯战中来回折腾（参黄宗智 1986P256-7、313-4；周锡瑞 1995P364-5）。

当然，学者在判定外来势力冲击对村庄的影响时，会对华北村庄原有形态（如果存在一基本统一的形态）作一判断，由此引出村庄共同体问题。此方面日本学者着力甚多。如平野芳太郎怀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特殊政治目的，提出中国村庄是具有内在权力结构、宗教组织和信仰合一的共同体。戒能通孝则强调中国村落分散而又不平等，无固定分界或公共财产，各家各户为各自利益而生产，其权力基础是阶级和暴力而非村民自发认同支持。但这样的争论正如与之类似的农民学中斯科特与波普金之争，存在两元对立的认识误区。而传统中国村落（自然村）除某些象征性功能（如秋神报赛、村祭社戏、土地祠等）外，制度性功能极缺，故不能单纯从前者推断出村庄具有较强的共同体结合力并能抵御外来渗透。<sup>26</sup>

杜赞奇分析了 20 世纪以来华北农村保护型经纪逐渐被赢利型经纪取代的过程。后者即国家经纪，掠夺型经纪，在村民眼里就是国家代表的外在世界的掠夺者；而前者是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的中介，以使大多数村民避开与赢利型经纪打交道。地方、里甲、保甲长等皆属此类。因其总与村众鄙视（但又恐惧）的衙役官差、匪痞丘八打交道，故功能重要但地位极低，多出自贫民或中农阶层。杜赞奇指出：赢利型经纪不属于作为正统权威母体的文化网络，保护型经纪则属于文化网络。不过，由于后者虽系乡村社会领袖栽培并被赋予集体价值观念，但极易受赢利型经纪操纵，故为文化网络中易变因素。

国家权力的建设在渗透入村庄、破坏原有文化网络的同时，却也逐渐走向了反面。这就是国家政权内卷化过程。杜赞奇根据对华北水利、看青等村庄或联村自组织的考察，指出在此过程中，乡村社会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乡级政权组织，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现代化、官僚化国家政权希望与村庄建立直接联系，发展不受村级精英操纵的基层权力机构，但不断增长的财政需求又迫使村庄形成保护型经纪体制。甚至可说民国政权有意重用旧有经纪体制增辟税源，或对赢利型经纪的再生无可奈何，反正在官府看来，村政府或村组织之存在无非是为了征收捐税、提供劳役和招募壮丁，能完成这三方面极苛刻的征收额即可，如何摊派从不过问。国家政权现代化运动不断侵犯乡村领袖固有特权，迫使乡村领袖逐渐脱离传统文化网络而愈益

---

单而论。黄宗智研究的 19 世纪宝坻档案证明，几百个村级牌头、甲长和首事中仅 4 人有功名。

<sup>26</sup> 参黄宗智 1986P26-7；秦晖 1998；秦晖、苏文 1996。如前所述，同样也不能从村庄缺乏国家正式机构径直推出村庄管理的自治性。

依赖正规行政机构。但国家政权深入所产生的正式和非正式压力太繁重，旧文化网络熏陶下的乡村精英大多竭力逃避担任乡村公职（乡绅退位的过程同时也是地主离村的过程）。战争和由此而致的匪乱无疑也是造成此现象的重大因素：精神和物质报酬越来越少，麻烦却越来越多（杜赞奇 1994P37-67、205；韩丁 1980 章 4）。且看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中的描写：

从前没有村公所的时候，村里人有了事是请社首说理。说的时候不论是社首、原被事主、证人、庙管、帮忙，每人吃一斤面烙饼，赶到说完了，原被事主，有理的摊四成，没理的摊六成。民国以来，又成立了村公所；后来阎锡山巧立名目，又成立了息讼会，不论怎样改，在李家庄只是旧规添上新规，在说理方面，只是烙饼增加了几份——除社首、事主、证人、帮忙以外，再加上村长副、阎邻长、调解员等每人一份（1980P72）。

自从派出粮秣借款后，不止铁锁出不起，除了几家财主以外，差不多都出不起。小毛是间长，因为过了期收不起款来，偷跑了。不断有散兵到村找间长，谁也不想当，本地户一捏弄，就把铁锁选成了间长。铁锁自戴上这项愁帽子之后，地也顾不得上，匠人也顾不得当，连明带夜忙着给人家收款（1980P113）。

清末与民国政府两次政治改革失败加速了村庄组织瓦解。士绅阶层原在国家与乡村间充当中介，现逐渐丧失功能或转为豪绅恶霸，农村分化加剧，少数权力阶层与多数无权者间隔阂加深。其实华北平原土地兼并的现象并不太严重，战前华北农村与南方相比，缺乏较大规模反抗地主剥削的抗租斗争，主要还是抵御兵匪蹂躏、反对滥摊强征捐税差役的乡村自卫。但华北农村普遍贫困的环境使村内同样存在激烈的竞争。财主等权势人家其实也只是相对较舒适：“谁家要是松懈了戒备，怜悯穷乡亲，放弃了最后一文租利的榨取，或稍稍中断了钱粮的聚敛，这一家就有被饥饿和穷困吞没的危险。人们不是上升，就是下沉”（韩丁 1980 章 3）。地主支配地位并非世袭，这些精英分子及其子弟对其家庭财产管理的好坏将决定社会流动的方向。许多时候纯粹是上代分家时兄弟的数目决定了土改时是富农、上中农还是下中农、贫农。

杨懋春指出：乡居地主与全佃农之间的租佃关系固然因为土地在农村很重要而使前者权势大，后者孤苦无告，但具体关系内涵可有多种差别。例如租佃关系：

多有善良感情的租佃关系，其特点是地主以仁厚好施之家长自居，对佃农不苛刻，收租时不斤斤计较，宁使佃农讨些便宜；遇佃农有困难，来求济助时，肯伸其援手。在佃农方面，对地主常存感恩心或爱戴心，在地主面前时毕恭毕敬，服从指挥；至少不仇视地主，不与之处于敌对地位。地主对于佃农之恭顺态度与奉送土产礼物，或义务帮工等，也受之无愧，无需表示客气，或计算价钱。

在正史看来，这等说法无异于替地主变天。不过作者还是承认：不在村地主与佃农关系则多很黑暗，概因缺少感情；对农事辛劳及收成实况缺乏认同；城市开销糜费，概赖地租支撑；中间人以图回扣以及官府衙役欺压等（杨懋春 1980P40-3）。地主一旦定居城镇，就不再提供种籽工具；收获时也不再监收，改收定额粮租或货币地租；在村地主也如法炮制。为防佃户拖欠还多采用押租制。原本能稍缓阶级冲突的讲求个人关系和社会责任的体系分崩离析。以往地主或地方名流歉收之年减免租赋或向佃农和小农提供帮助，而此时这些情况愈益罕见或成负担。乡间曾有的相互信任和道德权威逐渐削弱，矛盾趋于激化（费正清、刘广京 1993 下 P675-7）。农民的斗争对象开始由国家、政府愈益转向财主乃至作为阶级存在的地主。

那么西村村民又怎么看村里财主呢？许多人一见访谈员便习惯性地回忆道：过去“日子苦”，“没法说”，“地主狠了去了”。而阳有志这次又讲了段屡经复述的轶事：

林宝河租的贼六子地，没给人经营好了，上这要租子来了。说“那我就趁这么几口子人，我啥都没有，没的给。”说“你家有多少粮食啊？”“一冬都不够吃。”“一冬不够吃我得拿着，有多少拿多少。”在大街上就骨碌起来不是？贼六子把手枪都掏出来了：“毙了你，你不掏租子？”林宝河老爷子一下子把贼六子扑到那了，把手枪掰过来了：“我先崩了你吧！”（旁衬：不会使，遭！）这贼六子起来：“中了，老三，我算不要了！你把枪给我吧！”拿枪掖着撩了——听老人家拉过，这地主他没象演电影恶到这地步，没恶到那样程度。

有志最后给来了句概括，许是他自己意识到这故事的“毛病”了。贼六子无疑是财主里最恶的一个，宝河老爷子也有几分乃弟匪头子海河的暴性劲儿。44年入党的董春又怎么说呢？

给地主送点儿礼才能租上地，不然还到不了你手里，不相信你，怕你给不起了。那时候就送点儿点心啥的。不能提名道姓的。得叫先生。（地主）到过年的时候就觉得过年午夜黑夜以前必须（把佃户钱债）都要回来，要不过了初一，就不许要了，有这个风俗来着。（一次）把我爷爷逼得直哭，掉泪。这地主那会儿也心软了。一看叭叭地掉泪，过年都过不起了，这啥也没买呢，非跟你要这个钱，钱拿出来了，不知道打那弄的，是做工夫挣的两块钱，拿出来给他了，他心软扔那儿了，拉倒了，回来再说吧。是贼六子自己来要的，一般都自己来要，不带动手过年的。我年年都租他的地种。

故事前段一切正常，贼六子整个儿一个西村的黄世仁；后段急转直下，让访谈员大感意外。但别担心，下文讲到打地主时，董春会向你证明他不愧是老党员，对地主抱有足够的仇恨。

## 七 革命啦！

36年7月冀东自治政府民政厅出台《冀东各县乡镇居民联保规则》，旨在“使闾邻居民互相联保，一家为匪，他家举发，庶可肃清盗源，辅助警团，维持治安，并养成自治人员与警团人员通力合作之精神”。但此阶段只是承袭国民政府时期闾邻制，仅在邻近城镇、铁路的农村试行保甲（魏宏运 1996P30；朱德新 1994）。而在归远这等山区县，即使县城左近且地处要道如西村，无论此前的闾邻制还是日伪的沿用，其影响大抵也只限于乡保长的名目。更底下的甲长之类更是虚应故事乃至无人出头了。西村乡保长不久就将委曲出台。

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8月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冀东开展游击战，会议确定创建冀热边抗日根据地。9月平型关大捷后，负责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刘少奇指示河北省委抓紧冀东抗日暴动，命李运昌任冀热边特委书记，回去组织。<sup>27</sup>同月在天津成立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12月，冀热边特委在滦县召开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策划发动抗日暴动。同月华北日军制定《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规定警察队（公安局）常驻县城及县内要地，担任警备与公安；保卫团（联庄会、民团、保甲）在各乡镇以壮丁编组，协助警备队清乡、剿匪（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1937）。这实际上是日伪利用地方原有武装方针的体现。日本占领华北实质程度较低，仅沿交通线做点线占领，而对绝大多数村庄只能间或袭击、洗掠而非长期驻守，这一点连西村村民都看得清楚：

日本人是利用你，根本他在中国就不够使。日本在治安军里就超不过一个两个的，他不够站，在县城才几十个日本子，剩下都是满洲队啊。他不够分（林起明）。

这已经说到日后态势。村民对日军最初大多是畏惧、惶恐，更多的仇恨在特务汉奸身上：

过来日本人也挺老实来着，也不打人，也不啥的。过来以后道修得多了，这是大公路，那也是大公路，哪儿都给修了。我们都干过，不给钱。他给你划线，也不用说是谁的地，啥也不管，就在这修。庄里有监工，日本人，有翻译。刚进关挺老实的。以后就学坏了（笑），后来就不那样了。不派（粮），人家都不吃你们粮食。村里人跑出去三四天后就回来了（董春）。

要是没有汉奸，日本也不至于。那年庄里来日本。你也得上学啊。就我和一个18的大学生，剩下都是14、5的。在大街上走，排着队，学生排着队走不是？日本在旁边写字，问你认得不认得。要是旁边没特务，他也挺老实的，不害人。都是妈的特务臭事（董启）。

这庄日本人没咋糟践人，就在这来回走。大路上不要紧，就在山沟子里糟践人，因为他在山沟子里挨八路军打不是？没人报告不怕（黄龙雨）。

一个平常的日子里，20岁的钱周氏在南岭家里遭遇了日本子，她必须学会如何应对：

你就在山上呆着，就别动弹。你要是看见他滋溜就跑了，你就不是好人。你该咋着咋着，

<sup>27</sup> 李运昌 1987P29：冀东南有平原，北有群山，物产极丰。起义军不仅可在此纵横驰骋，且可得到物资供应和人力补充。特别是此地民间有大批枪弹。据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统计，22县当时共有民枪23万支。

你该做啥做啥，不许可你跑，你合着做着活计了，看见人家来了，拿起东西快擦了，那不中，立刻就把你降伏起来，你就不是好人。你要是在这呆着，哎，你是好的，你是好的，就那样的，你是好人，你不跑（钱周氏）。

有些甚至夹杂着戏谑的丑化，日本人的来临成了村民生活中一道意外，面对真正的“外人”，当时曾有的惊慌、悲苦和仇恨而今只剩下胜利者居高临下的姿态：

日本人丑着呢，没咱们人高。你不说咱们矮？还没咱们高。都小红眼珠，大裤腿管子扒搭扒搭的（笑）。住过咱家，就大道边子上你讲话（你知道）。日本人没打过我，也没给过我东西。你别跑。该给他烧水烧水，该做饭做饭。不打你。跑那倒打，再跑拿枪打（笑）（董海）。

刚一见着日本，上我们这抓驴来。他说话咱们不懂：“鬼子的有没有？鬼子的有没有？”管驴叫鬼子？咱们管他叫鬼子呀！看着驴槽了，有驴粪，“这个的，这个的”。“没有了，卖了”。没有他就走了。刚一进关那阵儿和气啊。后来就有中国的亡国奴，当叛徒的，他恶劣。日本刚一进关挺厚道的。啥他都得团结人民不是？没有人民，你争的是啥？不就争的是地盘吗？叛徒都是各庄里的，我们这庄没有当特务的。（地主也不当特务？）哎。那会儿净是在外面做工的，做着慢，回数多了人家把你散了，回来地里活你又干不下去，这就要当特务了。都是二流子样的，正儿八经庄稼人谁当特务？（冷向义）

冷向义又在向访谈者叙说他的运动哲学。他后面说的实际是闹民众和便衣时起来的那些年轻人：国家、民族太过高渺，重要的是村庄内外自己眼见的这片土地上的人心。虽说村民似乎记不得多少遭受直接迫害的故事（我们相信后来有过），但都知道日本应是极坏的。只是当时，日军快速入侵首先威胁富户的安全，农民有道理感到高兴。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尚在朦胧之中，又几乎没有土地，最糟不过掉脑袋。谁来不是交粮交税？国民党原县级行政机构和官员皆已避走，少数留下的乡绅藉扩大或新建各种准军事团体如民团、团练、联庄会和秘密会社来寻求帮助（撇开“卖国”的不谈）。但此时村庄毕竟面临权力和权威的相对真空。共产党及其正规部队还没到达华北村庄，是日本人的残暴和破坏使农民深感有必要组织起来抵抗，不过首先是为保全一方家园。共产党就是要激励农民的民族意识，将后者的自身利益融入整个民族战争乃至阶级斗争，使其准备为超越村庄的目标和社会经济新秩序战斗。抗战真正使村民开始关心国事，首次听见和使用以往知识分子或城里人用的一些身份范畴用词，如中华民族、汉奸、日寇之类。党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树立起民族（而不只是工人阶级）先锋的形象，成为一支重大力量。<sup>28</sup>

37年12月14日南京陷落，次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成立。38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合并成立伪河北省冀东道。7月上旬至8月底冀东爆发抗日大暴动。10日，起义队伍在归远铁厂（西村南40里）北玉皇庙警局击退县保安队步、骑兵，县城守兵被迫紧闭城门。中旬，在起义队伍攻势下，四卫所警察巡官起义，并派代表欢迎抗联进城。归远四邻起义群众向此集中。一时间冀东大地各路武装蜂拥而起，孤悬敌后的冀东却在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与此同时，由后方共产党根据地东进驰援的八路军四纵一部7月中旬攻破定东县城，一部8月初在归远芦各寨成立联合县政府。<sup>29</sup>8月中旬四纵和抗日联军会师铁厂。月底，四纵党委、冀热边特委和抗日联军领导召开联席会议，随后建立归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后因错误估计形势，决定主力部队全部西撤至后方根据地，只留包森等三个支队。中央接电后虽表不同意，但因消息贻误，部队已在西撤中损失惨重。11月，冀东特委在定东柳沟峪开会确定分散坚持、恢复地区的方针，提出由共产党掌握村级抗日政权，控制日伪保甲，并制定了具体策略，这也确立了此后一系列敌后建政会议的基本方针。先来看看正史上对当时起事盛况的两段记叙：

<sup>28</sup> 日本最初入侵华北及晋东南、豫北等地农民起先欢迎日本人“到来”的具体情形，参贝尔登1980；费正清、费维恺1993下P718-23；嘉图1986P85-6；Johnson1962P2-6。Johnson1962等认为帝国主义入侵尤其日本侵略是中国农村革命主因。但也有学者提出，日本入侵前很久华北平原上就广泛存在民族主义情绪（周锡瑞1995）。无论如何，在研究抗战对国共两党势力对比的作用外，应注意研究国家、民族及各级政权形象本身逐步建构的过程（杜赞奇1995在这方面的尝试严重忽视或曰错误理解了基层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参李猛1998c）。

<sup>29</sup> 抗战及解放战争期间归远县随形势需要辄转划归许多联合县（共产党军事活动和组织动员中心多在原各县交界处山区或偏远村落），西村行政隶属也多有变动，但正如下文所述原因，具体名目并无重要意义。

拿据点，赈贫民，暴动队伍声威大振。暴动队员趁机上街宣传。宣布“便衣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其宗旨是救国救民，抗日到底。大家只有起来抗日，打败日本鬼子，才会过上好日子。人们听了又惊又喜：世道变了，要改朝换代了！老百姓该熬出来了，年轻少壮的应该跟出去（中共深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87P103）。

起义队伍一路起枪，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穷人解放了，扛活的该抬抬头了！”也有喊“干了吧，干了吧！吃干饭去了！”许多顶着小雨翻白薯的农民纷纷扔掉木杆跑来入列（中共丰润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等 1987P117）。

但当时起义部队鱼龙混杂，除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各种抗联组织发动的外，尚有国民党队伍、地主民团武装乃至土匪等。老百姓谓之“司令赛牛毛，主任遍天下”，对各路抗日游击队统呼“便衣队”或红军。西村村民回忆道：

事变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民众，就是农民暴动，是共产党领导的，那时候都是不露面的领导。这儿事变由四卫所那儿开始，那时候我刚记事，上不了学了，也不上坟了，都变了。当时已经有日本了。那时候不是五星红旗，是青天白日旗，扯大队（黄宗平）。

顶我 20（38 年）事变，就是便衣队。这庄里有个局子，他们来——刚一事变哪有枪？有俩鸟枪。他都捡那二流子懒汉，说跟我当兵去吧。局子在路南三趁他们家。后晌局子里的人都不敢在家里呆着呀。那阵儿八路军净指着夺枪（冷向义）。

便衣队后来闹着闹着，也兴改装，都成了八路军了（林起洲）。

没落地主黄季英的后代黄宗平是多年在外打铁的工人阶级，并且勤奋钻研党和毛主席有关阶级分析的政策以备用，他的脑子显然很清楚。但冷向义和林起洲可不认为土匪、民众、便衣和日后的八路那么容易分得清，尽管他俩在村里绝对算得上“具有反思精神”的人物。无论如何，这次暴动对冀东村庄最深远的影响是基本彻底摧毁了旧有的地主士绅家族势力和闾邻制，其广度和深度是此前的玉田农运之类无法比拟的（注意黄宗平把事变而不是日本入侵作为一切“都变了”的标志）。风雷隐动数十年后，日本入侵造成的政权真空最终促成了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的到来：该消退的势力基本消退，广阔的空间等待新一代去施展。几位老会首行将就木，大多土财主逃之夭夭，西村的一批初生牛犊，无论是以前当匪的，还是至今未露峥嵘的，都自觉不自觉地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隐约看见了争取话语权的大好机会，但也许很难意识到这次和前朝世代有根本的不同：他们将接受长期战争环境的洗礼、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党组织的熏陶，当然，还有更加残酷的村内权争。

西村日后的英雄黄宗藩在 38 年前毫不起眼。据解放后他自填的简历（58/12/12、60/1/15）及各种查证材料：27 至 31 年在家中玩；32 年至 33 年底到四卫所姥姥家读书，回村后至 35 年 7 月在村务农，证明人毛宽；8 月至 37 年 9 月在金矿<sup>30</sup>做工，证明人孙腾兴；10 月至 38 年 12 月任村办事员，证明人陈龙孝。时间衔接顺畅，宗藩接受短暂教育和有过工人经历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但我们下章会看到，共产党办事员一职到 39 年方有，且西村最早两任办事员都不是宗藩——但他们早已失去了证明自己革命履历的机会和权利。宗藩以公认最老实的干部龙孝作为证明人，而非自己当时的亲密战友（也是日后最大对手）林奎，这就值得寻味。

且不论宗藩是否有意作假，接下来的整风和四清中多份查证结论逐步细化了他的经历：宗藩 33 年前在四卫所上了四年（甚至有说六年）而非一年学，回家务农两年后，36 年由毛宽介绍去归远丰聚成当店员和玉田林南仓烧锅做小工，37 至 38 年 7 月去金矿做小工（62/5/3；65/4/7、6/5）。虽有林奎 54 年证明宗藩姥爷就在四卫所教书，但无论这是否属实，能上那么多年学，其贫农身份就值得怀疑。再有，金矿做工比起小店员和小工来，更符合现代产业工人的性质，而且我们下章将看到这里更多的奥妙。

暴动最终是失败了。据最高领导李运昌总结教训：当时冀东几百名共产党员几乎全部参加暴动，但仅凭此显然无法充分掌握七万余人成分复杂的庞大队伍，自然产生依赖八路军主力的心理。冀东党又缺乏根据地建设经验，既未及时分散部队以建设根据地政权，也未认真组织整

<sup>30</sup> 金矿采集在归远一带民间颇为盛行，是村庄年轻人外出“打工”的重要去向之一，详参徐连治等 1989。

顿部队自身。加上刚放下锄杆的农民不愿离开家乡，以致敌人突袭时部队大部被打散，损失令人痛心。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干部大多随军西撤，但日后在后方根据地受训后大多返回，提高了理论基础和政策素养（暴动总体经过可见李运昌 1987）。

这场暴动在很大程度上与村中吃大户没大的区别。尽管有党的领导和组织，但在起事过程中鲜明体现出农民自发运动的特征，这与足以导向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的集体行动有相当差距，其“吃干饭去”的目标与推翻剥削阶级的社会革命也是相去甚远。自发农民运动的特征是阶级意识淡薄、地方主义和自卫性，大多只是一系列没有配合、组织很差和无甚准备的地方性行为，是愤怒的突然爆发而非运动；农民只觉在自卫，在抵抗外来力量（皇权、政府等只是模糊的形象）。农民中蕴含着混乱但根深蒂固的感情：而共产党把这种潜在感情转为行动（费正清、费维恺 1993 下 P343-9）。而这一次，新的意识形态特征加了进来，新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加了进来。但这只是革命的开始。可以说，从自发运动到革命，区别不只在于集体行动组织程度、目标明确性和长久性（更非先进性），而在于参与者被组织、动员、主体化和组织化的程度。

再者，这些行动形式中农民动机、利益和计算都不同，甚至是否可从这些角度来考虑问题也不一样。但不能单纯解释集体行动中的理性选择过程、“客观”利益关系，需考察具体文化框架中“决策者”对这些关系、可能导致的行动及其后果的文化意义等的看法。政治文化的意涵极其丰富，包括地方宗教信仰、亲族忠诚、道德认同、政治认同、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和社会角度的公平观念，关于如何组织大众抵抗的共享模式，体现共享价值观的共同记忆、歌谣、格言、谚语、英雄传奇等等（Little1989）。这场大伙儿揭竿而起的骚动也会逐渐变成一场运动，汇入当地政治文化，孕育即将到来的长期组织的革命，它最需要的是不是热潮和口号，而是在农村用特殊的武器武装到儿童的组织动员。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日本，马上都会意识到这一点。

## 第二章 风云乍起

1939—1946

今年盼着明年好  
明年望着后年强  
等到后年还是闹饥荒  
乒乒乓乓直放枪  
叫人心伤不心伤  
——《做春梦》（归远乡谣）

### 一 初期混乱下的控制争夺

冀东是拉锯区，又地处平津、“满洲”和内蒙的交汇要道，38年日伪突进华北腹地后不久，即开始加强控制冀东基层，另一原因是其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动员基层群众的厉害。新民会中央指导部年底分发的特务调查资料着重介绍了共产党在原地方官员跑尽了的山西基层培养选拔村长的工作：训练村长的宗旨是使其完成旧村长不能完成的使命。新村长应具备四项条件：民族意识、强烈责任感、现代知识和牺牲救国精神。村长应自觉成为村民政治上的领导者、民众总动员的核心、民众武装的执行人乃至民族革命的主要动力。显然，村长本人素质、承担的任务乃至依托的组织形态都将与过去的村庄（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有质的不同。

在具体的动员组织技术方面，日军在一份《剿共指南》中坦承“中共掌握农民大众的方法极为巧妙，已在华北各地施行。此点，日本望尘莫及”。日方清楚认识到村政权对于共产党稳固建立势力的重要性，也力图掌握共产党的方法，为己所用，争夺对村庄的实质控制：

村是党组织的工作单位和基层组织，是我们的接触对象。通晓农村，是了解农村组织实际情况的第一步，并且可以由此了解到该村出身的领导机关的人事关系。对一村进行侦察时，应注意的事项是：（一）中心村的组织强、党员多。在与县委和外村干部有往来的村，一般要有两名联络员。一名接待日军，另一名负责与外村联系，通知他们日军来村的情况。如果将他逮捕，即可了解其领导者——书记的情况。（三）外围团体的成员，不了解横的组织关系，可利用他进行引诱或绑架其它嫌疑分子的工作。（四）通过向农民了解对统一累进税的感想，可以获悉当时有关人员的情况。（五）小组人员中，无土地的人居多数。他们白天在田地装作佃户，监视农村的反党言论和行动。<sup>31</sup>

可以看出，日本对共产党在村政建设中某些细致的做法及其隐含的缺陷已有所认识，并企望有针对性地取得突破。然而，他们的做法显然会使非共产党稳固根据地的村庄更无人敢出头。

先看看日伪在冀东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在各县成立新民会，但其影响主要限于市镇，乡村势力很小，主要是通过各种宣教手段，如兴办新民学校，或在农民冬闲时开办冬学；或在各乡镇小学附设新民夜校，由县新民会教育馆委派教员。<sup>32</sup>二是重建警察所。归远警察所下设四个分所，其中管辖西村的二分所先后驻金山寺、大寨和阳家屯。三是整肃保甲。39年1月日伪开始在冀东重建被大暴动摧毁的保甲制度，在乡保甲层级结构下建立大乡制。7月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颁布《保甲条例》，编户入甲，编甲入保，联保成乡，数个自然村合为一乡，以大乡区公所为核心机构，清查户口、编制户籍、申领“良民证”（户口证、身份证）、联保连坐，并规定18至40岁男子皆编入自卫团。<sup>33</sup>四是设立感化院。41年秋末归远县伪政府在县城建感化院。先通知各村将本村为八路办事的武装班长、办事员、民兵队长和儿童团长送交感化

<sup>31</sup> 转引自日本防卫厅战史室 1982 上 P93-7、409。第二款原缺。第五款系特务在山西和顺潜伏观察的“心得”。

<sup>32</sup> 见魏宏运 1996P41-2。疑西村富农黄立仁和钱惠开讲的冬学即属此项。有关情况另参张祥云 b。

<sup>33</sup> 日伪保甲制编制、职责详参魏宏运 1996P31-3 及朱德新 1994，朱著介绍了实际情况与表面制度差异甚大。

院，不然就去各村抓，各村纷纷花钱雇人应付，多有村民迫于生活无靠，领钱冒名顶替入院。一时人满为患，不得不在城内分设四处，共收 1200 多人。此外还实行各种奴化教育。<sup>34</sup>

按晋察冀边区高级领导朱其文对日伪各种控制乡村措施的总结，其他措施还有每村设警钟、了望台、棒子队；在百姓中每村训练一情报班长；<sup>35</sup>对原伙会、联庄会政策改打压为拉拢组织（按：当也含土匪）；开设日语学校、小学教员短训班；设立宣抚班；利用乡间 30 多种落后反动教门组织进行宣传和特务机关活动等（据朱其文 1940，亦参南开大学历史系等 1992）。

西村村民经历了日本初进关时的惊惧、好奇后，开始了漫长艰辛的跑返生活。后来渐成习惯，敌情较紧时早早吃晚饭，然后抱上被卧上南岭，有时什么也不及拿就往山上跑。男人怕被抓壮丁，女子有许多不跑的，说是在家看家，也有的系因小脚不便夜间山路。当然，许多闺女在敌情紧张时赶早出门子（出嫁）了，未闻有受日军侮辱之事发生。南岭显眼处立有消息树，村民轮班看护，哪条大道上来了敌人，就往哪边放树。钱周氏在南岭也躲不掉：

那跑返就没法说，没黑没白的跑。跑返那哪有地方待呀？当院里待呀，躺着呀……那时候，你就锅里盛了，晌午这个烧火时候了，做了饭，一边做饭，一边东瞅西望的听着人家，人家说到哪哪了，快熟了，到嘴边了，掏出来还吃不上呢，就撩了，不让你吃不是？成天的跑返。黑间儿睡着觉，听见狗一咬，你就跑吧。睡觉呢，衣服都不脱呀。这糊弄着把鞋穿上。这要狗一咬了，忙了鞋都不穿就撩了，光脚丫子跑。

值得注意的是，也许由于频繁，并非人人都把跑敌情看得那么紧张。至少在村民讲述中，我们听到跑返时有人在山上打百分，有人背着赌钱赢来的一口袋票子。宗藩、林奎等村干部在避开国民党顽军袭扰时，还跑到南岭村民家里不慌不忙地坐吃喜酒。当然，艰苦和生命危险是时时都有的，但人总要活下去，而且得快活地活着，既然全村人都如此，又有什么理由过分沉浸于自家的不幸呢？再者，跑返因其持续频繁而反倒失去了值得记忆的情节，从而在如今的讲述中缺乏生命力，口头讲述如今只留下一些似乎没心没肺的趣事。这倒不是西村村民处变不惊的独特品性。比如某革命回忆录谈到：西村北部山区有个村，村长家养了头小猪，大家都当成稀罕物。该猪对当时战斗环境似乎形成“条件反射”，只要山头一喊哨报警，就从圈里蹿出，乖觉地跟在人后头跑敌情。这头小猪因为可以作为当时险恶环境的最佳写照而名留正史（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7 三 P221）。其实如我们上章所说，西村地处要道，过往军队实在不稀奇。支柱林说：除了日本子、满洲队来了要跑返，其他比较好对付，给点钱就行。黄俊兰的大伯早年被过境奉军冷枪打死，但黄俊兰说：八路军你也得应好，来敌情了你也得应好，那阵我没挨过他们打，我敢跟他们对付，我不怕。

## 二 突破治强恐怖

但战争毕竟是战争。日军在百团大战后充分认识到共产党力量，发现须在冀东“巩固后方”，并因此发动五次“治安强化”战役（简称“治强”）。41 年 10 月第三次“治强”后，日军调走久驻冀东的主力，以伪治安军接防，政策软化，宣扬曲线救国，一时与冀东当地民众关系呈改善趋势，形势于共产党不利。共产党边区领导在一份报告中也明智地指出伪军共五种：满洲队、蒙古军、警防队、治安军、县地方警备队和联庄会等，十分复杂，应区别对待，各个击破（朱其文 1940）。日方很清楚共产党瓦解伪军的努力，方面军对共调查班 41 年 12 月调查资料指出，冀东共产党“中心工作是对华北新政权的各种组织，实行打进、利用、扰乱、诱惑等所谓的‘赤化工作’”（日本防卫厅战史室 1982 下 P26-9）。

共产党 41 年 11 月始发动打治安军战役，在西村一线伏击从四卫所向归远县城移防的治安军。双城子攻坚战又敲掉一整营。村民多有传说包森智取双城子的故事。冷向义对此津津乐道：

<sup>34</sup> 参政协归远县委员会第二辑、县档案馆所藏有关奴化教育档案（尤其感化院作息时间表）及魏宏运 1996P42。黄、陈后皆因入感化院这一“历史污点”受过打击，此乃后话。

<sup>35</sup> 这差事可能落到推举出的乡保长或维持会长身上，如他们找不到替罪羊的话。西村黄龙春即属此例（见下）。

他们没讲八路军咋来咋去的？在过去，经老包那个时候，西边双城子驻着治安军，老包亲去好几遍……八路军多咋都是胜利，弄俩人，得点儿步枪，就算胜利。战斗过去了，编的那歌子：八路军计策高，打扮百姓去挖壕，腰里掖着盒子炮，敌人咋也看着不着——这是头一段……第二段：八路军计策强，打扮乡长先进庄，后边本是劈柴粮，劈柴粮里是大枪——那老包计策高着呢，八路军全凭计策不是？

38年大暴动后留下的陈群支队和包森支队后分别发展成八路军独立12团和13团，是整个抗战期间冀东正规主力（另一支队领导后叛变）。其中尤以包森著名，这位陕西老红军以洪山口和茅山为中心，活跃在归远东北部，在抗战中逐渐成为归远四周乡民心中与他们最亲近的大英雄，民众中留下许多传说、歌谣。<sup>36</sup>黄延青、冷向义等都以能向我们讲述包司令打双城子等战斗故事为荣，以示自己身经战斗年月且非一般碌碌村民，冷向义更是瞧不上其他访谈对象，认为不如自己会讲战斗故事。与国民军一样，军队的形象就这样通过机智勇猛的胜利、将领，通过充满令人鼓舞的场面和细致情节的歌谣，深入普通村民心中，成为“人民的子弟兵”。

42年2月打治安军战役结束，八路军23战全胜。4月日军反扑，开始第四次治强。日伪认识到村庄基层今非昔比，要抑制八路势力，绝非控制个把乡保长之类“干部”所能奏效，需要针对中共的全民动员施以全民隔离。8月，日伪强征民夫十万余人，在我基本区内挖封锁沟，筑堡垒。同时沿长城各县实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将老百姓从八路军易于活动的偏僻地区集中到据点附近，以达严密管制和“民匪分离”之目的。10月上旬日方开始第五次“治强”，至11月沟壕、堡垒大部完成，归远四邻各县共新建据点50余处。我军就此退往外线，到43年春方始反攻，恢复基本区（据娄平1987；彭寿生1987等）。

郑树林一家就是当年从被划入无人区的老家辗转来到西村的：

他这叫伪军乡，就归乡。郭家峪离喜峰口也就八九里地吧，都归那。当下就上那去，完了，就围着一大片地，让你上那盖房子去。左近那几个村子，都归那区。四角盖上炮楼。黑间儿不让你出去。你要出去上地里啥的吧，必须八点多钟出去，晚上（下午）三四点钟就得回去。你不回去？他那有个大吊桥，人家有站岗的，就不让你回去了，说你回去晚了，你就给八路军办事去了。归乡以后，离家比较远，作地比较不方便不是？过去庄稼人讲，就是弄点粪，养个猪啥的，生活不了不是？地里再长五六个钟头就得回去。你咋活去呢？这就维持了二年左右吧，维持不了，生活不了。反正那沟里就是东奔西逃的比较多了。反正看也看出来，生活不了，你种点庄稼，长点庄稼，给你点着。房子一次一次，烧了七次。我爸爸跟我妈他们就商量，咱们就走吧，逃走吧。这看着生活不了，一天天的没办法。这我们就连我妹妹，我们这四口子就逃出来了。就往这边来了。

郑树林叙述的语调是平缓的，但可以看出归乡、划无人区给当地村民造成极其惨痛的损失。正史也是如此控诉日寇的。我们看看日方在战后如何书写这段“战史”：

8月下旬，方面军为彻底隔绝八路控制区与现政权控制区，指示修建在地图上标出的隔断线，但该指示完全忽视当地实际。地区队奉命构筑一连串壕沟和岗楼，力阻八路军移动和物资流通，动员民众超过60万人次，给农作物收割带来很大损失。此事成为中共宣传重点，致使青年不断逃亡。方面军又令在沿长城线八路根据地设置无人区。于是地区队以武力强迫居民搬出。居民对此特别怨恨，八路军据此宣传日军实行“三光政策”。9月以来除上述措施外同时施行严厉剔抉、加强保甲制度、频繁讨伐、经济封锁等措施。然而……封锁地下活动极为困难（日本防卫厅战史室1982下P216）。

显然日伪也不得不承认，如此强硬措施也无法充分奏效，反使村民与八路军同仇敌忾、共偕存亡。即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退往长城外后，治安军在归远境内也只在县城周围有较稳定控制。

所谓“民匪分离”值得注意。日本侦察部门总结要领，首先认为八路军长期有规律生活不

<sup>36</sup> 孙伟1992P179另一《打双城子》歌谣版本：“双城子，好热闹，生意买卖真不少；娶亲大车穿街过，八路订计牢。八路军，真敢干，打扮妇女进据点；怀里抱着机关枪，棉被裹得严。治安军，瞎了眼，一心要把媳妇看；老包端起机枪扫，敌人全完蛋”。42年2月包森在对日作战中牺牲。

易改掉，故可突然或连续使之操练军队各种动作，区别是否军人，如集合民众，连续令其立正、稍息，或在谈话和休息时突发口令，早晨突然吹起共军起床号等，据其瞬间反应甄别；凡听到别人讲话就马上起立或有站立习惯者非党员即士兵。其次是实行身体检查，视其肌肉发达状况辨别：党员肌肉平均发达，士兵则肩有扛枪趺子；农民腕部、挑担行商肩部特发达；再有根据日晒程度：农民常赤膊劳动，日晒较重，党员和士兵皮肤稍白，尤其脖子，日晒部分和无日晒部分区别显著。不过“最近共党的工作人员与农民共同从事劳动，所以也经常日晒，手掌也有老茧，应加注意”。第三系据审讯及简单谈话辨别：讯问出生年月日，回答公历而非民国者多为党员；讯问是否为党员时党员多表现兴奋，并强调不是党员的理由；审讯、谈话时递与纸烟等物，试验其“共有观念”，党员因共产主义意识浓厚，常分与别人，吃饭时先让别人自己不争先。反之，因私有观念淡薄，有的向审讯官等不客气地索要纸烟。第四是检查服装：便衣是否合体、和谐、是否当地尘土、钮袷是否较多（按：因耕作者装束会尽量粗便）。第五系据携带物品辨别：勿轻信良民证（常备者反较可疑）；是否携带自行车、较多金钱、仁丹、牙粉等。第六，频繁窥视审讯者脸色或偷看其眼光者是党员征兆（日本防卫厅战史室 1982 下 P351-3）。

不妨据此反观日方眼中共产党对村民的种种细微改造。军事生活和组织生活对普通村民的改造不仅体现在思想、纪律和认同上，而且还体现在深层意识、几近无意识的行为方式乃至身体烙印（时间尺度、公一私与他一我之分、反思意识、肉体的细微改变、身体纪律化）等方面，而这些是以往为人所普遍忽视的。显然，上述要领有些适用于区别由农民转到党员、八路军的人，有些则适用于由知识分子、外地干部转到民众中潜伏的人。本文的分析或许有些过度诠释之嫌，唯愿能提供些思考方向。须知共产党对村民的动员即使在身体方面也远非日方总结的那么简单，但这是个长期过程，日后土改高潮中打地主时我们和村民还都会对此有所体会。

### 三 村里架起炮楼子

伴随“治强”攻势，日军派大队进驻归远，并在铁厂、陈家谷、大寨、四卫所等村镇驻有守备队，还实行配给制（参张祥云 a 及支柱林、黄延青口述）。西村未驻过日军，只在 40 至 42 年有治安军入驻。这也是西村唯一一次有军队常驻。但不知是否上述治安军政策软化以求改善与民众关系的策略所致，村民只说耕作不便，却并无多少特别受欺辱虐待的印象：

我们这庄驻一个营，教官啥的都日本人。平常老百姓没啥接触。打老百姓是常常的，其实打老百姓都是受汉奸的病，要不不打。他知道谁谁是好人呐？汉奸一跟他说那是八路，就揍了。我去东北那会儿治安军也不管你去哪儿（支焕）。

治安军住林家大院，修吊桥，过不了在南岭地里猫一宿。还放皮影，庙会不闹了（董春）。

这里炮楼子，八路军要过就把吊桥放下来。不放，几个人几棵手榴弹就揍死了（黄龙雨）。

显然，如前文所述，村民照例把罪孽更多地加在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中孙毛旦那样的汉奸身上：他们是四乡里那些不务正业的浪荡闲汉，也许就是谁谁家的二狗子，原先一起厮混的三秃、四腻兴许就投了国军或是奔了八路。话说回来，那时村民也刚学会汉奸这词儿，要不是耳闻目睹种种暴行，谁又教训谁在走正道呢？皮影依旧在放，只是没了庙会和组织庙会的那些会首。杜赞奇认为解散庙会削弱了村民与精英的关系，也疏远了民众同国家政权的联系。尽管精英在新生政权中找到通向权力及威望的新途径，但对乡村大众来说，宗教生活比行政职务、警察机制和新式学校（上学的多为精英子女）更为迫切和重要（1994P237）。杜赞奇正确地指出了村民与精英的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但其原因当然不只是庙会之类活动的停止。庙会虽不只是宗教活动，但也不过多地负载在村民心中建构帝国秩序的功能。况且，村民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也不只是发生变化的问题，可考虑村民心中建构民族国家之类外在世界形象的问题。

40 年底西村曾遭日军飞机轰炸，这是唯一一次直接受日军侵害的事件。林忠说原本是炸八区另一个村，驾驶员音听拧了，结果腊月 19 日飞机轰炸三次，投下 21 颗炸弹，炸死村里 4 人。路北草房大半毁于炮火。乡长呈报二分局批钱盖房。所谓听拧了的说法，许是觉得西村不应遭

此大劫（日方飞行员怎能按照地名寻找目标？而且还是中文发音的口头指示？），这也是警察局当时的解释。而后来人们说是村里阶级敌人勾结地主子弟黄延清，让其从唐山派日本飞机来炸村，这种说法也似乎更符合阶级斗争的逻辑。

治安军驻村期间，西村不仅建起维持会，会长黄龙春，而且是周边数村维持总会驻地。但此事少有村民提及，因一般村民对维持会和治安军营部活动不甚了了，加之维持总会长又是大名鼎鼎的十同，故黄龙春这个村会长倒被人遗忘了：

驻治安军时这庄有维持会，会长是周铁庄人，叫周圣征，没接触过。他给两头干事，明着给治安军干事，实际上给八路军干事。他是共产党，地下党。那治安军管啥？治安军的头也是共产党，明着给日本干事，八路军来了，县里提前来人先联系好喽，找维持会，维持会找治安军，到时候吊桥撂下，大部队呼呼地开过去。那时候村东北一道沟，那过不去不是？（董启）

这倒符合村民对治安军的印象。只有几个“上层”村民知道，在维持会、共产党地下人员和治安军下层军官之间，还曾有些地下斗争故事发生。比如据说42年夏，据点中有个李大个子投靠我方，宗藩与林奎去接应取枪，敌人发觉，林奎跑脱，宗藩被抓，后被我方打入的维持会长十同保出。<sup>37</sup>此事后由险情变故事，由传闻变传奇，个中详情版本多出，煞是有趣。整风时林惠据此告宗藩叛变：

41年宗藩在伪维持会跑个腿啥的。郑玉田大闺女是土匪麻老五姘头，宗藩也上那儿去。治安军把郑玉田父女弄去了，还打个够呛。宗藩被弄去营部挨灌挨打，找十同和郑玉田闺女一问便知。（62/3/23、65/5/3）

此事由革命故事变成风月丑闻，令人大感意外。因为郑玉田是伪保长，所以这出戏里什么反面角色都齐了。但正式结论否认了该指控。更典型的是，正史记载44年春冀东解放区司令部曾驻扎西村，此等绝密即使连“上层”村民如林惠及其子林起远流，也只是提到有几位地委部长在村里逗留，一般村民更无人提及。林起远以革命的正统回忆者的姿态向访谈员谈道：

维持会是治安军来了以后有的。治安军走了以后这个组织就撤销了。主会长十同是咱们党派下来的。“十同打入维持会”。他就住在这村，成天跟敌人抽大烟，打麻将，搞些情报啥的。他会抽大烟是咋来的？那他一般跟敌人的营连级干部接触，会那个。十同是15军分区派下来的。我父亲是联络站站长，十同不可能不来咱们家，经常和我们家接触。（十同夺枪的事儿您知道吗？）我不太清楚。他有房子，也经常在咱店里住，也经常到营部来。他活动频繁，还不止在这么一个地方，有时候还到别处去。和庄里其他人接触得不多，反正我父亲他们接触得比较多。他净上我家抽大烟我知道。有时候他跟着关营长、张营长他们打牌我知道，有时候他们是被关营长、朱连长他们请过来，打麻将的时候故意输给人家钱。在我们店里成宿地打，我父亲也陪着打。十回有八回都得咱们输。打完麻将，吃点拿点的，乐呵，那时候还讲还银元呐，人家都挺高兴的。以后他们设中心楼，对咱们都开绿灯，一听说上林家店，门都开开。正好咱们这边有啥……这是我随便分析。这道理是我后来心里清楚的……那阵儿我在庄上是小儿童团长。象刘振华、赵国普、李温这些区里的人老来咱们家。那阵儿领着我们跳秧歌舞啊，开展革命工作啊。赵希光（赵国普女儿，避住在林家养伤）组织西村妇女活动。

就凭提到的治安军内部、我党区委的这些人名，也看得出林惠家当时确实了得。证明了十同就证明了他家的情报站长地位。奇怪的是林起远似乎不知道著名的夺枪故事。是他不愿意提宗藩的革命事迹，还是此事纯属子虚乌有，是为了掩饰宗藩被抓而编造出来的？我们不得而知，毕竟历史一再被重复书写之后便有了巨大的客观效果，哪怕各版本之间存有歧异呢？

---

<sup>37</sup> 十同原名周庆林，又名周圣征，原籍归远周铁庄，没落地主家庭。曾任直鲁军团长，苏林燕、杨文汉皆其少年好友（参张汝林、李永春）。此篇中一坏蛋伪排长被夺机枪，而欲投诚的李姓排长是另一个人。有关夺机枪事件尚有其他版本可对照，参李猛1998c对英雄传奇塑造过程和分层历史问题的分析。

#### 四 建立两面政权、发展群众组织

冀东孤悬敌后，共产党自抗战伊始（或曰自大暴动失败后）即开始因地制宜地逐步摸索建政策略。继 38 年 11 月柳沟峪会议确立建政方针后，39 年 4 月冀热边特委改为冀东地委，开会总结暴动的经验教训，决定在巩固对军队领导和基层政权建设基础上伺机发动二次暴动。当时冀东村庄为应付敌我双方粮草负担，多有成立维持会者，我方认为出头的多为村中能说会道者，一般非地富，基本属暂替地富应付我方，不是依靠对象。8 月冀东地委又在归远舍身台开会着手建政，决定以丰润皈依寨（系基本区）试点建村政权，始设办事员。在我方常活动地区，此时维持会有的不积极、不想干了，我方就提出各村选举或推荐办事员作为村政权负责人，宣布为名副其实的抗日基层政权。而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情况则不同。为普遍开展工作，舍身台会议决定就地利用而非摧毁现有日伪保甲组织，派人打入日伪保公所任办事员（保公所中原有办事员一职，或称通讯员、监岗、保丁、帮办，是干事跑腿的角色）。39 年秋，西村一带建立了我方秘密区公所。40 年元旦冀东分委决定巩固现有根据地、肃清土匪、大力建政和建立青年报国会等，开始在保甲中暗中添设武装班长、财粮委员，变其为抗日两面政权。年底冀东区党委蓟县盘山会议确立村政权普遍建立办事员和武装班长的制度。

至 42 年，除大城镇外各村基本都建立了办事员和武装班长等。实践证明这项政策非常成功。办事员作为抗日政权核心成员，实际掌管村中最高权力。敌来时办事员隐蔽，由保长出面周旋。也有的两面政权由抗日政府直接派人任保长，身兼办事员责任。还有办事员以保丁身份公开活动，暗地主持抗日政府工作。因形势严峻，抗日政府还在大乡（镇）设立中心办事员（或小组），只对其实施直接领导，再经由他们具体领导各村办事员。武装班长负责抗战勤务（后又分化为专司抗战军务的武装班长和专司后勤劳役的战勤委员），财粮委员相当于保会计，管理帐簿与摊派数额的计划与分配。保长应付敌人时定有几条纪律，绝不准暴露村中抗属、抗日组织成员、村干、武装报国队员、公家隐藏抗日物资处以及八路军过往消息。但在敌包围村子，群众未能跑出并遭严重吊打，或敌逼群众交粮交款、不给就烧村子时，保长可给点钱支应，但需有旁人作证。这样，两面政权实际由日伪与我方两套班子来维持运转，既在敌情紧张情势下保证群众和抗日骨干不受大的损害，也使抗日力量站稳脚跟，八路军一方也能顺利征收粮款。

日方深知共产党两面政权策略的实效：“在我方地区农村中贯彻两面工作政策。过去旨在‘使我方村政权通敌’，现在则要实现‘村公所共有化’。由于我方县、乡政权无力，村公所难免陷入敌人操纵”。据 44 年日本华北方面派遣军总结：中共鉴于 40 年前军事抗战战略的失败，展开积极政治攻势使新政权两面化。对公务人员、武装部队和治安地区农村及自动放弃的农村旧根据地进行抗日赤化。此种战略显然使新政权在平常执行政务时形成抗战外围力量，以弥补中共独立抗战力量不足（参日本防卫厅战史室 1982P391-3；魏宏运 1996P33-4、69-78）。

41 年 6 月中共北方分局在呈北方局的报告中，全面总结了抗战前期冀东村级基层政权和组织发展情况（中共中央北方分局 1941），认为形势大体不错，归远大部地区已无敌伪实际统治，群众对敌经济负担很少。大联乡、大联校、警察局、情报员、棒子团等敌伪政权形式大部被共产党摧毁，只剩伪村长（或保长）以便敌来时支应。青年游击小组也已建立。

然而，革命持续与成功的关键是尽可能全面深入地组织全体农村群众，故报告虽指出报国会或救国会（统一战线抗日组织，内可分老头、雇工、青年、儿童等各组）与青年报国队（或自卫队、自卫军）等群众组织在冀东已普遍建立，却依然认为有组织的群众还很少，工农青等专门组织尚未建立，妇救也只在部分地区建立。总之，“群众工作是冀东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换言之，秘密或半公开环境里组织起来的报国会之类组织形式应在组织强度上有所突破，分为工农青妇各种专门团体，新团体将不再普遍吸收原组织中统战对象如地富士绅，而要配合减租减息与合理负担斗争，在运动中树立农会作为村组织中心的权威地位并建立群众武装组织。

为对照当时整个晋察冀边区的群众组织工作，可参见以下两份章程规定：41 年 5 月颁发的《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组织章程》规定自卫队有三大基本任务：进行群众游击战争；配合抗日部队作战；维持后方治安担任抗战勤务。边区抗日人民 16 至 55 岁者均须登记参加组

织为本队队员，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村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武委会）下分设妇女、自卫、抗先与模范四队。值得注意的是妇女队，其分编组合原则为：16至25岁之全体队员及26至30岁之大足无4岁以下小孩之累者混编；31至55岁全体队员及26至30岁之小足有4岁以下小孩之累者混编。同日颁发的《晋察冀边区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简章草案》规定本队除自卫队任务外，另有加强队员军政教育训练；不断输送队员入伍扩大边区子弟兵两条；队纪中规定六大纪律：不违背国民公约和青年信条；出门请假，准时到操，不无故缺席会议；尊重抗先礼节，爱护自己武器；不说破坏组织的话，不作破坏组织的事；服从队部指挥调动，战时不动摇逃跑；不推脱偷懒，积极执行抗战勤务。<sup>38</sup>

这些要求中除明确宗旨、树立信念外，大多集中于培养组织纪律性方面，着重是对徒具爱国热情（甚至只是热情）但无纪律的普通农民的组织化要求。青年农民若未上过学（还不能是私塾），恐怕是首次需要接受如此严格的集体化训练和纪律观念的培养（这与“服从”是两码事，需要主动反省、积极执行、“奋发向上”），至于妇女的组织就更是史无前例。有学者认为，华北乡村经过抗战的最大变化可谓社会组织化。原本松散无序的农村社会由党政军民不同系列组织紧密联系起来，其首要目标皆为争取战争胜利，形式和作用都服从战争需要，并愈益趋向集中统一的领导。组织军事化的直接后果是上层政治运作和群众行为方式的群众运动化（刘一皋1995）。这样的思考方向不错，只是组织化的影响不只是军事化要求的结果，群众运动的内涵远远超出组织军事化的形式，而要渗透到每个村民的思想观念、身体行为上，而不会随战争的结束而告终。此外，冀东敌我拉锯，不同于较稳定的边区腹地，群众组织的运作与群众对组织和运动的态度都不会一样。而在缺少家族势力传统、流动性又较强的村庄中，组织纪律的培养也更为艰难。当然，冀东也有优势，许多人有过在津、唐等地现代厂矿做过产业工人的经历，较易接受和理解集体观念。

回到北方分局的报告，在村政建设方面，报告指出冀东90%村政权尚未改造。为更好地贯彻减租减息与合理负担，应清算村款、反对严重贪污浪费，有必要撤换一部分极坏村长，争取部分村政权的改造。在敌伪统治尚不很薄弱、我之力量尚未占优地区“暂时允许两重政权的实际存在”；而在敌占区“要争取改变敌伪政权为两面政权”。<sup>39</sup>41年8月冀东区开始改造村政权，在有基础的村庄建立村政委员会（包括正副村长及民政、财经、教育、调解、敌工五委员），在最巩固的村实行村代表制。

44年前因战势紧张，我方建政工作唯图艰难求存。42年6月冀东地委指出：武装班长、办事员将来要取消，但不统一取消，有被捕逃掉或叛变的即不再恢复，而可暂用伪村政权组织形式作为表面依托。12月地委提出在基本区要利用旧有的伙会，变其为敷衍敌伪实际抗日的两面性群众组织。据43年底调查：归远城东南一带汉奸组织较强，小股敌伪活动频繁，我部队很少去。故我方须秘密活动。直至秋初我方在县境边打一大仗，入秋后敌伪据点、碉堡又撤退一部，情况始呈好转。现全境皆能征收，但所余据点、碉堡仍相当严密。四卫所一带尚有20余村因曾组织伙会，情况仍不甚好，除征收外无其他工作。全县党员千余，但：

西部数目较多，北部寥寥无几，中部较起作用，能作调查工作，但在民主民生的斗争上统很差。合理负担办法多不一致，且有的村庄在被“蚕食”中为上层推翻后尚未恢复。村政权除一部分仍保持着班长、办事员制度外，大部分是保甲长一级的抗日两面政权……群众工作，西

<sup>38</sup>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等1989下P43-55。晋察冀边区基层政权建设初期情况可参38年3月《晋察冀边区区村镇公所组织法暨区长、村长、镇长、闾邻长选举法》和40年6月《晋察冀边区县区村暂行组织条例》。较成熟期可参43年2月《晋察冀边区县区村组织条例》，其中第47条规定村公所设正副村长；治安员（锄奸、稽查清查户口、维持治安等）；民政委员（户籍、地政、选举、优抗、抚恤、救灾、调解等）；财政委员（村概决算、公产、统一累进税等）；教育委员（学校、社教、宣传等）；实业委员（生产、贸易、合作等）及粮秣委员（公粮草、军鞋、抗战勤务等）；中队长和指导员（人民武装中队部掌理兵役、民兵、岗哨、自卫等）（分参同上P304-13、32-46；下P317-24）。

<sup>39</sup> 彭真在晋察冀边区大会上也称：目前最大多数区域政权仍应适当采取两面政策应付敌人（在群众内部仍应同时进行反支应或力求少支应敌人的教育）。这不仅是为避免群众遭受不必要的摧残，而且是为减少频繁报复“扫荡”，以便开展工作（彭真1941）。此之谓以退为进，留出活动空间，以求生存发展。

半部在四、五次“治强”中已垮台，东半部仍为报国会形式……（邻近地区多属三种情况混杂）一部是村政委员会，一部是武装班长、办事员，一部是在我掌握下的旧保甲一般的抗日两面政权。保甲一般皆很好，比老办事人进步，一切对敌伪事情都是向我讨论，经我同意，然后进行（姜宇 1943P76-91）。

43年12月行署在次年首季工作纲要中指出：巩固区一般都要建立村政委员会，已建的要再次改造，树立基本群众优势；游击区能建村政委员会的要建起来，不能建的要民主方式掌握保甲长，或建副职，或设抗日办事员。44年2月冀热边行署公布《冀热边村政委员会选举条例》。至同年春，全区改造了近两千村政权。

就西村所在区域而言，抗战及解放战争期间政权组织在具体名目、划归单位上十分复杂。两面政权全凭军事情势决定孰进孰退，共产党行署或地委、县或联合县、区三级党委和政府（党政多不分）委员皆无固定机关驻所，长期在各村串，村民呼之为“背包政府”，故只能说是活动范围而非管辖范围，具体体现于各种地下或地上交通线、情报站、后勤供应线和地下仓库、伤员转送线与后方医院、办事员联席会议、民兵联合行动等。而当时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动员各阶层人民统战抗日；发布政策法规；镇压敌特汉奸；组织动员参军；进行各种武装和非武装抗日活动；贯彻合理负担；征收粮款鞋袜，保障战勤及拥军优属；调解民事纠纷。<sup>40</sup>

## 五 总得出个支应人

这段时间里周金林和郑玉田长期分任乡保长。乡长是个小园脸盘的矧子，略通文墨，脾气好，有点薄地可供赔补，正宜做四面支应的受气包。保长高大勇武，家徒四壁，目不识丁，干替人搜捐刮税、进据点保人说情之类烂事，倒有几分身体资本。村民对这两位印象甚好，说他们都办事得力，象个庄稼人，能说，护庄，是不得不干那些杂货事：

庄里是非得把他们安置出来，你没那个人不中不是？咱们庄乡保长不错。一般的他也向着八路军，送个情报啥的也管往外派。你就是知道给他们干不好，也得出那个人。咳，那个社会真是受罪（林起明）。

我们那乡长罪受大了，让日本给打昏过去多少回呀？把他抓去，问他你这庄办事员是谁呀？武装班长是谁呀？他不说，说就是我自己，说我们西村是守着公路，选谁当办事员和武装班长也没人干，说就是我自各干着，我又是办事员、又是武装班长、又是乡长。他说你们这方面要粮要草我得给，八路军那边要粮要草我也得给，我惹不起。爱咋咋着。他是大家选的，谁愿意干那个？今儿干，明儿脑袋没了，谁惹得起呀？哪边你惹得起呀？八路军一下命令，你这西村十天以内给我做50套衣裳、200双鞋，要十石米，给我送到小应家谷、洪山口去。到时候他就得给送去。你不送去，到第11天就把你这乡长抓去活埋了你。保长也是选的。那时候的选跟现在选那民主气氛？没那事儿。上层人物，中农，地主富农，说你干吧，就这么着。没那个程序。不想干你也不中啊。为啥选他们？事情都有个背景。周金林还识几个字，脾气特别柔和，肉儿叭叭，踹一脚不出气，人缘也挺好，也不惹事，人挺厚道。觉得把他弄出来，大伙也不会受害。郑玉田跟他两码事儿，大高个，挺胖的，一般人惹不起他。乡长和保长就跟现在书记跟村长似的，哪头沉呢？还是乡长管事多。乡长管催粮催草，保长管政治多，就是治安啥的。要是日本鬼子跟治安军把谁弄进去了，保长到那儿能给弄出来。乡长他不去。保长到那儿，说那是好人，就把他放了。要粮要草，要俩民工，这些乱七八糟的就乡长张罗。就他俩，之前没有。你想想，一共才几年这事儿？由39年、40年日本才到这儿，45年就投降了。那时候区小队啥的来，都是周金林给找人，找驴找骡，抬担架。那时候办事员不大管这事儿，管政治的多，管这扩兵啊，庄里谁是特务、叛徒啥的，锄奸（支焕）。

<sup>40</sup> 参杨文汉 1987。民事调解具体规定见 42 年 4 月《晋察冀边区行政村调解工作条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等 1989 下 P171-4）。费远盛之类原村庄讼棍淡出舞台后，民事调解成为共产党培养新式地方精英的重要渠道，参强世功 1999。

无论多年的党干部支焕此前无乡保长的说法是否准确，确实无人提及二三十年代哪个有名有姓的保甲长，这俩乡保长也确实是日本来后富户们自己不爱出头，被捏弄出来的。不过听上俩人的意思，乡保长夹在日伪和八路之间，委实难受得可以，而办事员则比较好办些，只要一门心思朝着咱们这边干就得了。然而，我方首任办事员的后代董印说起来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无论开始如何为生活所迫，干的终归是鱼肉百姓的伪职，和自己父亲的磊落比不得：

周金林由东村搬来时候穷，由当乡长发的。郑玉田是最穷的一个人，是偷发财的。搬来一家十来口子，在外面东院小厢房住。他力气大，偷，有劲，使小驴驮 240 斤盐，到接官厅拐弯那里看见有人追过来，卖私盐罚款不是？连驴带盐的挟着进高粱地了，没捞着他。郑玉田庄稼活能干，当保长偷发财了，复查时候捋光了。他兔子不吃窝边草，上××偷去。（那他这群众关系怎么样？）那还好了喽？当乡保长的都是后来就挺横的了。（老收粮收款什么的？）那可不行！是庄里事儿，打架斗殴的。红白喜事不管。

而保长儿子郑启财至今满怀怨气，这也很自然：

土地平分我们也没得地也没出地。父亲那时候当保长也不吃香，你当是没遭死，没活埋了。那时候他没啥，有钱的人家不当不是？八路军也得硬要帐，日本来了也得伺候，八路军来了也得伺候。哪方面都——我父亲他胆子大，一个子也不识，就让他干。（谁让他干的？）庄里呀！有着地主啥的就甭说了，没了那时候也都撩了，到县城去了。二等户啥的那会儿看这玩意儿，要支应人不是？这也不中。八路军来了吧，要鞋要袜子得给派出去，谁谁做。来了，赶到派饭，也得派。八路军那下手（一开始）也就是小米加步枪不是？那时候，来个干部，就得给站个岗，放个哨。日本子一来告诉话，撩，就这事。八路军是走哪吃哪，也不带给养，乱开个条，就顶个征购，就得。不让八路军活埋了就算不离。你反正也不给日本办好事，也不给八路军办坏事，这就差点（就不那么厉害）。你要说给八路军破坏点啥的，那可就活埋了你呀。

周金林侄周义也没好话：“大爷两面都得应好，一面不拉场子也不行”。倒是黄延青界限还划得清楚：“周金林当过乡长，那老爷子不赖。他和父亲两码事。他干的时候我父亲也干过。反正是你不限制我，我不限制你”。当然，他自己父亲后来也没好下场。另外还有个短期保长：

屈连当过保长，日头不多，清算时候没找他。他家生活困难，地少，贫农。就是做点买卖，秋里在这买点栗子，往唐山送，弄俩钱花（董启）。

看来，两面政权中基层“办公人”的处境比较尴尬。我们当然不能就此否认当时人们的抗日热情和革命安排的正确性，问题还出在我方某些政策的执行方式上。东村的情况又如何？

那时候两方面。咱们是偷摸的，人家乡保长是很明显的。保长张宝第，乡长张信。张宝第他们家过日子平常。张信他们家也不算咋好。那阵儿乡保长他们都挣着工资，村里给的。咱们给共产党干点儿啥的，啥也没有。代耕是大以后了，家里地扔了不中啊，得活着，找几个人给你薅薅。乡保长是给小米。他们自各可以敛，按地亩摊。一个月大概 200 上斤小米（冷向清）。

当年东村的老办事员觉悟似乎有待提高，对共产党代耕制和乡保长村费收取之间的差异还颇有微辞；而 35 年生的朱柱虽说其实啥也没真正经着过，可积极学习，说话硬是有大局观：

国民党那边叫维持会，有会长，相当于咱们这边的办事员。一般这老解放区都有，叫两面政府。共产党来了，说哪哪咱们给送点儿给养，哪哪有点儿袜子给转移转移，鞋给弄弄，哪哪有多少伤员给押送，送哪哪去。这个谁办呢？就是武装班长、战勤、办事员办。国民党这边来了，顽军来了，就找维持会，找乡保长。人是两套人，但一般都相互支持，不敢相互残杀。都残杀了，村里工作也没法弄。给国民党应对那事，他来了你不给安排做饭吃也不中。那八路军来了说给带带道，有几封信给送出去，你不给送也不中。

其实西村只在治安军驻村时才有维持会，不过性质与乡保长也差不多。两面政权的某些弊端我方高层也很清楚，曾任冀东地委书记的李楚离 43 年（时任冀热边特委副书记，李运昌副手）在报告中指出，政权逐渐巩固后办事员制度暴露以下缺点：易与乡保长对立，使旧办公人寒心；易脱离群众，强迫命令，缺乏民主精神（制度本身问题）；支部对村政权领导简单化。他在指出办事员在村内对乡保长简单领导的同时，也承认乡保长常因完不成任务遭到毒打和扣押（“当

然只是日伪一面”），被称为挨打的架子。同时提出：“执行两面政策的人应不是我们自己的人（冀东如此），需保持他的两面地位（他有他的立场），我如运用不好，他即对敌真实对我敷衍。所以，对这种人当耐心，并对他诚恳坦白”（李楚离 1943P12-3、71）。

## 六 谁是村里的老革命？

西村约从 39 年开始有了办事员或共产党员，总之是党的基层骨干。但究竟谁是首位党员？谁是早期办事员？却成为众家争夺、查证不清的问题。至少有三人争夺村里首位党员（当然也是最早为党为革命干事的）的资格，同时也必须证明其他竞争者说假话。

董印称其父董祥明（1903—1940）39 年经包森介绍入党，成为西村首位共产党员和首位办事员，化名景文，并发展邻居冷萌清入党（当时 36 岁，后一直在外为我方秘密转运药品）：

办事员管破坏电线，电道，征粮款，给八路军做鞋，较发——那时候还都留大辫子呢。父亲六月初三被抓去，38 岁，六月二十一死的。崩了就扔在河里。地主就因为我父亲让做鞋。地主的地多，鞋做不了了，用纸做底子，外头弄层白布，那一穿就折不是？我父亲发现，都给撅了，撅一双罚三双。这黄家大地主还抽大烟，叫黄立仁。冷萌清是药铺先生，先在犍子峪开，然后到西村，入党后到县城东街开小卖店，小药铺，好给八路军往外送药。斜对门就是日本小部队。一个鸡毛信摆在柜台上，让日本看见了，把他抓去，罪受老了。那是 41、2 年：上电；弄点肉，把狗叫来；铁链子烧红了，跪铁链；最后使竹签。

告密者富农兼教书先生黄立仁后被八路处死。董祥明的资格虽因其烈士身份而无人质疑（也在相当程度上无须质疑），但后来因为新精英的崛起，其功劳也就无人宣扬。值得注意的是他援引的介绍人是军事英雄包森司令，而非林惠、宗藩、林奎等其他老党员常称的苏林燕、苏远兴等正式负责发展党员的组织干部。接下来我们详细看看宗藩和林奎。

据宗藩自填履历（58/12/12、60/1/15），39 年 1 月至 40 年 6 月他任村财粮委员兼党内小组长，证明人周子明（填表时任四川某县公安局长）。其间于 39 年 7 月 4 日与林奎和周子明同经当时冀东地委组织部长苏林燕（47 年 5 月牺牲）介绍入党，当即转正。40 年 7 月至 48 年 12 月任村党支书，证明人冷向权。49 年 1 月至 52 年 8 月任村长，证明人黄荣。但四清、整风和文革中多次有人控告其历史问题，查证出其虚报党龄，结论是 39 年起与林奎、周子明等在村给乡保长跑腿，暗中为我方送信。40 年因敌情紧张，去归远某金矿和孙腾兴、林忠、支振声、黄龙祥等做小工一年。41 年至 47 年 5 月在家务农并先后任办事员、村长、支部书记（按：按表上字迹，“办事员”字样显系后来添加）。41 年 7 月 4 日苏林燕在本村董振富家介绍宗藩、林奎入党。直接证明人已牺牲，仅林奎能证明（62/5/3；65/6/5）。

现在我们知道宗藩其实先后去过两座金矿做工，但前章他为了使自己的革命经历尽早开始，将其并作一次，并从众多“工友”中挑选了孙腾兴作为证明人，而孙解放后是十区区委书记，因培养典型的缘分，与宗藩存在荣辱与共的关系，此系后话。宗藩任财粮和党小组长的经历基本可信，至少没有反证。而他查证前填的一直任党支书和村长则纯属谎言，因为土改他被批斗，停止党籍数年（见后），故查证后结论具体到了开展复查的 47 年 5 月，且有意无意地为了开脱其没落地主的身份嫌疑，特意注明他一直务农。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究竟什么时候入党。请注意，即使如查证结论所述，将宗藩的入党时间推迟两年（如此也就肯定不是村中最早党员），即使结论中引人注目地详细注明在某村民家入党，也大有可质疑之处：林奎是孤证，且其本人的党员资格也须通过此事证明；而那位董姓村民又早已迁出西村。

在解放初期的宣传读物里，林奎和宗藩似乎是开辟西村革命事业的“朱毛”：

老党员黄宗藩和林奎是 40 年一起入党的出生入死的战友。敌人那时挖沟 2 丈深，1 丈多宽，八路军还要插到长城外。黄宗藩当时任村主席，号召全村每人捐一把柴填平沟（逯斐 1955）。

宗藩的领袖气质跃然纸上。沟确实有（即董启上面说治安军在村东北挖的沟），八路军也确实要往长城关外去（即上文之“退往外线”），而村主席这职事不知从何谈起，不过这有什

么关系？总之俩人一起打江山闹革命就是了。五年后的宣传读物写得更是让人怦然心动：

林奎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在村里作武装工作，人们称黄宗藩和他是一文一武，生死兄弟，患难同志。他的性格是直爽、刚毅，作事痛快、干脆，还有个说法是急、快、猛。社里有什么突击任务，都交给他去完成，黄宗藩对于他作的事情，比相信自己的手还相信（张朴 1960P5）。

不能说书上不对。人还那人，脾气还那脾气，只是看的角度可以很不一样，村民现在说：

林奎这人脾气暴躁，鲁，抓工作还是有一套。宗藩不用说，当然也有缺点。林奎大方面不如宗藩，宗藩较稳重，说话有一套，和林奎一文一武，开支部会说“在林奎领导下”（林起友）。

一般情况林奎不及宗藩。林奎是咋回事呢，人有点粗暴，他忒爱报复，报复心忒大（毛存）。

四清整风查证后，正史开始直书宗藩为 41 年 7 月 4 日首批入党的西村党员。但文革前村史介绍宗藩、林奎两人一块入党，林奎更任相邻各村“骨干民兵联合游击队指导员”。文革中林奎被打成反革命入狱，新村史便指出宗藩早在 30 年代就与黄龙祥、周子明参加革命，41 年与周子明、冷向权一起入党（分见立新公社纪事编写小组 1966；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1975）。会在自己主持会议时说“在林奎领导下”的宗藩，最终还是更“相信自己的手”，把林奎打了下去。显然，为他人作孤证的林奎不仅在日后现实斗争中落败，而且连其过去也被正史抛弃了。

但他其实只是第三个而已。村中神秘人物林惠在 62 年整风时自称 39 年经苏林燕发展入党，并质疑宗藩、林奎入党时间，因他自称 40 年前即在村负责情报站，夫妻俩是西村最早的两位党员，却不知道宗藩他们是党员。当然，这逻辑的基本前提是他自己确是早期党员干部。而如前文所述，林家父子知道许多敌我双方的上层人物和事件，似乎可以佐证。村民们也都知道他代号尚山，长期与上面关系紧密，甚至有手枪！可他无论解放前后从未出任本村干部，竞争实力不免大大下降。他起先跟宗藩住一个院，关系不错，后来全家都关系很僵。无论孰是孰非，村民普遍对这家人评价较差。黄延青尤甚：

林惠心眼多，不忒正道。认人交朋友，有光沾就交，土改时候把行署朋友寄放在村里的 3 万斤小米给吞了。

我们下面会看到，粮食既非行署私人存放，也非 3 万斤小米，更非林惠独吞。但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总得有人来承担本村这一无法洗清的污点，谁让林惠家既神秘通天又爱告状争斗？我们在最后一次访谈时撞上从外地退休回家的林起远，而他也没放弃这机会：

父亲是 15 军分区半脱产干部，有时在家，有时在外头。法大纲那阵我父亲不在庄上，随军打锦州，管善后处理，军管会。参加工作是 39 年，39 年入党，40 年转正。是苏林燕介绍的。这一段搞了很长时间弄不清楚，最后成了反革命，也无所谓了。（谈南下不成事）如果那时候要让我父亲是党员，那么黄宗藩就不是党员，我们两家的焦点就在这里。我父亲一直坚持他是投机××，四清一直在搞，最后他们给了我父亲一个糊里糊涂的解释。黄宗藩也搞了合作化运动，土改以后也参加了革命，当时孙腾兴也（袒护）……不提了。大军南下以后我父亲就落在了归远兽医站，第一任畜牧主任。我父亲会治军马，牛什么的。我姥爷是老兽医，传下来的。以后调到公社当兽医站站长。文革期间把我打进去以后，就也把我父亲打进去了，押了好几年。

所谓南下不成事，据 62 年林起远与县长座谈（这本身就是一种地位标志），称其父参与接收天津，后准备下江南，来三封信要求转关系也不给，区里说转给村里了，宗藩楞说没见着（其实当时宗藩并非村里一把手）。本可成为南下老干部，就此只能屈居乡下兽医站，确实郁闷。但仇恨是双方几十年相互积攒而成的（起远 55 年入团时介绍人还是宗藩、林奎）。解放后林惠和弟弟、儿子屡次就宗藩家庭出身和党籍等问题向上级指证，林惠甚至不惜控告宗藩调戏自己妻子和儿媳。但宗藩解放后已逐步成为模范典型，上面调查后定为诬告。无法击败对手的林惠便成为第二位失败者。上级就林惠控告宗藩党籍问题作出如此结论：

宗藩确实是在村入的党，是否 39 年不知，但 43 年入党的冷向权确系他做介绍人。林惠不在村发生关系，也不在村过组织生活。林惠夫妇自己党籍无从查证（62/4/6）。

告状不成，反倒砸了自己的脚。起远文革中则成了反宗藩造反派的幕后首领，最终入狱：

其实林奎是 44 年入党的。黄宗藩他们牵扯进去以后，就生出了 41 年入党。后来经过 62

年整风，一直到四清，组织上永远没有确定他不是党员。后来林奎到文革时候都反过来了，就不承认了。一不承认就搞外调，林奎的入党介绍人是刘振华，还健在，文革时我们搞过调查，刘振华打了证。因为打那证，西村整了三十多家子。经赵国普、刘振华（作证），林奎是44年入的党。我父亲说这还差不多，黄宗藩——到现在我还是坚持我父亲的意见，他绝对是骗子。黄宗藩是没落地主，土改时候给他划没落地主是经工作组奚仁贤（的手），文革这段我们都搞清楚，都调过，都有材料。因为林奎管我父亲叫哥哥，我父亲代15军分区在这儿开了一个林家店，经现在兰州军区司令王杰（按：即当时牵线的上级），我父亲是党地下联络站站长。当时西村驻着治安军，林奎正在我父亲手下跑堂。我父亲是党员，他（林奎）要是党员那阵儿，我父亲肯定得知道喽。情报站有我父亲、林奎、周子明，周子明是打更的，林奎和另一个小跑堂黄宗智。后来黄宗藩文革时候就说这是黑店嘛。最后，是赵国普的女儿还健在，再加上王杰，回来给咱们公安局打信。这才把那段历史搞清楚，那阵儿蒙冤嘛。

言之凿凿，可资证明的大小人物一个个抬了出来，起远还为我们写下在北京的赵国普女儿地址。但这些都重要了。宗藩当年是典型人物，必须保护。重要的是维护政治大环境，而非维护某些人物的真实身份。其实目前可以肯定宗藩压根就未当过作为我方一把手的办事员：

董祥明死了以后办事员就是——陈龙孝当过，黄龙春当过，就他们俩吧（董启）。

（我们庄净谁当过办事员？）就黄龙春，董印他父亲，经我记事就他俩（黄龙席）。

与黄龙春同族的黄龙席如此说尚可理解。而解放后一向作为村庄对外正式发言人之一的董启也如此说就令人很不解了：难道以前没有人问他这一点？其实黄龙春才是头一个失败者，黄延青回忆父亲化名东风（此即证据），董印父亲死后任了三年办事员，后觉两面支应委实难受：

13岁那年因父亲当办事员，国民党正抓他，他带着家口躲到老家（丈人家）徐店子。庄里派黄立仁等人找他，说躲不了，还是回去吧，没事。你合着是办事员，给共产党办事，要不回去，就算完了，房子给你没收。父亲没办法，说我们商量商量吧。就又跑到县城住了半年。那不是久占之地。共产党员在县城呆着？又上徐店子住去了。但老这么躲着算啥？家口怎么办？就回来了。回来就被庄里送进感化院，猫了一年。出来还是明着当保长，暗的办事员。只当了五个月。因为这活难做，八路军这边要粮食鞋袜得派活，伪军要粮食钱款也得给，两面都得答复。43年正赶上主力转移，父亲就想不干了。总脚踩两只船还行？

实际黄龙春在感化院只待了8个月。黄延青自称自己小时认识的几位共产党区长，后都证实确为当时秘密区干部。<sup>41</sup>但他们都死于日伪，没能挺到土改时成为乃父的靠山。虽然黄延青称其父为党员，但似乎无人承认，又是三代单传，为人老实，故注定要被人推举出来支应，也注定成为最早失败者。许多村民知道他当过保长，但知道或认为他当过办事员的很少。土改时他被划成富农。60年代一部村史中，他甚至混进县城民团当团丁，回西村刺探情报（立新公社纪事编写小组1966P397以下，可能即前文所谓安插的情报班长）。请注意，龙春当办事员或保长的这段时间，恰为治安军常驻西村的那段最艰难的日子，从这一点来说，他都比自己的前后任更难开脱。不争功还不算了：

（后来就是也没人提（父亲当干部）这事儿了？）咳，现在——过去了就过去了，谁还愿意提？你出了名，挂了号，就挨抓，这还咋提呢？那时候见事儿就要躲，谁闯啊？谁不怕事儿啊？当干部惹人没好处。征收小米，庄西林老八儿子林志不给，说“你看着办吧。”你是中国人不？你种中国土地不？我父亲说：“不要了，看你送不送！”第三天上林老八抗不住了。谁敢不给？（那您父亲收粮的时候把林志给得罪了？）一点不错。（土改斗过咱家吗？）那会儿斗过。他有他那个节子呢，那点仇没处消化。没打，就批斗。东西拿走一部分——也没啥东西。没让搬出房子（黄延青）。

日后复查时他挨上了。但现在村民说起来还比较同情：

---

<sup>41</sup> 黄延青自称那时认识来家的雷区长（即东村首任办事员冷向清访谈时提到的区组织干事雷宝贤），后被打死，42年换了田区长，后死在黑驴沟。林奎妻周国珍提到这位田区长，说自己父亲是东村老办事员（实为财粮）。一次因将区里鞋袜给了包森部队，被田区长命令打成重伤。后包森回来要找田时，田被伪军打死在黑驴沟。父亲养伤时东村地主都来探望。

黄龙春当过维持会会长，主要给敌人办事，但是他也不敢得罪八路军，这咱们说良心话。你哪村都得有一个。因为啥？敌人到这儿筹粮筹草的，你总得有一个人出头露面的。而且这出头露面的人，你穷苦人还不中，家境还得多多少少有点儿财产的。他在我们这地区也就属于上中农这样的，到不了富农。敌人来了他给敌人筹划，八路军来了他也不敢惹（林起远）。

黄龙春有个 30 多亩地，雇个活啥的。反正下面就是甦子里拔将军。抗日那时候不论你成份。你地主、资本家，只要给八路军办事，人家也用你（支焕）。

林起远说的维持会会长可能倒是黄龙春当时最正式的身份。董印的说法有所不同：

父亲死后黄龙春当了几天办事员，以后又当保长，瞎干呗。他家是富农，没入党。那是黄家地主安排的。办事员一般都八路军组织，就他不是。整我父亲时他和黄家财主都画押来着。

料想他不会说自己父亲也是“瞎干呗”。自诩革命后代的董印显然是在维护自家身份的纯正性。他不会不明白所谓画押是村里不得不有人出头。

争到最后，正史写下的是 43 年 7 月西村成立党支部，宗藩任小组长。65 年《抗战时期主要村干部》登记表（65/5/3）写下了 6 个人，他们依次是：党支书宗藩，爆炸班长林奎，战勤委员冷向权，村长黄龙祥（非党员），战勤班长陈龙孝，财粮委员支瑞善（非党员）。

宗藩由小组长升任支书，其实那时全村党员不过七、八位。林奎在党内的宣传委员一职（据县老干部韩士林 96 年口述）被忽略，反正他更善于“打仗”。周国珍告诉访谈员，自己这位勇猛的爆炸班长丈夫那时是八个村的民兵指导员（一般说是四个村），多次救过日后害他的仇人宗藩。战勤方面有冷向权和陈龙孝两个，但差别甚大。龙孝是最老实的一个老干部，当我们 96 年访谈其妻，问其夫是否当过干部、干过啥事时，她只知道丈夫负责给八路军号房子。冷向权则染上当时不少战勤委员的通病。人缘不好的支瑞善法大纲后一直被打击，58 年因攻击宗藩合作社被打成坏分子（后改正）。65 年档案上还留下“为人尖滑”的评语。至于村长黄龙祥，此人非常有意思。许多村民说他胆大，敢直接搞枪（当时民兵不发枪，只能靠自己缴获或上级奖励，因此能搞枪是很受年轻人崇敬的，这是闹便衣队时留下的传统。档案记载他曾于 40 年前当了一年不知什么兵），但也皆知他是个大烟鬼：

据我父亲介绍，黄龙祥这个人还是给革命做了一定的贡献。非常机灵——跟着林奎（一起）也是经常地跟日本周旋。可是他始终没脱产（林起远）。

驻治安军时黄龙祥就跟八路军勾着。有密探队，便衣，在北边住着。黄龙祥直接就上密探队弄枪，胆子大不？（林起洲）

黄龙祥也抽大烟，他穷，和人学呗，没钱就偷，外号不拉好屎（董印）。

黄龙祥因为抽大烟挨过逮捕。到了大狱犯瘾不是？“我解个手去！”那还不让人去喽？弄个大烟贴脚心上了。他没处拿呀？都给翻了不是？就这么大瘾头。被咱们县公安局抓起来的。那时国家不让抽大烟了不是？口外就种大烟。村里也有，集上也有。卖大烟偷着卖。也不敢公开卖。让国家也把你抓起来。解放前也抓。几个抽大烟的以后都戒了。那国家紧着没治了！没法了，你卖大烟的看着也把你抓起来，大烟给你没收了。不管你是哪的，哪的也不中，犯法！卖多了还枪毙。少了是罚你，把大烟给你没收了。你就没处买去了。他慢慢也好了（支瑞万）。

另支瑞万自称整 20 岁（42 年）就当民兵连长，率全村 100 多民兵干各种事。董春 44 年入党，解放前曾任财粮。但革命带来的斗争的跌荡使他们渐渐失去了在正史上烙下自己声名的权力乃至权利，岁月化作坚硬（权威性）而柔软（可塑性）的文档，一层层叠积起来。其实谁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并不重要，至少后人制档时并不觉得谁是战勤委员、谁是战勤班长有何特别需要分清的地方（当时党政分立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让活下来并且站得住的精英能够根据回忆或“谱写”历史时的地位，在过去的历史时点上“各就其位”。

总之，因为 48 年土地法大纲“亮党”前，基层党员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加之一些负责早期党建的组织干部相继牺牲，战时又不可能建立和保存完好档案，所以入党时间和早期革命任职经历经常只能听凭个人汇报，而个人证词的信度又与党（乃至群众）对其革命工作的评价、与其所依托的介绍人或证明人互成前提。更麻烦的是，由于两面政权的特殊性，所以几十年后

如何评价个人当时的工作，主要看哪一面的工作，就与此人以后的政治命运互为前提了。

## 七 正确发展党组织

西村党员资格的争夺当然有其特殊性。我们来看看整个冀东党组织建设的情况。

抗战初期，各地抗日组织蜂起。在军事、建政等方针皆不明朗的情况下，共产党起初发展党员出现了一些混乱。据杨尚昆当时总结，在39年8月中央决定巩固党以前是开门大量发展时期：因片面理解大量发展的意义，华北党大多重量不重质，“大开门，拉夫，无例外的如此”，一夜发展40名，3分钟发展5个，骑驴“跑”党员，打锣号召入党，“什么奇形怪状的都有”，造成华北党成分现状相当复杂。政治上多有把三民主义或山西按劳分配主义与共产主义混同。群众反映“共产党好，共产党员不好”、“法善人不善”、“从前那一批人得势，今天是这一批人得势”。40年9月后开始进入基本以巩固为主的时期（杨尚昆1941）。彭真41年在晋察冀边区会议上指出：阜平一人一天发展60人，一时传为笑柄（所谓招兵）。行唐则有摆开桌子在街上写名册之事。入党无严格手续乃至全无手续。支委、支书乃至干部个人皆可批准入党。支部讨论通过和一定机关批准等手续一概没有。个别地方降低入党条件，把党实际变成农会或普通抗日团体（如此即有手续亦无用），“称党为穷人会、抗日团、八路军同情会”。有的入党尚不知自己是党员，或知是党员却不知为何党（彭真1997P155）。

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生动再现了当时村庄在完全缺乏组织动员的情况下推选干部的混乱状况。山里人本就胆小，几个月死了许多人，大家更不敢出头。只有俩地痞把握了机会：

别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各救会、武委会，刘家皎却除了县府派来一个村长以外，谁也不愿意当干部。不久，县里派人来刘家皎工作，要选举村干部，金旺跟兴旺两个人看出这又是掌权的机会，大家也巴不得有人愿干，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其他各干部，硬捏了几个老头子出来充数。只有青抗先队长，老头子充不得。兴旺看见小二黑这个小孩子漂亮好玩，随便提了一下就通过了（1980P5）。

中共后来逐渐认识到，必须首先进入村庄，发现积极分子，并逐步在工作中予以培养、吸纳，并由此打开局面，实现对村庄群众的发动、组织，在革命工作中从积极分子里选拔党员，才能稳固势力，得取民心。具体方法据杨文汉（苏林燕战友，后曾于48年4至6月任归远县委书记）当时总结，发展党员大致有以下几条方法：首先是由上级脱产干部在抗日活动即革命工作中直接挖掘基本够条件的苗子；其次是通过党员和抗日家属这些“根子”寻找潜在的合适对象；第三是优先从两面政权中共产党一方村干如武装班长、办事员等里面选择够条件的吸收入党，再经其进一步联系村中积极抗日，在破坏敌人公路、电线，站岗放哨，掩护抗日人员等方面不怕牺牲、表现出色的群众，即充分把握基层干部并利用他们挖掘后备群众；第四，如一村庄尤其敌伪占优之村庄尚无党员，则通过亲友等社会关系了解情况，选定条件好的加以培养。

这是在敌我拉锯的特殊情势下摸索出的细致办法，在入党组织手续和支部活动方面也强调慎重安全。一般是成熟一个吸收一个，经区委批准秘密入党，除个别举行宣誓外一般不举行仪式。农村支部和各党员都不公开（相互有可能知道）。村中即使有支部也很少开支委会。支部最多不超过五人，支委会上不暴露小组长及党员姓名，支委绝不兼公开职务。各党小组之间不发生横的联系或开组长联席会。有些情况下红了（即身份暴露）的党员编在一起，参加伪组织的党员和秘密党员各自另编组。区委对支部分工领导，绝对不准保有支部名单。

那么，在秘密的情况下，党组织又如何能在革命工作和村庄日常组织活动中发挥领导带头作用？在两面政权中，村党支部或党小组应为村中军政民的最权威领导，办事员及以后的支部书记是领导核心。而各党员（即便不为人知道）皆应积极带头执行政策、制度和对敌斗争。一般村办事员皆为党员，在政府工作中积极贯彻执行支委会决议（显然办事员不一定是支部书记）。县、区委“背包政府”委员皆分区分片领导，长期在各村串，因为区委完全秘密，随时可能被游击队扣下，所以都得带枪活动（杨文汉1987；周文彬1943）。

董春是西村现在世老党员中党龄最长的，不过 44 年入党的他似乎许多事情挺“糊涂”：

那时候看着工作有点进步的，就吸收。也不用写申请，也不用啥，那时候入党一举手得了。（您什么时候知道他（指介绍人冷向权）是党员的？）那以前不知道，得到入党以后才知道。不知道啥是党员那阵。（那时候都是秘密的？）秘密。（他后来什么时候跟您说共产党的事，是怎么跟您说的？）那将来——，就是——那时候是叫党员来着？不叫党员？叫啥来着？——反正那时候说话少数着呢，有啥问题呀，对这国家——有啥事啥的，就传达，开会也不在家里开，谁也不知道，上不传妻子，下不传父母。将来他说呢，走向世界大同，讲共产党打日本啥的。（您还记得他第一次给你讲什么时候吗？）就把我招呼那儿去了。不是他们家——是叫入党呀？叫组织，叫入组织。一开始就是破坏电路，破坏公路，弄电线，搞破坏。我就参加那个。抬担架。打日本子，看着工作，阶级好，穷人，对这日本子，仇视日本子——反正这么说吧，多少有点认识，工作有点积极，这就招呼你，一举手就得了，参加组织了，往后有啥事，得汇报，得说，得按时开会。（您入了组织知道黄宗藩什么了吗？）那都知道了。都有谁谁，将来组织承认，支部是谁呀，啥叫支部呢？（笑）（你们入了党后对治安军有什么做法吗？）那也有布置。监视。有啥情况啥的好汇报。送过信，那没少跑。（您还介绍谁入党了吗？）我没有。（冷向权还介绍过别人入党吗？）——有吧。那不知道。（开会什么地方？）南面有个核桃树，核桃树根儿下没少开，挺僻静的。一般都擦黑的时候。也有一俩钟头的时候，也有一小会儿的时候，几句话的时候，都有。用通知。告诉你。也兴商量事儿。有啥新情况了都告诉，区里有啥行动。法大纲以后，把我们几个支巴在当街去了，这才谁谁是党员，谁谁是党员，这时候这知道了。（那时候周金林、郑玉田他们找你们干过事吗？）那没找过。（他们都不知道你们是共产党吗？）那不知道，知道可了不得。（知道他们会告密吗？）那他也不敢，估计着。那也不和他们发生关系，谁也不让知道。（您知道董瑞明那会儿是党员吗？）反正给我们开过会。比我们还以前呢。那阵我还不是党员呢，单独找我说过。那时候我也就十几岁吧，没说媳妇呢。（培养您？）对了。（他还找别人说过吗？）那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您呀？）那不知道咋事。（他和您熟吗？关系好吗？）那熟，那是我（同族）叔叔呢。平时来往多。说也就是侧面呀。八路军往后怎么着怎么着，咱这怎么样怎么样地侧面说。什么走向世界大同，将来把他们消灭了咋的。说还保密，可别跟别人说呀。（那时候您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吗？）那不知道。（那您猜呢？）我也不知道。（当时没想到？）当时想不到。

即使入党后，董春也不象正史上那些党员那么有明确觉悟，46 年后也一直未任干部（别的原因，见后）。不过我们知道了当年村中发展党员确实很机密，两面政权的关系也挺有意思。

冷向清是东西俩村唯一在世的老办事员，当年的战友都故去了，我们去时他异常激动：

我入党才 20 岁（39 年），各村办事员在一起开会，年岁都差不多，都死好多了。应家谷和黑驴沟的办事员都死好几年了。那阵儿开会区上谁找你，见个面，说事儿，不找你开会你就不知道。那时候开会是在北边陡岭子、陈家谷那里，山坡严密地方。一般都是黑间儿开。附近离十里、二里的咱们碰不上敌情，知道了也都躲着。拿个锨、锄的，（装作）老百姓下地。

爱讲战斗故事的冷向义这次很深沉地告诉我们一个秘密：

我入党谁也不知道。我在十八、九那阵儿入的党（按：那该是 37 年左右，显然不太可能），赶到土地法大纲那阵儿把党丢了。（当时还有谁把党丢了？）没有。那阵儿庄里也知不知道我是，就冷向权知道。这赶土地法大纲，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干部是党不是？谁也知不知道是党，不知道咋叫党。他没参加过党，咋知道党？那阵儿入党，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谁也知不知道。你要露喽，敌人三天两头大围攻，搜查，谁谁是党员啊？那你就露馅啦。好比咱们仨么在一块儿，就知道研究啥事儿，你知不知道我是党，我也知不知道你是党。为啥办公的都有化名呢？（您有化名吗？）我？我没有化名。

我们很“残忍”地问了他最后这个问题，弄得兴致勃勃的老汉似乎很遗憾自己没有化名，因为那是个强有力的证据，象董春就不仅说得出自己化名正山，甚至知道西村化名五河村，因为他干过财粮。但或许更令冷向义遗憾的是，虽然大家都缺乏当初入党的证据，但他从未当干

部，空有一肚子运动哲学，连来自称入党（哪怕招人查证）的资格都不曾有过。

## 八 两面政权下的村庄负担

对中共而言，加强建政的重要目的是要能征收得到粮草鞋袜，保障机关部队的供给，是要组织起坚强连续的战争勤务如送信、抬担架、运粮草。它决不只是经济行为，不再是以往户主缴纳的“皇粮国税”，不再是花钱消灾的“打发费”、“犒劳费”，而是需要共产党在村庄树立新的形象、确立新的精英、建起新的组织。妇女组织起来在炕头纳出的一针一线如今都有了保家卫国的神圣意涵。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八路军战士，女人可抛却过去的道德廉耻为其擦身护理，男人可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穿越封锁线，将其转运到后方医院，因为他们是子弟兵，是“同志”。两面政权另一方如何能与此相比？在韩丁笔下的张庄，日军驻防时地下干部仍能一夜间收集 6000 多斤粮食运往八路军，妇女就在当街敌人眼皮底下给八路军纳鞋（1980 章 8）。

当时两面政权应付摊派一般建立两本账，日伪来了拿假账，八路军来了看实帐。对日伪负担按人口均摊。一般如日伪军要粮，在我方暗中说服和掌握下的保长出面应酬敌人，通过保会计核计，再暗中经办事员批准后征收，给据点送去。对八路军负担主要按资产状况，实行合理负担。一般由抗日区政府财政助理将应摊数额分报各村财粮委员（简称财粮，也许就是保会计），后者与办事员一道计算出各户应征数，再由站岗的青年报国队员通知各户，夜里送粮食（多为小米）到财粮处，最后择定黑夜派人秘密送往部队或地下仓库。

自晋察冀边区建立伊始，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战勤组织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统一战线的建立与维持使村内地富可提供更多贡献，而农民又需得到一定实惠以利于动员。随着整个战局的演变，这中间存在微妙的平衡。而冀东情势又与边区后方有相当不同，就更决定了这些财政措施与建立健全群众组织和村政权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38 年 2 月《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颁行，规定二五减租，地租（国粮）与各种高利贷全免。40 年 2 月修订条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等 1989 上 P31、199-202；另参彭真 1997）。40 年春，冀东区开始由原先按亩均摊改行晋察冀边区的合理负担。由于原制度的某些缺陷和冀东的特殊性，合理负担和累进税制执行细则几经修订，数次在基层执行时引起强烈反弹，故紧急停止。12 月盘山会议决定改不定期征收为半年征收一次，建立统筹统支和预决算及粮票制度等，并制定新条例。42 年 2 月专署公布《合理负担暂行办法》，实行 13 级合理负担。但这些条例都存在计算复杂、地主负担过重、标准不一、村款使用缺乏监督等问题，况且冀东属敌我交错地带，确能巩固执行地区很少。

43 年 1 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重新制定并公布租佃债息条例。冀东区至此方开始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归远是秋后），实行二五减租、三七五交租，取消一切正租外的杂租、小租等。债息关系方面，新债旧欠皆以年利率最高不超过一分为标准清理。8 月《冀热边村合理负担暂行办法修正草案》规定合理负担共分九等，按等累进，累进率为 0.1，最高额为 1.8，征收单位定名为分，按股定分。后改十三等，最高 3.6（魏宏运 1984 四P167-72）。同月《冀热边社会状况考察》详细介绍了合理负担具体实施办法和各村变通规定，指出主要存在以下缺陷：首先，合理负担执行中一般未形成广泛群众运动，主要依靠区村干部强迫命令。群众大会上缺乏很好“斗理”，仅简单表决。某县长说：地富稍不满意，即被我工作人员带上顽固落后帽子甚至给以打击。区工作人员直接与地富对立，明显站在一个阶层打击一个阶层。地富只能出财赌气，不敢提意见。其次，执行中普遍隐瞒地亩，<sup>42</sup>合理负担计算办法不会算或算不好，村评议也多有问题，有的地富“背地哭泣”；第三，公粮公款的分配多凭估计或各村均摊，负担不平衡、不合理。考虑到当时维护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这份考察对地富“遭遇”的重视是可以理解的。

<sup>42</sup> 黑地（隐田）是村庄的传统，无论清政府、军阀政府还是日伪、八路军和国民党，在收取税租时都面临这一问题。此前日本人于 40 年代初清查土地后冀东可征税亩增加了一倍；而共产党在日后土改时也一再强调隐田问题，并视阶级不同规定了具体政策（杜赞奇 1994P39；胡素珊 1997）。

该报告还详细介绍了当时村庄对敌对我两面人工负担的情况，指出基本区对我人工负担过重，卫生机关附近看护伤员和妇女缝纫负担都很重：

41年彭家峪战斗后要把80多个伤号送到迁青平一区三个村庄里去住，当时正是夏耕季节，这几个村青壮年全体动员来守伤号，结果地完全荒了……××村260个妇女（实际做活者不过2/3）便做了裹腿113付，棉大衣400身，帽子500顶，棉手套468付，棉衣500身，手榴弹袋50个，子弹袋270个。<sup>43</sup>

当时冀东最高领导李运昌曾在一份报告中详细列举了村财政、负担征收、实物摊派等事务中各级基层干部的贪污现象，强调健全征收入库和财务行政制度，正确执行征收政策，在已有工作基础的地区将合理负担面扩至85%，<sup>44</sup>征收量不超过产量5%。他提醒各县区应按期彻底完成征收计划，雷厉风行，杜绝麻痹，争夺群众：“如敌人先要去，我们再去，人民就要不痛快；我先征到，敌人再去要，人民反敌情绪会倍增的”（李运昌1944）。

当时西村所在地区对我“合理负担”究竟如何？李运昌称：

抗战结束前夕冀热辽区人民负担，按规定每亩约征三斤公粮、一斤优抗粮、其他合一斤小米，总计五斤小米，占产量收入5%。这在平原来说是不重的。平地每亩出产红粮七八斗，约合百几十斤小米，山地四五斗红粮，约合百数十斤。各专区、县负担很不平衡，14、15专区负担就重，有的一自然亩达八、九斤小米（鞋袜柴布在内）。村款负担平均按相当于对我负担一半计算，则人民的实际负担每人约48斤小米左右，约占其总收入20%以上，负担是很重的（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1987二P386）。

但他也指出：平原对敌负担重，生活程度也高；山地只对我负担，生产较低，平原山地平均起来相差不多。故应减轻山地贫穷区、基本区和一般灾区负担，多承担柴草鞋袜，而平原区应多承担粮款。西村村民当时究竟如何负担各种战争勤务？管收粮食的董春说：

就是庄里堆着，上面来调令了让往哪调就往哪调。（村里交粮食你到各户去收呀？）对。没有不给的。一个人不中，跟着约秤的，背口袋的，四、五个人，结帐的。（都找谁呀？）那忘了。（不一定是党员？）临时工就是。（得找那种小伙子，有力气点，能背的？）对了对了。（然后收完粮食，您自己还得种自己的地是吧？）那得。有时候帮着给做点活啥的，派几个工做点活啥的，义务义务，帮帮忙。没钱，啥也没有。不讲价钱那时候。

他这干部的活计还算安全，管民兵的支瑞万就不那么轻巧了：

拿那炮楼子，没黑没日趴去。黑间儿大地雷拿着，大道挖坑埋去。有情报不是？日本要上哪哪出发，崩汽车好留着。电线杆子日本那木头的，拿去都给拉倒，把线就给绞断。他打不着电话啦。就那冬天，洋镐瞪瞪刨，一刨冒火星子。一大刨他汽车开不过去。就那么干来着呀！

空有一肚子诗书学问的支柱林就是支瑞万管的普通民兵，如今支柱林又学了样技术活：

够岁数就算是民兵，挖电道、挖地道、埋个地雷什么的，都是民兵的活。我就会埋地雷，到区里去学的。平时要下地雷干部就来找，下了还得在旁看着，地雷由国家置。夜里站岗不着道儿也得去。有一回夜里过抬担架的二十几个人，自己以为是敌人来了，跑吧，结果还不是。

放哨是按地亩派，谁地多就多出工。也摊着做鞋袜，不给原料，也不给回东西（林贺）。

男人站岗放哨，女人缝衣纳鞋，军民齐动员，卫国又保家，有组织，有纪律：

我当基干民兵那会抬过担架。那时候有武装班长给预备人。你愿意去也得去，不愿意去也得去，这是任务，不去还中？部队依靠谁？就依靠老百姓。为啥八路军老打胜仗？不打不骂，老百姓拥护她（林忠）。

没做过那种衣裳，夜里赶活返工，心里急死。春天还给八路军拆洗换下被卧（黄俊存妻）。

我们娘俩上北边取过活计，纳双鞋底给点小米，超不过四斤。连着纳起码也得两天纳一双（强万和）。

<sup>43</sup> 另据43年2月晋察冀政府公布的《抗战勤务条例》，规定凡15岁至55岁的男子，18岁至55岁之妇女，均应服抗战勤务之义务。男子每月五个工，女子每年做四双军鞋。

<sup>44</sup> 根据地较稳固地区实行合理负担后，一时出现许多大土地占有者为减轻负担而出卖土地的现象，后有所改革，规定富有阶层贡献不得超过一定比例如30%，负担面扩至全村总户数80%以上。

棉衣裳，鞋，袜子，啥都做过。我上南岭住的时候也上庄里做来。庄里有人，这东西都在庄里大队里不是？这一家里来个一群老娘们，也兴做棉的，也兴做夹的，也兴做鞋做袜子。你做啥你做啥都分开了。都在庄里做完了，才许可你回去。活计，哪庄都分开了多少（钱周氏）。

无须说，许多时候战勤是有生命危险的，钱得泉和孙合春他丈人有次送信就碰上了：

我们俩么还知不道，还在走呢，这边叫站住，站住！吓得“哎呀，这回完了，碰上满洲队了。”问“干啥的？”那我们还不敢说是送信的。送信的还了得？我们都说：“我们有一老克郎，把圈门拱开了，知不道哪儿去了。我们找猪去。”“去吧！”碰着就瞎掰，碰不着就拉倒了。我可没少送信，弄个粪箕子，里头搞点粪，把信弄里头，挎着，怕哪儿特务（钱得泉）。

村里不时有敌人袭扰，胆小的冷向有差点儿被逮了去：

我们前头那家里庄里爆炸班的条子让人家翻着了，就问我姓啥叫啥，说“啊，你们这是八路军侦察班呐。你二哥是爆炸班。你们哥俩……”这整出事来了，管我们要枪。那哪有枪啊？立刻把我拴上了，打了一顿，要枪没枪，四下翻，哪也没有。我们那小厢屋里住的说“别打了，再打人就死了。人家说的一点儿也不差。”把我拴在厢屋里。那人安慰我说：“没事儿，你别害怕。”赶以后我估计他是地下党。翻也没翻着，说要走把我带着。第二天就走了，也没带我。

东村的情况如何呢？办事员冷向清说：

那阵征收铁，咱们这儿也做手榴弹。不是庄上做，就是征铁给他们运去，也是地下工厂。两、三个区有一工厂。铁就是锅、火盆啥的。都是黑间收黑间给送去。送到八区姚家峪这一带。各庄各自找毛驴送去。我找几个人夜间串家串户地征收，够一驮子了就找驴派别人驮着送去。

战勤负担和挖电道、破公路之类“破坏工作”是一项非常严肃的高度组织化的革命工作，是对我方动员能力、村干组织才能和领导作风的检验。李楚离在报告中强调：各村须一律执行破坏工作，保障电话、汽车不通，指路牌没有，户口册、良民证等一律焚毁；反之，各据点、重要路口与电线杆上须有我方传单和标语口号。破坏斗争者“杀无赦”。他也总结了大破坏的经验教训：不间断破坏易使群众疲劳而成虚应故事；乡保长若掌握不好，在敌威吓勒索下易动摇屈服（“大部屈服，因此我们夜间破坏，他们白天修复。有的村子自买电线与杆子准备着”）；群众觉悟程度不够，破坏中易发生本位观念，如到别村破坏，不破坏自村附近；群众如因破坏而遭敌人打击报复，即不满意我方；说服、组织不够，群众不了解破坏的意义而敷衍我方；干部在破坏中缺乏教育，强迫命令，脱离群众，故不易持久坚持等等。不过，“虽有以上弱点，但在推动群众的武装斗争与组织民众参加抗战上，是大大的前进了一步”（1943P65-6）。

## 九 减租减息

43年开始抗战转入后期。减租减息的运动强度也随着对统一战线认识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上级越来越强调由群众自己搞运动，在运动中形成群众自己的组织，但基层往往有种种顾虑或忽视群众运动的倾向，结果屡有反复。43年10月1日中央政治局指示纠正减租减息中包办代替和恩赐观点，<sup>45</sup>要求各根据地检查减租政策执行情况，在减租斗争中建立或改造农民团体，使群众在斗争中看见自己组织起来所具有的力量，而不满足于现有成果（租确实减了），否则一旦上级撤出，情况就会变化。18日晋察冀分局指示各地贯彻中央精神，克服明减暗不减和减租不彻底现象，并颁布《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28日又指出：冀热边地区基本尚未执行减租减息，在工作开展较晚的游击区应视各县具体条件变通，减租成数可低至10%，最高租额可略高于37.5%（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1943）。冀热边具体实施办法见44年4月《冀热边抗战期间典地回赎暂行办法》（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1995P29-31）和9月冀热边特委《关于进行减租运动决定》，后者明确提出：

在发动广大群众中，注意培养与组织积极分子，认真地培养农民中的领袖，防止积极分子

<sup>45</sup> 据44年丰滦区务会议记录：有佃户还有认命思想，自认减免租子是命好，是上级“恩赐”；或有诚惶诚恐退租以致“明减暗不减”（魏宏运1996P120）。

脱离群众，注意推动教育落后分子。在农民组织上，在减租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民主，这是发动群众的积极性，防止农民团体官办倾向以及干部蜕化的必要条件（中共冀热边特委 1944）。

而 45 年 3 月冀热辽区党委总结减租运动时，称减租最大收获是“领导和干部思想上从长期忽视发动基本群众开始有了转变，基本已初步的发动了基本群众”。但也指出归远县政府发生偏差，号召农民交租交好粮，不超过 37.5%的不减（冀热辽区党委 1945）。

然而半年后的冀热辽区减租运动总结依然写道：干部多没有走群众路线，有恩赐观点，强迫命令。情况较好的丰润全县也有 73%的村农会无声无息乃至不起作用。许多地方干部一走，佃户即亲自将退出的租子送还给地主。而面对这种情况，“干部不知检讨自己领导上的毛病，反埋怨群众，处罚佃户。如归远县规定，收回明减暗不减的佃户的土地，或向农会交一部分租子，致造成又一次脱离群众的现象”。区党委检讨：“因整个地区处于敌我斗争频繁尖锐局面，党委决议一般的着重于对敌斗争与解决群众困难等问题，或把重点放到反贪污浪费、实行合理负担、整理村财政，把这一有关根据地巩固与发展的中心工作放在次要地位”，原因是“怕过早促成阶级分化”（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 1995P53-76）。

其实过去一些工作重点如整理村财政等确实需要坚持，而“怕过早促成阶级分化”的担心也是事出有因。要强调减租减息就得相对突出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而华北农村土地集中和租佃条件恶化程度并不很重。不过应注意，战时减租减息在相当程度上融合了阶级斗争的性质和根据地政府的财政需要（参 Friedman et al. 1991）。党鼓励农民直接要求地主减租减息，而非简单由党出面夺取地主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要让农民认识到自己在原有关系中的利益性质，认识到他们是被地主剥削的，由此从消极无奈走向积极参与，也就埋下日后走向极端的种子。

## 十 长期战事下的乡村经济与政治

冀东乡村经济在抗战数年后变化剧烈。首先是生产力锐减，劳力大量流失。冀东缺地状况上文已有所分析，西村本有不少年轻人（“剩余劳动力”）到金矿、煤矿等做工，但或因介绍人关系的断绝，或因企业本身的易手、倒闭，被迫另寻生计。还有些人下关东或内蒙，战事的拖延、生活的萧索更使不少人被迫举家他迁。支焕说：

41 年我叔伯伯哥逃荒到东北，说那好过。我父亲、母亲和我三个就到东北了。那阵儿我七、八岁。到了吉林也是那么回事儿。天下要是黑的，你到哪儿也是黑的。你到那儿也得给地主榜青。好比我是地主，你去了，跟我要 20 亩地，50 亩地，你尽管薅啊，榜啊，收啊，到时候粮食给他一半，你有一半。这叫榜青。扛活就由不着你自己不是？在东北呆了四年，后来我母亲闹病，水土不服，就家来了……我父亲下过金矿，西北茅山，过去日本开的。打眼，放炮，扛毛。在那儿干了四、五年。在那儿干还是比扛活强点儿，一天二斤小米，吃不用花钱不是？他一去扛了三年毛，把里面的砂子扛出来。后来二年给人记工，比较轻巧，不下井了，收入也多点儿，起码也涨 1/3。那矿上好几百人，他不识点儿字吗？过去庄里除了地主、富农啥的，识字的忒少。你想出几亩地、买几亩地，写个证据，挺不好找的。毛宽去得早，一点一点的都找他去。他在那儿当把头，矿上都归他管，去日本局子领个炮×、雷管啥的都经他手。他后来干不了了，露了馅了，跑回来了。日本要抓他，弄死他。他领了雷管，全卖给区里不少，卖给共产党这边地下党了。那时候做手榴弹，不是缺这个吗？他领十个发五个，后来露馅了。他走了其他人还干着，后来这矿的日本局子让八路军给炸了，开不了了。那时候我还没去东北呢。

如前所述，介绍宗藩去外地做店员、烧锅小工的，也是这位金矿工头毛宽。他是村里许多人出外觅活的介绍人，至今村民多有明确回忆。而今关系也断了，矿也倒了，象支焕父亲这样好不容易混出头来的现在也不得不走了。劳力流失远不止是经济原因，正史告诉我们：日方在此招大量“华工”送往东北筑路、开矿，“仅西村就有几十人被强迫或诱骗走”（《硬杆子精神放光芒》编写组 1975P13）。这不仅是通常认为的经济掠夺，而且是政治手段。43 年 8 月承德日本宪兵本部《灭共对策资料第一四号·冀东地区中共党的概观》自陈不讳：

将乡村青年逮捕送满洲一事，是否以破坏乡村的党、政、民兵各组织为直接目的，先当别论，而使党失去工作对象则是最大的打击。党工作的对象即民众，其中尤其是青年层，他们同时又是扩军对象、生产的源泉。拨赤区青年入满洲当劳工，使之离开乡村，切断他们与党军的联系性的方策，作为剿共工作是极其有效的。通过此举，使党失去工作对象，阻碍党的发展，降低赤区生产，薄其经济力量，断绝扩军的源泉，进一步破坏乡村组织，动摇党的立足点（转据陈平 1992P90-1）。

除了劳力流失，生产力的毁坏还体现在农民不再使肥田粉乃至所有肥料，耕作短期化（包括长期投入的减少和尽量选种速熟作物）；农具被毁；大牲畜和大车被征募；农时被破坏（青壮年每日跑敌情，42年敌命十岁以上者同去挖沟捡石子）；日伪修路挖沟毁坏大批良田，或将战地青苗完全铲除（含禁种高粱）。

其次是村款负担逐年增加：办事员和武装班长每月皆三四十元；某区村办事员武装班长津贴（一行政村有2到5人领津贴）每人每日12至18元。乡保长津贴各村给粮给钱不一，一般比办事员津贴不少，有多至60元者；跑敌情群众、各村互派座探、村干开会、敌方办公人、应付伪军贿赂招待、伪机关敲诈、赎人等皆须吃饭开支。敌人围村索要办事员与乡村政权委员，村中为保护村干也得花钱雇，数百元一个（每村每月雇人须五六千元，大村万元）。

第三是经济模式转变。一是因农业生产锐减、土地化费过重，战争环境中商业利润又大，故胶皮车营业与小贩发达。二是因日伪占据行政、商业中心，而农民则被夹在交战各方规定之间，币制混乱，许多方面退回实物交易，正常贸易模式遭破坏（有关双方货币战和贸易战情况，参河北省税务局等；嘉图 1986P223-9）。三是因合理负担实行过重（基本村尤甚），敌我负担大多落到地富，故42年夏季前贫下中农普遍买地，地主普遍卖地，土地趋于分散，中小富农增多（李楚离 1943P20-2，另参费正清、费维恺 1993下 P772；《冀热边社会状况考察》）。

日伪的疯狂烧杀掠夺是造成战争创伤的根本原因，我方各种战勤虽使村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也是战争胜利之必需。冀东深处敌后，情势特别险恶，反破坏方针也很强硬。锄奸工作“谁拿住谁杀”（李楚离 1943P10）。村民对此印象极深：

那时候活埋抽大烟的，耍钱的，小偷啥的，办事员一说就活埋你。就自个挖坑儿，躺在那里就活埋你，再不成拿镐头插两下脑瓜子，埋了，那会儿政策就那样啊。你咋着八路军出个政策，他不知道调查调查咋回事，有人报告，就是活埋。那十区有王老狼的区长，那活埋人多了。动不动就活埋。他自个也不知道他埋了多少，埋了几几百吧，哪庄都怕他。日本到这儿，他说你也是汉奸，八路军到这儿，你给日本办点事，他也说你是汉奸。就是庄稼人不好受，你挪了这个地方，还不中，没处去。哪个方面来也得应好，就这样儿。到这时候你分说分说，调查调查，那时候也不用分说，就一定了，汉奸你就是汉奸了，活打死你。建国你就得那样。你在这儿待着地主啥的他给你报告了，你待得了？不镇压你也待不了，你也建不了国（郑启财）。

看来，保长的儿子虽对乃父遭际煞是不忿，却也算得上“深明大义”，懂得建国的道理。大家都提到王区长，他杀人的数目在传说中不断见长，支瑞万甚至差点把他同土匪混在一起：

跟现在（似的）？有点事国家调查访问，那时候谁管这个呀？我们十区有个麻子五，闹个十区区长，经他手毙了五百多人——不，叫王老狼。以后让日本逮住了承认的。经他手活埋的，崩的、放了的还不算。那时候谁调查这个呀？好比说咱们俩打架，你见着王老狼了，你就这说我，“我们庄那支瑞万坏着呢，他不是好人！”到着就把你抓起来，就活埋了你。那时候拉踞区不是？你不黑也不中啊！那时候特务、反动派、汉奸都有的是，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

而说什么跟自己眼见了似的的董印又说自己就差点儿遭过两回活埋：

活埋的还有黄贺保爷爷黄龙林，卖纸叠金元宝，被八路军区长王老狼说成是探子。过去这里埋人不算啥，就区长王树林埋了八百条人命。那时候区大，这条线都归他管。咋埋都有，有露个脑袋脖子的，有躺那，脑瓜子底下垫块石头，用镐一插，一埋。（按：黄贺保本人对访谈员说，爷爷大冬天上外头卖纸叠的元宝，知不道死在哪儿了。）

郑启财说办事员可活埋人的话并非空穴来风，支焕说：

那时办事员权威挺高。只要跟区长一说谁告密，弄去就活埋，处死你，不讲这批那批的。

43年3月北方分局就冀东工作指示：“我们如不痛加反省，纠正过去除奸工作中的乱杀人、活埋、刑讯等错误，与合理负担中过高税率，则统一战线决不会作好，伪军工作也决不会作好，我们决不能取得全民对我之同情”（中共中央北方分局1943）。<sup>46</sup>村干工作中有时生硬倒不仅是因情势险恶，原因是多方面的。44年2月（此时战事已相对缓和）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改造与健全村政权的指示中指出：不少村公所因工作繁重，成了简单支应机关，无暇组织村民经济生活、解决其困难、贯彻政策法令等重要工作。该指示认为，目前游击区村政权主要存在以下严重问题：对敌人摧毁腐蚀我村政权的政策缺乏应有警惕与对策，致使某些抗日村政权变质；存在脱离群众倾向，不敢大胆发动群众与广泛发扬民主，满足现状；因村干部不良成分在某些村庄中还占相当数量，故贪污浪费严重等等。再有，因人民生活困难，村政权工作繁忙，游击区对敌斗争尖锐，人们多不愿当村干。<sup>47</sup>该指示总结道：村政权存在这些严重问题，主要系因各级政府往往只交付任务，限期完成，做“要账式”领导（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1944）。

据张闻天当时对陕北晋绥等地的调查，相对和平的根据地腹地村政也极繁琐：

村政权经常工作：1、战争动员，含人力（扩兵、站岗放哨、抗战勤务）和物力（公粮草、村摊款）；2、改善民生如贷粮款、救济等；3、民主建设如选举、开会、调查登记等；4、生产建设如春耕秋收、纺织、合作社等；5、文化建设如小学、冬学、卫生、破除迷信等。其他还有解决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其中开会、调查登记最多（春耕时行署发了17种表格），其次是公粮、村摊款多（摊款3月一次）。减租减息和解决群众问题都是上边不来，下边不做。某县一月内公粮、村摊款、招待占整个时间43%，开会、登记调查占45%，解决各种问题只占4.6%。会议多，中心工作与季节性工作不分（瞎指挥），分工不明确（各种村级委员会形同虚设，不如裁撤），党政民各种组织不分（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等1994P310）。

## 十一 基层动员与教育

十五分钟的讲话结束了，大家特别听得清楚的就是有了裤子才能抗日，有了权才愿救国，至于怎样减租减息，执行合理负担，实行民主……还只好等第二天再听。不过就听了这一点大家也很满意，散了以后，彼此都说“人家认理就是很真”，“就是跟从前衙门派出那些人来说话不同”——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

“有了裤子才能抗日”的话虽粗了些，但理不粗。从前村民们也开会，但“从前开会吃米，现在开会说理”。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张庄的贫农老太都开始懂得“每天都去开会，寻思长些见识。大伙要都闹不团结，个人也别想过好日子”（韩丁1980章31、46）。

西村因无宗族势力，以前会开得更少些。那老槐树下，当年想来也就是这么聚起一批终年劳作或浪荡的村民，开始“开会”的。战争开始几年后，不只是财主几乎跑光的西村，整个冀东村庄中原有的权威关系网络都受到了破坏，这是早在共产党开始动员中下层农民之前就开始的过程。前地委书记、当时的地委委员周文彬对此总结如下：

以前地主组织保卫团、联庄、伙会，两边都打。38年大暴动后枪大都被没收。留在农村的是一部份小地主与富农，是村中当时领导中心，但不敢出头，见谁都怕。不敢出来支应，找流氓来代替。从此地富地位一落千丈，与日本关系不似与旧政权机关关系，随时可能受特务欺侮。暴动前地富自己经营土地多，暴动时大牲口拉走了，其后又不断被拉走，加上大经营在战时易受损失，故经营分散，雇农大都变为佃农。留下的地富一部分同情抗日，大部同我们好是“怕好”，人人自危，不知何时会被绑走。逃亡的与受过我们害的认为我们与土匪相差有限，至今尚有人有此印象（1943P87-8）。

<sup>46</sup> 冀东自44年秋开始进行新一轮锄奸运动，以适应日本退却、国民党进攻的新形势。9月冀热边特委发布“关于如何执行党在除奸工作中的宽大政策的决定”和“处理敌探国特的一些基本政策”（李文骅1987）。

<sup>47</sup> 44年丰滦区务会议记录：有群众对政治仍有不介入思想，抱“谁吃公粮谁负责”、“不吃公粮就不办事，凡事与我无关系”态度（魏宏运1996P120）。

地富对我方态度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昔日的穷棒子们开始作为主人受到召集，被请去开会，被告知要挺直腰杆，做“硬杆子”。但万事开头难，况且任何事情都有其矛盾的一面，周文彬认为，基层党员干部成分问题很大：战争环境中雇农质量与数量均下降（大量转为佃农），有些全村才6至8人。工人和妇女极少。党支部吸收的一些富农和富农子弟能力强（受教育多，有独立经营经验），反而能左右支部（参1943P102）。彭真更在边区大会上尖锐批评道：

有些个别的党的干部和工会、农会、青救、妇救的主任和自卫队长，喜欢像战场上的指挥员指挥其队伍一样，去命令自己的会员或队员，或以强迫命令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党员，有的人出了新辞典：“说服就是我说你服”，“什么是政治动员呢？有军事动员令，有政治动员令，政治动员就是政治上的动员令”。说了不服，或者政治动员群众不动怎么办呢？他可以关人的禁闭，罚款，戴高帽子游街，他可以打，也可以骂，会用名词的还可以名之为开展斗争……总之有些干部是以封建社会老子管儿子，统治者管老百姓，店东管店员学徒的办法去管理党员或者对待自己的会员、队员（1997 P183-4）。

委实不能全怪这些干部。渴望动员的干部自己也刚受到上级的动员，他们和自己那些动员对象一样，都刚刚洗脚上田，都还得好好学学开会的技术和动员的奥妙，学习民主与纪律的辩证关系。确实，几十年后看来，动员要求下的开会无论对谁都是一门学问，“开会”必须“会开”，动员的效果就是要变“要我开会”为“我要开会”。但在当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而且也有副作用。地委书记李楚离指出：动员或开会多了群众易厌倦，动员重了干部易强迫命令（1943P61）。在44年丰滦县区务会议上，干部也诉说了自己的难处：群众把自己不愿做的事当成讲民主，有人不去挖沟，自认此乃讲民主。如一定要他去，便说遭抗日干部压迫（魏宏运1996P120）。在十里店，当一年轻党员自称缺点是很少召集民兵开会时，台下哄堂大笑，因大伙皆知解放区流传顺口溜“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柯鲁克夫妇1982节12）。在张庄，一干部说：“过去，谁敢拒绝出公差就抓起来；而现在，要是我们话说重了些，人家就批评我们的态度，给我们提意见。唯一的办法就是人家不去我们去”。工作队就此在村民大会上宣布：选举是权利，但选出干部后就须听从其合理管理，否则即无政府主义（韩丁1980章58）。

为了解共产党动员基层干部的具体方式和效果，试根据搜集到的46年左右四份基层干部自述书（据46/11、12各项），从自述书要求填表人回答的问题，分析其个人情况、回答及措辞。推测系内战初起时该地区共产党上级组织统一要求基层各党员干部（至少到区级）填报的。上级统一发布问题，填表人自己找纸回答。问题共分九大项数十小项：

一是个人背景，含姓名（含化名、曾用名）、年龄、籍贯、成分。

二是家庭状况：家庭成员（乃至尚未正式成婚的对象）的职业、思想及与本人现有关系；家庭生活主要来源为何，有多少房屋、土地及买卖资本，存钱、放债或欠债多少，交（或收）地租、债利多少。对家庭经济收入数量与来源构成的认识与详细填报，是让许多出身地富家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认清自己阶级背景的前提。

三是社会关系：关系密切、有社会地位的亲戚朋友过去现在的职业、思想及与本人关系。

四是学历经过：上学、受训的详细情形；教师的思想、党派及现与本人关系。这是搞清填表人思想背景的重要线索，是争夺教育权的重要一环。日伪和国民党都曾在归远举办过各种青年学生培训班，吸纳因战乱失去升学或谋职机会的流散学生。

五是职业经过：参加革命前职业与介绍人；最接近的同事的思想、现工作及与本人关系。

六是战争经过：参加过的战斗与斗争的领导者、结果、本人认识及批评。

七是抗战前后思想转变过程与其他：对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认识；参加党派乃至宗教团体的具体情形、介绍人职事与现关系；受过的外界影响和刺激；看过的书籍及本人认识；参加抗日、参加共产党的原因与当时动机，介绍人工作及现关系；思想上起过什么变化，对革命前途曾否悲观，曾否对党的指示决定阳奉阴违、不安心工作或有过后落想头与行动，以上都为什么；曾否被捕，经过情形及原因，怎样出来的，感想如何，有何反省，上级如何处理，本人有何意见；曾否脱离组织，脱离的时间及原因，现是否恢复；生活上是否发生过不正确男女关系，曾

否贪污腐化，是否违犯过政府法令与制度，曾否违犯过群众纪律。等等。

八是奖罚情况及决定机关、本人认识；现职及本人意见；优缺点与特长；总的证明人。

九是填表人工作、历史如何；党内外都做过什么工作，何年何月何地时间各多长。

对于今天从做学生起就被要求填各种履历表、写各式个人小结和思想汇报的人来说，这些问题不足为奇，或许只有第二、四、七等项还略有嚼头。但正如上文对农民被要求服从组织纪律的分析，这些基层干部（不管读书多少）平生或许第一次被要求填报这些事项：他们不习惯问题的具体内容，还不会写填表应写的“话”，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不能熟练反思自己，在新的权力技术面前，他们并不想有意抵挡，而是竭力学习，尽管从字迹到反应都有些笨拙。

宣山 22 岁，中农成分，念过 6 年初小，自述家人和妻子皆农民，思想顽固落后，与己“没有关系”。认为共产党“不但争取中国和平，打倒不平等和用势力压迫人民，还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先锋和利益，实现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其他党派像国民党是“挂羊头卖狗肉，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表面，实际是杀人民，不要人民的政策和民主，是代表大地主和资本家，独裁专制一党专政的”。入党时“我认为是给世界的劳苦群众争自由的，打倒一切不平等的事和势力压迫人民的手段”。看过《新民主主义论》等，觉得对目前道路很有些帮助。“我为了不受势力的压迫，不受日寇的毒打和辱骂，不受各种的包围。参加共产党当时的动机就是为了不受大资产家的剥削，不受封建势力的欺侮，为了世界的劳苦群众解放，使劳苦群众翻身求世界和平”。自己“行动是求进步的”；“群众纪律就是打过二次人”。

孙继峰 21 岁，自述家有祖母、母、妻和女，除祖母外皆不满意本人参加革命工作。家有房 10 间、地 60 亩，雇工 2 个。念过 7 年学：

过去我对共产党无有什么认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对共产党有重新认识了，知道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给人民谋利益的，将来我党的主张走到共产主义上去，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有衣穿。我对共产党无有什么批评，无有什么意见。过去我对国民党的认识就是在八年抗战期间他未有打日本，这是我痛恨地方，现在我对它更有大的认识了。它是一个独裁专制党，遭受万人痛骂的一种顽固东西。我对他的批评很多，它不应破坏政协决议，他不应一党专政，他不应勾结美国侵略中国，把各种权力卖给美国等，有许多……过去有时是自由行动的现象（工作上走马观花），没有小广播的现象。现在我对自由行动的现象已经改正了……工作上有些个弱。其他缺点自己检讨不出来。

董治清是十区治安员。上过 3 年学，他写道：过去对共产党没有深刻认识，初步知道打日本，后又知道打倒法西斯，建立新中国，为人民服务。过去对国民党就知道他跟我们性质不同，欺骗人民。现在知道国民党专制独裁，压迫人民，是不对的。41 年 12 月在本村入党，“在那时打日本为正，建立新中国与国民党革命为副”。“与国民党革命，把国民党取消，我们就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有吃有穿的，不能受任何人的压迫”。抱怨上级不发枪，致使自己两次被捕。“上级分配工作有时讲价钱，因自己能力缺少，达不到上级的全部的工作，结果执行上级的决议，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必须执行上级决议”；“受过上级的话语批评，因跑犯人。说我警惕不很注意，我的思想真是报愧”。

林贵华是十区农民部长，上学一年：“我说的话，使我的革命作证明。不信时就去调查”；过去对共产党就知道打日本的。现在我才知道是反封建反帝，给没产阶级想办法改善生活，我认识共产党人没产阶级的命。我过去对国民党没有认识，因为我是山地人，耳里听不着国家事情。自共产党来到打日本，国民党不抗日，王（汪）精卫卖国，我才知道国民党是害人民的。我对国民党的批评：蒋介石不应勾外鬼（打）自己人”；“不向别处调动我，我就没有讲价钱地方（皆我家忒穷）”（前自称对家庭观念太深）“如一定让我去时就是不得不去，我还去；我认识小广播是破坏之一破除”；“我没有男女关系，心里有过，未说出来过。我没有打过群众，我拴过群众，因为他破坏，不听上级说，拴的。现下我认识拴人太不对了”。

填表人学力和家庭背景差异甚大，字句表述方式也有所体现，但透过这些差异，我们能清晰地发现他们不仅对国共两党性质认识一致，而且思想转变（或深化）过程也基本相似：由形

象到理性，由身边利益到大同世界。我们还不禁赞叹这些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性，他们不会说坚持什么什么原则，但他们一丝不苟地交代自己打了两次群众（这在战时是多么常见），交代自己只是心里有过的男女关系！甚至惭愧地说“其他缺点自己检讨不出来”。农民部长的话让人哑然失笑：“你们爱信不信”。是的，他们此前未有但已经开始并且日后将反复不断地接受各种填表、汇报、查证的考验，他们会慢慢掌握一些技术，培养批评（包括对共产党本身）与自我批评的习惯和能力。组织纪律性的培养绝非只是表面上行为的遵守。那些管理他们的人和他們管理的人都会主动被动地、自觉不自觉地打上这些东西的烙印。

再者，根据普遍要求填表人回答或表态的问题，可推出当时基层干部存在的一些问题：男女关系上不能很好地表率群众（反而更可能利用职权）；组织纪律性不强，接受任务时与上级讨价还价；工作不太讲究方式，作风粗暴，打骂群众；信念不明确或不坚定，对共产主义与抗日胜利的区别不甚了了，时局不明朗时思想有消极乃至开小差现象。出现自由行动和小广播现象；办事员易为（区委分片负责的）少数人操纵，成了上层的腿（李楚离 1943P13）。培养干部的方式不少属带徒弟，易认个人，长期下去易染通讯员不良习气（周文彬 1943P106-7）。这些都是当时冀东党最高层领导的清醒认识。

来看看共产党教育广大群众的方式。作为向基层干群宣讲政策的重要工具，40年元旦《救国报》在归远远僻山村芦各寨创刊，初为八开两版周报，发行千余份。因收不到延安新华社消息，只好收听并甄别国民党中央台新闻。报纸在秘密地洞印刷，通过交通站沿村传递，每个基层组织一份。41年春，报社迁往更隐蔽的鲁家峪，发行量一度达五千，并改为三日刊。同年秋，报社增出通俗小报《老百姓》，八开两版油印，刊登时事解说、政策解释、抗日英雄事迹及歌曲、漫画、连环画等。但以上这些只是解放后总结材料或回忆录里介绍的情况，据对县里几位老同志的访谈，即使当时在县、区革命政权中做宣传工作的孙继峰等，虽经我们提醒，也称当时一般极少看到这些报纸，遑论更零散的“基层工作者”。周文彬总结了报纸宣传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出版困难，地方干部文化程度低，派送困难，宣传政策与上级有偏差（通讯困难），如提出“要求治安军替我们打鬼子”等过右口号（1943106）。<sup>48</sup>

关于共产党的教育方式，我们能找到的最全面的材料是45年7月《十五专署第一次民政科长会议记录》（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250-5）。详细分析这份记录原稿，有助于捕捉当时共产党基层政权部门初步开始正规化建设时的工作方式，了解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意识形态教育与组织观念教育及组织建设之间相互促进（或制约）的关系。

此次会议的目的是研究、计划和布置各县轮训各区、村干部，并结合当时民政部门几项重要工作，如村政建设、减租增资、学校社会教育等，交换经验。具体培训方式是：由县里先派各科负责同志任教员，负责训练一期主要村干（村主任），吸取经验后把干部（科员等）分配到各区帮助训练村干部。先作启发式报告，再检讨反省，然后上课，由区长及强有力的助理员任教员。主要课程是“加强群众观点与工作作风，基本政策，工作方法，时事教育”。

会议认为过去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重视不够，人员配置不齐甚至流散，归远各区设教育助理甚至全部调换其他职事；二是缺乏教材，2/3以上小学校念伪课本，有些学校因缺少合适教材，学生逐渐减少乃至停办。而专署和各县却没有主动有计划地组织编写翻身教材；三是工农出身干部与教员间隔阂颇深。合理负担政策中也未对教员实行免征优惠。

会议同时总结了社教方面各地一些经验：有的在各村设立黑板报、夜校，利用闲时说（带形势教育内容的）大鼓书。有的利用高小定期设立农业研究，解答农民疑难。有的设立社教委员会，成立识字班、识字牌，由小学生轮流管理，教给来往行人识字，并实行实物教育。归远各村也成立夜校、读报组、妇女识字班、识字牌、影社等，小学教员兼夜校教员者每月贴津20

---

<sup>48</sup> 与晋察冀根据地其他分区相比，地处京津之东、“孤悬敌后”的冀东地区一向与后方联系困难。迟至44年2月边区党委仍批评冀东长期未向党报报导（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1944）。《救国报》后成为冀东地方党组织机关报，先后改名为《冀热辽日报》、《长城日报》，最后发展为《冀东日报》。42年初起电台开始接收党中央的消息电文。有关战争期间冀东地方党和日伪在利用报刊渠道争夺宣传影响的情况，参马建国1995。

斤细粮。<sup>49</sup>不过会议同时承认，各县领导和检查不够，不能坚持，收效不大。

与传统教育最大的不同是：社教工作面向社会大众，绝非单纯的知识教育：“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教育。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大众的民主的，与广大劳苦群众相结合的，是为广大群众服务的”。会议就此制定一系列具体计划，以期加强教育机构设置。因现有师资极缺，且多为旧式教育出身，故需重点抓好师资培养。各县负责轮训现任小学教员，政治上予以审查提高，让训练较好的教员回去起推动作用。<sup>50</sup>特别要求归远等县抓紧高小毕业生，动员一部去联大学习，一部直接参加革命工作，一部任小学教员。

会议要求专署和各县积极组织自行编写的翻身教材，以行署编写小学及高小课本为样本，编印些辅助教材，以目前中心工作、模范例子、群众斗争英勇事迹为中心内容。在具体课程设置方面体现尤为明显：如算术、自然等较少涉及社会生活的可沿用旧课本，传统课程如国语、常识、习字等也被认为有阶级性，可结合阶级教育，故需统一改造以新形式、新内容（如读报、时论），或直接设立新课程如社会发展简史、时事教育以实现教育的阶级性和革命要求。体育娱乐也非简单课外活动，记录最后一点便是对儿童的组织：要通过灵活办学时间等减少家庭困难，力劝学龄儿童入学，并成立学生自治会或童子军。各村名目及具体实现与否或不一致，但通过学校组织儿童、通过教育统一儿童认识，这个方针相当明确。

民校在当时普遍兴起。但民校教育绝非单纯识字。42年2月颁行的《晋察冀边区民众学校暂行规程》规定：民众学校旨在扫除文盲、增进人民文化知识、坚定民族意识；识字不足1000的15至45岁男子及15至35岁女子均须入学，余者听便。初、高级班均设政治常识和**组织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等1989下P168-70，黑体为引者加）。

在西村，曾给支焕父亲上过冬学的会首狼咬已自杀了。害过董印一家、也教过董启的黄立仁也被我方正法了。还剩下钱惠，林起远介绍了这位与自家一样有争议的“开明士绅”：

钱惠是个民主人士。他是富农，但较开明。看农民没文化，自各鼓捣桌子椅子，让农民学习，他教。教一冬，自各也不收一分钱，粉笔都是自各买去。死乞白赖的。他还同情救济，谁要有大灾大难，生活过不去的，你拿点儿都无所谓。钱惠算一个开明人士。反正西村人也是各有各的看法，我们这一代人接受过他的教育，反正是做过不少的好事。

好几位老村民自述受其启蒙。后钱惠被划成富农，此事自然就不提了。

甚至到派遣工作队员时，共产党也面临如下困境：必须利用大多出身地富家庭（否则在缺乏南方族学体制的华北上不多学）的小知识分子去从事反对剥削的阶级教育乃至直接旨在消灭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在实践中，尤其在运动高潮中，从经济关系上消灭剥削阶级与从肉体上消灭剥削阶级中的个体，这两者间的区别又往往是从基层干部到群众都有意无意混淆的。参加土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处境尴尬。在韩丁参加的工作队中，来自北方大学的知识分子，其生活方式虽为土改所彻底改变，但干劲远比地方干部高，只是工作常脱离实际。而本地基层干部虽工作稳当，但缺乏热情：

对于许多人来讲，采取一种新立场决不是什么抽象的问题，决不是单凭对这种立场的经济上的优点或政治上的优点进行客观推理就能决定的。他们自己的家庭已经或者不久就要遭到打击，他们的父母有些已经被狂怒的农民殴打致死。有些人可能还要到自己的田产所在地区负责平分土地；他们必须准备着，农民的控诉和行动也许会使他们家破人亡……农民和干部们过去就曾经违反过政策。将来斗争激化了，他们还会违反政策的。谁要以为将来什么都会和和和平，那就太幼稚了（韩丁1980章27）。

<sup>49</sup> 影社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旧皮影形式排演反映新内容的新戏，如42年打治安军战役后排出《西村之战》。昔日满足老百姓梦想的舞台（它造就了许多意欲实现自己“鸿鹄之志”的土匪）而今开始“反映现实”。抗日识字课本第一课为“中国大，日本小，中国人多，日本人少，长期抗战，他受不了”（归远县文教志编纂委员会1991）。问起一些老村民对日本的印象，常能听到类似说法。并非说他们的记忆或当时看法就一定从学习或宣讲的抗日课本上学来的，但当时的社会宣传、学校教育无疑与时事有紧密结合且颇见成效。据归远市党史办《党史资料卡片》第566号文569：冀东某县识字班“妇女午饭后两小时，男子晚上两小时”；识字牌“路过人都念一遍，不认的小孩教，不念不让过去”。识字牌形式文革中仍存在，见刘震云1991。

<sup>50</sup> 但据归远县档案馆1986、归远县志编纂委员会1990，直至47年9月方首次集训全县小学教师400多名。

韩丁亲身感受了工作队员如何艰难（然而也因知其必要而愉快）地树立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及能力：工作队员交心时要深挖问题，暴露对自己和别人的真实看法，往往很困难也非常痛苦。但这已经成为呼吸一般的必需：

大家决定今后有意见不藏在心里，而要痛快地讲出来，互相帮助……我从来没有见过象他们那样始终如一地置原则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人。全队人员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而达到互相体谅和了解的新水平，也使我惊讶不已。我开始意识到，这个方法是需要经过学习的。大多数队员都成长于极端利己而又很爱面子的社会之中，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并不是这种社会的特点（韩丁 1980 章 42、43）。

这方法并非只有知识分子或基层干部知道学习。在十里店，一位贫农团领导候选人反复责备自己对父亲态度不好，其实上次会上大家已经否定了这等说法，“但鉴于村里正开展自我批评活动，他显然在这一问题上动了点脑筋”（柯鲁克夫妇 1982 节 12）。

## 十二 土改前夕的乡村状况

44 年夏，驻防归远的伪治安军残部逐步撤走，伪满洲“一心队”换防。日军开始对该区实行军管制，推行冀东满洲化，加强军政会一元化领导，但败势已无可挽回。9 月中共归远县办事处改为县政府。10 月，西村、五更庄等正式划归归远十区。一年后的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一周后驻守归远的满洲队将城内日本人一夜间杀光（董春很自然地说是八路军杀的）。9 月 30 日归远攻城战役开始，11 月成立冀东行政公署。12 月 31 日夜满洲队弃城南逃，归远全境解放。

抗战甫定，我方工作重心即转向生产。45 年春耕始冀东区普遍开展互助合作，通过拨工组（队）、合作社、工（农）会、民兵等把全劳力、半劳力男女真正自愿地组织起来（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7 二 P364-5）。5 月冀热辽区生产委员会总结春耕工作时，要求各级派人检查，发现典型材料、英雄模范，以带动全区（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7 二 P365-6）。重心的转移并未失去群众动员的特色，典型示范、骨干带动的方式将在即将开始的土改中成为法宝。在党组织建设方面，45 年 2 月至 6 月冀热辽全区整风。10 月归远县党员统计 4048 名。46 年 5 月恢复抗战前归远原县境，全县党员统计 7039 名，比 7 个月前猛增 3/4（或有因县境变化引起统计口径变化的因素）。更猛烈的革命浪潮即将到来。

在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反奸清算，并将抗战期间实行的减租减息做一深入（因冀东特殊战势，故减租减息深度和广度较边区其他各地相距甚远）。

先来看看土改前西村各“阶级”的典型经济状况。正史介绍道：经过多年战乱，农民过着水深火热的困苦生活：全村 154 户中仅 4 户地主、3 户富农和 8 户富裕中农能维持生活。其余大多扛活、做月、讨吃、背毛（在金矿背矿石）、开店及走关东等（立新公社纪事编写小组 1966）。黄家地主占了大块良田，贫农地块极分散，耕作颇不便。有道是“炕一块，锅一块，帽子底下盖一块”。贫农支瑞常共种地 12 亩，分 54 块，散布各山坡，一筐粪上四、五块地还用不完，翻地使不开犁。加之各地块有的相距很远，生产极困难。100 多户贫农仅 7 头毛驴，30 多户中农也仅 11 头驴、6 头牛和 1 头骡子（《硬杆子精神放光芒》编写组 1975P13）。

黄家财主的情况上文已有叙述，在此不多介绍。必须指出，即使是良田，当时亩产也不过百斤，地主本无大车，大牲畜在战乱中也逐渐失去，更无心发展农业生产，改进技术。

接下来便是村民说的二等户，按阶级划分应是富农和部分具有一定扩大再生产能力的上中农，如林升、冷恒合、钱家江、钱家泉等，他们也不太吃细粮，攒钱置地。

董启和董春是一个太爷门下的兄弟，但前者马上就要被划为富农挨斗，后者是 44 年入党的老革命，被划为下中农（66 年登记时改为贫农），我们就以这两家为例：

董启爷爷辈人少（父亲系独子，而董春爷爷有四个儿子），分到 40 亩地，年年剩二三百斤，但到父亲时一年粮食却不够吃，败家（按：董启爷爷 37 年方故世，其实村人皆知董启父不抽不赌，过日子也精细，败家之因不在本人）。也置地。种点花生，还有栗子树，作为零花钱。

园子里种靛染布用。爷爷时家有4头牛，父亲时只剩2头（董启挨绑时卖了换赎金）。一直有头驴，还有两口猪。穿的全是布衣。八月节吃细粮，三伏吃点饺子、包子。上了好几年学。

董春爷爷在时家有三四十亩山坡地，不能种麦子。粮食只够吃两三个月。租地主贼六子地，能种点麦子。套种玉米和谷子。使麦子到集上换点粗粮，好年景一年能打300斤。养两三头猪。平时吃白薯、杂面、萝卜丝汤；后晌好了能和上点杂面疙瘩；过年吃顿饺子，好了买袋白面（40斤），割点肉。不好吃了点荞麦、棒子、渣子窝窝。做点豆腐、粘饽饽。家里四口人一床被子，夏无特别衣服，冬有付棉袄。有一陪嫁破碗柜。21、2岁娶媳妇，请了20多人，四碟八碗。

前文提到的只做散跳不扛长活的黄臣家是贫农，家有一间半草房，四五亩山坡子地。再租几亩地，只能种豆子、花生、玉米。平时拾柴禾。租贼六子七亩山坡地，定额地租22块2毛5分（当时一块钱值二三斗粮食）。弄好了交地租后剩1000多斤粮食。冬天被子拆了做春衣，然后再拆了做夏衣。家有锄、镐、耢子各一。

贾秀英父兄一家是西村较少有的标准雇农。他们自家无房，冬天借钱得果（中农，家住洪山口，夏过西村看南岭果木）房住，夏住一小窝棚。四季无粮可吃，各种野菜如榆树叶子之类吃遍。父亲生有七个孩子，仨儿子过出俩，女儿早嫁做童养媳。自己无地，给贼六子看树，也种树和下地。地主走后才从南岭搬来村里。

村中生活无疑很苦，几乎每位村民见下来“调查”，开口便是“过去？那日子困难！”但至少现在提起来阶级仇恨并不明显。日月冲淡？地主早迁？分化较低？宿命意识？难以定论。传统有一派革命理论认为不满情绪和分崩离析的社会促使痛苦的人产生相对剥夺感，诉诸武力，参与革命。但重要的是，痛苦的个体如何感知集体的被剥夺？还要把自身痛苦视作集体被剥夺的一部分？如何把这种被剥夺转变为普遍的革命推动力，导向改变处境的集体行动？这里尚有一系列步骤等待考究。托克维尔尝言：一旦人们意识到有可能消除冤情，它便显得无法忍受。而使人们意识到冤情、找到归咎者和改变处境的道路，这正是革命动员的过程。

在涌动的战火背后，整个社会经济大势到底如何？众方家说法不一。马若孟利用满铁和卜凯调查资料考察本世纪上半叶冀鲁农村经济状况，认为此间产量增长率却超过人口增长率。对外贸易扩展所推动的农村手工业发展、工业原料作物引种、非农雇佣劳动机会增加等，使得除天灾人祸时期外的农民生活水平并未下降。土地分配并未进一步恶化，也无证据表明阶级间剥削十分残酷。主要问题还在于农业技术缺乏迅速发展的机制。但尽管他明言应将结论限制在华北尤其冀鲁两省，仍有学者指出利用满铁资料有问题，一是被访人心理因素，二是所选村庄多邻近交通线。总的来看，20年代末后受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战乱及天灾影响，农业生产全面萎缩，35年后才有所回复（就全国而言），但耕地面积萎缩和亩产降低之势未变，人均粮食产量逐渐减少。至三四十年代农村经济已完全崩溃（参从翰香1995P243-5；Mayers1970）。

黄宗智说得很具体：河北一带贫农在付租或纳税后所得无几，千方百计结合家庭农作与短期佣工维持一家生计，希图延缓沦为长工的命运。这种极不稳定的生活方式一旦再遭其他压力（赋税加重、市场价格升降、政权滥用、战争、盗匪及天灾）便极易颠覆（1986P317）。更数字化的事实是：在丰润，30年代末一架水车约120元，大车约80元，小车约40元，一般贫苦农民以致中农皆无力购置。一村至多几匹骡马，主要还是驴、牛。骡120元，马100元，牛50元，驴30—40元。一般贫农乃至中农即使买得起也养不起。骡、马、牛每头每天消耗约10斤饲料，约相当15至20亩粮食作物副产，一头驴也约需5—6斤粗饲料；耕畜做工期间还要辅以精饲料（高粱、玉米、大豆），骡、马、牛每头每天约需2斤，近乎成年男子粮食消耗二倍，驴每天也约需1斤。故骡马主要是地富耕作动力，中农阶层以驴、牛为主，一般贫农几家合用一头牛或驴，更贫苦的户则根本无力饲养牲畜，需耕田种地时多采用临时雇套或以人代耕（黄宗智1986P153；魏宏运1996P153-5）。不妨说，即便没有战火洗劫，冀东农村经济也已陷入根本困境。战火造成的最严重的破坏实际出现在农业之外（出外做工、做小买卖之类）。

在下章讨论土改前，不妨把视线放得更长些。照杜赞奇的说法，从清末新政开始的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社会的扩张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到40年代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华北乡村

社会中政治、文化及社会联系。清末新政的新行政机构深刻影响了乡村领导人员构成和村财政运作方式。对新兴公共事业（如学堂）的日常管理和财务监督，对外来摊款的分派和征收，都会产生并巩固村庄新型领导组织（杜赞奇 1994P3）。

但杜赞奇未能明确揭示：新型公共活动仅仅是为产生新型村级组织提供了需要或曰必要性，却并不一定确保这些新型组织发挥强有力的效能。如前所述，每个具体的村庄面临的外来压力或许相似，但实际孕育出的组织类型，尤其是这些组织在村庄日常生活中具有的切实地位，却不一定完全相同。这里缺漏的分析环节是：新型公共活动是否真正侵入了村庄日常生活和村民心理感知？是否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村庄原有公共活动类型和村民原有心理感知？村庄新型组织的出现也许是事实，但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精英类型及其活动方式是否有质的改变？或者，所谓村庄产生了新型的精英和精英活动，新在何处？这些问题的历史背景是：从清末新政到杜赞奇依据的满铁资料的考察终点——本世纪 30 年代末，华北村庄是否经历了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相当同质性的历史过程？与本文更有关系的是：日本入侵后到土改结束，共产党政权在整个华北普遍巩固建立，其间的变化是属于杜赞奇概括的过程的延续还是有着质的不同？

杜赞奇认为，村庄中存在复杂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不断相互交错作用，构成权力文化网络。组织成员认同的象征和规范价值赋予组织本身乃至整个文化网络一定的权威，使之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在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主要是为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而非追求物质利益（杜赞奇 1994P4-5）。这样的分析显然更适用于具有较发达的家族组织或看青会、水会之类联庄组织的村庄，更适合分析在较强外来势力侵入前较具“共同体”性质时期的村庄。他在相当程度上把文化和权力的关系以及村民对此的看法理想化了。也许他分析的那些时期的那些村庄就是如此？

当然，杜赞奇虽然认为乡村社会领袖只能产生于具有共同象征性价值观念的组织结构，但同时指出，在乡村社会中，表面约定俗成的文化价值有着细微复杂的产生与运作过程，充满包括国家政权在内的众多社会集团、宗派间的相互竞争、妥协及自我调节。他提请人们思考：在文化网络中的符号很可能被用来为某一集团或个人谋利的情况下，人们如何被引向对“合法权威”的认同？国家政权要想创造出可行的新型权威，是否必须将其建立在适应社会变迁需要的组织上（参杜赞奇 1994P20-33）？

最后一点已涉及对组织重要性的考问。杜赞奇实际是径直提出村庄中存在复杂的等级组织，而对普通村庄（至少华北）和村民来说，组织形态、组织观念、组织技术的引入、巩固和演变其实是个非常晚近的过程，新型组织形态及其对村民（无论其是否成为精英和正式组织成员如党员、民兵）的心理、日常生活模式的影响，远非以往看青会、家族之类“组织”所能比拟。村庄基层组织机制的改变是巨大的。在相当程度上，此阶段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外界力量对村庄的渗入可谓是权力组织网络取代权力文化网络的过程（强世功 1999）。建立组织和培养组织化生活在新的权力技术的引入过程中具有绝对的重要性。

但所谓文化网络并未被简单地替代（除非将文化狭隘地理解为绅权族权甚或拜神求雨）。即便在强世功所谓的权力组织网络中，符号依然是非常有效的形塑手段（强大的动员及强制力）和分析工具（考察造成符号多种用途的条件和环境）。杜赞奇的分析时点下限是 1942 年，而真正实质性的变化才刚刚揭开帷幕。好戏看来还在后头。我们已在抗战中领略了共产党在村庄建立组织的动员效果，在接下来的土改革命高潮中，我们更将见识动员政治中权威、符号、组织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抽象地说便是：组织因承载了符号而具有了权威，符号在组织行使权威的过程中被具体化，权威通过符号体现于组织而被巩固。不过，这等概括性结论并无多少意义，还是来看看丰富具体的运动进程吧。

## 第三章 风潮怒涌

1946—1948

东西地 长又长  
小三娶了个大姑娘  
在家能织布 下地能帮忙  
人人都说小三命运强  
小三摇摇头  
不是命强不命强 靠得是救星共产党  
要不是分地又分房 哪有我小三娶的大姑娘  
——《小三娶个大姑娘》（归远小曲）

### 一 反奸清算

45年10月冀热辽区党委发出放手发动群众的决定，清算时期开始。首先是减租减息斗争。但各地局势较乱，一时无统一标准。如前所述，冀东原本以雇工制为主导，抗战中大中地主又纷纷外逃或出地，故减租减息不单纯是与地富的斗争。就连归远县委在调查县城附近减租运动后，也发现中农、贫农、富农皆存在佃出佃入情况，觉得不能单纯从阶级矛盾和租佃关系入手，转而指出：“一切农民和经营地主的呼声，都是村负担过重，清理村财政，改变村开支，是他们一致的要求”（中共归远县委1946）。然而斗争是必须深入的，据正史总结，减租运动中干部起先组织不力，地主也抱看风头的侥幸心理敷衍，但数村农民年关前在县城举行了示威游行，大获成效。声势为之大振。旧历年前县城周边村庄大多减租退租退负担，立了新契。因此土改伊始就证明：必须组织农民本身。这是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某种意义上也是斗争的目的。

46年2月15日归远所属的15地委开会，总结前段减租减息运动。因干部中此时还有人担心妨害统一战线，会议于是明确地主阶级是国民党社会基础，和我方已分离。同月归远县委上述报告认为前段运动中村政权和党组织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抗战胜利后县城周围原本敌伪势力较强的村政权形式上换了，实际有的仍在旧势力影响下，有的不顶事，新成立的农会多半是空架子，“归远城解放后我们逮捕了一些汉奸，要发动群众控诉复仇，很多村主任、村干部联络村民来保释，教群众说汉奸是好人”。实践证明，组织农民自己起来斗争是推动运动高潮的上好途径。因此报告提出：要在运动中改造农会和两面政权时旧办公人，同时大力建党：“把在群众斗争中很积极的份子，除去政治面目不清，阶级异己或投机分子而外，全部吸收入党”。

不过，此时县委对群众斗争尚保持清醒认识，强调要注意各阶段火候：农民未起来前是“阶级教育，算穷账，放手发动群众，向地主清算（经济的、道德的、政治的），高度的提高其阶级觉悟与斗争性，以通俗的阶级斗争的道理来武装群众，把地主压倒”。群众取得实际优势之后，“即要引导群众研究政策，进行政策教育，对地主有打有拉，在削弱封建地主时，要照顾到他的生活，这样斗争更可得到社会一般人的同情，斗争起来时很剧烈，群众不发动起来，不能压倒地主，收场时要和气”（中共归远县委1946）。县委甚至推荐了这样一条日后不可能出现的经验：某村农民对地主斗争取得胜利后，过年时给他拜年送年礼。

3月形势急剧高涨。归远县委召开清算复仇公判大会，处决伪县长等三人。全县普遍开展清算复仇，口号是“以血还血，有仇报仇，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杀斗争对象当然不用偿命）。正史载全县当时处决13人，滥杀9人（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0P21）。3月11日冀东区财经会议则认为“归远城周围搞发动群众，开始也想从控诉复仇开始，到减租退租，群众不干。因离城近怕国民党来，不敢控诉复仇”，把首段斗争偏软原因归之客观战势。

4月起形势暂时转向温和，起因是冀东区党委发出普遍纠正偏向的四二指示，称：

最近各地发动群众发生许多过左行动，最严重的是：（一）乱斗，不少地方打了中农、富农和抗属。（二）斗争方式，单纯斗力，不斗法，不斗理，不经政府及决定手续，滥捕滥罚，灌粮、拉牲口、杀猪、伐树、大吃大喝，有的拉大队分粮，吃大户，分土地，甚至个别的发展到抢夺、杀人与反对政府。（三）单纯为经济利益，与提高群众政治觉悟脱节，并在经济斗争中破坏性大……（干部）思想上以打为快，左比右好……加上自私报复，斗争胜利品少数人独吞，同时也有反动分子，故意以左的面目出现，歪曲政策，趁火打劫。因此，已引起严重恶果，革命秩序紊乱，人心惶惶，不但地主、富农甚至一部分基本群众，亦对我怀疑不满，县城少数积极分子又过左行动，阻碍了更广大的群众翻身，促成边沿区顽伪迅速组成伙会，地主向津唐据点逃避……（中共冀东区党委 1946a）

但在 47 年 2 月底的冀东区土地会议上，区党委民运部长阎达开严厉批评了该指示的倾向，认为它在干群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只是根据党内少数人意见，认为前阶段群众运动过火，需纠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故该指示极大地阻碍了群众。阎认为如果迅速承认农民斗争果实完全合法，并坚决表示支持，农民是舍不得乱吃的，“五四以后，则不再吃了”。四二指示代表一种情绪，未具体分析现象和地区差异，就一概“纠正”（47/2/28）。不过，阎的发言是将近一年后的事了，而他在过了几个月后，也被批评为过“左”。此是后话。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减租减息在西村几乎是轻飘飘地过去了：

八路军组织工人，扛活的，加工资。秋里就是二五减租，三七五交租。八路军给你把种子刨去了。以前多少斗棒子一亩地都讲好了，赶到那时候都不那样了。八路军开会呀（冷向义）。

人们的记忆全被同期的清算乡保长和此后的法大纲占据。西村清算了三位伪职办公人：乡长周金林、保长郑玉田和财粮董祥庆，分了部分浮财，但未扫地出门。按保长儿子郑启财的说法：“清算时候反正也没账，拿光了算”。在许多村民脑子里，董启家复查被斗，表面上是怀疑其父当先生时贪污。其实是父亲过日子孽道（抠），万事不求人，也概不外借，不受欢迎。

反奸清算是抗战胜利后进行土改前一次必要的运动，也是检验战争时期的基层干部在相对和平时期组织动员群众能力的头一炮。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照韩丁总结，至少在张庄，一般群众参加太少；斗争不分对象，对汉奸也很少或没有按其出身和动机加以区分。大多数农民积极分子只把它看做是对战时所受损害的一种报复，将为生活所迫或武力相逼的贫农、中农等“一顿饭”汉奸也一概清理。继承和通过租息添置的财产也被怀疑是剥削而来。户主当汉奸，全家受株连。村中气氛恐怖，中农倒向敌人一边（1980 章 12）。总之，阶级矛盾和土地问题尚未被推向最前台。

## 二 “我党不能不表示同意”

这种转变对于少地和无地农民的信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多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他们睡在自己的房屋里，走在自己的土地上，撒着自己的种籽，盼望着自己的收成。他们不欠任何人的粮食，也不欠任何人钱，这也许算是最使人高兴的一件事了……“同志，翻身了吗？”代替了“老乡，吃了吗？”（韩丁 1980 章 15）

46 年 4 月中央开会讨论解放区土地问题。5 月 4 日正式颁布五四指示（中共中央 1946a），标志党的土地政策已由实行减租减息转到耕者有其田，但出于策略考虑，未明确宣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数日后毛泽东、刘少奇就土地政策指出：五四指示是“为群众所创造，为中央所批准”的“解决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适当方法；不要去批评农民的平均主义（土地彻底均分），而应“批准”农民这种彻底消灭封建势力的行动，但不能是不联合中农、不照顾应照顾的各色人等的无止推平（毛泽东、刘少奇 1946）。

五四指示在谈到中农时指出：坚决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益，决不可侵占其土地，整个运动须取得全体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真正同情和满意。至于富农：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如在清算、退租、土改时期因广大群众要求，“不能不有所侵犯”时，“亦勿打击过重”，否则

将动摇中农并影响解放区生产。农民已公平合理得到土地后应巩固其所有权，此后凡因自己勤俭节约、善于经营而发财致富者，均应保障其财产不受侵犯。“因此不可有无休止的清算和斗争，妨害农民生产兴趣”。

土改绝非单纯土地分配，这是中央一贯的认识。五四指示在建政方面指出：运动中及土地问题解决后应注意巩固和发展农会、民兵、党组织，培养提拔干部，改造区乡政权，并教育群众为保卫已得土地和民主政权、实现国家民主化而斗争。指示并提出斗争策略和比例：只要团结农村90%以上人口（雇农、贫农、中农、<sup>51</sup>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约92%，地富约8%），保持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不会犯冒险主义错误。但如不能遵守上述各原则以正确指导运动，如侵犯中农土地或打击富农太重，或不给应照顾者必要照顾，就会分裂农村群众，严重阻碍土改。因此干部问题是个大问题：各地须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实施计划，调动大批干部短训后派到新区工作。同时应教育干部尤其区乡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干部作斗争”。指示也预见到纠偏的需要：各地应“以充分的热情与善意”教育和纠正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右的和左的偏向”。<sup>52</sup>

无论其出于宣传目的的策略性成分有多大，由刘少奇起草的五四指示的周全性质是可以肯定的，既强调发动群众的必要性和巨大潜力，号召干部重视群众的热情；又提醒干部注意策略和纠偏；既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和残酷；又正视自身可能出现的新的腐败。但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与指示中统一规定出的敌我比例显然容易被利用或误解，常造成过左偏向。

冀东情况更有意思。阎达成在次年土地会议上如此评价冀东群众运动：第一有成绩，群众发动起来了；第二有缺点，群众起来发生左的偏向；第三有错误，有些地方实际实行土地革命，大吃大喝，毫无原则，把社会秩序弄乱。“这结论未出领导机关”。因许多干部认为群众运动已过火，“才会对中央五四指示电报的拍发错误不假思索，信以为真：中央拍电报时，将‘我党不能不同意’的后一个‘不’拉掉，成了‘我党不能同意’”。<sup>53</sup>为什么接受这个电报呢？因为当时是这种情绪占优势的，个别同志虽然提出怀疑，但也未见正面坚持己见”（47/2/28）。

冀热辽区此阶段的土改肩负了多方面的任务。5月11日中央指示冀热辽分局：在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工作中，须将战争动员、参军运动、武装农民等工作联系起来（中共中央1946b）。17日又充分肯定冀热辽分局前段成绩，并要求对土改中党内右倾和“左”的偏向“加以热情善意的教育和纠正，有计划的大批培养本地新干部，适时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对群众在斗争中的天才创造，应特别重视”（中共中央1946c）。

但据区民运部长总结，此阶段基层与各级领导思想上存在混乱（其实是对表面温和的五四指示缺乏深刻理解），农民惶惑而地主嚣张。故5月30日冀东区党委通过《区党委关于群众运动问题初步检讨及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初步意见》（河北省档案馆1990P23-9）。随后行署发布布告，坚决表示支持群众。此阶段确立归远所属15分区（刘慎之负责）为全区典型。

本月归远又在县城召开清算复仇动员大会，<sup>54</sup>由此从反奸清算转入执行五四指示阶段，首轮土改开始。当时有报道称“城外每天有十来村浩浩荡荡成群结队进城结算，每村一二百人，民兵全副武装，背着口袋，拿着绳子来拉东西”，一时间城内外纠纷不断（邵清华1946b）。

按正史总结，归远执行五四指示在7月中旬接近高潮，9月上旬基本结束，初步实现耕者有其田。具体步骤第一是组织领导。各村成立工会、农会、清算委员会（或称土改委员会）。县、区组织工作队下村加强领导，15分区并组织工作团分赴各村加强指导，抓点带面。

<sup>51</sup> 阶级划分体系首先需改变村庄旧有阶层体系（财主、二等户、中户、穷家主）的观念。46年7月董边“归远二区发动群众的几点经验”（1946）：中户穷人是一家，农村提中户比中农好。

<sup>52</sup> 纠偏不同于轰轰烈烈的斗争：“纠正错误是个党内的教育问题，不能大喊大叫，造成群众运动，应当有调查研究分别个别的去处理问题。我们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错误是在为人民的事业当中发生的，但在纠正错误中就不能采取群众的运动办法”（中共冀中区党委1946a）。

<sup>53</sup> 原文为“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

<sup>54</sup> 46年6月中央指示：土地运动中须多召集农民以群众大会和代表大会形式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这是发动与提高群众斗争情绪和农民觉悟、暴露地主罪恶、打破地主离间、巩固农民团结、建立农会、培养干部、交换经验、改造政权等工作最好的方式”（中共中央1946d）。

第二步是酝酿发动。先开党支部会说明政策，强调三点：首先是打击汉奸、恶霸、不法地主，达到人人有地种，铲除封建剥削；其次是坚决不打击中农；第三是斗争过程中要团结90%以上的人。再开工农青妇武和村政权联席会，介绍外村经验，找出本村不法地主，清算减租数目，研究斗争方法。然后召开各群众团体，让群众自己刨穷根，启发阶级觉悟。

第三步便是开展斗争。先开积极分子会，搜集不法地主推翻合理负担、隐瞒级数、剥削欺压穷人、说破坏话、当汉奸、办坏事等罪恶事实，据此算好账，安排好控诉揭发人和喊口号者。<sup>55</sup>开会时先由主席说明开会意义，鼓动群众气氛，接着喊口号。让被斗地主一进场即受震慑，感受到群众压力。<sup>56</sup>同时注意区别对待：对恶霸、不法地主坚决斗争，对中小地主采取调解、谈判、仲裁等方式处理。“大地主被斗倒后，中小地主、富农、犯过错误的、勾结过反动派的人，主动向群众低头，坦白认错，自动献粮献地，有些犯过错误的中农也要求献地”。政府则予以退回，但欢迎开明人士自动献田。据8月16日统计全县“党政干部、进步人士及开明地主共献田2.3万亩”。<sup>57</sup>

第四步是分配果实。胜利果实分配原则是按家庭人口和经济状况分等级，民主议决。先由村清算委员会根据分配原则制定出具体的分配方案，经群众大会讨论修改后执行。要求干部严于律己，表率群众。分配顺序是先贫烈、贫抗，再雇农、贫农，最后是中农。<sup>58</sup>

最后一步是确定地权，订立新契，整顿发展各类组织，提拔积极分子等（鲁文曾1990a）。

按正史所载，7月初至15日是15分区群众运动高潮，并立即接上扩军高潮。因为众所周知，农民得地后认为扩军是自己的事。8月上旬统计，归远提前超额完成扩军500名的任务（鲁文曾1990aP32）。<sup>59</sup>

7月15日冀东区党委总结了15分区发动群众的许多经验，同时坦率承认：不少区干部起先下去只在个别村子搞示范，未能普遍召开各村积极分子会传达对各阶级政策，“结果示范只作了五天尚未作完，已有20多个村子群众自动起来，并打了不少中农，发生村与村之间对立”。此时上级连忙召开区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解释对各阶级政策，特别是团结中农。强调村干、积极分子不能强迫命令群众，“群众内部有意见，只须和平调解，不须斗争分裂”。特别提醒基层干部须服从区县领导，经常报告。结果几个区很快起来，“对象对，群众多，领导成份好，村与村的纠纷少，发生争议自己会解决，区里去了也好解决。只有两个小穷村子，区里认为他们向来无斗争，未找他们开会，结果也起来了，偏就打了中农（因该村无地主恶霸之类）”。

区党委据此乐观地估计：照目前规模与程度，如无特殊阻碍，年内可提前完成土改。归远

<sup>55</sup> 开大会喊口号，多半问答式，显得力量大（董边1946）。会场上口号和标语是鼓动气氛、点明政策的上佳手段，如贫农和中农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共产党是人民的长工；建立民主、自由、和平、繁荣的新中国；反对贪污腐化，退回多占果实；教育与劳动相结合（韩丁1980章33）。到47年底刘少奇向地方干部严肃指出：今后在群众会上及人民法庭上停止在主席台上喊“该打不该打”、“该杀不该杀”之类的口号，这种简单方式是提倡群众盲目性，不叫群众多想问题（中央档案馆等1998P349）。

<sup>56</sup> 中共冀中区党委1946b：干部单纯认为斗争中参加人多、斗得热闹就行。许多地区参加斗争的儿童占一半以上，而青壮年反倒很少，“会上没有充分的吐苦水，以致斗争不起劲。也有些地区为了参加人数多，而用强迫斗争方式……献县尹庄为发动群众参加斗争，哪户不去即到那家吃饭，借以威胁群众参加。另外有的地区干部认为群众不‘左’起不来，于是鼓动打人或带头打人，实际是干部‘左’不是群众‘左’”。

<sup>57</sup> 赵效民1990P329：至8月各解放区开明士绅等共献田3万余亩，问题很多。各地就此明确规定献田范围和时间。群众斗争未发动前一般拒绝接受献地，发动后也仅接受抗日军人和干部的家属以及开明士绅献田。地主献了田，农民也要算细帐、吐苦水、追穷根，认识到地主的田本应归还农民；农村主人翁是农民而非地主。

<sup>58</sup> 归远某村分果实账上写“奉上级指示，村干及积极分子多分”（邵清华1946b）。在张庄，首次财产分配时原则是斗争会上诉苦表现，“谁斗谁分”。积极参加大会，大胆倾诉苦水的人都分到了东西。那些没有说话的人，得到的就少些，甚至什么也没得到。“但随着大家的斗争热情都起来之后，这样就不合适了”。起先大家都生怕成为反攻目标不敢要，尤其是贵重东西。村干部和民兵皆未参加头几次分配。区长劝道“群众看到干部还没有分上一点，就会主动提出建议，那时你们再分也不迟”。“可是干部们耐心地、无私地等待了很久，却始终不见有人提出建议说他们也应该从斗争中获得好处”，于是产生私分念头（韩丁1980章12、15）。在十里店，东西实用性影响作价（一双几乎全新的皮鞋作价两毛，而一双布鞋却作价三毛）。在窟窿户分等评定中体现出平均主义倾向（柯鲁克夫妇1982节30）。

<sup>59</sup> 邵清华1946a：个别村雇佣式，在村里大大宣传：“谁去15亩地，两石玉蜀（或麦子）”；村干只动员别人，自己不作模范；以及把四十四五及十五六的都送来凑数；甚至有个别村因竞赛而争成绩。

再有个把月即可完成。各地应用一切方法争取迅速实现，但须走群众路线，不要包办代替恩赐。在建立健全组织方面，各地应“扩大工农会及妇女青年儿童等组织，务使解放区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起来，大量发展党员，把运动中基本群众的积极分子，全部吸收入党（阶级异己分子和流氓除外，但也不怕个别不稳分子暂时的混入）”（中共冀东区党委 1946b）。

基层群众运动如旱林野火，迅速演成轰轰烈烈之势。在韩丁笔下的张庄，县委提出“三透、四有、五不留”，即揭发透、斗争透、翻身透；无地少地的农民要有饭吃、有衣穿、有地种、有房住；不留一个贫农、不留一个落后分子、不留一个问题、不留一点封建思想、不留一个地主。只用一句话便总结了全部土地革命，从而鼓舞那些年轻干部在几周内完成社会变革（韩丁 1980 章 21）。与此同时，中央也在努力寻求更平衡、更合理的政策。7 月 19 日中共中央致信各地，咨询征购地主土地问题，寻求一项可向全国公布的法案。提出为真正使地主土改后能维持生活，是否可每人保留两倍于中农的土地，并公开宣布土改后地主所留土地及财权人权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并且奖励依法实行并积极赞助土改之地主。信中建议的对富农、中农政策则更为温和。但对于华北村庄普遍经济背景和运动现状而言，这等意见明显脱离实际。对此中央也很明白，询问如目前宣布这等法令，对正发展的群众运动有否阻碍；在群众运动刚开始的地区宣布这等法令是否适当；要求各地电告照顾地主生活采取的办法和群众在运动中创造的办法，以便中央在一两月内制定一土地政策公布（中共中央 1946e）。但这个“公开的土地政策”一时难以意见统一，未能出台。两个月后中央指示山东土改时称：斟酌各地意见后认为暂不公布为宜，待阳历年后各地基本解决土地问题时再予定夺（中共中央 1946f）。

针对运动中中农被斗或消极的普遍现象，7 月 20 日冀东区党委指示归远县委：中农与贫农之间有时也发生利害争执或帮助不足，应该认为其原因在于旧社会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彼此生活皆无保障。现应积极团结共同清算封建地主：“须知注意争取落后分子参加运动，是群众工作中一个重要环节。运动没有他们的参加，不从他们之中培养出积极分子来，中间分子就不能继续前进。如果使落后分子的利益受到损害，中间分子就一定怀疑动摇，结果使积极分子孤立，运动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甚至形成非常不利的复杂局面”（中共冀东区党委 1946c）。

8 月中旬内战爆发，国民党某部进攻归远。而区民运部长总结认为 15 分区至此连搞土地带扩军已胜利结束。9 月全县统计：土改前地主 1500 户，运动后 6 户仍为地主，690 户变为富农，794 户变为中农，10 户变为贫农；运动前富农有 1300 户拿出部分土地，但运动后仍为富农者 600 户。全县共 570 户中农被斗，2 万户贫农升为中农（47/2/28）。9 月 10 日国民党军和逃亡地主“还乡团”（后习称顽军）占领县城，直至 47 年 6 月撤离（张永生、鲁文曾 1990）。

### 三 首轮土改过西村

首轮土改在西村似乎没有留下什么较深痕迹，激烈的斗争还在后头。更准确说，因为后来事态过于复杂，使这段局面因其相对平静而陷入一种缺乏突出事件的境地，从而在记忆中与后来的时段混融一处，也许强行区分出哪些事情属首轮土改发生无甚必要，毕竟如此分期并不决定村民日后生活。热闹的倒是 8 月 2 日至 22 日一股顽军在西村安据点。因为林惠日后揭发宗藩、林奎等在 46 年来顽军时投敌（宗藩 65/1/15 自填未曾有被捕、脱党经历），我们才从各种查证结论中捕捉到写史所必需的“事”。起初结论是当时宗藩、林奎、冷向权等村干提前委派好乡长应得义、保长冷向仁，与周子明、林惠、支瑞善、林志、黄龙祥等转移出村。路上与东去的林惠一家分手。后大伙儿碰上某县委委员（当时林奎嘴巴肿，宗藩陪伴，两人“离队”未见着），商定打据点，派黄龙祥回村打狗调民兵，冷向权等替部队找地图。后回村准备在乡保长配合下干掉叛徒周恩。全过程中仅冷向权、周子明被单独叫到伪军连部去过（62/5/3）。

但在三年后的查证中，宗藩被查出确实去连部“自首”过——东村村长周恩叛变，全村村民受到威逼，故假投降，借敌之手除掉周恩，说“是他让我们当干部”：

当时宗藩、林奎、冷向权等干部的家属先后出村找寻，因此宗藩等人在敌人威逼和家属牵

连下，发生动摇，经伪保长冷向仁、应得义、地主黄延田等与敌联系后，与四联村（即邻近四个村）民兵指导员林奎、村治安员冷向权、武装班长黄龙祥、财粮支瑞善等向敌自首。当时只向敌说了每个人的干部身份，并当场答应为敌送信、办事等，没有暴露党员身份和党的秘密。自首后该村群众和我储藏物资没受损失。同时宗藩同志第二天（顽军已撤走）到大康平村找到当时区委书记苏远兴交待了自首的经过，受到苏远兴同志的批评，并把宗藩留在大康平村搞复查工作，因而不存在投敌叛变，是一种一时政治动摇自首错误（65/6/5）。

所谓留在大康平村云云，其实是某种更加证明宗藩清白的托辞。宗藩去那里搞复查应是47年的事情。至于那东村村长周恩，此事也有些戏剧性，冷向清说：

周恩不应该那么死。他初步是自愿当八路军的，当多少年后让日本子弄到日本国去了，还会几句日本话呢。解放了他回来了，回来他投敌了。（冷长子：你得说清楚，那是抗战胜利了）是。他暴露了咱们解放区（公）所驻的地方，还有几个厂。他们（顽军）跟着他上这几个地方掏抓去，都没抓着，这以后走了，就把他崩了。他们要不崩，咱们这儿也准备崩了他。那阵儿区里跟我也商量好了，这儿省事了。

东村人说东村事，说的就是和西村人不一样。要按冷向清说法，宗藩等假自首，借敌之手除去内奸的事就不那么有谱了。而董印说的就比较有利于西村人，并且周恩也更坏些：

周恩由日本回来当过几天干部，48年被中央军——傅作义的队伍——给崩了。他在东村当干部，把东庄黄家、周家的财主闺女都强奸了。中央军在这儿安据点——是春天吧，他就投了中央军，报告说西村有多少干部、多少枪，庄里就抓。这时候老应就出来了，说没这码事儿，西村老百姓没有枪，给八路军干事的有。他把干部找来，对对词，后来把周恩给崩了。

老应也是焦点人物。林惠告发宗藩时，顺带揭发他企图打死应得义灭口。老应原系治安军驻村时的伙夫，与营部对门狼咬老婆相好。后治安军在东北被歼，老应回西村与该女合过。林奎委派其为保长在顽军驻扎时应付敌人。同年十月，老应突然被控曾于五年前与狼咬老婆合谋害死狼咬（前述老会首狼咬于41年服毒自杀），宗藩、林奎、冷向权等在调查此事时因老应不承认，打过他。更奇怪的是47年冬土改时老应反过来给当时被押的这三个老干部通风报信，“说掌权的贫农团的怪话”，又被贫农团掌握的法庭法警痛打。此项查证结论又对林惠不利。

爱告状的林惠此时在村中还是混得挺开的人物，大伙都对这位在村中素无一官半职、但却与“上面”李运昌、县公安局等皆有联系的神秘人物又敬又惧。支瑞万说：

林惠也是老革命家，闹日本他就革命，就是共产党员来着。那时候咱们闹不清楚就是，不敢那么说。有秘密信往哪哪送，及时就他发出去转着走。林惠文化程度和宗藩差不多。脾气反正要我看是不错。（有人觉得不好？）那一人脾气都随大伙心了？（宗藩脾气怎么样？）宗藩也那么回事吧。比林惠强。他那个人呐，忒护庄！咱们庄上修个铁路，他当县委书记了，他不让。因为害怕地么！护庄这叫，没地老百姓吃不了饭不是？林惠？他也管不到那个不是？他算啥呢？啥干部也没当过。就跟着八路军瞎掺和。

看来就算林惠坚持原则，对宗藩的控告都正确，不“护庄”也是白搭。其他评价就更糟了：

要我说坏事就坏在我们姓林的身上，尤其是林惠两口子和他儿子林起远，忒爱鼓捣个事。林惠媳妇叫老狐狸精。什么事儿都有林惠他们操纵，冒泡。林惠和林奎平时并不太好，和宗藩倒还挺好（林起友）。

林惠在先是牲口贩子，上哪儿买个牲口啥的。要是论坏，庄里没人能比他坏。他和老干部不和，以后也是有病死的，没有被抓过，土地法大纲斗他来着，为啥？跟老干部不和呗，跟他媳妇一起（冷向义）。

其实法大纲时并未斗林惠，他那时根本就不在村里。但冷向义既然能把林惠祖传的兽医身份说成牲口贩子，如此回忆也很自然。当年一块干的林起洲说的则透着同情：

便衣队一走，八路军一来，就是赵国普的区长，他和这区长挺好。林惠起先跟他们，跟李运昌啥的都认识。林惠那时跟宗藩一个院里住，我老上那呆着去，都挺好的。（怎么后来弄不好了？）都是因为私事。林惠这人是这样，谁去，吃啥随你吃，有钱就花喽。也爱掺和事儿。

林惠他老婆也不错。后来老干部也淡性，忘了以前，这就一来二去的产生意见。这不把起远他爸弄得也挺操蛋的？连起远。

原来大家开始都是一块儿的，只是大浪尚且淘沙，更何况怒涌的人间革命风潮？

#### 四 复查前的缓和

五四指示的任务似乎已基本完成，冀东区各高层领导纷纷开始总结经验。11月19日，冀东区党委书记李楚离总结本区运动规模与深度，充分肯定群众运动势不可挡的伟大力量：

各种斗争方式，很多是群众自己的发挥和创造，如清算减租、查黑地、算负担、控诉、复仇等等，以及在群众有力的提出土地改革后，地主被迫自动献田等方式，最后获利农民十二个县有二百多万，而我们十二个县的干部不足五千人，此绝非少数干部强迫命令所可做到，也非盲目无组织的群众所能为，而正是有充分的酝酿和自觉的有组织的群众所进行的。

大规模派工作队还是下阶段复查时才有的做法，此时的李楚离一定很满意靠少数干部即完成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成绩。但共产党也不可做群众运动尾巴，他耐人寻味地指出：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其表现形式是用一种超出社会之上的特殊力量，来维持某一特定阶级的统治，我们各级干部必须学会使用国家这副机器使赤裸裸的阶级斗争达到缓和来维持与巩固自己的统治。

他不久就会知道这种思路提得太早了。他还提出几个以往被忽视的问题，比如因为土改打击了大多数雇主，雇工得不到必需的生活，须设法解决，“否则影响雇工与农民的团结”。这个“意外”其实是雇工制较租佃制占优的冀东实行土改的一个关键问题（李楚离1946）。

11月底，15分区领导刘慎之在某次报告中认为土改已基本结束，政治收获也很大。他自豪地援引了一位感激涕零的村民的心声：“毛主席比我爸爸还强，我爸爸也没有给我留二亩地”。但刘也痛心疾首地告诫听众：斗中农实是让群众打群众自己，非真正发动群众。这次土改伤害了很多中农，缩小了基本群众基础。拿出东西不多，得罪人不浅，很不合算（刘慎之1946）。

但重要的是大局，是群众运动蓬勃蔓延的大好形势，是地主富农低头认罪胜利成果：

只要当土地“回了老家”，农民取得了“命根子”、“饭碗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便空前提高……农村赤贫消灭，乞丐、偷盗绝迹，雇、贫农大批升为中农、富农，市场欣欣向荣，小工业蓬勃发展。解放区的这种兴旺气象，正是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指标。

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读了这段12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争取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中的话，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它既是对整个已开展土改地区形势的乐观总结，也是对即将开展土改地区的动员令，更是对国统区人民尤其知识分子的积极宣传。社论充分强调了自卫战争与土改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自卫战急切要求旺盛的革命精力，而土改恰恰可以提供这种精力；土改与自卫战结合得越好，两方面也都越有成绩。当然，社论也从全局角度出发，承认土改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各解放区土改不平衡，还存在“翻了个空身”或“翻了半个身”的现象。这固然也在于各地客观情况不尽相同，主要却决定于各地领导机关与负责干部是否认真执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及执行中是否采取群众路线。社论充满信心地宣告：务求春耕前基本完成解放区土改，准备来春大生产运动（《解放日报》1946）。此时社论的基调仍是认为许多地方偏右或明“左”实右，不利于更深入发动群众土改。

但社论的宣传考虑与实际工作自然存在距离。47年1月冀东开始赔偿中农土地。10日冀东区党委决定以土地债券的方式赔偿中农之被侵占的土地，并经当级农会评议救济部分地主（中共冀东区党委1947a）。20日冀东行政公署发布指示，明确指出该政策并非放弃基本群众，而是为了“巩固贫农抗属既得利益，加强中贫雇的团结，确保农民优势，并照顾被斗过苦的富农，及被斗后不能维持生活的地主”（冀东行政公署1947a）。

与此同时，1月底中央派考察团帮助出现过左偏向的晋绥解决土地问题。2月中央政治局开会部署土地复查。但这并不代表土改走向缓和。在1月10日中央转发的刘少奇信函中，刘已

流露出对土改不彻底的怀疑，指出出现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与贫农平均分配原则上相对抗：“在这些分配下，引起农民不满的地区，是否应提出重新分配的口号？或只实行个别填平补齐即可？重新分配办法应在何时何地提出为妥？”（刘少奇 1947a）

## 五 妇女的发动

47年2月中央专门就发动妇女参加土改并广泛收集发动经验发出指示，指出土改中领导上“应主动及时地加强发动妇女参加，发动得愈多愈普遍愈好……使受压迫的妇女大翻身，打破数千年来在观念上及社会制度和习惯上的封建束缚”（中共中央 1947a）。

我们先来透过韩丁和柯鲁克夫妇的笔，了解当时妇女参加土改的情况。在十里店，起初开会时女的还是单聚一堆，带着鞋底来纳，甚至连纺车也搬到会场。在串联建立贫农团时，提名女候选人的资格要求有四点：勤劳、品德端正、会与人相处以及热心为人民服务。显然，前三点是妇女的传统美德，只有最后一点是新时代的要求。征求意见时妇女态度大多很消极：“象我这样的妇道人家，做不了啥，也坏不了事”；“你们男人想着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女人家不大懂这些事”。少数妇女当选贫农团委员，但并非因为政治活动的能力和表现，而只因具有温良、顺从和勤俭的传统美德。即使此后常无人通知其开会，她们也乐得清闲。原妇女主任因“行为放肆”靠边站，使她们深信“在公众活动中无所事事是一种美德”。女工作队员艰难召集起选举农会妇女部的大会，但选举资格迅速变成看谁有时间。婆媳关系有所改善，但男人依然蔑视女人。只是在调剂房子时与会妇女特别多（柯鲁克夫妇 1982 节 6-7、11、23、26）。显然，相较选村干和分土地，自己朝夕操劳的灶台、猪圈的归属更能引起妇女们的兴趣。

张庄的情况似乎较好些：几个主要村干的妻子最先组织起妇女会，通过“诉苦忆苦”，发现自己所受苦难比男人还多，自信控诉起来不会比父亲和丈夫差。但丈夫和婆婆强烈不满，指责她们伤风败俗。随着妇女开始学习下地干重农活及土地分配办法改变，妇女地位有了真正的提高。贫农家妇女活动相对自由，麻烦小些。她们都觉得在一起干活有意思，“大家呆在一起，闲聊、学习、唱歌，长夜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劳动效率也较高”（韩丁 1980 章 16、19、22）。

当时农村随着土改的开展，甚至在妇女积极分子内部对妇女本身品德的评价也在发生变化，干部的更迭有些类似于男性中老年干部与新干部的交替，只是没有那许多暴力：

运动初期，先出来的妇女，多是比较活动能说会道，生产不怎么积极，有些男女关系，因为她们顾虑少，敢干，积极，易接受新的事物，因此她们开始被选为干部较多。但经对群众多次教育，与妇女运动深入之后，正派老实的，积极生产劳动的妇女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当选为干部。她们在工作中表现积极负责，作风朴素，威信很高（冀中妇委 1948）。

贾秀英是西村著名的妇女积极分子，这位雇农女儿自称打小就天地不怕：

那不岁数小嘛，啥也不会干嘛，在家成天过穷日子，吃糠咽菜，哪会干炕上活计？过去自个做鞋，纳鞋帮子，纳底子。不会。婆婆净往手上扎：“这笨！这笨！”，气没少生。那阵儿生气我没怕。那不解放吗？那不妇女开会吗？开会回来就骂我“积极么！”我说“不积极点中？年轻人不积极点？”顶嘴呀。一般人不敢呀。我一小就不是玩意儿。我是有理的事不怕，没理的事不做。我就这样，敢跟人家开会。实行剪发，我先把头发剪了（按：因剪短发曾被日本人指为女八路，被揍）（您还记得怎么召集你们开的会，谁找的您呀？）那有通知呀。那时候县里妇联刘主任不是来组织吗？开会还有点秘密的。上各家院里开会，有媳妇、有闺女。讲这解放的好处。我是48年入党。那阵子就公开了，就解放了，就土地改革。我那时候知不道啥叫入党，我说啥叫入党呀？我看你够了入党条件了。那他们找人干点啥，积极肯干，家里有时候有点小过节不怕的那个。就这么着。好比我开会回来了，“做啥去了？”我说开会来着。“开啥会？”我说开啥会那就告诉你了？“你不怕，你还真行！”知不道让你参加入党呢。

不过她也承认，当时积极的妇女毕竟是少数：

土改那阵儿要说女的积极的还是不算忒多。有几个姑娘来着，出门子了。姑娘家管的人少

点儿。媳妇家管的人多不是？象我这样的媳妇没几个。有个媳妇积极，婆婆要喝毒水寻死。儿子媳妇开会去了，那过去年纪人都生气不是？怕外头出啥事儿。之后是媳妇吃过饭起出来，也死了。林起友的媳妇那时候挺积极的，贫农团的组长。

东村的动员情况也差不多。据先后当过东村和黑驴沟土改妇女干部的周国珍介绍：

妇女那不是咱们自家找，咱们找找不来。那都是区里在这里开会，给你选的。东村那时候仨妇女委员，一个组织委员，一个宣传委员，还有一个支委，就顶副主任。四个全是姑娘。

不妨详细分析一下50年后对西村一位普通妇女的访谈。被访者刁凤兰，1917年生，14岁嫁入西村毛庆家，毛死后改嫁贾秀英兄、当年诉苦典型贾进田家。

问：您那时候参加过大会吗？〈想由开大会具体场景入手，从“日常生活”过渡到土改〉

刁：我参加过大会。就在大院里开，不搬凳子，站着时候多。白天、晚上都有开的，我晚上不去，有孩子没法动弹。全村都去，那阵儿人少，我觉得也就一百口。〈夜里得在家看孩子是许多妇女现在的说法〉

问：有外头来的人吗？〈想提示对于工作队之类外来人的回忆〉

刁：也有外头来的人。

问：记得斗地主吗？

刁：斗地主记得，问我咋斗的我说不上来。

问：喊口号吗？〈提示具体细节〉

刁：那年头多了哪还记得？好象是喊口号，一招呼都去。也兴自各去，有女伴，也兴和当家的去，没准——那阵儿庄里有限的人。

问：打地主吗？

刁：打地主来着。

问：打得狠吗？〈面对这样的被访者，许多时候我们被迫采用这种不太好的逼问〉

刁：有打得狠的，有打得不狠的。

问：您当家的打得狠吗？〈毛庆当时属新干部力量，见下〉

刁：那人多我哪看得清？

问：您看得心软吗？

刁：（笑）那地主我也不理会。地主啥的也挺恶的。〈下面会听到别人对此更明确作答〉

问：还有外来的人到过您家里吗？〈进一步提示对工作队的记忆〉

刁：——那事儿我都忘了。

问：开会时候您都跟谁在一起？〈提示对于开会时自己表现的记忆〉

刁：开会时候都是女的站在一起。也有拉咕也有不拉咕的……

问：后来这些运动您还参加吗？

刁：一般都是男的参加。儿子他们大了，都参加。

问：儿子媳妇您让参加吗？〈当时许多婆婆不让媳妇太积极，“抛头露面不顾家”〉

刁：我儿子媳妇也参加过加，那咋不让啊？〈“参加”属于“字儿话”，就是场面上的官话〉

问：法大纲那会儿庄上有哪些女的比较积极啊？〈了解妇女积极分子对一般妇女的影响〉

刁：法大纲那会儿——想不起谁个女的积极了。

问：没有妇女干部找您谈话？

刁：没有。

问：那您这一辈子好象也没受多大苦，就这么过来了？

刁：嘿，就稀里糊涂的反正，糊弄着能揭开锅来着。〈村民常用“稀里糊涂”和“糊弄”总结生平〉

问：我们庄上有特别苦的吗？〈以下提示对当时诉苦的记忆〉

刁：那——有。

问：听拉过吗？

刁：我也没听拉过。我有多少年没参加了？〈后半句及下句是许多村民尤其女性的“遁词”〉

问：当家的回来不说？

刁：当家的开会回来就拉倒，也不念叨——年头多了，啥都忘了。岁数大了，记不清。

这段访谈几乎问到了所有与土改高潮时重大事件有关的问题，但勉强得到的回答都缺乏具体信息，甚至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被访人在顺着访谈员的问题做是与不是的机械回答。这其实是许多上年纪了的村民尤其女性的典型反映。是老年记忆的昏愦？年代久远的淡忘？自觉敏感的回避？还是当时情况的写照？都可以做一思考。

再来看一段对林白氏的访谈，林白氏 1912 年生，15 岁嫁入西村，丈夫林凤曾任贫农团副主席和人民法院副法官（即副庭长）。她比刁凤兰年长 5 岁，细节却记得更多。只是在侍候一旁的儿媳看来，婆婆许多东西原本就没闹明白，上了年纪就“更完了”，屡屡代向访谈员回答：

问：法大纲时候的事儿还记得吗？

林：早不记得了。

媳：就是分房子那年。

林：没分房子，没分。

媳：怎么没分？我还看着过法大纲后分房文书呢，分的是钱家光的房子。

林：那不算是分的。

媳：其实是当时串房檐，住在林奎的西厢房。钱惠媳妇过来（钱惠儿子钱家光是我婆婆干儿子），对我婆婆说“大嫂，你们别串房檐了，你搬我们门房去吧。”她们门房当时开面铺。

林：那就是嘛，不是分的。

媳：那就是土改时把钱惠他们给分了，就势就把那房子分给你了，绝对是这么回事。

林：反正是从大院搬到那儿的，我早就忘了。

媳：那也算分给你的。

林：那咋说，文书没了反正是。

媳：（对访谈员）为啥她说房子不是分的呢？是她那房子原来住的一户富农家里，人家都是看透形势了，知道要是不给她们住，土改了也得分出去，就把她们招呼进去了。土改就势就分给了她。她还总觉得是人家给她的，还留出一间给人富户做走道的地方。她就住这两间房子，还挺心满意足的，说人家给我房子住啊，一分钱没要啊。

被访人对于土改其实有许多具体的回忆，尤其是认为与自己有关的房子、胜利果实之类（而不是谁上台谁下台，就此不妨反省：是否是对刁凤兰提问的方式和内容造成其“缺乏”记忆）。但她说的许多事情，比如此处房子的由来，比如土改后没饭吃等，在媳妇听来都是那么有悖常理，不符“现实”，于是被访人的记忆被看成老糊涂后的乱想。林白氏于 98 年我们再次入村前去世，至死想必也认为房子是富农让给她的，虽然她在这一点上没有公开发言的权力。

## 六 掀起复查高潮

就在刘少奇疑虑土改是否过于温和时，2 月 18 日薄一波向中央报告晋冀鲁豫区填平补齐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刘的问题：

（一）深入查田、查阶级、割封建尾巴（消灭封建残余），清查遗漏、隐瞒、干部包庇和假买假分，做到彻底取消地主这个阶级。（二）干部、积极分子、民兵占取土地改革果实过多部分，采取各种方法令其退出，分给赤贫和贫农。（三）贫富合村，贫富村联合斗争，平分土地，达到消灭赤贫和贫农。在填平补齐运动中，对地主追究运动极猛烈，土地、房屋等公开财产全部重新分配，地下所藏的现金、衣物、器具等亦全部追出（发生了打与杀的流弊），填补了赤贫和贫农。对地主则先行扫地出门，然后由群众民主评议，赠送一些坏地、坏房以示宽大。对自私自利的干部、积极分子和落后群众，包庇地主替地主隐瞒财产，发动了广泛的挖“防空洞”运动……并采取换平办法，按远近地、好坏地、水旱地折合搭配，依全村人口土地比率一

律平均分配（干部与群众同）。

薄的报告的特点在于明确宣告：不要怕“左”倾，要坚决追查。干部要“洗脸擦黑”。“团结互助大家翻身”。“填平补齐运动实际就是重分，不过不叫重分”。当然也得考虑困难：

关于转入生产的困难，主要有五点：一是怕富、怕斗争、怕割韭菜，不敢发家致富，这是由于过去数年每年春天强调生产，秋后挨斗争所致。二是怕负担，因为负担很重，有的群众甚至因此不愿意分土地。三是靠斗争吃饭，不事生产的二流子思想。四是有许多贫、雇农，虽然分得土地，但牲畜、农具甚缺乏，困难未解决，政府贷款不够用。五是支差多，战争勤务繁重，妨害生产（薄一波 1947）。

生产上的困难可以解决，重要的问题则必须搞彻底。中央此时不仅赞同这种形势，而且号召各地向晋冀鲁豫学习，干部不要拖群众后腿。刘少奇指出：事实证明最近土改中群众常跑在党的领导机关前面，党的领导甚至常阻碍群众。必须迅速纠正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刘并肯定：为了满足农民要求，必须动富农利益，但需谨慎注意中农反应。鼓励各级领导让农民自己开会、选举，接管政权，实现其民主权利，并借此改造党组织（刘少奇 1947b）。

2月底冀东区党委召开土地会议，区党委民运部长阎达开逐一总结了已有运动的各个阶段，以及各分区的各阶级动向。在谈到打击中农问题时阎指出打中农有左右两方面的原因：

有的地方打中农多，打地主不厉害，这是右的倾向，另外村穷土地少，搞了中农，这是很容易发生的情况，如铁厂压着不让起来，但区干在集上向村干随便说了一下“土地改革了”，未等讨论传达，结果20多村中农被打，有的因解释工作还差，中农自动出来的地也不少。被打的中农不少伪人员保甲长，从成份上看大部属于富裕中农（47/2/28）。

问题未解决透彻，这是上下各方的共识。但原因何在，该向哪个方向解决，却从一开始就不甚统一。情势不定之下，3月初冀东区开始组织工作组进行复查试点。4月1日冀东行署发布土改复查布告，重申一切中农（含富裕中农）土地不得侵犯（冀东行政公署 1947b）。18日冀东区党委宣传部长张达在作复查动员报告时指出农民政治上还未翻身，大部分地主气焰尚未搞垮；号召基层干部和工作队员多看“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1947）。

4月25日15地委强调在复查中进一步巩固基本群众优势。首先是抓紧群众迫切要求，深入启发阶级觉悟，“使群众对每件苦事都有深长的回忆，并使此类事实不断的发现与增加，务使其改变原来的定论，提高其革命认识，这种群众性阶级觉悟，一定真正做到大多数，并经一定指导机关的认可”；其次是在多数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启发群众斗争性；第三是组织与发动群众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要在群众运动中让群众自己选出领导，又得避免新领导脱离群众，须贯彻在运动中整理支部的方针（中共冀东区党委 1947b，黑体为引者加）。很明显，复查绝不只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5月1日，15地委就执行区党委复查决定指出：目前党内基层非无产阶级意识相当浓厚，“由于我们这个地区党的大量发展是从民族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大部党员民族意识很强，共产主义思想比较差”，故须整理党支部（中共冀东区第15地委 1947）。

4月底复查试点结束，典型调查结论扭转了县委最初基本完成土改、复查无多大问题的认识。就此县委初步检讨：前段运动声势虽浩大，但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还很远：

有些奸滑地主，主动拿出土地缓和群众斗争情绪，掩盖群众阶级觉悟。也有些村干部阶级觉悟差，在地主收买拉拢下把群众斗争压下去了。更有些村只着重斗争素日行为不正者，没有从封建阶级剥削出发，反而给地主留下空隙，趁机挑拨，扩大事实，掩盖其本身罪恶，还有些村认为是山沟穷村无地可斗，根本未动（中共归远县委 1947b）。

5月8日《冀东日报》发表了这篇检讨，试点经验始向归远全县推广（参鲁文曾 1990b）。

5月6日朱德、刘少奇指示：冀东土改已获伟大成绩，但还未彻底，地主还保留过多土地财产，富农土地一般未动，无地少地农民要求仍未满足；为尽可能最大限度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应学习太行山经验，完全割掉封建尾巴。朱、刘不仅鼓励冀东继续朝着激烈方向推进土改，且自承以往犹豫不必要，对地主过软（朱德、刘少奇 1947）。但仅过两月，刘就在一篇讲话中反思自己此时认识也有偏差，至少未能充分强调各区域具体情况：老区平分土地得利户实际仅

20%；而受损失户也有20%，油水不多（不过几石粮食几件衣裳），农民斗争情绪不高。故不可能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新区则不同，参加运动人数多，改革对象又有东西，自然轰轰烈烈。故油水多不多影响着运动是否轰轰烈烈，而绝非所谓新区群众进步，老区落后；绝非新区主观领导上比老区好。这显然是提醒老区各级干部勿出于种种善意的热情甚或一己争功私利而追求火爆的运动表象：在老区“硬造高潮就会出乱子”。但纠偏也要控制火候，毕竟发动群众运动最主要：“过去左了，但不要向外宣传，叫得厉害，按新的方针作就对了”（刘少奇1947c）。

基层此时尚未料到此后变化。归远县接朱刘指示后即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据后来总结：贫雇农情绪空前高涨。斗争局面很快打开，但某些领导、工作队和运动骨干误将放手发动群众当成群众说了算，故运动中出现放任现象。直至7月地委明确提出杀人须经批准：

当时的形势是穷人要翻身，土地要还家，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杀人者偿命，欠债的还钱。群情激愤，斗争情绪越来越高，范围也越来越大，没落地主、富农、“狗腿子”、地痞流氓等都在被斗争之列，这时打人较为普遍（鲁文曾1990b）。

5月底冀东全区开始推广复查五条经验：1、运动中对一般村干部说服教育，加强思想改造，促其反省，转变作风。对少数投机流氓分子和背离政策犯严重错误、脱离群众的分子则应坚决洗刷；2、在斗争中培养选拔真正劳苦的工农为骨干，防止流氓异己分子混入领导机构，注意新老干部团结；3、斗争前启发觉悟靠诉苦，斗争胜利后团结则取决于合理分配胜利果实，运动中须紧抓这两个中心环节，警惕反革命分子异端挑拨离间。对流氓应采取批评教育改造的方针，防止仇视与放任的两种偏向；4、运动中应不断进行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加强领导；5、运动中应鼓励农民积极生产（《冀东日报》1947）。

试点总结完毕，6月下旬归远开始普遍进行复查。各村相继成立农会，组织斗争地富。28日李楚离在党校作报告，指出凡能“作为封建剥削工具的一切物质资料，如土地、房屋、高利贷与利用封建积蓄而开设的工商业等，统统搞掉，丝毫不留，要在经济上彻底搞垮封建势力”（李楚离1947a），显然对中央文件加上了自己过分积极的理解。在这等精神指导下，7月下旬县政府召开城乡农民代表会议，与会代表一致表示积极参加城内对敌清算复仇，大会在“天下穷人是一家”口号下成立城乡联合斗争委员会，在城内照搬乡村土改复查做法，斗分工商业，严重违犯中央工商业政策。<sup>60</sup>8月1日冀东区党委就此指示各地在清算各斗争对象的工商业财产时要避免市场停顿及某种破坏现象，不过仍然明确指出：

作为群众运动的结果，发展到清算土豪恶霸、地主、封建富农须以其工商业财产作为偿还农民债务时，我们对农民此种正义行动，应坚决予以支持（中共冀东区党委1947d）。

7月8日冀东行署抽调千余人组成工作团，团长李楚离，进驻归远二、三区搞复查试点（当时冀东区党委设在归远）。工作团要求每个工作队员进村一周内须交一名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朋友，再逐渐扩大，组成贫雇农小组，成立农会，接管村政权的“戳子”，吸收进步中农加入农会。在此基础上召开诉苦会，经反复诉苦，让每个贫雇农把过去受剥削受欺压的苦水全部诉出，以便很自然地揭示出斗争目标。然后再组成人民法庭加以公开审判（鲁文曾1990bP38）。

工作队进村扎根决定了这场运动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斗争。以十里店为例，工作队进村当晚即召开大会，台下心态各异：有的不安，怕搞到自己身上；有的渴望，又有机会得地了；有的淡漠，以前也没得着什么；有的期待，可以报私仇了；有的世故，说又要乱了。会上向全体村民逐一介绍将为他们撑腰的工作队员和此前一直秘密的村党员。党员公开给这些老革命造成了很大压力。一党员惴惴不安：“人人都夸毛主席领导的党。当他们发现我这样的人也是党员的时候，也许会笑话的”。工作队很快发现以组开会比单独访问好，有利于产生安全感，相互打气、启发。小组会上队长启发大家，为何没翻身？有地主、干部。为何我们不行？因没组织起来，干部也不好。动不动中农？不动，要不没人好好干活。从哪儿动？斗得不彻底的地主及

<sup>60</sup> 归远县城商号259家，复查前仅剩163户，复查时被斗109户，复查后营业58户（鲁文曾1990c）。抗战以来冀东工商业日渐衰落，48年6月统计商号数较复查前减少31%强，较抗战前减少61%强，且规模资金极小。各地集市萧条，运输不畅，业民生活困难（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0P426-33）。

其“防空洞”（斗争时替自己亲戚或地主收藏财物的人），多得果实的干部和军属，再就是和所得超所需的中农“商量”。组织起来，谁来领头？有说只要给权力，有说敢拼命但没本事。“只要你们不走，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但只要你们一离开，我们就又没有主心骨了”。群众在鼓舞之下揭发了许多现任村主要干部劣迹。但工作队认为鼓励群众议论党员干部是为揭露问题而非制造对立，勿被群众对个人性格、生活细节的批评牵过去，要看阶级斗争中的大局表现和政治观点。过去村里几大干部说了算，很少开会。无论党下什么指示，党员干部都只是组织少数积极分子来完成。而今则必须全面、真正地发动群众（柯鲁克夫妇 1982 节 2-4）。

李楚离在工作团队长会议上做总结报告时充分赞扬了群众发动的成果：“基本群众觉悟程度提高，有恃无恐，敢于向一切黑暗势力做斗争”；同时重点谈了诉苦活动中存在的缺点：一是缺乏明确阶级内容，矛盾欠集中；二是启发贫雇农阶级觉悟不够，“我们在诉苦运动中不是去听故事，乃是要具体的启发与引导诉苦到主要的反封建的阶级矛盾上去”；三是算帐时要分清阶级性质，不能全盘否定雇工，否则将永远停留于小农经济；四是扩大己方阵营，孤立地主。同时他也强调：既要防止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避免阻碍群众运动；也须防止少数积极分子脱离群众的孤立行为，避免做群众运动尾巴。“在目前贫雇农的政治资本异常雄厚的情况下”，要注意其孤立主义倾向（小农报复性与狭隘性）（李楚离 1947b）。刘慎之在会上也指出：诉苦中若不通过启发提高其阶级觉悟，将农民内部问题引导至阶级问题，则可能引起分裂乃至内部斗争。他还针对基层斗争中火爆现象指出：处决人和扫地出门皆须 92% 同意（刘慎之 1947a）。

7 月 20 日冀东区党委给归远县委发出长篇指示信，对许多重要问题作出代表性的阐述。

首先，积极分子应主动团结落后分子参加运动，学习其积极生产（落后分子多系富裕中农和中农），不能说其政治上落后甚至顽固：<sup>61</sup>

关于执行“争取分化政策”的问题，地主阶级与汉奸敌伪为了加强其统治，曾迫使或引诱过一部分农民为其当过傀儡，执行过村正副、乡保甲长的职务，或为他们跑过腿，服过务，赚过他们薪水，受过他们的提拔，或在抗日时期被迫暴露过革命秘密，有一些过失，但他们之中大多数并无大的过错，并且大部分已成为过去的事，各地应公开宣布一概不予追究。

即便有重大错误或悔改不够的也要积极感化，不能推向敌人，还要看到他们身上农民的一面。如此方可得到全体中农的同情和满意（如李楚离在工作团队长会议上所称，不能动腿子（主要是贫雇中农）个人财产，尽量减少逃亡、自杀或策应敌人，这是一种斗争策略）。

其次，运动进入高潮时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须团结中间份子。县政府应明确宣布没收地主（含经营地主）黑地，农民黑地归农。地主逃避合理负担者追算，农民过去未出合理负担者豁免。没收黑地和清算出的粮食应明白宣布分配给雇工及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含农妇）。指示信特别提出地主分四类，在政治上和斗争策略上要区别对待，收回土地，控制动向，不让跑到反动区去。“恩威并施，先威后恩”。避免群众被地主假开明献地所惑。

为避免政策上一刀切造成过“左”或右的偏向，指示信列出一系列详细问题要求基层逐一统计上报：全乡土地总数；各阶级人口和占地比；基本群众现得地数、可从地主处拿回土地数及还应从富农处拿回土地数；基本群众是否在土地上翻身；地主生活能否维持等。这些情况县、区皆应掌握，以便掌握解决土地工作的左右深浅，继续推进或在适当时机下转变工作环节（中共冀东区党委 1947c）。这等要求可谓用心良苦，但事与愿违。群众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干部和村庄中积极分子的热情一旦鼓动起来，上下催动，交相呼应，势不可挡。

7 月 30 日归远县委开会总结前段复查，要求全县复查和区党委复查试点同时结束。10 月 15 日归远二、三区土改复查试点结束。据正史总结：斗争中虽传达了朱刘指示，但因某些同志片面理解（按：如前所示，实际是指示本身的问题），加之发动起来的群众对地富仇恨已如干柴烈火，压抑不住。斗争偏离政策，趋向一律“扫地出门”，“有的连说带打，气愤至极，一

<sup>61</sup> 47 年 8 月 15 日《冀东日报》（魏宏运 1996P125）：有贫雇农小组讨论团结中农时说：“什么是共产党，咱们穷人就是共产党，工作组是咱们的军师！”有人说贫农是共产党，中农是国民党。一老大爷说：“管他中农又是什么党呢？反正咱们团结起来，中农也就来了”。

人喊打，大家一齐上，以致有的被打死”。后又出现“国特”案，在县西部地区很快扩展，“一旦被诬陷，不承认就严刑拷打，甚至用烙铁烙”。被诬陷者逐渐从地富到贫农甚至工作人员。后经冀东区党委核实皆为“屈打成招”，不了了之（鲁文曾 1990bP39）。

## 七 法大纲出台

在基层运动如火如荼、成果卓著并出现过火现象的同时，中央也在努力加以正确引导。7月17日至9月23日，中央工委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在代表工委向中央报告会议进展时指出各地农民有四大要求：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其中土地与民主又是基本要求，而民主更是保障与巩固土改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全体农民向我和政府的迫切要求，原因是我们干部强迫压制群众的作风，脱离群众，已达惊人程度，其中贪污自私及为非作恶者亦很不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作风并撤换与处分那些坏干部”。

<sup>62</sup>民主被提到最高地位。刘重点谈了运动高潮中村干、上级、工作队与群众之间的诸种矛盾：

区、村干部多年未改选，大多是完全不对群众负责，不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强迫命令，其中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以前是贫雇农者由于当干部，现在大多成为中农或富裕中农与富农，他们得罪群众，怕群众揭发报复，因而更要控制恐吓群众，有人批评他们错误泄露其黑幕者，即予以打击，他们大多不当兵，不服抗勤，负担较少，降低自己社会成份，而以当兵，派抗勤，出负担，订成份去打击其反对者，照顾其拥护者，选举开会完全包办，村干部有的分成二、三个宗派，互相反对，轮番上台，但各派作风大多一样，群众则是中立的、冷淡的。少数最坏者则为新恶霸，各种罪都犯。脱离群众最甚者，常为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

刘少奇不得不承认，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有时甚至超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

此时群众中则常有过分主张与行动，强迫村干到大会坦白，不彻底者穷追，并加打骂、扣押，有仇者报复，夸大罪过，此时领导如不能有效说服群众，并组织法院接受控诉，上述主张即得群众赞成，发生打人、押人等事。干部亦有在群众行动下逃跑与自杀者……有些村农民坚持先斗村干，再斗地主。

如此情绪之下，老干部、群众和以工作组为直接代表的上级之间势必互相猜忌，恶性循环：

当农民起来撤换村干，特别群众中有过左行动在大会斗了某些村干，打骂、扣押及自杀逃跑事件发生后，影响极大，四周贫农及不满村干部就欢喜，并派人来请工作团，向工作团告状。另一方面，干部大哗，有的意见较好，只要求不在大会斗争，弄清是非轻重和责任，有的意见则根本反对，强调村干功劳，强调上级责任，问党是否还要干部，并威胁说，如此下去，既无人敢当干部，公粮、扩兵、抗勤等任务，将无人负责，卸了磨子杀了驴，悲伤、恐惧、躺下怠工、不管工作，并造作许多谣言，向上级反映……有些干部准备工作团到他们那里时，即逃跑或进行联防自卫，逐渐形成有组织的非法抵抗，并有训练班数十干部到自杀者坟上烧香、示威、叫口号，村干部如得上级干部撑腰，则胆量突增，不向群众屈服，并敢于作一切非法抵抗……将来整个发动，如无正确领导及周密准备，必致发生重大事变，地主及反革命分子与宗派斗争，均可参加进来。

一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改组基层组织，更好地推进土改；另一方面又不能放任自流，失去对运动的控制，刘少奇颇有些左右为难，认为唯一有效方法即借助贫农团和农会：

---

<sup>62</sup> 李楚离 1947b 指出：过去村干脱离群众在冀东是群众性而非个别的。47年2月归远县委检讨干部领导方式，指出各基层（区级尤甚于县级）存在事务主义、打骂群众现象；“对干部使用多，教育少，指示任务多，帮助办法少”；忽视干部学习及总结交流经验，政策水平没能在工作中很好提高；对村干的领导“缺乏耐心的说服教育，体贴困难，多给下级想办法的精神，工作完不成单纯逼……把强迫命令不民主的坏作风带到村干中去”。县委提出须注意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的结合，建立检查、汇报、总结制度（中共归远县委 1947a）。这其实也体现出上级和基层干部普遍面临如何协调常规管理与发动运动高潮的问题。

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并造成树立民主作风的条件，但这个方法，又是如此激烈的一个斗争过程，若在全国实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

因此他建议全党确定方针：通过贫农组及农会发扬民主、完成土改，并改造各组织及干部：如有党的组织和干部不能有效执行此方针者，即由上级组织派遣工作团直接执行此方针……为避免在运动中群众随便打人、杀人，派可靠干部在各地普遍建立人民法庭，接受群众控诉，并加调查审讯，有罪者适当分别处刑……干部有否认、辩护、发表不同意见，出席、退席大会等自由权，并禁止打人及一切肉刑、在大会逼供等行为，群众在大会上对干部只有批评、罢免、选举及控诉之权……只有法庭才有权逮捕监禁。

最后他提出一点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支部中贫雇农占少数（试考虑出身受教育比例及华北特殊性），则支部如何（在运动高潮中乃至以后）领导贫农组和农会？（刘少奇 1947d）

以上我们之所以详细介绍刘的报告，概因日后有关整党、清理村政、处理村干等政策的基本问题、认识和方针皆已初见端倪。党的最高领导在土地会议上如此详谈这类问题，可以想见土地分配之外运动的实质与种种影响，下文对西村的叙述更能体现这一点。

9月5日工委就彻底平分土地问题请示中央：多数赞成彻底平分，认为简单迅速，但可能从约占人口5%的上中农那里抽出或换平一部土地（中共中央工委 1947a）。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其中下述内容较为关键，可对比五四指示有关内容的措辞：

废除一切地主土地所有权；由农会接收一切地主土地及公地（除另项规定外），连同乡间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统一均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乡村农民大会、无地少地农民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各自选出的委员会为土改合法执行机关；农会接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一份；分配之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改前地契及债约一律缴销；对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交由农会或农代会选举及由政府委派人员组成之人民法庭审判及处分；应由乡村农民大会或其委员会指定人员负责接收、登记、清理及保管一切转移的土地及财产，防止破坏、损失、浪费及舞弊。禁止任何人任意宰杀牲畜，砍倒树木或破坏、偷窃、强占、私下赠送、隐瞒、埋藏、分散、贩卖各项物品；政府切实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一切干部，有全权得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一切干部；此前土地业已均分地区如农民不要求重分，可不重分（中共中央 1947d）。

刘少奇在会议结束时号召大家勇于承认错误，用运动的眼光看待运动：“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是会有错误的……运动发展过程证明总不是那样完满，原来的决定总会需要修改，甚至有根本的错误”。他总结土改不彻底主要有三点原因：指导政策不彻底、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领导。当然，他马上又肯定作为总体指导政策的五四指示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的和平要求，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的土改要求。党内不纯包括“党内小资产阶级自发性的弥漫，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组织上混乱等”。因基层党员中混入不少地富成分者，党内阶级路线、观点模糊，使土改不能彻底。而官僚主义即所谓“雷厉风行”，强迫命令，不发动、启发群众。他就此为前段运动中出现的偏向定了性：

党内思想斗争以反右为主，防止左倾。特别是在贯彻平分土地政策的情况下，左倾情绪在党内、群众中有很大的基础。这就是流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投机性；有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怕别人说右，故意搞“左”；党内还流传着一种“左”比右好的观点（刘少奇 1947e）。

10月9日中央指示工委与晋察冀中央局，告知《法大纲》将于次日公布，指出“从报上登载至传达到乡村当在半个月以后，似不至影响种麦，如中央局认为可能发生影响，可以推迟若干天发表”（中共中央 1947b）。应该说，如何有利于保障和发展生产、清理与健全组织一直是中央在制定和推行土改政策时考虑的重点，但为何到具体执行时便偏于纯粹的斗争，除了组织机制上的某些特点外，村庄内部的阶层财富分布和权力机制也是极为关键的因素。

10日中央正式向全国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决议指出：中国土地制度极不合理。一般而言，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80%土地，残酷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有约20-30%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因此必须根据农民的要求，消灭封建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也希望各地订出适合当地的具体办法（中共中央1947c）。

## 八 寻找偏向的起因

11月29日中央致信各地征求关于阶级分析的意见，重新发布两份文件。<sup>63</sup>信中明确指出：过去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项政策过左，但关于阶级成份的规定则基本正确。中央要求将两文件印发各级党委、政府、农会及土改工作团讨论，以纠正左倾错误：

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须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中共中央1947e）。

12月18日工委指示晋绥分局：纠正土改中“左倾”错误，必须“在纯洁贫农团组织本身及维护与中农团结的前提下，坚决树立与维护贫农团的权威”。<sup>64</sup>并有针对性地指出：

确定某人成份，应以当地建立新政权的若干年及抗战后实际的社会经济地位为标准来决定，而不要联系到很远的历史，更不要以今天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的好坏为标准来提高或降低各人的成份。尤其不要用故意提高某人成份的办法去打击旧干部（中共中央工委1947b）。

25日至28日中央陕北杨家沟会议制定纠正土改整党中“左”倾偏向的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坚决肯定以贫农团为村庄土改领导的正确性：为坚决彻底进行土改，须首先组织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作为土改合法执行机关，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不过同时须坚决团结中农，如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毛泽东1947）。31日工委更明确要求纠正左倾错误：不要追历史、查三代；不要有许多标准划定阶级；树立贫农团权威时“不要仅由少数人掌握的贫农团说了算”（中共中央工委1947c）。同日中央转发工委《关于农民代表会的指示》。

细加琢磨，此阶段纠正土改整党中“左”倾偏向虽已出现在各级政府的政策指示中，但到底是更多地依靠新建的贫农团来帮助清理原来的村政权和党支部，还是相对限制贫农团的权力，避免让在以往常规管理中发挥作用的村政权和党支部被砸烂或成为尾巴；“左”倾偏向最主要的原因是群众运动发动起来后失去控制的必然结果，还是成分不纯的村政权与旧干部名“左”实右的体现，上下各方对这些重大问题并不存在明确共识。在中央和中央工委艰难摸索克服“左”倾与推进高潮的平衡点的同时，基层斗争继续高涨，革命的热情与村庄内部某些权力运作的因素融合在一起，在斗争深入的同时渐渐产生了一种隐含危险的惯性。

11月11日到12月12日冀东区党委召开土地会议，传达土地法大纲，部署全区平分土地和整党、三查。<sup>65</sup>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到会。会上当场将一地委书记和一专员撤职。

11月15日，15地委专员常佩池在冀东土地会议上作汇报，坦承在整个复查中，冀东区上下各级对生产与复查孰为重、如何联系富农、是否赔偿中农等关键问题看法不一。报告直言不讳地描述了运动高潮初起时的局面：

<sup>63</sup> 即36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发之《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1981P840-51。韩丁1980章30：瑞金标准优点在于抓住每个农村阶级重心，说清了各阶级典型成员特点及其与生产资料特殊关系；缺点是没有规定出各阶级相互间确切界限，对如何区别实际生活中常出现的“那些非典型的介乎两者之间的事例，缺乏必要的精确性”。最重要的中农与富农、中农与贫农间差别恰恰很含糊，故中央在47年颁布补充文件，从具体剥削量、测算时间年限和出卖或雇佣劳动力的具体方式等方面作出便于计算的规定。

<sup>64</sup> 不妨考究其措辞：如按原意，此话的语序应倒过来。但强调的重点就大不一样了。

<sup>65</sup> 有关详情及对各专区执行政策中地富思想的揭露，见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0P371-6：《冀东土地会议胜利结束——深入四查展开思想斗争改造领导阵容十四地委方治平十三专员张振宇被撤职》，原载48年2月25日冀东区党委印《整党文件》，四查即查阶级、思想、立场、作风。

中农恐慌，纷纷要求入会。比如×庄因为中农落后，贫雇农暂时不要他，有的自己上了吊，有的自己把肚子弄开……这时农民对地主富农仇恨极了，每村都要搞死一个两个的。只要认为他是罪大恶极，就把他捆起来，到处是公审法庭。这时敌人组织一个捞尸委员会。说共产党残忍是因为蓟运河的死尸太多了。蓟县组织一个联村斗争是自上而下的十个庄公审，豪绅恶霸，一次即打死 20 多人。这些人打死对不对呢？今天检讨起来，没有错误的……有这样三条，第一条抗日的打汉奸，第二条是共产党打国民党，第三条是农民打地主……当时地主富农没处钻，情愿把全部财产拿出来只要留一条命。农民情绪极高。

常专员报告了一些具体数字：据 7 县统计杀掉豪绅恶霸 2321 名（自杀 66，政府处决 223，群众自行打死 2122），其中归远 250 名。阶级成分上，地主 721，富农 513，群众痛恨的中农和贫雇农（化形地主变成中农贫农的，含流氓特务）各为 302 和 134（按：原文数目如此，两项总和不等）。常专员在肯定这些人该死的同时，也承认中层干部的指导存在某些问题：

今天检查起来，这些该死不该死呢，绝大部分地主豪绅恶霸我肯定的说是应该的。但是这里有些严重问题。当时我接受刘慎之同志的传达，90% 同意打死就打死，没有想到如何经过群众反复酝酿，因此也有的是流氓操纵打死的……宝坻县下了个通知，说把国民党完全杀了。后来立即纠正了。只要打死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敢说不对，玉田十区区书回去以后，把消灭地主阶级当成都杀光……玉田县书周克刚问××同志杀人没有？他说没杀，周说“给我杀去”，回去一杀二三十个。虽是罪大恶极的，后来立刻制止。

报告充分肯定了此阶段的工作成就，同时也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总的讲起来这一段工作是轰开局面的，把地主资产阶级气焰打下去了，到处地主富农要求留条命。贫雇农优势大大巩固起来。但是个别例子说明，领导上的思想，以我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没有研究怎样执行 92% 的意见。公安局长问我杀多少人我去信说，**只要是 92% 的意见，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修改的权力**，很教条。严重的官僚主义。当时领导上斗争策略没有注意，这时流氓腿子搞起来的也不少……我们检查起来群众路线差，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很严重。杀掉的这些都是豪绅恶霸，人人共恨的流氓，该杀不该杀？该杀。如果领导上打招呼不一定死这么些（黑体为引者加）。

报告还谈到运动高潮的其他一些附带效应，如交粮很踊跃：“保甲长说，早交粮，早立功，复查过来留条命”；村内阶级斗争混入权力斗争：治安员“绑地主时他说，不是我要绑你，是谁非要绑你”；此外，扩军也不太有利，干部动员贫雇农参军，贫雇农却不太积极：

富农说，给贫雇农 2 亩地他不出来，你再给他说他个老婆他更不出来。咱们干部空喊保卫胜利果实……贫雇农还是不参加，结果就雇（常佩池 1947）。

几十年后学者如此解释此时及随后的极端倾向起因：抗战时农民对日伪大乡及保甲制度一律砸碎；解放战争时在自身握有权力情况下仍采用“砸碎”方式。而某些地方干部与工作队员的“放”与“纵”也起了很大作用。尤其开展“三查三整”并出现“左”的倾向后，一些干部与队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有些人心理失衡，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才保险，宁“左”勿右。群众运动过火后又怕“泼冷水”，不能调控群众自发倾向，“放”乃至“纵”，“轰开局面”，公开鼓动杀人（参魏宏运 1996P130）。

一周后常专员的搭当——15 地委书记刘慎之——又在会上汇报了冀东区工作团到归远二、三区试点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如旧村干阻挠、团内自身不纯、地富拉拢、基本群众不信任等。刘指出，据二、三区调查，地富成分和倾向地富的中农党员比例不小，且在支委和当权人物（支书、村长、农会主任、民兵队长、治安员）中比例更大，同样人数下发挥的作用要大于贫雇农。以往贫雇农在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中获得些好处，现要求真正翻身，首先要求打掉旧村干。<sup>66</sup>因为翻身委员会和支部还掌握在旧村干手里，所以贫雇农开始串联成立小组，其结果是：

<sup>66</sup> 刘慎之举出的干部表现及群众态度具体如下：163 名当权人物中表现积极 14，转变 16，一般 23，反对复查 110；当权人物中被群众拒绝入会 45，暂为候补 16，坦白 12，撤职 66，斗争 33，处决 10，当选村委 8，当选区代表 5（据刘慎之 1947b，两项总和不一）。

他就要干预国家大事了，要管村里的事情，把村公所戳子拿过来，过去的路条一概不算，今后由我们掌握，民兵得交枪，交给劳而久苦的，交给可靠的贫雇农，封锁村庄，地主富农不能跑（刘慎之 1947b）。

显然，“不能跑的”主要还是旧村干。说他们以往压在基本群众身上作威作福显然过分，但贫农团权威之确立自然存在与旧村干协调的问题。更何况此时在上面眼里旧村干很不可靠。在张庄所在的潞城，县委匆忙审查各村党支部出身确信，基层党员至少 40% 出身地富。县委把穷人没有翻身、命令主义、享乐主义和徇私舞弊等全归结到这一大批人的反革命阶级出身和破坏活动上。县委书记对即将下村的工作队员说“谁在村里找不到贫农，谁就没有资格吃饭”。在十里店，工作队对村里乃至中央局对太行区的党员干部的估计都很低，认为贫雇农翻身不彻底系因党员干部的地富思想作祟（韩丁 1980 章 27；柯鲁克夫妇 1982 节 13）。

最后来看看复查试点的斗争成果：两区 34 村统计地主共 170 全斗，富农 451 斗了 405，留待处决人犯 46；群众打死 35，自杀 35，枪决 67，共 137，内土豪劣绅 112。37 村拿出 14772 亩地，村均 4 顷；34 村斗出房子 2102 间半，村均 60 间；30 村斗出粮食 2962 石，村均 90 石；30 村斗出牲口（骡、马、驴、牛）355 头，村均 10 头，如完全解决贫雇农无牲口的，一人一腿才十家；35 村共搞出 18993 件衣服，村均 500；31 村搞出农具 4253 件，村均 100 多，耢子 390 件，村均十二三件。罪大恶极者被惩办，封建势力被全面摧毁（刘慎之 1947b）。

## 九 该怎么诉苦？

刘慎之的报告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深入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他指出，贫雇农以往受旧村干压迫是一回事，工作队以诉苦形式引导他们认清阶级压迫又是另一回事。但诉苦一旦发动，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反应：“由于贫雇农受苦惯了，还没有觉悟以前，感觉着没有什么，由于我们启发引导，诉起苦来，开始由他生活诉起，诉苦中，有这样表现：有的以苦为荣，谁在村子有苦就吃得开，谁有苦，谁受罪，有苦吃得开，道德观念变了”；讲个人英雄传，讲来讲去还是认命，工作组于是启发地主才是穷根，“所以在诉苦当中，很自然的把斗争目标拨出来了，诉到义愤填胸就转入对土豪恶霸的控诉斗争”。

群众内部对诉苦也反应不一：中老年妇女“诉的最为深刻、细致。特别在封锁妇女（原文如此），哪年哪月什么时候，回忆的特别深刻，年青的感觉：‘诉什么苦，和他们干吧！’有点不耐烦，老年诉苦，教育了他的子女，晚一辈的青年，拿起武器来革命”。但只要是通过诉苦提高了贫雇农政治地位，树立了民主习惯和主人翁感。就属于“群众自己的诉苦”。

“还有的诉苦，是给工作团诉苦，非有工作团在这里不诉，‘同志给我记上！’未诉先哭，每诉必哭，每哭必大哭；有两口诉苦，男的一诉就哭了，女的不哭回去就打起架来了，说：‘有工作团在这里，诉苦你不哭，让工作团看着好象咱们没有苦。’所以是为工作团诉苦，这样就没有劲”。有中农为多分果实而诉，有工作队员开会时强令诉。还有群众和工作队员混淆诉苦和提意见：“咱们诉苦给谁提意见，明天好斗，过去你打过我”。

当然，这等诉苦是走了样的，不是长年作牛作马的劳苦百姓的主旋律。如这类诉苦居多，只能说明负责动员的工作干部的无能。刘慎之总结的经验是：进村伊始就搞控诉，普遍性群众运动很难发动，受间接压迫的，受剥削不明显的，不易起来，只少数人和积极分子起来，没有广大群众，故诉苦是提高群众阶级觉悟、阶级仇恨很必要的工作。而且这里还有个微妙的团结中农问题：贫雇农怕中农脑筋活，夺领导权，多分果实。工作队员扎根在贫雇农家里，也有些讨厌中农：“贫雇农在诉苦中有了政治资本，提高了地位，占了优势，很吃得开”（刘慎之 1947b）。

看看西村村民对访谈员提出的诉苦问题的反应。朱柱年纪虽轻，照例说得有谱：

贫农团里头有主席、法官、委员。就跟现在演的刘罗锅似的，要是批斗地主富农了，法官和主席就得坐在正座上，掌握着贫下中农斗地主富农。有冤的申冤，有屈的诉屈。就讲土改的

时候阶级复仇。诉苦就是我给你扛活，给你放羊，给你干得那么好，压工资，他不好好给我，黑着我。我没参加过西村的批斗会，在陈家谷看见过那个场面。

朱柱当然主要是从陈家谷而非《宰相刘罗锅》的电视里见识诉苦的，而我们下面马上也会见识西村贫农团法庭的厉害。我们找到一向被大伙儿认为糊里糊涂的林贺：

庄里有人诉苦，说过去给扛过活，也兴挨过打，受过骂，工钱给得少。记不清谁诉苦了。

他既记不清谁诉过苦，我们便找到最“苦”的贾翠萍，想挖掘些材料：

要我拉拉过去的事儿，我——（没事儿，您就拉拉。）那早先呐，我也不大开会去——这做啥呀，还录音呐？哎呀，要录音那我更说不好咧。（没事儿。）我这人呐是个废物，你说比那傻子呢强点儿。也没上过学啥的，我也不会拉那个。

面对这位五岁嫁入林江家、公公瞎、婆婆凶且严重气喘、丈夫入狱、大嫂耳聋的童养媳，我们只能沉默。也许她这些苦都算不得阶级苦，只有曾上台诉苦的雇农贾进田、“要饭24年”的黄生那样的才算。冷向仁的回答更让人啼笑皆非：

斗地主庄里人都去，开大会。烙人可不看。就在北院门口，吊起来。诉苦？那谁给他们诉苦啊？（误以为是替地主求情）

即使是老党员董春，对诉苦留下的记忆也有些不着调：

诉苦？东村有一个，搞粮食统购统销的时候诉苦，“二十年没吃过饺子，你说吃点白面，那不容易呀。吃不到呀”。诉苦，一边诉，一边哭。

不能简单说当年诉苦未给西村村民留下深刻印象。在日后粮食统购统销、四清、文革中，诉苦都依然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动员手段，其影响不是直接的、单一的（关于西村村民的“苦”感及有关问题，参方惠容1997）。我们于三天内两度访谈了冷向山的妻子贾秀兰，这位文革时的诉苦典型由于耳聋，基本听不到访谈员的问话，访谈也基本是在她的悠长回忆中艰难地进行，但她比董春诉得更“地道”，在两次访谈惊人相似的情节背后，是她多年的诉苦情结：

在东庄上大台子，开那大会，林奎在一半拉，底下全县都瞅着我开会，瞅着我讲话，都掉泪。开大会以后，一来二去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召集这群老太太，妇女，办学习班，我们当下幸福了，咱们办学习班，毛主席，共产党给咱们长了精神了。当下这老年纪人到一块了，打倒了，可幸福了。不吃河蟆籽子啥的活着了。不吃馊子了。法大纲往这么，一年比一年强。

（法大纲那阵儿咱家分了多少地啊？）忒听不懂。忒憋闷。（停顿6秒）这文化大革命往这么去，这文化大革命往这么着，（16秒，拨弄火盆）这文化大革命往这么一年比一年强。这棒子一掰，日子一年比一年强，活上来了。（您这戒指什么时候打的？）手抽的疼，手也抽疼腿也疼。（3秒）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帝国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完全必要的。（以上几句语句连贯，语气平缓，13秒）唉。

（隔日后二次访谈）受着林奎的压迫，这林奎，把他压下去了，毛主席来了，咱们把他们整下去了。在东庄那个大台子，整林奎。我在大台子上整住，这有我的说话的权利了。这把林奎这，在东庄大台子上，整，讲，说，那么前儿我还说上来了呢。那台子底下全县人都在底下，不大离的都掉泪啊，叫我说的都掉泪。看着我忒可怜。那林奎狠着呢，拿着个穷人那不算一点事。（啥时候您开大会处治林奎啊？）啥时候开大会？法大纲，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大会，开好几回大会，全县的会。（收机欲结束访谈，贾见走又续）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开始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怎么搞的，你们了解这个，啊？可惜我说不好。

此处只摘了她两次访谈的最后部分。我们已无意于追索林奎究竟如何“迫害”了她，脑子里就只是她播弄火盆的颤抖的手，和那沉默良久后爆发出的悠长的叹息。访谈员盘腿坐在炕上，火盆的热气似有还无，那种麻木和惶恐弥漫了整个小屋，也留在了访谈员的记忆里。她真的蕴含着一种痛苦，身体的痛苦，但已经转型，曲折地上升到可以言说的地步，转化到了历史和阶级的痛苦，找到了一个阴谋去指诉，找到了一个罪人去为之负责。“苦大”就这样成功地达到了“仇深”。

## 十 搬掉大石头

冀东区土地会议结束后，紧接着 12 月 18 日至 28 日归远县召开土地会议，县、区党政军领导、区土改工作队全体队员及部分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代表（一说是每区由农村选拔十名劳而久苦的好农会干部）共 500 多人与会。会议首先学习《法大纲》，传达冀东区土地会议精神。会上组成县新农会临时委员会，主席苏远兴（曾任十区区委书记，47 年 11 月至 48 年 4 月任县委书记）。刘慎之讲话后，当场以阶级异己分子包庇地富等名义开除三名县党员干部党籍。

为解决党组织不纯问题，三查三整（查阶级、思想和作风；整顿组织、思想和作风）运动迅速展开。据正史总结，人人过关，交待个人历史，背忆祖宗三代，联系工作思想，检查阶级立场。小组评论严肃认真，有的几次检查仍未过关。所谓整顿干部队伍，一方面接收上级被刷干部，一方面转移安排本区干部，即“搬大石头”。<sup>67</sup>三查整党气氛紧张，情绪偏激，出现左的偏差（参马秀山 1990）。后来连冀东区上级党委东北局也认为，冀东在传达中央土地会议精神时右与左的情况并存。会议开始即下了所有开会人的枪（包括各分区司令及地委书记），已发现找路线、安帽子偏向，到会干部很恐慌（中共中央东北局 1948）。

12 月，冀东区党政军三方“联合布告”宣布全区执行《法大纲》，强调一切党员干部不得贪污自肥、营私舞弊、阳奉阴违、阻挠破坏（冀东区党委、行政公署暨军区 1947）。随后，冀东区新农会临时委员会 12 月 26 日向“农民兄弟姐妹们”发布《告农民书》，以颇具煽动力的通俗语言，历数了旧社会地主恶霸汉奸和国民党的罪恶，揭穿了这些罪恶与乡亲们困苦生活遭遇的关系，宣告了土改具体步骤和对各阶级的政策，点明了新旧村干和群众组织应起的作用：

大伙赶快起来，自己动手，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好政策。咱们就都能有地种，有房子住，有饭吃有衣裳穿。要当家作主了。地主是咱们的冤家对头，吃咱们的肉，喝咱们的血，欺压的我们喘不过气来，他们吃租放利，欺街占道，把持会事，这还不算，原先仗着军阀组织保卫团，日本子来了当汉奸组织大褂子队，顽军来了给美国当汉奸组织壮丁队，欺压穷人，有的霸占财产，有的图财害命，有的强奸妇女，有的打人骂人，无恶不作，还有的钻到政府、部队、机关、共产党里去，本来政府、部队、机关、共产党都是给咱们农民办事的，可是地主、富农钻进去，就借着公家的牌子，抗属的名义，保护他们的财产势力欺压咱们。现在他们又暗里盘算，出坏道，坑害咱们。咱们成年的辛辛苦苦干活，一年到头混不上吃穿，挨饿受冻，逃荒要饭，闹的妻离子散，真叫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让地主封建势力压得咱们祖祖辈辈翻不过身来。共产党领导咱们实行合理负担、减租退租、控诉复仇、查黑地、算负担、土地改革复查，咱们日子比从前强了一点，可是还没有完全翻过身来，有的还缺房子少地，没种籽没粪，使不起牲口，买不起家具，翻了半个身，或者翻了个空身。很多人还是受穷受苦，咱们在村子里说话不占地方，受人欺负。这，一来是以前没有实行平分土地，二来是咱们农民还没有齐心团结起来。有不给咱们办事的干部，没有换上能给咱们办事的，对坏干部也没有撤换他们。

一切的罪恶都找到了根子。地主富农早已落魄，大石头们还在当道。乡亲们，怎么办？

先组织贫农小组，贫农团，开大会选出贫农委员会，再“召开村民大会，宣布法大纲和联合布告命令，把地主富农当村干的和不好的村干部，统统撤换，让他们下台，村里的一切事由贫农团领导来办”。再由贫农团组织新农会，吸收下地干活不剥削人的中农，然后：

地主的土地、房屋、农具、粮食、衣服和其他一切财产统由农会接收，连掩藏的金银财宝也在内，不管理的多深，藏的多好，都要追根究底，挖个一干二净。富农财产有很多也是吃租放利剥削来的。他们的土地、房屋、农具、粮食、衣服和其他一切财产，多余的也得拿出来。

全部合并算总重分，抽多补少，抽近补远，浮物分配填坑补缺。此后便可甩开大干了：

凡是自私自利，欺压农民的人，都不配当共产党员，村里地主富农混进共产党的，一律停

<sup>67</sup> 何谓“搬石头”？同期 12 月北岳区党委副书记杨耕田作报告时如此谈到：自上而下的搬石头，能做土地改革的干部统统集中起来分散到各区各村；村级地富干部一律撤职，其中党员停止党籍；农民不满、害怕、对土改起破坏作用的干部（不管是否地富）一律停职；党要利用一切关系、方法并发动附近村与村互相检举，揭发地富干部腐化堕落分子和一切脱离群众干部，短期内迅速去掉发动群众之障碍（杨耕田 1947）。

止党籍。根据地内的党员，一律交贫农团审查，看谁不够格，可以提议共产党开除他……农民兄弟姐妹们！咱们赶快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彻底平分土地，自己闹翻身自己作主，分了土地财产，就好好生产过日子，支援前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在后方打倒小蒋介石，在前方打倒大蒋介石，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冀东区新农会临时委员会 1947）。

当时报载，《联合布告》和《告农民书》张贴或抄写于各村村头，群众听之闻之，无不欢欣鼓舞。全县开始平分土地。按正史总结，第一步便是组建整顿队伍：工作队进村后撇开原村干部，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物色积极分子，广泛宣传《法大纲》、《告农民书》、《联合布告》。组织贫雇农小组，成立贫农团。再吸收中农成立新农会。然后公开党组织，停止党活动，党员听候贫农团审查，地富出身党员停止党籍；再依次选举贫农委员会、农会。然后开村民大会，表明对各阶级态度，村干部停止工作，听候贫农团审查，撤换地富出身和有问题的村干部，地富财产一律查封，不准隐藏转移、造谣破坏和私自外出。贫农团、新农会为最高领导组织。

第二步是学习毛泽东、任弼时有关划分阶级的论述及上级有关文件，掌握政策标准，查三代，计算剥削量，评定各户阶级成分。最后由贫农团审定，张榜或开会公布。

第三步是清算斗争地富，扫地出门，净身出户，追挖财物。组织人民法庭，开会斗争。

第四步是按填坑补缺原则分配胜利果实。分土地是全村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均分，抽多补少，抽肥充瘦。分房屋是自报公议，比“日子”、比苦，划分等级，排出先后。分粮食是比穷苦、比家底、比劳动力，特殊情况特殊照顾。将各户自报现存粮食和接收粮食加总按应分粮人口总数平均，再按人均应占有数补齐（粗、细粮按比例搭配）。分什物是先公布帐目，自报公议，通过比苦、比“光景”列出顺序，依序挑选。上也分给地富一份。天下穷人是一家，穷富村贫雇农齐翻身，通过联村会议调剂。将有些人多地少、邻村又无力支援的贫困村移民至富裕村。

最后两步是赔补错斗中农和颁发土地执照，至 51 年 6 月底发证结束（参鲁文曾 1990d）

## 十一 西村初期复查

在彻底搬掉大石头、重整村政权的热潮下，全面平分土地的法大纲时期开始了。这也是西村最复杂变幻、对日后几十年影响最深远的时期。介绍了县区各级土改进展后再来看西村具体事件，固然有塑造“历史背景”和因果逻辑之疑，倒也符合既往的释史习惯。在西村村民记忆中，这段时期充斥着扩军和抓壮丁、新老干部间的无情争夺和对地主的无情斗争，土地和胜利果实的分配倒不是印象最深刻的（所得本就不多），更不清楚根据文件政策作出的各阶段划分。

西村复查开始于 47 年农历 6 月，在大多数村民记忆里，除了减租减息，土改只有 47 年夏复查和冬天法大纲两阶段。前一年的平静与后一年的风云变幻构成强烈反差，使许多前一年事情被拖入后一年时间框架——更何况村民现在很少、当时更不太可能有按照超出村庄的时间框架与事件系列来记忆的现实需要、心理准备和技术可能。学者当然可以“出于习惯”，根据各种文件来推断具体时间（注意阴阳历甄别），但村民既然把一些事情混在一起看待，自然会产生许多效果。而这些效果正是编织记忆之网的基本。

复查开始时村里支瑞善和宗藩任财粮，林奎、黄龙祥抓武装，冷向权抓治保。此即日后所谓老干部的基本组成。林志、冷向礼也参与领导，但非主要核心。这冷向礼是个新人物：

冷向礼瞎字不识，也听老干部使唤。他净上外头拴人去，我净说他，他也不听话。（父亲要在他得听？）那他不敢。我家就他比较活跃，刨去他都老实。他要论坏也不是坏，就是当人家的枪（冷向义）。

他二哥没说三弟有项土改必不可少的绝活。那时刚到西村的朱柱对此印象深刻：

那时候村里开会都是用个纸筒广播，站在哪家的平房子上，或是站在哪个坎棱子上喊。这庄上喊的声音特别响亮的是冷向礼。他那时候 20 多岁，喊的比有电的广播还真凿呢。在周子明那个小院里，有个小西厢房（站在上面）。他这个声音特别响亮，我还记得说：“大家注意了，今天开个群众大会”。在哪哪哪。那时候在街头上开。也有在院里的时候。

此时斗争对象还是村里仅剩的两个地主：黄延田和黄延藩。贾秀英说，斗地主时当然要喊口号，就是打倒地主、打倒恶霸、剥削人之类，举着牌子，写着标语，街上也刷满了小纸片一样的标语。她本人和哥哥贾进田、老要饭黄生都上告诉过苦，就是地主如何如何不是人，自己怎么怎么困难。支瑞万和董海都称：其实地主处境开始还不算艰难，老干部还叫黄延田当先生，负责记复查（或为首轮土改）时起出东西的帐（即他自家的浮财）。宗藩和黄家财主正在五服上，老干部都不好意思打地主。董海说，底下人就有了意见，说咋弄个地主管胜利果实。要说此事也委实离谱。不管咋说，干部们后来把封存待分的浮物给私分了。如果这些老干部们能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宗藩为核心的党支部周围，抵御干部队伍内外的挑战者；若非后来他们分赃不均起内讧，群众未必会知道。至于究竟谁该负主要责任，就得看谁在台上谁不在台上了。

其实村里也真没啥可分，而大伙儿的企盼也不高，知道黄家财主有限点东西早就弄跑了：

复查没分地，就分东西。我分了个猪槽子，五尺。一个纯木的炕沿，这么高，这么宽，咋没用？搁在屋里算个坎儿呀。东西都在我们后院内搁着，算库房。分了好几件衣裳。那时候分东西是作价，折成多少粮食多少棒子。农会主任主持。分地按人口分。分地委员一共15个。上面有工作组，全村开大会选的，平分东西、土地都是他们当家（董印）。

在南岭住，分也是分点梨树。没地。分了一口缸，好几道纹（钱得泉）。

分着胜利果实，就这个柜橱。穿不上衣服的那个，敛巴出来给他一件他一件的（冷向仁）。

胜利果实？没那回子事儿。一件破衣裳，也分了个高桌。有好玩意咱们也捞不着。啥也不指着那个，咱们给点给点，不给点不给点，我就开会去来着（黄俊兰）。

东村的情况又如何？两位干部说：

分胜利果实的时候是农会主持，咱们跟着，开会，参加意见。有个叫郑凤奇的，在里面比较懂事，道儿多，出谋划策。周勤在乡保长那阵儿是个会计，那时候也还算会计，算点儿账。我记得由他们富农地主家里搬出来的东西有好有赖啊，洋钱，镢子，我都见着一点儿。他们咋分呢？这洋钱、镢子跟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掺着，纸包着，抽沟。就是这些贫农抽签。谁也见不着这些东西。以后反正到家里有见着的，这以后闹很大意见，说是他们贪污了。中农没有抽。那会儿成份已经定了（冷向清）。

把衣裳啥的都入一个大库房，给检查，瞅瞅，啥衣裳是多少件，写好，上上账，这还都得区里检查瞅着呢。那时候都尖着呢。都弄完了，没啥了，这都由那个大库房里头拿出来分，粮食也是一样。该你一斗是一斗，该你一升是一升（周国珍）。

复查结束后宗藩去区里开会，回来后说要选新干部。先选出翻身委员会，日后工作组来又选出贫农团和人民法院。翻身委员会主任林志，副主任黄悦，财粮郑凤同。贫农团团团长林恩，副团长林凤，委员黄荣等5人。人民法院庭长黄荣，副庭长方顺、林凤，另有四大法警：董海、方子合、支富和黄臣。再加上支书陈龙孝，这拨基本就算是新干部。法警虽非干部，但却留给人切肤印象，忘记他们是不容易的。先来看看后任村长的林恩的家底：

杜恩后来不当干部了，岁数大了。他以前有个小车，小毛驴。谁家要结婚，接媳妇去了，把帘一挂，雇一趟几毛钱，出租使。过去接媳妇分三种，趁钱的雇轿，不太趁钱的雇个小车，再不趁钱的就骑毛驴。轿子是四卫所、归远县城雇去，抬轿的庄里自己找（支焕）。

## 十二 当家作主开会忙

为了解群众动员过程，我们细问了村民开会经历。积极分子贾秀英在这方面当然积极：

为我们开会和他（丈夫）净打架。敢到婆婆那我说现在妇女解放了，你还不让开会？我啥在底下，受压迫在紧下，那不在过去妇女在底层，在紧下？我说现在八路军了，解放了，还不让我们开会去？跟她没少斗争。解放以后开会更多了不是？那前十几年，那开会积极的不是？后晌开一下午会，干一晌活计，赶早还压碾子去——那阵没机器。那阵开会没少生气。我说现在的社会是开会开来的，过去你挨饿，吃糠咽菜，现在你粮食满仓，吃的穿的不发愁。这社会

哪来的，这不毛主席给的吗？这不党、社会给的吗？

她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作为代表选贫农团的情形：

贫农团那就是举手看谁中。大家在一起开大会。分小组再集合，看谁举手在多数。分组是20多个人。那也六七个组呢。每组选仨代表代选。我这个组我就是代表。

但在其他许多村民看来，开会就是开会，干部开，群众“会”，当然，去都是去了：

（法大纲开会的事儿您记得么？）咳，我这脑袋二五眼，记不住。（选贫农团主席什么的那参加了吗？）咳，那时候，那参加就是开大会去听，要不开大会听那个去？除了开群众会去听——钱妻：都选好了来着，去听。听着就中咧（钱德）。

土地平均那会儿开会庄里通知我当家的父亲去的，我还没去。他回去也没咋讲，分给你啥听听就得了，咋生咋长的那细面上不说（林贺）。

土地平均时候开大会，参加来着。自各我听着了呢，那一般不答茬。有女的，有女主任啥的，咱们答啥茬？咱们不答茬（黄俊兰）。

会不少开，天天后晌下去开会去。住南岭也得去庄里开会去。庄里那时候也有站岗的，通知开会啥的。有值班的。一家一个人。我们家是我去时候多。父亲他也是不爱跑，我年轻人爱跑爱撩，瞧热闹。我们沟里的招呼着，“走喽，开会去喽——”，一块去，一群。站岗的告诉最下边老秦家，一个招呼一个，往上通知。开会时底下不拉磕，就听上面讲。十天、八天的开一次。以前有啥事儿啊？这赶以后土地社了，会多了。（开会时选干部吗？）那开会就干部给召集开呀，他要不召集，谁开呀？钱妻：那干部早就给选好了，听着就得了（钱得泉）。

钱得泉好歹还大老远下南岭来村里开会（那时还有狼），也住南岭的钱周氏可不那么好动：

（组织念什么炕头组呀——）没念过。我在山沟住，没有炕头组。人少。大老远一家子，大老远一家子。够不上边儿。（那庄里那时候开会您参加吗？）开会？开会参加。家里老岭老峪的没人看家，出不去。开会忒打紧了去。不打紧的不去。（那时候什么会打紧呀？）咳，那哪说得清呀。他要是忒那啥的了，就让你去，不忒打紧了，瞧我这家里忒脱离不了，有啥啥事，你们替我办了吧。就托给他们。

或许这些位都不算太积极，当年动员的也不怎么好。再来听听两位干部妻子的回忆：

嫁过来时候当家的就老开会，在家也开过，开会时不大出去，但知不道是谁老来。人家就招呼，用你去就去（指端茶送水之类），不用你去就不去啊。我这傻了叭唧的开会去做啥呀？（当家的没动员您去？）没有（冷向权妻）。

（斗地主那会儿老爷子常去开会吗？）那那阵儿谁不去呀？（您去吗？）我没去，找我也没去。也不会，也不懂得那事。（老爷子回来跟您说这些事儿吗？）他回家就吃饭，吃完饭就下地，还讲那？（没人来家开过会吗？）没有（陈龙孝妻）。

显然，不仅她们没有受到丈夫的熏陶，而且当干部的丈夫们也没有把在外的动员劲头（假设他们确实有）用到家里。出于某些原因，当年积极开会、热心选举的人们大多没能好好地活在现在的村里。林起洲当年倒确实是积极主动过：

选干部不投票，就是开群众会，“咱们赞成谁啊？”一举手就得了。群众就是随声附和，到啥时候都不明确表示意见，都怕惹人，怕伤人，你赞成我也赞成了，不赞成也赞成了。人家都举手了你就不举手剩你自各，一瞅，哦，你有意见。过后人家当干部了报复你。农村老百姓都是这势。就咱们仨傻。

不久我们将看到，这仨“傻”人反对了新干部，“下场”不太好。而新干部一头四法警之一的董海如今说起开会选举来，也有一番不太积极的理论：

那时候哪有准干部啊？今你整他明整他。内部不和，他掐他，他掐他。你说群众，群众哪儿知啊？行，我不干了，你选吧，我把你选了顶合了。没干全天呢。他就说我整他了。

董海虽因后来种种遭际，谈起这些未免曾经沧海，但毕竟提供了最具体的一次开会场景：

开会，开着开着开崩了，那个“喻”都撩了。你知不道是咋事。连我也知不道咋事。他操纵，他在后面操纵那事。开没开好。那时候没屋里。在大街上。开群众大会。那啥我也知不道，

反正我就听着呜呜的，在后儿呜呜的。让人家都“嗖”散了。跑了。往哪儿去都有。（呜呜的这什么声？）散了乱跑嘛！往哪儿去都有。（为啥开了一半就散了呢？）那细情不知道。（您当时在会场上吗？）那谁不到？群众开会谁也得去不是？……知不道咋的他们散了。咋事呢？是吧？那叫——你讲话，谁打听呀？你不如找地方呆会儿，眯一会儿……就合一块，谈。（谈崩了？）知不道咋的，反正是散了（笑）。

这次会议据推测是新干部与老干部最终闹崩前的一次谈判。董海当时大概不至于如此消极，实际上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样，根本不是想消极就消极得了的。但重要的是，经过了这些斗争，开会和动员或许曾有的积极意义被掩映在了权争之后。曾有不少研究强调当时基层开会选举对群众翻身获得政治民主的意义，这固然是一种非常重大的进展，但也应看到：基层开会选举是共产党试图夺回农村传统精英的行政管理权力，交给农民积极分子，确保农民动员成功（参 Chen Yung-fa1986P5）。然而，动员农民与组织农民之间，以及农民获有开会选举的权利同最终能通过选举干部为自己谋利益之间，都尚有相当差距。换言之，农民并不一定迫切需要民主选举和参政，并不一定认为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必须首先在这些方面取得突破。需要考察的问题更在于：如何动员并维持作为小生产私有者的农民，使其产生对社区公共活动的兴趣？在革命高潮中，特别是转入日常管理后，农民如何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这样的参与“权利”与“义务”？正如谢觉哉所说：民主就是要使一向避处政治生活和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里面来（参强世功 1999 有关分析）。放权给农民也是更好地动员农民、促进对农民控制的良好途径。

### 十三 当道的石头搬下去

新干部选出后，宗藩、林奎、冷向权被借调搞复查，短暂离村。9 月中旬林志又告老干部贪污，斗争白热化，双方各自寻找群众和上层支持，软硬结合，局势极为混乱。在此姑且不作定论，甚至也不径直给出一前后连贯的事件过程（这是正史写作的预设前提和必然效果），先来看看整风和四清时一些主要当事者的证词（作证时林志、黄悦等主要新干部业已被枪毙或入狱，而查证的主要起因是群众控告宗藩的历史和现行问题）。作证者中冷向权是最主要的一位老干部（宗藩被查证，而林奎又正挨着黑）：

复查后平分前，旧历 6 月间把宗藩调康平村，我和林奎调洪山口搞复查，7 月回来。回来就告我们贪污，追我们 100 多石玉米，我不承认，要打我就跑了。到区公所民兵来了不少。到庄林奎正找我，把林志他们赶跑了，林奎、宗藩放出来了。我们一同在村公所。以后，下去两个上月，林志他们又把我们圈起来了。我又跑了，控告到区委苏远兴，区里派人带民兵又把林志他们关起来，后来林志跑了。区委不叫我们在村，就在区里呆着。后来苏远兴调走（按：47 年 11 月调走，阎大兴 48 年 1 月接任区委书记），大兴区委，就开始法大纲。林志他们往回要我们和老苏，大兴就把我们交付了。工作组奚仁贤、洪图等也来了。到家就抢光了，说老苏是大国民党，我们是小国民党员。宗藩被斗，先是赔补贪污的损失，后追三代追没落地主就把他斗了。赔补时我拿出一辆胶皮车，一个轧面机。林奎十石玉米，支瑞善、毛宽等把地里庄稼都给收拾去了。黄龙祥一口肥猪。到法大纲就没整我们的东西，人也没东西了（62/3/31）。

而他妻子 50 年后对丈夫被斗和家里被抄似乎还没搞清楚缘由：

土改我们啥也没分着。房子没有。地？知不道，是不是分着了喽？（虽然）穷也没分着，东西也没有。（丈夫）当干部也啥没有。啥原因我也不知道。

以下三人，前俩是老干部，后一个是“电线杆子”，这是土改中常用的词，原指替地富等斗争对象通风报信，在西村一般指替老干部或新干部（看谁不在台上）通风报信：

法大纲时整我们的是林志、郑凤同、黄悦、毛庆等。那时我是武装，担任民兵队长，说军装叫我穿了，因为贪污把我们整了。把我的肥猪和一盘磨给拿出去了。光挨押我呆了一个月。先把我和支瑞善弄去的。冷向权还领民兵半夜把圈我们的支富和方子合斗一回。我们又把他们镇住了。一来二去闹到法大纲宗藩被斗，也是因为贪污，查阶级。我们干事那会儿是吃喝一股

子（黄龙祥 62/3/29）。

说我们贪污吃一股子，挨的整。我们秋天粮食都收了去，别的没啥，那时穷。宗藩、林奎、我租的地全收去了。林志最清楚，吃喝一块吃喝，分粮食也给他一份来着（支瑞善 62/3/29）。

47年冬先整宗藩他们，我和黄龙祥在后一步，我（那时）当优抗委员。苏远兴区委给我来信，让我去区里（汇报），我不敢去。第三次我才去。从后门出去碰见林升，他就报告了。苏远兴和我说，叫我到村里把群众稳定一下。回来跟干部一说开个会，就招集。说说别闹了，都是一庄人。散会以后隔了两天，林志找我说我是电线杆子，要整我。我想顺应家谷跑了，碰上支瑞亭，我又奔五更庄。到那儿已掌灯了，区委问我怎么了，我说庄里让坏人整得不象样了，呆不了。次日早晨苏远兴上洪山口了，我也……追到洪山口，苏远兴给我开封信交到区公所……区里财粮助理说你是抗属，爱上县上县，爱回村就回村，他们还把你怎么着了？我也没罪来。

转了好长时间，回来以后就是先把电线杆子绑起来。这时正赶上工作组奚仁贤、洪图在这。就把我们押起来了。押了三个来月，从旧历十月到腊月。我挨了四、五遍打，三回捆，一回吊，支瑞万给我松的。反正我是为革命一场，我不是党员，我闺女、儿子都是老党员。我儿子由大寨那边过来，找我。打发孩子把我找来，就解开叫我来了。队伍正上东北，劝我忍耐了吧，骑马就走了。<sup>68</sup>我儿子走后又把我押起来了。支富等说我贪污 2 斗玉米，我不承认，又把我拴起来了。到法大纲，就发动打我们。初步没人动手，后来这一棍子、那一下子打个臭够。我们几个属宗藩打得重。支富、方子合这两坏蛋，和瞎林田，林田因为搞掏毛（男女苟且之事）叫我碰上过，我说过他。这时他也上来了，让我说扣帽子（即承认是诬蔑他）。说我给老干部当电线杆子，也斗争我。我 14 亩地庄稼和复查时分的东西也都弄去了。到腊月先把我放了。后来还闹时间好长。对宗藩给扣了个没落地主的帽子，让他们要饭吃（毛宽 62/3/30）。

老干部黄荣因特殊机缘，老干部重新上台后依然完好，查证时自然很客观：

到法大纲才公布宗藩、林奎、支瑞善、冷向权、周子明、黄龙祥是干部。<sup>69</sup>此前 47 年旧历 6 月就挨了一顿整。那时宗藩是村办事员。法大纲又一回，是 48 年初。原因主要是老干部贪污，有支瑞善、林奎、冷向权等（按：未提宗藩），主要是分点粮食，也有林志在内，给他的少，他没负责。因分赃不均闹起来的。平时追三代，说宗藩和黄延清是家里，可能有联系，就说他是国民党。林志更真的和黄延清勾上了。那时林恩是贫农团团长，林凤是法庭庭长，我是副庭长（实正好相反）。整宗藩主要是林志，他是党员，他说了算。贪污的粮食支瑞善知道，他是财粮，写的白条（按：人缘不好的下场）。要说追宗藩三代，可黄季英却是贫农。宗藩常当村干部，并一直积极为党工作，因而为了革命工作影响其劳动时间也是存在的；就其剥削量来看虽不算少，但基本是为了维持生活，而非剥削别人。那时候当干部真是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他家有点地，不找个人给他经营经营，就得把地荒了饿起来，当干部也得吃碗饭嘛（62/3/29）。

可以看到，老干部在当时村中无异于搞地下工作时的险恶处境；与斗地主的阶级斗争相比，这同样是你死我活的拼杀。大家竞相向外、向上求援，下文将展示几次告状的经过。无论如何，按现在村民回忆，那时无论老干部还是新干部都常随便吃喝，没有了就动员中农出粮食，在干部间享用私分。整老村干那阵说贪污几石玉米，今天吃点，明天喝点，没处填了，由中农动员出来的粮食他们分了。其实新村干中挑头的林志也分着，因分赃不均才闹起来，但……反正是这拨倒了那拨，革命在左，反革命在右。界限是一定会产生的，区别在于如何给出个说法。

#### 十四 积极肯干的站出来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

<sup>68</sup> 村民告诉我们其子任八路团长，不过他们还说毛家另一当国军不知所终的是蒋介石的卫队长。

<sup>69</sup> 实际是亮党，即公布党员身份。周子明这位最早的“游击队员”亮党后即刻离村当兵，未卷入干部权争，解放后曾任四川某县公安局长，62 年方回村。林奎妻说丈夫党员身份到法大纲才公开。他们站在黄家大院房顶上喊：老党员回来了，老党员回来了。她愤愤道：回来仨老干部就挨押了。

不过正不能冤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其实当时也不只是斗干部，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是避免不了的。按照正史习惯的线性时间顺序和事件因果逻辑，在此必须做些倒叙。如前所述，西村仅剩的俩地主没啥破坏性（有能耐的早遛了），加之与宗藩是夹缠不清的亲戚，还没咋挨着收拾。先还是扫地出门：

上人家屋里拿东西去，封他门。把地主轰出去。哪儿找个厢屋里，先搁那屋再说。家里东西都埋了，找不着。浮物、钱没有。就是点粮食、板柜啥的，乱七八糟的。都分到各户去了。在林起友院里储存。搁人看着。得找一个年轻的，管事的看着不是？（贾秀英）

这年轻管事的看守后来出了大问题，这且不谈；多年如一日的积极分子贾秀英当年是否真的带着人，走在阶级斗争的最前列，也不能完全肯定。但西村不会只是干部之间的斗争，它必然也必须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朱柱一席话高屋建瓴，直指要害：

47年夏天不彻底。不彻底有不彻底的来源。抗日战争咱们共产党在农村，你吃谁去？主要吃中农往上的。有的时候摊粮摊款也让他们摊。贫农有的趁一亩地，还没有生产力，根本就不大打粮食，就扛活给人家做长工或者做短工什么的。根本就挣不了俩钱。粮食供不了家里吃的，就没有给咱们革命武装做多大贡献。那时候咱们无产阶级要出力，就只能当兵也中，抬担架、砍电线杆子、破电道、埋地雷。派粮派饭就得找中农以上的。47年以后法大纲，咱们的对立面就是地主、富农了。农村干部觉得这几年咱们是打日本，跟日本斗，总是要鞋要袜子，要粮要草，中农、地主、富农总摊着来着。这回咱们也这么着吧。有的（干部）说派（地富）什么中，说斗争他（地富）了，就有点薄弱。群众对干部就有些看不过。咱们贫下——真正扛活的，受压迫的，瞅着斗地主、斗富农不坚决，咋办？工作组的政策就是这样，斗地主，斗富农，这是土地改革时候咱们共产党的政策。抗日的时候主要是锄奸，只要是爱国的，不分阶级出身，联合抗日，共同对外。土地改革的时候就是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斗这个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我们的斗争对象转变了，抗日和土改是两个运动，两个对象。工作组就吃派饭，在贫雇农家里。工作组撤走，土改就结束了。48年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把所有的地都折成产量，按人算。好地坏地按产量（总数）算。

整个过程清清楚楚（虽然显得革命政府有些过河拆桥的味道），不过朱柱其实来得挺晚：

我（48年）三月三到西村，这儿地主和老干部正关着。正封着地主的门，拿他们粮食吃。

于是我们知道地主和老干部一起关着，并且已经是在很晚的时候。但我们无法那么叙述。林起明和郑树林是两位更早到西村的外来村民，他们分别说：

批斗地主那时也算粗线条。实际那时连农会人也不完全懂得政策。××一个老粗，啥字不识，瞎弄呗。实际那时没人命的根本不让打死，这毛主席说的。有人命的不用说，得经国家批。

那时候就是下中农不往外拿东西。中农、上中农的都得往外拿，都得往外贡。反正地多的，房子多的，都得贡献出来。

这俩的政策水平明显差着一大截。但他们好歹还会说些“字儿话”。东村的情况又如何？

土改这几家都被斗了。反正他们也是比别人生活好一些，没有大的恶感。乡保长也被清算了，没算忒斗，就在大会上——现在就叫批评。那阵儿乡保长也就是为了挣点儿玩意。没有扫地出门。地主和周家富农都被扫地出门来着。那几家被定成没落地主。后来有几家恢复，有几家没恢复（冷向清）。

东村土改是区里给你分出来，谁是贫农，谁是富农。区里人跟着，就上地主家，把人都轰出去，把屋里粮食啥的归整归整。那时候也杀猪宰羊，大伙都上一块儿吃去。全庄的人去斗争。猪啥的大伙闹一顿，地主啥的赶到一个屋里蹲着去。比如复查到老周家了，复查下来第一天就说：“谁也不许透露，谁透露就必须负责任。”这都暗暗地派人上岗了，怕上外鼓捣东西啊。也兴轰到贫农家里啊，或是当干部的家里头啊。好比地主在我家呆着吧，许可出去一人俩人要饭去。以后没啥事儿了，再给他点粮食。那那会儿总有对他们好的。受他欺负的不给他，那不受他欺负的，娘们姐们的，就给他点。也就许可穿你这一身衣裳，刨开身上这一身，其他都不留。到冬天，发凉了，捡他自各穿剩下那旧衣服。六月复查那时候分东西，不打不骂，赶到十

月土地法大纲才打骂呀。轰地主是工、农、妇、青，加儿童团团团长。工会就是扛活的，领着一群。农会就是下地的这一群。儿童就是那几岁的。我领着妇女。东庄的地主尖，立刻就说实话。我的东西在哪哪呢，我的东西在哪哪呢，就这样啊——也没啥东西（周国珍）。

和西村比，东村地主没咋挨揍，至少没挨烙。按东西村人的共识，东村的地主更小些。不过据我们所知，东村也未涌现出西村四杆枪这样的积极分子。待到西村群众特别是积极分子发现可分的果实不多，地主就麻烦了。斗地主的力度不断加大。支瑞万比划着说，斗地主时砍了这么长一个板子，这么宽，这么厚，那上头写上字：打死无论！打地主不是？先捡了品性孱弱的“肉头”黄延田按在地下，没往他身上打。板子邦邦的朝地下拍，肉头嚎嚎的向墙外叫。给（墙外的）黄延藩听呢。吓他。这以后黄延藩该着他了，那是真打了。以后黄延田也挨上了，屁股打烂了。那都打苦了。屁股烂了好几年。弄个洋盅烧，点上火，弄劈柴照后头让他背着。后颈子烙烂了，这人都死了。这事他都经着的。支瑞万其实也委屈：

（您记得那会儿一起打斗地主的还有谁吗？）那人哪记得住那！全庄的人。开大会么。（当时谁是负责打地主的？）负责人那都死了。头一个是我儿子媳妇他爷爷黄荣，法庭庭长。庭长不管打人，净吩咐的。他得找我呀！我再吩咐呀！你带几个民兵，带多少多少绳子，就是把那吊起来，打人家。我他妈听吩咐的：“支瑞万，预备俩民兵！”你就得给预备俩呀。我就找那个尖子班去。叫基干民兵，也叫尖子班。你管上哪哪谁么谁么家去，在那后院吊人不是？打呀，你不说？不说撞你！——那么码事吧，稀里糊涂。

曾听黄俊兰说她面对奉军、日本和八路都没怕过（原谅她的并列），但现在她也害怕了：

我去了两天，可受不了啊，把我吓坏了，这心软呀，打那。把（黄立仁子）黄贯东媳妇紧起来了，把我吓坏了，立刻眼珠子就肿起来，睁不开了。我说我受不了。那媳妇可不离啊，挺好的。他们家是富农。

连董印这自称遭过两回活埋的都不免胆怯：

黄延田那么打他，知道他有枪，他也不说。后来是唐山下乡知识青年挖菜窖挖出来了，使黄涵渚着一支三八大枪。法警也是选的，穷，敢干，敢下手打人的，四法警里面就黄臣不打人烙人，那仨打人狠去了。属方子合格得多，支富就是打，使板子棍子打，把黄延田的屁股打得叭唧叭唧血直溅。180棒，好家伙，看得我直哆嗦，没敢着边。

对这些“枪”，来自东村的周国珍似乎比较能够站在“局外”说话：

那各庄姓方的他们狠。他那时到这儿当头了，那时候越穷越吃香嘛。饥荒得上午饭吃没了，后晌再要去。这样话儿的才吃香。就他下命令，生用烙铁烙。（他跟地主有仇吗？）他不是想多落下点玩意是点儿玩意吗？落下那也是大家伙的，他自各吞不了。但多落下点是点儿啊。

她还说这都是那外姓干的。她儿子自小眼见了父亲林奎的官场沧桑，似乎也深有所悟：

过去那事全不是本村真正的户，都属于按现在话说盲流干的。或者是出于报复心理，那都是正常的。也可以说公报私仇，不新鲜。那时人的思想跟现在比比较单纯。能吃饱饭（就行）。

日子颇“硬”的冷恒合因人缘好及其他原因，未被划入富农挨斗，他儿子冷向有说：

那阵儿人家有那积极分子，来运动就有积极分子，先进的，那样的拾掇他们了，一般的没人打他们。（那些人为什么积极啊？）哪时候也得有那样人啊。没那样人不中啊，都得有那积极分子，要没有那样人，让你打你不敢下手。积极分子让你打你就得打，让你烙你就得烙，他下得去手不是？那一般人他下不去手！

也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群众，如最老实的村干陈龙孝的妻子：

斗地主？不记得那个。没看过。看孩子还顾着那个？也不懂得。

斗地主那会儿也跟站队似的，也喊口号，“打倒地主”什么的，有头领着。黄延田、黄延藩——连我姨也是。我们家啥也不趁，没牵连上。我姨家那时已经到县城了，没斗着。斗地主时候是大人打，小孩也没人敢打。叽叽哇哇的直叫唤。不清楚谁打的了，多少年了（强万和）。

老强说的站队是日后文革时派性斗争的事儿。要不是他大姨早撩了，要不是他们家实在只是老实过日子，否则也躲不开，更不会“不清楚谁打的了”。其实，在龙孝妻的“不记得”、

“没看过”和“不懂得”之间，又有多少复杂的过程？世事人心本各异，苦乐冷暖当自知。

冷向仁似乎一辈子心善，他老婆就是庄里黄金太当匪时拐来的，后来金太归编了八路，战死盘山，成了烈士，老婆也就“归编”了冷向仁。老冷一向对抢抢斗斗的忌憚三分：

法大纲分了点地。那阵儿脑筋才叫老。把黄家地主的分过来，想凭啥人家的地咱们夺过来，咱们种着哩？当头的说你咋这样呢？这哪还是他们的地？这是咱们的地啊！穷的那些说我不管那个，人家给我我就要。这让人说的，人家敢要咱们不敢要？！嘿嘿。

都象冷向仁这样，土改绝无掀起高潮、走向成功的可能；话说回来，要都不象冷向仁这样，整个土改也就少了许多微妙的韵味，所有的动员、诉苦、整党、纠偏……全无这般复杂、生动了。还记得党员董春说贼六子年来家收债的事，到打地主时他早已觉悟，看清地主阶级本质：

就是几个比较仇恨的地主打得比较狠。贼六子没在家。（要在家您会去打吗？）那我下不去手，废物不是？（您恨他吗？）恨。（怎么恨呀？）那剥削呀。（对您家还可以吧？）可以？可以啥呀。（也不好？）不好。（你什么时候知道剥削这个词的？）（笑）入党以后我就知道。（以前也不知道？）以前也知不道。（以前恨他吗？）以前——以前咋不恨呢？（但是也不知道他把你东西拿走了？）（笑）对。

冷向仁不愧是个好群众（当然他自称当过党员和八路，不过都是“秘细”的，谁也不知道），虽然当时吓得躺在炕上，可他明白搞运动的长远道理。且听他道来：

那时候打人，谁不打也不中。谁拿着××（轻细）棍子打人不中，非得拿着××（粗重）棍子。我拿着个××（粗重）棍子出去了，把他们吊在当街里头，这个打那个打的，我都×不上来。末了，我说不中，忒不舒坦了。跑到家里，盖了两床被卧，这才缓过来。那打的，哎呀哎呀叫唤。这是翻着个儿打咱们呢。我吓得哆嗦。也有下得去手的。大多数下不去手。（就是那些当枪的下得去手？）哎。……地主是把地和房子拿出来后，按人口，跟着咱们一块儿分。打过地主，你不打他就给了（指底财）？把烙铁搁在火里烧红了，烙地主。你有啥说啥，你别不说。一烙就哎呀呀，就说了。在外头那个一听屋里直叫唤，不定哪天拾掇他，就说了。方式不一样，有的是真烙——我们庄是真烙啊。村里人下不去手，由外村搬来的外姓人人家积极肯干，庄里人有的他落不下脸。谁不打也不中，还得使劲打。庄里人有的下不去手，装得劲儿挺大，下去轻。有的是铁劲儿的往下打。要有积极肯干的，社会能进展。都跟××我这样的，国家有进展？都落后？咱这是说实在嗑。

在曾长住南岭的钱周氏记忆中，跑返、顽军裹挟、复查和文革等通过微妙的契合混融一处：

日本来那阵也跑返，黑家白夜跑。（有匪吗？）匪是一样儿。一样是一样。中央军，治安军，八路军——我都记不清了。那都讲，我长这么大就跑返。我不说从我搬这，到炼钢铁，朝后，我就不跑返了，搬到庄里来了。搬到庄里，净富农挨打。穷人，那人家上面让打就打，让骂就骂，让搞起来就搞起来。那时呆着都不消停呀。你看热闹去，老年人还得看着人家去。搞到冷头屋子，不让吃饭，冻得嗒哈嗒哈乱战，打得浑身乱战，烂青。这个叔叔呀，给我拽拽呀，这胳膊就揪紧了，挣不开了。那个大爷呀，就成宿地叫，就让人看着呀，怕跑了，谁跑了，拿他顶命。他也得挨揍。那时候那就不用说，一会儿消停时候都没有……（有军队到过沟里面吗？）那可不？到那过。啥都给拿去。跑返呀，啥都让人家给拿去。闹顽军。是啥给拿去，炕席都给拆了去。门扇摘去，被卧拿去，啥都拿去，粮食拿去……（您说当时咱们庄打富农那时候，您还来看看了？）嗯。（是要求每家都看？）那可不？（打得挺厉害的？）那敢情的。是人你只要敢下手就敢打。那心软的，看看热闹，觉着怪受罪的，就躲咕着。要心狠的，我也打两棍子去。你大姑，那还斗争黄延田。（媳：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文化大革命那阵儿，她还打去呢。郑各庄一个小伙子，搬到这庄来了。他妈了个×的——（媳：赶我来那阵儿，黄延藩他媳妇还挨批斗呢。）那支广喜他爸爸（即法警支富），他们两个狠着呢。往死里抽，赶到之后这才弄回去了，不要他了。我们这庄里人就够用了。不要。忒狠。拿烙铁烙，拿烙铁烧红了，放水，这吐噜一下子，这吐噜一下子，让那手头都烂了呀。老爷们捆上搁冷棚屋里去了，老娘们拿烙铁烙了。（老娘们也有挨揍的？）老娘们也挨，可了不得。就地主的。（女的也有被打的？）

打的，后面，一天天的捞不着饭，要饭吃都没有人给，不让给。这穷家主，他待这个穷家主没好处。他这阵挨批斗了，没人搭咕他。（媳：那是文化大革命那阵。）那叫狠了去了。你有些个给他盛一碗，过来了就不让，立刻把他的碗就夺过来，扔泔池里头，宁可给我们猪吃呢。他在穷人跟前也没好处……有好处的那啥时候到外面也说好。这狠人到啥时候也没人说好。

80岁的钱周氏如今坐在炕上，伴着她的是冬日的暖阳、孝顺的儿媳和不知跑返为何物的孙女，还有不知被访人是否真正听清问题的访谈员。老奶奶已是去日无多，一切都满足了；而我们一时竟自恍惚：到底她最后说的狠人是剥削穷家主的的地主富农，还是那些敢下手的小伙子？

## 十五 老干部一时落败

前文几位业已过世的被斗者在四清和整风时的证词，使我们初步体会到了复查时斗老干部的激烈；不妨再透过在世者回忆，遥想当年新老干部战西村的场面。提起这段董印便莫名兴奋：

新干部打击老干部，那热闹得去了，那文斗武斗乱得去了。老干部跟新干部打起来了。区里保着老干部，行署跟县里保着新干部。打官司告状那热闹！打地主的打地主，打老干部的打老干部。那时候整老干部，用八号铁丝钳宗藩。工作队姓奚的打是不能不让打，就是不许害死人。宗藩被民兵看着，他母亲媳妇要饭吃。这庄去80多人上县里告老村干。林志领头，把宗藩他们这老干部都告倒了，行署来了人，把宗藩、林奎、冷向权、支瑞善这四个都圈起来了。陈龙孝是老实人，没斗他。那事儿多了，没法说，忒复杂。

所谓八号铁丝事出有典，而且斗争的残酷性远不止此。有过切身经历的东村冷向清说：

我就挨搬来着。撤职，我们三个人，会计周保华，还有书记周永清。找一小屋，把我们三个圈起来。家里给送饭。没打我，比西村要轻。西村那拿铅条给拧上。我们也挨绑来着，没打。地没分完区上来人就恢复了，我们跟着主持的。当时西村还没有恢复，乱得很。县里坐车来，西村人把车给截住，拿棍子，不让走。（当时是县里来人，要恢复宗藩他们工作是吧？）啊。不让。西村那闹得挺乱。宗藩、林奎、冷向权他们，农会那阵儿要打死他们。咱们听说，那时候农会分几拨，也有不会写的不是？给一人一个纸条。说的是一回事儿，以后做就做错了。有的说是要打他们就得让他们死，有的说打叉的让他们死。这几拨一做，打叉的让死的也有，画圈的让死的也有。结果一对照，死活差不多。那阵儿区里、县里多少人掌握着呢，你随便打死人不中啊。（咱村也都知道这些事儿？）那西村那边开会，我们绑着也都过去来着。县里来人组织开会，我们都绑着去听听，讲些政策啥的。以后就慢慢恢复了。

听起来似乎太过偶然，让人将信将疑。当时天天给挨圈的丈夫送饭的冷向权妻子说：

（斗地主那时候您当家的积极吗？）他那时候家里事儿都不管，以后自各过了，更是吊儿浪当的，啥事儿不管。村里事儿他管，回来啥也不跟我说。（听说被关过？）那时候是有一阵儿难过来着。关在外头。我给送饭。那时候我可苦着呢。现在这干部都挺肥实的，那时候干部有啥呀？可穷着呢。我跟他这一辈子，可没处抱怨去。便宜？这我老舅（林忠）在这儿呢，他最知道。当家的尽出去惹人去，狗鼻子也没往家里拿过。他那会儿干部当的，家里吃没吃，烧没烧。他拿啥呢？也没处贪去。当干部不得逼你？一逼伤人，惹仇了。那头是男的，还不找你报仇？他死了这省心了。（他活着总有人来找他？）那可不？来了运动就找他。老爷子在家呆着，他那时候当不了家了，你当干部当得好下场！当一辈子干部，没功劳还有苦劳呢。都是仇人不是？好比说咱俩都下地，你当干部呢，我回来拿个苹果，你看到了不要说？这不闹腾？法大纲给押起来，我给送饭时间还不短呐。也被打过。（打得狠吗？）那人家打还轻巧了喽？（林忠：你以前整治过我，现在你在我手上了，我还不狠劲打你？）犯到谁手上也轻巧不了。（谁打的？）谁打的是咋的？当下也有活着的，也有死了的。林臣还活着呢，支瑞万还活着呢。支瑞万我这么前儿看着他心里不那么××了，年头多了，那阵儿我一看见他，我心就立起来。他，支富——有几个人，还审，没在家里。嗓子落下点毛病，总卡着，后来总咳嗽。吃饭，吃棒子粥就不想吃，那阵儿送饭总吃棒子粥，出来至死也不吃，早晨起来饿也不吃。老爷子一看冬天

穿那皮袄（他俩那时候穿着），就不让我们穿，只穿那小棉衣裳。那时候我一看见心就立起来，心里就瞪着慌。（您丈夫是怎么把他得罪了？）（同笑）当干部的还有好下场喽？惹人呗。（支富长得凶吗？）支富是死了，活着一看是惨人（同笑）。

冷向权当年的挨押给他和他的家人留下了惨痛记忆，从心灵到身体。可冷向权自己此前此后也都不是什么善主，同属“尖曲孽道老冷家”的冷向义说他脾气“暴性”：

伤人太重，经常打人，紧人，就是弄个绳，把你胳膊捆起来，拴得挺紧的，再这么一拽，往上一诶，一会儿你就咧了（即受不了了）。我说他，年轻的时候你别这么脾气暴性，动不动就拴就打。我说他他不发脾气。（别人说他发？）别人也不敢呐。我说他也不听啊。后来我就不说了。那会儿他爸早死了。他和哥哥一起过，哥哥比他大不少呢，也管不了。他妈也死了。

林起洲当年因为替老干部告状，挨了新干部的斗，他对自己捍卫的对象却也没啥好话：

冷向权奸着呢，没人说他好。那阵儿搞龙华会什么的——法大纲前我们庄早就有龙华会啥的——数他得罪人多。他也乐意干这活，拿着枪成天找人整人，别的老干部都不爱干。宗藩有一阵儿先是打击他，就是土改那阵儿，后来又利用他。

我们始终没搞清楚所谓宗藩先打击冷向权指的是什么。根据“疾恶如仇”的黄延青的说法，似乎冷向权土改前曾被我方关押过：

冷向权是弄枪弄棒的玩意，不学好，放回来也盘了一拨子人。到了也得了病也死了。

新干部中的龙孝其实也是抗战时的老干部，但他此时并未挨斗，原因在董印看来是因为别人没有斗他的兴趣，也不害怕被他斗（这两样当然是紧密相关、互为前提的）：

陈龙孝是老实人，没斗他。那是个枪，只知道干，也不贪污。

而在龙孝的家人说来，老爷子就是这庄上一等一的好人：

次子：知不道谁发展父亲入党的。他拉过，记不忒清。不是咱庄上的。大队后来照顾他，放个马啥的，干点轻巧活。身体不好，年轻时落下的，得肝癌死的。他不是（头批）硬杆子的……他说当时支部定下党员不能完全都入社，社以外留点人做工作。父亲特别老实，忠厚，也没文化。他就是说别忘本，工作干好。儿媳：总是说可得好好干啊，犯错误的事儿咱们家的人可别干。次子：父亲临死的时候还挺清楚的，挺坚强，到最后一声没哼过，二十多天吃不下饭，解手俩人架着也得下炕。庄里人都说，那老爷子可是个好人。孙女：爷爷这人特别忠厚，心特好。我爸说我们家特别穷，尤其是我爷爷、我太爷那会儿根本就饭没吃，说我爷爷这人命特苦。

下文会说到，解放后龙孝一没当上首批硬杆子，二没进村干核心，“光荣离休”了。当时龙孝本人是无意掺和还是无力掺和我们已无从确知。反正在许多村民的回忆中，此人是过军号房派饭有他，吃喝拿占分脏没他。在运动高潮中，女人可以不闻不问。黄俊兰道：

（老干部和新干部打架您知道吗？）我知道，爱打咋打，也管不着。碍不着咱们，咱们也不是办公的，也没那有出息的人。让开会就开会，让咋咋着。告状的事儿知不道。人家也不告诉咱们，咱们也不是干部，也插不上嘴。保密的事儿咱们啥也知不道，不是那里头人。

但是象龙孝这样的“办公人”，还有其他一些“有出息的人”，甚至如冷向仁这等老实疙瘩，风潮袭来之时，无论主动被动，都是得有所表态的吧？

干部弄得不合，他咬他、他咬他的。尽他们老林家三个，林奎、林凤、林志。冷向权不知道因为啥，把他拴上了。当武装的，还没有惹人地方？庄里大伙，说他这个那个的。要让我说话，我讲事实。弄到大院里收拾他。我一看事情不好，真要弄出人命来。我说你们打，谁打死谁偿命，这拉倒了。还打谁？毛宽也是两面派。那阵儿你说他是干部，他还不是；你说他不是，他还乱掺和。大伙拴着他，揍他（冷向仁）。

## 十六 四法警

“电线杆子”毛宽大概算一类“有出息的”，只是当时他这“两面派”或许恰好走了眼而已。而象西村四杆枪这类“有出息的”，当时则正当道。不过大多数群众认为这些法警是被人

利用的“枪”，运动过去后，无论新干部继续掌权还是老干部重新上台，都不会有他们这些冲在最前面的好果子吃。不过，这是后话了。当时，小伙子们在支瑞万率领下可是威风八面。

最初见到董海，这位当年的法警正闷处角落阴郁地烤火。下次访谈时他才越讲越多：

（怎么斗地主您还记得吗？）那怎么斗？他要是老实，态度好了，把东西倒了，我该给给，他要差了？他要是耍花招么，那就讲话呢，挨揍呢。打，绑大树坑那儿，嚎嚎叫。（那地主他不肯说啊？咱庄的地主不肯说吗？）他不说，他说没有。（那咱庄上人都打么？）那人人见着啊。他不说，斗，打。（笑）猛劲的打。（您打过吗？）谁都打过。咱们这你不打不中……

（笑）老黄（指宗藩）啊，你还不跟他划清界限啊？（当时打得狠吗？）那屁股蛋子那，棍棒。那我们这搞得不狠。我们这土改也好，平分也好，没打死过人。大应家谷打死仨。（是地主吗？还是老干部？）那都死了。那都左。你讲话，没，它不到这，不破坏他东西。打死？（打死也不违反政策吧？）那咋叫违反啊？反正谁打谁上末股了了。那都没人管。（笑）打起来不好说。（打过干部吗？）没有。（新干部也没打过老干部，老干部也没打过新干部吗？没有？哦。）——你反正那是报复吧。（谁报复啊？）那谁报复啊？谁输了报复那输家，还报复那赢的了？

这阵儿在村里保家的董海后来就去卫国，他自认是看人看出毛病，招人报复：

去我们仨。林奎也去来着，冷向权，这都去来着，干部。那时候那阵，工作组（要求去）。这到那，那都去啊。他把人家糊弄去了。到那，是吧？赶黑家，知不咋捅咕捅咕，走了，就把我们仨留下了。都回来了。我说这有鬼，我心里话没办法，我回来吧。那耍啥阴谋？耍阴谋了。我们那时候因为啥呢？净看着的，也有看着的。（看着谁啊？）干部啊？我不说拉咕，我说我不拉呢。（你们看着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打架啊，他们俩不和啊。把你圈起来，你给看着点。你看哪是啊，你说谁是……不说？这没法弄。（你们当时看着老干部？）今儿看他，明天看他。轮着呢。（今天看老干部，明天看新干部？）那新干部，那阵，谁当家，就不看着谁了。那都看着？（笑）也就这个人家呆着。不让瞎遛达。该送饭了给送饭。（那您那会儿干什么啊？）没干过。当干部当不了，没文化，不给跑个腿啥的？看人，找啥呀，找谁谁谁。

其实要说董海后来也是自己主动报名去当兵的：

我这一看呆不了，就赶紧的走了。走了，我推了推，谁再找我找不上了，是吧？（去哪了？）当兵去了不？（您是自愿去的？）啊，那是……（那您怎么就跟着去了呢？）没说是告状。说上那讨论去。讨论去，看怎么办？找他们让这儿解决了……他们以前那个，都是要好衣裳，要好地，要好房子，就是当兵这事。我说我啥也不要。我说我去，问题不大，把我家里孩子，几家老人给我照顾好了，我就感谢关心，感谢人民。我回来就这么个事。（那您这个当兵是有人报复吗？）没有。（那象林奎、冷向权他们去当兵是有人报复吗？）他们？没有……是报应……我回来我啥也不是。就种地。是事不掺和。没好处。（您受过报复吗？）我咋没受过报复啊？报复我这人都没了。这不文化大革命又找我，冷向权、林奎他们。那阵儿活着呢，当下说这话拉这个。那阵我可不拉这个。拉这个可了不得，又得挨整。一宿不让睡觉……出头的椽子先烂。

自知结怨的董海属于“被迫”“主动”去当兵，好在他如今面对我们，不那么怕再挨整了。方子合是董海当法警时的“同事”，也是和他一起去当兵的战友，而其父方顺不久也走了。按支树林的说法，郑各庄老方不是好人，尽挑拨。后来庄里看不起，把他撵走了。我们问董海：

（他爸怎么就搬走了呢？）在这受气嘛！我不拉这个。（笑）他爸就是一个狠！对谁都狠。（狠。得罪人多？）啊。（他得罪谁了？）那咱们哪儿说去？各办各，那时各办各的事，是不？

方子合一去不复返，我们在邻庄找到了他，他似乎已接受过好几次来自西村的“查证”：

我由45年到46年搬到西村的。那时候我们家老的不是穷吗？到处讨着吃。那里有个大地主，叫黄啥的，去给人家看园。我呢到那儿给人家扛活去，放牲口去。就在东沟有个看果园的窝棚。以前都是趴五道庙子。46年8月顽军进攻，我就当兵去，到那儿打散了，没组织了，我又回来了。回来赶到47年，这才又去当兵去。46年是从东村走的，走了几天。那不新兵吗？没组织好，让顽军给打散了。顽军把区小队给打散了，谁也不管谁了，就又回来了。是补充团。回来还是继续扛活，给人家放羊。到了完秋，法大纲，贫农团把羊都弄没了，就不放了。我是

在西村参加的土改，在西村实际根本就没呆着，就在外头放牲口。

方子合是标准的苦大仇深，9岁放猪，10岁放牛，14岁放羊，如上所述，种种机缘使17、8岁血气方刚、满腔愤怒的他在运动最高潮时正好在西村，接下来的一切都那么自然：

赶到47年冬天，阳历11月吧，回到西村。西村运动那时候不是搬大石头吗？那时候年轻，是吧？说是穷家主都得参加，那也不用说了，就参加吧，是吧？参加。参加了以后，实行运动不是吗？那时候黄宗藩不是办事员吗？区里叫啥不知道，咱也没文化，傻了叭唧的，就组织搬大石头。那时候黄宗藩不是被圈起来了嘛？区里组织就让打呀。人家让打，谁敢不打呀？是吧？赶到11月底，我一看不怎么样，这阵儿脑筋都有点儿通了，那正组织扩兵呢，我和董海、古兴得，还有一个叫黄啥的我忘了，我们四个一块儿走的。新干部？没什么大印象。其实我说是搬那庄，根本就没呆着，就呆了几天。呆了两个月我就走了，当兵去了。我扛活又在东庄。西庄人不认得，没有朋友。一起打的好几个呢，负责人主要是区里——有姓林的吧？不知道叫啥。因为啥？我在山上住着，跟谁也不来往。可搬下来了，我又扛活去了。之后又当兵。我前后在那庄也住不过俩仨月。（那些人现在还有活着的吗？）那说不好，我也不去，就知道有董海。我当了六年兵，以后就直接回到这个庄上。回来，刨去开会，不去西村。（您父亲在土改的时候还当过负责的吗？）那我都说不好。那阵儿我就知道跟着开会去。那时候人都蠢，也知不知道咋回事儿。当下就中了，哪儿都懂得。那时候就跟傻子一样。东村那家就算地主啊。西村地主——叫啥？也就是两三户吧。富农可能多一点儿，那时候咱也不问。要有文化的人能写个记载。扛活的就懂得搞着吃。（那时候西村开大会会有诉苦的吗？）那说不好。我们都走了。一般到48年才正是诉苦呀。我咋知道？在外头当兵诉苦呗，在部队里。我没看见在西村大会上谁诉苦。（打人是誰让打的？）就是区里的。（是区里的还是工作组？）那工作组就是区里，区里就是工作组哟。（不是贫农团让打的？）那不是。（那时候有贫农团吗？）那哪知道啊？那时候我不懂得啥叫贫农团的。（后来西村搞运动，有人来找过您吗？）找过，问过。问打人，我说那就是当官的让打呗。董海——我们在一块儿，我们都挺积极来着。他也是一个没头脑的人，也是大老粗，人家让咋着咋着。你要有文化，脑子转转个，也好办点儿啊。（46年您当兵也是自愿的？）那时候我在东村，要饭也要够了，扛活也扛够了，没出路都是。

如按其说法，他对当时自己这边的新干部、贫农团、工作组及自己斗争的对象——地主和老干部几乎一无所知。当然我们宁愿相信，他或许是经过日来许多查证后，自觉不自觉地学会的闪避，这一点在他不断地反问访谈员的反应中也有所体现。

四法警中也不都脾气暴性，黄臣就是个村民皆称的大好人。有个“黄臣卖猪”的故事，说的是他去四卫所大集卖猪，回来后认门的猪也乖乖地跟了回来，拿了人钱的黄臣又把猪给人赶了回去。当然这是解放后的事。当时黄臣如何我们已不得而知，他自己对那一段也是讳莫如深，二次寻到他时，竟不由勾起他一肚子愤懑之情：

（怎么挑上你们四个人的？）那时候你说怎么挑上的？（激动）那时候，你在这一群人里头，当头儿的，这也就这样啊。（是工作团指定的吗？）不是。（是群众选的吗？）那反正选不选的，有啥事儿都找这几个人。法庭说“开庭了，把谁谁谁找去”，就找去，就管这个。找来了，到这问了问，“送回去！”就这样。（是个人主动干的还是上面派的？）派的。你主动？我想干这个就干这个？那不是。当干部的没有那样的。法警不算干部，挑的都是贫农。（激动）你就是当个组长，也得有旁人，不是你自个想的不是？我那时候是民兵不是？当法警就是法大纲那一段不是？都是从民兵里挑出来的不是？（那当民兵也是别人来找你的？）那可不？当民兵也是按岁数啊，差不多的都当。那你当官的，当工作队的要说和气就和气，要不和气就不和气，那你看跟谁说话了。你跟贫下中农整天嗷嗷的还算了了？你跟富农地主和气了那还中？

四个小伙子生逢其时，在那短短的几个月里，伟大的任务被放在他们身上。“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人人必须回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一切生活境遇的改善联系在一起，而求索其答案的过程又绝非请客吃饭、绣花穿针。他们曾一度以为站在了多数人的一边（并且实际也可以说是这样），代表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了专政。他们是“枪”，

因为他们无非只是代表，其实全体村民乃至工作队员都处在范围不等的群体的压力之下；而他们又不只是听人使唤的“枪”，他们在这欢乐的戏剧中获得了快乐，因为正是在同样的群体中他们获得了心理的解放。政治一时间由精英的筹划成为大众的节庆。而这种节庆今后还将以不同的方式一遍遍上演，因为社会关系可以在政治运动中得到敞明、建构、解释和改造，而个人关系可以转化为社会关系、阶级关系。

## 十七 告状告来工作组

村里斗来斗去相持不下，自然得向上级寻求支援。法大纲前后曾有过几次村民告状事件。老干部这边人去行署找熟人告新干部；<sup>70</sup>而林志则率全村 80 多人去县里告老干部。自觉“上支下派”花了气力却又得罪了人的支瑞万滔滔一番话，整个告状的前因后果一览无余：

林志他看着宗藩，林奎，老干部，哼，开会时候大了，兴上哪儿喝点酒去，吃点饭去，也有时自各花钱，我跟着吃过，自各花钱。他就看不公。（是工作组把林志他们扶起来的？）不是！林志他们弄起来的。（他就招了一帮人？）他招了一帮人，zhao——造反呀，写了（状子）以后，都上县城打官司去。大伙哄隆隆我们庄都去呀！县政府也没治了，上中央请示啊！这中央派了军区工作团么。见天开会。宗藩、林奎、冷向权那阵被他们打下去了不是？捆着呢，生捆着，家里给送饭呐。了解你得了解真实了呀！你得慢慢了解去，问周围人到岁数的，年轻的，年老的，都得打听了，是咋的，到底是怎么样，你就稀里糊涂把人家就弄死不中啊？了解清楚了，没事人家！又把人家放了！林志倒霉了，枪崩了。（找您了解情况了吗？）他找我？还找我？我跟他们是一码事？我跟宗藩他们是一码事！他不找我不是？赶林志那一码子人找他们了解才清楚呢不是？一找一问，为啥你整宗藩你们呐？因为啥你说说，把这理你说说。说不出来……那事多了。弄个半年把宗藩他们都翻过个来。把他们新干部都按倒了。黄荣他没受病，和宗藩头批硬杆子了。别人受病了，那好几个呢。吓死的（指毛老八，见下章）——没法拉。不拉那个，没好处。要拉那个，犯不了病了。没有了，他们这些人就剩宗藩自各了。他们那些人都来回翻个。他打他一回，把他打够呛。他又翻过来，又把他斗。就来回折个。折好几遍。林奎大狱押死了。林志枪崩了。这都里外翻翻的。他翻过来，他又和他一拨子。整死。他又翻过来，他又整他那拨子。要不我们庄死不了人，那我们庄死人也不多。这么大庄才死俩仁子。没碍着我。没找我。我总干来着不是？哪边也有我。（那会儿打得厉害吗？）有的厉害有的不算厉害。不太厉害他也记住了！那他哪有不记得？我谁也没打过！那还记着我们这。那还是恨你不是？那我上支下派呀！（下指宗藩不该在日后“报仇”）我也没打过你，我也没骂过你。你们下去我还干着呢！人家和我要人我不给？

支瑞万当年带着基干民兵（后来又是人民法院的法警）拘人紧人，50年后在大队（虽早没了公社、大队，村民仍如此称呼）看仓库，因某种疾病只能终日喝点白酒代饭。他后来两边都不落好，肯定觉得告来告去、争来夺去特没劲。林起洲当年选举时就当了刺儿头，后来就和另俩“傻”人上区里告新干部，替老干部说话。他对老干部特同情：

老干部那时候的确不易，整天东跑西颠的。哪个干部没有点主观性？新干部也不好干不是？其实人家老干部以前对敌斗争挺了不得的，埋地雷啥的，哪都是据点。八路军男的女的来，掩护，把人藏起来，艰巨的任务，不惹人？那时候农村敌对斗争，汉奸，秘密通信的，直接就活埋你。你埋他，还有走狗，偷着往据点送信，汇报情况。你当个农村干部，他不紧着点，不惹人，中？这个得从敌情方面考虑。他真要是啥工作不干，尽顾着私事，把自各家弄好了，这咱们可以提意见。说老干部贪污，贪啥啊？也就是吃点，照当下那都表不着。那阵我跟林奎他们掺和，后晌了吃点饺子啥的就算不离。那群众知道了还提意见，也得偷着吃。老干部也有不对的地方啊，他不都完全正确。可是说也没有忒大的啥各。你指着谁当干部一步俩脚印这么正

<sup>70</sup> 起初是宗藩等人的熟人苏远兴任十区区委书记，47年年底升任县委书记，故西村老干部开始是到区里求援，后去县城左近行署驻地告状，而县里正弥漫着“搬大石头”的狂热气氛，支持代表群众新生力量的新干部。

道啊？没有，比较的还不离。

最让他不忿的是林志之流新干部头当年也是一块儿掺和的兄弟，自己不好好干，还栽赃，群众也跟着起哄，更何况群众里面有不少自己就该挨斗的：

林志和黄悦是一心，偷着把财主家好东西象毛衣啥的都弄去了。林奎和宗藩就不满意。这就有意见不是？互相之间为着这事都不心平气和，弄了两势，结了两派。你看我跟我们家叔叔（林志）都没在一块，跟林奎这远点的我们在一块。群众不知道是新干部多拿东西，我们都知道不是？那阵儿群众还选老干部？法大纲以前，早就有苗头对准老干部。大伙开会就选林志他们当主任。那阵儿我们村道门多，蛤蟆仙，龙华会。入这些是迷信的。那也是一种统治。庄里人入那个也多了。都是入蛤蟆仙、龙华会的当头了，都是中农、趁户的这个玩意。那还中？这直接就是破坏咱们政策的。属于选他们的全是这个。这庄乱得去了。那我最清楚了。选举时我没举手，我们家叔叔我也没举。这庄那复杂得去呢。我们都看着不公平。不公平也不中啊，少数啊。可群众既选了你们新干部上来，你们马上就得往好里去，这啥好的都拿了，往后还了得？群众他不。他有早先老干部那底子那个劲，正选上新干部，心服口服，信任他们呢。他们弄这个东西全知不道。我们在这北院都清楚不是？根本，他们也没瞒着老干部，你看林志跟宗藩啥的也挺不离的。你反正宗藩也不是主要负责人了，选他们当主要负责人了，是啥都拉不是？后来全完了。林志都叛变了，不跟老干部一个思想了。那时候群众对老干部相当不满意。你就是国家干部也不中，跟这老干部这扣帽子。

干部起内讧，群众又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看来村里是待不了了，只好到外面找救兵：

老干部就找我们，说让找行署。当时也不知道苏永生已升官了。去行署告状正是冬天，没过节呢。我们去行署告诉苏永生后起先没回村。区里先派了工作组，一个劲儿广播说让回村。苏永生说村里派工作组了，你们回去吧，让你们做啥也别怕，绝对没事，你们就放心吧。那听他的话不是？回来就捆起来了不是？让群众看着，让打呢。工作组拦也不中。群众那阵那高潮了不得。回来就捆，捆上就打，拿棍子这么往下砍着打。方子合最狠，说打就打：“告上来咧，群众说让揍他们一顿！”还有支富也急着呢，狠了去了。黄荣、杜凤是法官，问案子，他们一句话，“吊起来！”后来老干部是在办社以后，林志他们一死，这才慢慢一点一点弄起来了。

“掌握着群众”的新干部这边更不示弱，董海就去告过状，打那回来就觉出不妙了：

（您为什么跟着去呀？）观点不一样。我向您说，是吧？不管咋咱们得占一头不是？你不能两边一边一头扭。（有两头扭的吗？）没有。（去的都是站到这头的观点？）那可不？（那就是您对老干部有点意见，是吧？您不说您站了一头吗？您对另一头有点意见，是吧？）没意见。（那您没意见您怎么去行署，跟着一起去的？）都去了，净去的。那不是一件好闹的事，闹了妈的好几个月呢。

董海说得有些糊涂，其实当时去告状的村民大多也很糊涂，只是非得“占一头”：

新干部是发动群众去告状啊，我也去过。那阵儿开会，都让跟着去，每家去一个。（那您觉得老干部不好吗？贪污东西了？）咳，当干部哪有不贪污的？谁当干部也得贪污。干部对干部就是不和，里面分赃不均，闹意见，就介这上面引起。那阵儿你不去也不好啊，你不去又是跟老村干好了。谁也不敢……（那你不怕老村干报复？）那人多他还报复过来喽？他报复不报复群众，谁称头他报复谁（冷向有）。

显然，对于上中农冷恒合的儿子冷向有来说，去是随大流，不去则是出头的椽子。

现在该谈谈工作组了。西村肯定来过不只一拨工作组，有最初来搞清算解决土地问题的，也有告状后区里和军区（即行署）派来解决干部问题的。麻烦的是，我们无法区分哪些印象属于这一拨，哪些又属于那一拨，即使村民自己怕也弄不清。反正有四、五个人来村。东村办事员冷向清在挨搬后不久即得了解放，对工作组印象还蛮不错的：

清算那时候是工作团，文化也挺高。有叫奚仁贤的，管跟前这几个庄，自己在西村住。这村是洪图，管咱们庄，比奚仁贤官小一点儿，咱们看着也就是副组长。也有女的，是方燕。洪图在这蹲点，咱们没少佩服他。下雪，我们都在太阳光里呆着，他在雪地背阴地里呆着，也不

穿个袜子穿个鞋，成天地讲话，也不冻脚。洪图他们工作组来，住在贫农那儿，扎根找贫农，慢慢找着座谈。他们要找勤谨的，还要找阶级好的。

县里老干部孙继峰当年就被派下去当过工作队员，“面上”的情况也比较了解：

凡是有工作组的都很左。所有老干部、出身不太好的、平时工作有点矛盾的都被打下去，有的整个支部都被打成国民党。虽说也是发动群众，但群众不也是听工作队的？工作队一进村都得找穷朋友，干部都不相信。队员都得扎根串连，尽找扛活的，家里不趁啥的，在人家家里住，一块儿干活，摸清真实情况。然后再逐渐串联，发动群众。一般穷人都好交，去几天就熟了。下去之前一般都先学习一阶段政策，进村的基本工作方法，我认为工作方法挺简单的。但我本人未学习，属于直接被调去的。

方子合家按说最穷，我们很感兴趣工作组在他家下了多少功夫，但得到的回答很出意外：

那时候工作组经常找穷的，找我们家。（发动你们？）那可不？说啥没什么忒大的印象。没在我们家吃过饭。那阵儿工作组一般在比较趁点儿的人家吃饭。在我们家吃啥呀？吃糠咽菜，你又不吃。一个厢屋两间，一个炕一个锅台，一个窗户地。没啥粮食，借借找找的。

由于现有土改一手文献大多是当时派工作组搞典型的试点材料，或者是跟随工作组进村的知识分子的记叙，所以感觉上似乎每个搞土改的村子都派有工作组，而且其作用还挺大。不过，按冀东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在每一个村子都派常驻工作组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通过试点发掘典型村的经验，然后加以推广，发动村中自身积极分子力量。然而，村庄此前虽然缺乏动员和组织，但远远不是没有组织形态、没有权力斗争的一潭死水，等待着外来的工作组去搅动。

## 十八 划下成分好参军

按正史概括的普遍步骤，工作组来后宣布大整党，全体党员停止党的生活。工作组和贫农团研究划成分，看当时、查三代，给宗藩划上没落地主。所谓看当时，就是土改前几年他家还有 27 亩地，雇过长工、短月，有剥削；查三代就是他太爷时有 200 多亩地，雇过 10 个活。全村成份划好后就研究了斗争对象，一共斗了黄延田、黄延藩两户地主；宗藩一户没落地主；钱惠、黄龙春、董祥庆、黄贯东、费远盛五户富农，但富农基本未挨打（参 65/4/7）。

五户富农中其他已说得不少，至于钱惠，我们知道他“义务教书”，还把房子“无偿”让予贫农团负责人林凤家住，显然有腐蚀之意。据说他是靠卖大烟发财，支瑞万称 13 岁（36 年）时给他家放牛 5 头，家底可见一斑。钱惠常读报，善于把握形势，留下了许多故事：

钱惠尖，一看八路军要成事，他就败家，他爸爸置的地他都给败了，儿子都参加革命。大儿子没解放就参加革命，当秦皇岛财税局局长。<sup>71</sup>二儿子是南方江西八路军大队长，三儿子是文工团。女儿过给李家，现在是国家大干部，北京啥厂的。出不尽，还是富农（董印）。

钱惠闺女叫李宗英，现在在北师大，16 岁时因为她爸爸挨了复查不行了，这人在地方上有些影响，地方八路军啥的对她印象都不错，就把她介绍到李春光<sup>72</sup>那儿，当时是 15 军分区的一个司令，解放后是天津气象局的局长。她到李春光那儿给他清扫啊，看看小孩啥的。后来李春光看她很勤快，把她推荐到国棉六厂当团支部书记（林起远）。

林起远再次展现出比村庄“野史”的传播者更高的视野和更权威的信息。下章我们会从大白活阳有志那里听到有关钱惠的更令人惊讶的传闻。不管他是否属于开明士绅，钱惠未能赶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势之前出尽家财，还是被划为富农，所幸至少土改时未挨着皮肉之苦。村里这些富农要说运气还都不错。不过还有运气更好的。村民大多说，其实论家道，有几户日子不比他们差，但要么因人缘极好，多行周济，“你管他借驴，他喂好了给你牵来”，要么属于大户，被保了下来，最后划成上中农或中农。而这是个决定是否属于基本群众的关键区分：

黄龙春、董祥庆、费远盛这些富农其实日子都没冷恒合硬。老林家保着林起华，林起华比

<sup>71</sup> 实际是钱惠二子为该市交通局长，文革被打成反革命回村监督劳动，人缘蛮好。

<sup>72</sup> 即前文黄延青说的林惠那位“行署朋友”，曾任中共归远县委书记、冀热辽区 15 地委城工部部长等职。

冷恒合还硬，在万字号有买卖。这杂拌姓群众不服划冷恒合（为富农），冷恒合人缘好，穷人去借点粮食借点钱不记帐，有心就还，没心拉倒。林起华和冷恒合住前后院，日子差不离，就跟着冷恒合沾光了。把林起华撂下（即划为富农）就得撂下他，把他俩撂下就得撂下支柱林他们。他们的日子都比黄龙春和董启他们硬。一个保长、一个先生，这俩挨整（董印）。

如此说来，西村并没有单纯执行经济主义的阶级划分。姑且不论董印的话是否属实，不考究当时是否有家族势力的侵入，有一点可以注意，这些上中农大多是以往所谓“二等户”，是盛行换工互助、伙养牲口的村庄中经济庇护关系的重要支柱（地主不易接近且较早离村，而其他富农又多有些不三不四）。由经济关系到社会关系、人情往来，在定成分时多少占了些便宜，毕竟除了赚多些钱，都没有什么民愤，也不曾欠下什么血债，又何必死跟人过不去？

无论如何，具体的阶级划分和分地此时并非决定村里局面的重点。或许村民和我们的叙述都多有前后颠倒之处，这一是由于记忆的混融，也由于当时确实存在许多反复。此后（？）种种告状、老干部被斗被抄才是焦点。据四清结论，当时老干部被批斗罪状主要有三点：一是贪污、私分清算和复查浮财及克扣军属粮钱补贴；二是被指为国民党；三是宗藩是没落地主（这也是核心）。宗藩被斗后拿出房子六间半，一部分浮物，七分园田；同时没收其 11 亩地，留下 21 亩。分胜利果实剩下东西分给他一个旧板柜，两口缸，两块洋瓦等（参 65/4/7）。

分完了东西，土改就能结束得了吗？

许多人觉得把精力花在锄地、掏粪和打井上要比开群众大会、搞审判、拆炕、挖坟好处更大。到底要折腾到什么地步？谁家真能有保障？农民拥护用暴力打碎旧制度，但如纯为掠夺、惩罚和报复而使用暴力，未免太残酷、愚蠢。大伙心里无疑都这么想，因此就渐渐消沉，不肯积极参加新运动的人越来越多，领导就催得越来越紧，使村干和许多原来一直全心全意支持他们的村民之间产生了隔阂。命令主义之下，群众大多也只是服从或不敢违抗。那些“酸溜溜”的家伙会被扣上落后帽子，会被抓起来揍一顿，受罚额外为军属多干活，为前线抬担架、搞运输，甚至被送去参军，不过往往会被部队退回来（参韩丁 1980 章 23）。

在张庄，韩丁发现了运动的持续高潮带来的副作用，而我们在西村也看到了这一点。内战爆发后因冀东战略位置很重要，归远始终处于动员参军、出担架、大军进关过境等浪潮中。正史以许多数字雄辩地告诉我们：农民得地翻身做主人后，明白卫国方能保家的道理，参军情绪高涨。47 年 7 月县委和冀东军区在归远组织两千人随军远征担架团赴辽西参战。9 月中旬开始扩军高潮，九、十区打擂台，组织动员翻身农民参军参战的扩军竞赛，“但也要注意把口子，不要是个就送”。不到 20 天全县 1315 名青壮年报名参军。48 年 5 月首次担架团归来，6 月又组织担架团，8 月返回。12 月归远又组织万人担架团去平津参战（冀光 1947）。

这几年里西村先后共 12 人参军，仅 48 年就有 5 人，为国家的新生奉献了两名烈士：黄贺余、古兴得（归远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0P653；《硬杆子精神放光芒》编写组 1975P22、35）。但村民屡屡提及，在当时大小环境的激烈斗争中，征兵屡屡成为争权夺利的嫁祸借口、压制群众的整人工具和一走了之的避祸手段，尽管谁都知道保家卫国的大道理，得地报恩也是人之常情。烈士黄贺余的弟弟黄贺保（现村治保副主任）对访谈员如此说道：

那阵老干部开大会扩军，捡这哥们多的。我们哥俩不是？老林家这林起友他们哥四个都没有。那阵儿都是捡软和的欺负，扩军出去都死不是？我爸爸软，回来说我们哥俩，必须让我哥哥出去当兵去。他原先在麻家峪给人放牛，头天接回来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走。补偿是按照一年代耕 6 个还是 8 个工，过节一开始啥也没有，五几年以后才有那么一两斤肉。就这 6 个工我也始终没有看着。村里也始终没有找过。

其实他父亲黄广是如假包换的贫农，和黄荣是一个爷爷，为何还如此忌惮？黄贺保道：

那有不愿意去的，不愿意也不中，干部拾掇你。齐瑞春俩儿子，让他大儿子去当兵，不去，不去不中。后晌冷向权、黄龙祥、宗藩他们几个假装做别的事，把一大盆白薯秧子搁在门上，齐瑞春进来，把绳子一拉，整个扣在门下，浑身烧得都是泡，说你去不去？到了还是去了。齐瑞春后来搬大康平村去了，大儿子可能也牺牲在外头了。这事庄里都知道。我爸爸就念叨：“要

不去，跟齐瑞春似的，咋弄啊？”

黄贺保解放后成了刺儿头，齐瑞春则再也没回村。而老干部不久也将落到同样的命运。47年底老干部被放出后，新干部曾想让他们都去参军，林起洲说：

先圈起来打，然后说给你们一条出路，让去当兵。那工作组还不乐意？都去就都去呗。那阵谁当兵去呀？脑瓜子掖裤腰带上啊。好多那时候都将够岁数，都说要剪草除根，永远也别让他们回来了。

不管谁在台上，反正这几次被送到征兵站或主动参军的主要是一批中农（子弟）如钱德、钱得泉、冷向有等，法警方子合、董海，老干部冷向权、黄龙祥、林奎，以及告新干部状的林起洲、古兴得和林起满三人。冷向有说：

土地法大纲平分时候扩兵我去来着，到区公所，领到收兵处检验，没检验上就回来了。我们去了好几个呢，挑上了两个，董海和钱德站住了。我和林奎、黄龙祥三个一起回来的。钱德脚有毛病，去了些日子走不了，就回来了。董海去了部队，打仗，部队让人家包围了，他让人家裹了去了。赶到解放以后，也知不道他是咋回来了。我是因为眼睛不好。那时候没人愿意当兵不是？脑瓜子掖在裤腰带上。那时候县城还驻着敌人呢。怎么挑上的？那阵儿土地平分，我们老爷子给报的。不是每家都报，开会动员，谁爱报谁报。那阵儿都是打（击）这个中农户啊！找一块儿开会，让你当兵，不当兵都打（击）你——复查喽。钱德也是中农户。董海也是。

林起洲说林奎等人精瘦，征兵处的人根本不要。宗藩未被送去，可能因为他是没落地主（另一说是打得太厉害，身体太差，不能当兵）。征兵中也有意外发生。黄俊盛说：47年征兵时村中冷向权、林奎当干部，作球抽签决定人选。干部舞弊，10个球有9个去，一个不去就被干部捏着。全村几乎被一锅端到了黑驴沟。征兵的问是否自愿，说不自愿，都跑了。他和黄俊平一起到唐山下了煤窑，把饭票赌输了就跑了回来。村民有许多则说48年年初征兵，因没人愿去，新干部干脆把全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一锅端。但据说那次到黑驴沟征兵处，被选上的几十人在林志怂恿下纷纷逃走。林志告诉这些人说让郑启仁（保长三子）带去唐山下窑。也有说是去投在日本航空部队做事的黄延清，到那儿日本不收才下的窑。总之许多人直到6月才敢回家。我们不太清楚这两次“一锅端”是否是一件事。因只有住在南岭、又长期在外走庄串村的货郎黄俊盛提及老干部作主的这一次。正史定论后一次是林志被处死的头条罪状。其实无论此事究竟如何，颇有些村民反倒觉得林志替这些新兵的父母做了好事，他们终归认为征兵时有强迫命令和不公现象。东村的情况也不是太好，周国珍说：

东村那时候去参军的也不少，都是花粮食雇。去一个当兵的，庄里都是花一担棒子什么的，哪家也不愿意去，怕打仗给打死了。庄里这粮食也是按地亩摊，然后把粮食给那些参军的。哪儿也这样。早先参军的都是这样，拿粮食。那时候也不检验身体啥的。

如果不是部分基层干部的问题，善良无私的村民应该不会表现出如此低的觉悟。在恶劣得多的抗战时期他们支持了那么多年，真正当了主人后，不会不懂得舍小家保大家的道理。加入自己的“子弟兵”绝对应该是件光荣的事。两位胸怀宽广的好公民有着我们意料之中的认识：

家里哥仨哥俩的去。他们自各乐意，村干部再做做工作：去吧，你也不保家，我也不保家，咱们这家哪儿来啊？只有（有了）大家才有个人家。就用这个办法。48年我想去当兵，那批兵扩了，没让去。我是56年入党的，一个党员，就得按照党的工作，说实在的，你从思想上，不按照群众一般要求自己（朱柱）。

你看我这脑筋这么老吧，扩军我都劝年轻人去，走光荣大道，别走小道。当兵去是为了救中国，有了国家才有家不是？没有国家你哪有家呀？先救国后持家呀！（冷向义）

## 十九 认识老区的特殊性

历史的年轮以公元纪年的规则转到了1948年。共产党在全国战场上正以自身也始料未及的加速度逼近一统大陆的那一天，全国普遍土改的时日已经不远。在华北老区、半老区，过去

两年的运动高潮成效巨大，但也隐含着一些绵长的危险。而在西村，新老干部大战一场后，或许是大家都累了，似乎突然进入了一个缺乏记忆的阶段。该打的都烙狠了，该看的也圈怕了；该走的走完了，该杀的倒还剩些气数，蛰伏待变。地富已经没得斗了，西村的运动该往何处去？

同样在 48 年的 1 月，韩丁面对彷徨的张庄，怀想广阔的乡村，种种疑虑浮上心头：

剥削和特权，有时在改头换面以后依然存在。几乎没有什么被永久地确定下来。建立在千百年传统之上，并且由风俗、宗教、儒家伦理和雇佣军的赤裸裸暴力支持着的地主阶级的独裁统治，被一批过去无地或者少地的年轻农民暂时取代了。他们苦大仇深，积极热情，勇于创造，向往美好的新世界。然而他们还有私心，很容易走上追求享受、滥用职权的歧途。在突然被推上领导岗位之后，既有成百荷枪实弹的民兵做后盾，又有绝大多数分到“果实”的人民群众的拥护，他们将如何行使自己新得到的权力呢？这些领导人是从旧社会的污泥中爬过来的，身上还带有其出身的印记，他们有没有见识和能力来纠正那些损害运动的过火行为呢？他们能不能摒弃凭着领导地位而取得的一些特权利益，领导所有的穷人站起来，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搞大生产——包括自耕、互助和集体耕种，使张庄摆脱过去那种绝境呢？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见识和能力，那么谁有呢？（1980 章 24）

中央越来越发觉老区土改高潮下的问题。就在元月里，刘少奇、任弼时、习仲勋等中共高层领导相继就老区土改中“左”的偏向发出警告。1 月 4 日习仲勋向中央报告：老区情况特殊，中农多，贫雇农少，地富少于 8%，不能扩大化（已发生制造地主情况），发动群运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左倾形式主义。老区许多历史环境决定了即使发动起群众，也不会象新区那样轰轰烈烈。有一村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另一村农会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司捆打吊烤，人心恐慌。许多地方所谓“群众自发运动”实际是“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的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大部旧干部和地主、富农领导的），让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习仲勋 1948a）。半月后他直接向毛泽东报告西北土改情况时更加直言不讳：

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烤、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有几个村庄，连贫、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县乱搞不及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是地、富成份下降还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故这些地区组织起来的贫农团在群众中无威信……土改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对人民的生产有帮助。不然，群众连开会都不积极参加，叫“穷开会”、“开穷会”。这种批评是很对的。诉苦斗争也不应准备一套形式进行（习仲勋 1948b）。

12 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讲话时强调反对使用肉刑，并将乱打乱杀的原因归于党内不纯，地富投机分子和流氓分子趁机捣乱，造成乱打人、打死人、逼死人现象。他明确要求“对被审查的干部，准许群众放手批评指责，但不准动手打人”（任弼时 1948）。<sup>73</sup>

23 日刘少奇指示薄一波等：在反对右倾及强迫命令的领导方式后，左倾错误及尾巴主义已经成为主要的危险。老区封建残余已经不多（地富财产及贫雇农都不多），所以仅限于土地问题常常不能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而必须结合整党及民主运动（刘少奇 1948a）。

2 月 8 日阜平中央局提出：党的健全领导、贫雇农群众的领导骨干和全体中农的团结是边区土改顺利完成的三大环节。部分贫农团，主要是下乡干部，对支部党员否定一切，脱离了一些实际并不坏的干部党员。对乡村支部和党员干部必须治病救人，决不可冷酷打击。但中央局也同时肯定道：一切村级地富成分党员党籍仍应停止，坏干部仍不应复职（阜平中央局 1948）。

<sup>73</sup> 柯鲁克夫妇 1982 节 13：上级后发现对基层党员干部看法有误，及时发文纠正。但 48 年 1 月 12 日任弼时所作讲话因战时交通隔绝，直到 3 月底十里店才收到复印本。这又是一个信息沟通渠道的落后妨害高度组织化的动员体制的例子。

2月11日中央指示：纠正土改宣传中“左”倾错误，不能单纯提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许多地区错误强调“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成了尾巴主义。要避免陷入急性病，避免整党中的唯成分论倾向（中共中央1948a）。数日后中央发布《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旨在纠正党内广泛存在的在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补足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民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避免左倾错误。草案强调阶级划分标准的唯一性和具体操作中的复杂性，要求坚持典型调研，建立健全人民法庭审议制度。草案逐一说明了许多具体问题，反映出土改正开始认识并正视各种复杂情况，逐步走向成熟，以及对前段运动中过激路线的反拨努力。草案还通过一些具体界定表达了对土改后发展生产的倡导，明确提出中农多余土地如本人不同意则应保留，多余财产一概不动；在加强对中农政治教育前提下保护其政治地位，协调其与贫雇农的村庄内部关系。至于以往依靠的最基本的群众，草案也清楚意识到他们在运动热情外的种种主客观局限，着重提出贫农团须同时担负斗争与团结之双重任务；民主政府应负责帮助全体贫农上升；党应经常注意提高贫农政治觉悟，使其能经常成为乡村中的良好领导者（按：即可适应运动高潮过后的日常管理）。

吸取前段运动过分杀伤人命的教训，草案还对各类犯罪分子作出了具体认定和不同处置办法，规定除战斗和紧急情况（比如罪犯实行凶杀时）外不得直接处死任何罪犯，以防滥杀。原则上不得在村直接设人民法庭：审讯工作应尽量进行调查研究，应允许被告有充分辩护权，严禁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不得指名问供（中共中央1948b、c）。

尽管中央已逐渐发现偏“左”问题，但基层思路的转变尚需时日。1月9日冀东区党委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推进平分高潮。区党委批评某些县、区委害怕群众的大量自发（而这十分需要），不敢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或规定一套主观的计划步骤和截然划分的工作阶段；有的则仍采用已经过时的“手工业”式的交朋友方式。这些均不能适应目前革命形势，忽视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感情与要求，限制了群众运动的发展。指示就此提倡工作队直接发动贫雇农，鼓励联村串联（中共冀东区党委1948a）。<sup>74</sup>但一个月后区党委在致中央工委并转毛泽东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因某些前段遗留问题未曾解决，基层群众对进一步复查并不积极（中共冀东区党委1948b）。23日热河分局在转报这份报告时指出：少数积极分子与贫雇脱节，贫农团与中农脱节，因而孤军作战，广大农民并未发动，存在严重的孤立、关门倾向。划阶级混乱，把一些中农错订为地富来斗；严重侵犯中农利益，凡比贫农强者皆动，或决定富裕中农土地、浮财一起动，还有许多地方未适时联合中农，待之冷淡，有的即使成立了新农会也只是装衬；许多地方在纯洁组织过程中过火，加之有少数贫雇农想多分果实，使查比工作出现这等尴尬场面：

比苦痛后，前辈作准，三代平均，政经混淆，黑点不要。一户一人，重男排女。一人有错，全家不要。雇贫农出身的长旧村干，不论好坏，一律不要。复查时得地者现在不穷不苦不要。反复查比，比一次，小一次。有的村，一百多户贫雇农，经过五次查比，只剩下十九个人（中共中央热河分局1948）。

其实客观上说，即便不论华北自耕农比例较大的因素，老区、半老区农民经过多年的土地斗争和生产劳动后，经济状况已经上升，中农已经成为农村最大的阶层，由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者在老区一般占中农一半以上。而在尚存的贫农阶层内部，除由地富下降而来者外，其余人生产不能发展或经济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天灾人祸、过去分地不公，乃至好吃懒做、抽大烟、赌博等各种非封建生产关系原因。在这种情势下再单纯走贫雇农路线，甚至采用访穷、比苦、查比方式在贫农中划分等级，势必造成少数积极分子与多数农民相脱离，甚至把一些流氓分子拉上领导岗位，不仅缩小、孤立了贫雇农本身，而且常常会助长运动中的破坏行为（赵效民1990P367）。

中央对这种形势及其后果也很清楚。纠偏开始被正面置于生死攸关的地位。2月22日刘少

<sup>74</sup> 在果实有限、村庄观念尚未完全被革命的共同目标消除的华北农村，联村串斗普遍被证明具有极大危险。张庄一户村民的妹妹从婆家带来2000块银元藏匿，张庄谁也不知道。可妹妹在那个村子被打得招了，于是那村出动大半村的人来起出底财，大吃大喝三天三夜，还请了戏班子。张庄小伙子眼看财富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甚是恼怒，于是将这家的哥哥和弟媳（弟弟出外）打死（韩丁1980章21）。

奇讲话，认为土改应分三类地区：“毛主席说，农民一部是翻身了，一部是翻了半个身，一部则是翻得过高了。主要问题就在这里”（刘少奇 1948b）。3月15日中央工委回复程子华报告及冀东区党委报告时指出：土地会议批评与纠正各种右倾观点后，实际工作中又多发生左倾偏向，批评与纠正命令主义后到处又发生尾巴主义（中共中央工委 1948）。4月底东北局指示纠正冀东土改中左倾错误：冀东在复查与平分中普遍严重侵犯工商业与中农利益：

打人普遍，杀人近×，这是极端严重的左倾错误。如不深刻认识和坚决纠正这些错误，我们将处于极危险之地位……纠偏阻碍主要是干部思想上各种抵抗，一定要用大力耐心说服消除。同时依靠贫雇，通过群众自己觉悟认识，说明纠偏是为了他们的长远利益，注意不要丝毫损害贫雇今天可贵的积极性。纠偏还必须与当前中心工作生产运动密切结合，不要孤立进行，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和团结大多数。目前主要纠正左的错误，但同时要高度警惕右的偏向抬头……冀东基本区目前应停止一切土改斗争，全力转向生产（中共中央东北局 1948a）。

制定纠错具体步骤尚不困难，难的是在自身机制上寻找错误起因。3月初毛泽东致信刘少奇，认为许多错误主要非因坏人捣乱，而是领导机关政策未明确区分可做与不可做之事，而这又系领导者对将执行的政策缺乏充分经验或不重视他人经验，或出于不应有疏忽。经验业已证明，无论什么政策，这样都不能正确动员党与群众。“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毛泽东 1948a）。两周后刘少奇在致毛泽东报告中也承认工委的某些失误（刘少奇 1948c）。4月1日毛在“左”倾最甚的晋绥为干部会议讲话，以分清责任，明确错误，重振信心（毛泽东 1948b）。

革命越来越表现出大众动员后的惯性，纠偏在整个土改过程中频繁发生，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运作机制。“偏”或出于个别的领导方法，或出于政策性失误，或源于执行政策时的经验不足，但宁“左”勿右的情绪不仅是基层干部的错误倾向，某种程度上也是更深层的运动机制的曲折体现。只有偏才能激起“麻木”、“消极”的人们的情绪，所以纠偏也是理所当然。重要的是农民必须参与斗地主，斗争对于斗争者而不是被斗争者更重要。作为动员目标的参与实际上是一种控制机制。动员的目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一种历史参与感，有“千百万的人等待我们去解放”的历史使命感。多数人面对少数人，伟大的理性社会设计面对历史的阴暗面，宏伟的历史进程面对暂时的落后、挫折，又如何能瞻前顾后、温情脉脉？

## 二十 重塑党的形象

赶斗倒了张太，共产党的小组长把三喜的积极活动情形报告了支部，支部就派这小组长去和他谈入党的话。这小组长才跟他一谈，他说：“不是早就入了吗？”小组长还只当是别人已经介绍了他，就问他：“是谁跟你谈的？”他说：“我不是已经斗过张太了吗？”小组长说：“斗张太怎么就算入了党？”他说：“搞翻身不是共产党的主张吗？照着共产党的主张做事，怎么还不算共产党？”小组长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他了解错了，才给他解释怎样才能算入党。解释完了问他入不入，他说：“入入入，斗争了这一回，连个共产党员也不算还行呀？”（赵树理《小经理》）

抗战八年和土改数年后，象三喜这样的情况仍然存在，而且还比较普遍。土改中是否依靠党支部、如何依靠党支部并在此过程中整改，确实非常棘手。老区支部长期秘密是造成与群众隔阂的主要原因之一。革命、战争、解放民族、争取民主、改善民生与实现共产主义，这些观念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好理解的。48年3月20日的《冀东日报》登载：当问到共产党时，有的人回答，“书没念过，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有的则回答：“贫农、好中农都是党！”（转据魏宏运 1996）。在韩丁笔下的张庄，谁都信任毛主席，他的名字就是革命、党和政府的同义语。革命积极分子、游离分子乃至反对派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革命的象征，作为自己行动或思想的根据。政党和阶级之类的抽象范畴必须具体落实，毛主席的个人身体化作大会主席台上高悬的巨幅画像。工作队不得不指导贫农团讨论：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好是坏？如果共产党好，为什么会有坏党员？大家逐渐懂得，党不是延安的毛主席一个人，而是由全国各地

千千万万基层党员所组成；干部与党员不是一回事；妇女也有党员，也能领导大家翻身。

但工作队员起初机械的贫农至上立场不利于群众正确全面地评价党支部。工作队员只找穷苦人家，躲开村支部党员。许多农民马上就看出苗头，把被子、枕头及好看点的衣服都藏起来，把野菜粗粮放到锅里，以观风向。交流进村经验时，某村工作队的汇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开头，我们发现一些贫农能说会道，对村干部有许多牢骚怨言，一味反对干部。我们依靠了这些人，因为我们认为原来的组织都是坏的……我们当时很急躁，以为在三天之内就能掌握全村的情况。我们甩开村里的党员，并且接受了贫农们的要求，把党员集中在一起住宿和吃饭……党员们很委屈，许多人都哭了。村长老婆骂她男人：“你这个蠢驴，当个村头还不够，干嘛还要入党？”

而象搬大石头这样偏激的整党措施也不利于正确塑造党的形象，理顺群众心中为自己带来土地和主人翁地位的党与村中具体党员之间的形象差距。没收运动深入和打击面扩大产生的政治摩擦在农民内部造成分裂，这也助长了某些干部和民兵滥用职权、盛气凌人的作风。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了对整个党的理解。在张庄，参加了强大的党，手中还有枪，一些民兵很快从地主阶级的灾星变成人民的灾星，养成从前村痞的许多恶习。47年旧历新年夜，一群民兵仿效旧时民团，把一被斗户儿媳抓来轮奸。民兵队长、村长都不干净，而且都觉得不便把男女关系说成大问题（当时村里有那么多军属和被斗户家属），彼此袒护、栽赃或互抓把柄。一位村长自陈入党后思想更坏了，心想“这下有了靠山，可以爬上更高的位置，什么都可以干了，没有人敢得罪我……如果我不花钱，生活得好一点，这样努力工作有什么意思？”某民兵干部说：“我知道共产党好，可是那个‘党’字，我可不太喜欢。现在我们都这么下劲和国民党斗，没有人不恨国民党。也许将来人们象恨国民党那样恨共产党”；一名民兵在说明入党动机时说：“我觉得入党光荣。入了党就能有地位，有势力。我找区委书记去填表那阵，根本就不懂得党是怎么回事。书记交代入党条件，说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献身，不对敌人妥协，不向困难低头。可是，我入党以后就骄傲了，觉得这下有了靠山，后来就干了不少坏事”。……韩丁尖锐地指出，由于缺乏旧士绅的保护色，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就愈发显得丑恶：

一种奇怪的两重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纪律松懈和对群众强迫命令——发展蔓延到了惊人的地步。随之而来的，是报复主义、宗派主义、徇私枉法，以及享乐主义所产生的小偷小摸、逃避公役、乱搞男女关系，甚至持枪强奸妇女等等。作为旧政权特征的滥用职权又开始复发，虽然还不十分严重。有钱、有闲、有文化并有一套传统，这是地主阶级的保护色，长期以来掩盖着其暴力统治的本质。现在的干部没有这些保护色，他们的违法乱纪行为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与人民的美好理想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在运动高潮过后，村公所忙于解决群众日常问题；民兵须摆正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避免形成独立政治力量，走上军阀和土匪老路；妇女会无法领导男子；农会成员广泛，无法保证产生领导核心，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核心如果真产生了，就能冲破分散的个体小生产经济对一般农民意识的局限。这四大组织彼此间协调也是大问题。因此，还是需要依靠党组织的重建（韩丁 1980 章 18-9、22-4、35-6、42）。十里店高潮过后的管理也面临这等境况：新干部领导较软弱。迷信之风大盛。他们深知过去干部发号施令得罪不少人，故什么都经过群众，这样错误也是群众承担。他们不会和任何刺儿头硬顶，怕以后惹麻烦。村长是老好人，什么都自己干，就是不领导。还是得由党支部来树立榜样，坚强领导（柯鲁克夫妇 1982 节 28、32）。在陕北、山西，不少基层党员在革命高潮过去、发展生产成中心任务后，觉得公家利益与自各利益一致，公家事情与生产有关或间接有利的尚热心，如学文化、参加会议等就无甚兴趣。部分党员甚至要求退党，说“现在该轮流到别人来负担了吧！”（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等 1994P83-4）。

中央也在检讨基层党支部乃至运动中新起的干部常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上级分配任务常不按实际可能条件，时间紧促，任务繁重，促成基层强迫命令。领导上官僚主义，不甚了解下情，检查工作不够，对下面发生的错误未及时指出并助其纠正，使强迫命令的坏作风更易发展。领导机关平时只知道要求党员干部做什么，并未多想办法去提高其政治觉悟，很少注意农村环

境中容易产生的各种自私自利倾向并及时给予批评。今天纯洁的新党员和新干部及作风和思想业已改正的老党员和老干部，掌握权力一段时期后，又会有不少人要重复过去错误。因此“领导机关决不可采取‘让群众去处理’的放任的政策，更不要受某些群众一时甚为高涨的宗派报复情绪的影响”。对某些具体政策缺乏及时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或规定本身就错了，因此下面就容易犯或左或右的错误（中共中央 1948e）。

随着纠偏的开展，随着高潮过后发展生产的需要，随着战略大反攻所需战勤供应的急剧增长，华北农村日益明显地表现出需要坚强持重、富有经验的日常管理干部，而相对不再是冲锋在前的“运动分子”。对被打倒的旧党支部的重新甄别、改建就成了十分重要的工作。

旧历新年后，陈龙孝就任西村支书，但他注定只是个过渡人物。同月任子志到十区（3至12月任副书记）。去时县委书记对任说“应该恢复的老干部恢复了，不应该恢复的不要恢复”。当时十区老干部见着原书记阎大兴就跑。任子志后来谈了西村当时在上级眼里的印象：吸大烟，在大佛教的多，可以说就是个乱七八糟的村。陈龙孝就是大佛教头子，想开除他，县委不同意。因行署工作团原来扎根在陈那里，怕开除影响不好。区委认为任到西村后可先恢复林奎工作：

在打击老干部那个时候，想把冷向权他们打死。恢复林奎以后，他们又想把陈龙孝再打下去，还想打光那几户人。我说你们谁敢动一动，不经县里批准，先把你们押起来。因此他们没敢动。恢复林奎以后打算恢复宗藩，找他他不见面。跑跑躲躲……当时林奎、宗藩他们是一个人（现在不是了），恢复林奎后，他一个劲儿救宗藩……宗藩的事就找林奎吧，要办都是他的事。我49年阳历年头回来的，在十区肯定没恢复宗藩的党籍。这事还是孙腾兴……事后孙腾兴还对我说，你看又恢复了，又多个骨干。恢复宗藩应该请林奎说实话，林奎马上让我恢复宗藩，他没见面，所以没恢复。林奎可能按我这个意思办的。恢复他们这些老干部都是经区委研究决定的，不是我个人决定的（62/3/7）。

至于龙孝，任子志觉得“这部分报复那部分，影响更不好，所以仍留在党内”。最终四清就宗藩党籍问题查证结论如下：47年底，宗藩和其他党员同时被停止党的生活，平分后期，林奎等恢复党籍，而宗藩因当时以没落地主（身份）被斗，故未及时恢复。平分结束后因老党宗藩确属错斗，区委曾派人找他几次，想恢复其党籍，但因本人挨斗被分，消极不满，在恢复党籍问题上不积极，始终不见，就此搁下。48年5月任子志来西村做老干部恢复工作时留下1000斤恢复粮，宗藩得500斤（高粱），但没见面（65/4/7、6/5）。

其实转过48年，从基层工作组到上级领导都已认识到法大纲后运动高潮带来的负面影响，形势开始朝不利于新干部的局面发展，所谓林志策动新兵逃跑只是导火索而已。2月，十区召开代表会，决定组织联村大检查，消灭假贫农团。代表联署的声明（内有区长刘树棠和西村工作组成员奚仁贤、叶迈）称有些村“封建势力始终未打垮，地主富农仍在村中或明或暗的活动，操纵贫农团”（《冀东日报》1948a）。这实际上是指出：土改高潮中上台的贫农团等新干部势力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需要整顿。

5月1日冀东区党委暨行署发布标志土改高潮结束的五一指示：现值春耕，应将土改作一结束，以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中心，逐步纠正土改中“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明确宣布大致不再平分，个别只须抽补调剂。强调须补偿好被斗中农经济、政治利益（冀东区党委暨行政公署1948）。新华社7月25日社论强调基本解放区土改已经大体结束，现在的中心任务是纠正偏向，促进基层民主，确定地权，发展生产，调整负担，改进战勤制度，改良技术，提倡互助（新华社1948a）。27日又指出有些农民因生产条件较有利，又努力生产，善于经营，就可能逐渐富裕，其中少数可能剥削而成为新富农。另有些农民因生产条件较不利、生产不力、经营不善或遇某些不可抗拒的打击，就可能逐渐贫困，其中一部分就不能不受人剥削而变为新的贫、雇农。这种竞争与新的阶级分化即使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也不可避免（新华社1948b）。

此时各级领导已看出土改高潮退去后华北农村中潜伏的危险。6月23日东北局在总结工作时指出：冀东等地土改整党中左的偏向较为严重，打击面宽，杀人过多，侵犯工商业，尤其是以“搬石头”、贫雇农审判方式代替整党，引起贫雇与中农、党与群众、群众与干部、新老干

部之间发生对立。群众与干部思想混乱，“纠正情形尚不明”（中共中央东北局 1948b）。

中央的指示毫不掩饰对农村局势的担心。6月8日中央在转发华北局计划时批示：日本投降后华北大部农村每年尤其秋冬都有激烈群众运动，没有敌人的基本区农民，其土地要求业已满足或基本满足，对运动和斗争业已发生厌感，普遍要求安定，建立稳定秩序和制度以便安心生产。因此建议各地颁发土地证以示结束土改（中共中央 1948d）。稍后更直接了当地指出：

华北某些地方群众表现有动荡不安的情绪，而且呈现出一种不很团结的现象，更由于干部的“躺下”，以致迷信及会门团体，随着有些发展。这与战争延长，人力、财力担负很重，天灾疾病流行等有很大的关系，与土改过程中一些过左政策也不无关系。群众中产生一种不正常情绪，反革命特务也就借机活动起来。上述现象应随时加以警惕。现在群众要求安定，这除要在实行土改地区迅速确定地权和负担额，尽量节用民力，减少支前动员，组织群众生产等外，同时也要少开群众大会，以免他们误工太多，妨碍生产（中共中央 1948e）。

## 二十一 和平即将到来

上级担心的事情果真来了！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袭扰归远西部（详张永生 1990）。归远东部爆发暴乱。据县委数日后内部总结：旧历3月初，景忠山老道串通九、十区一带80余村部分反动地富及心怀报复的错斗户，准备在农历5月15日暴动，但提前两天（6月19日）乘蒋军进扰，我各机关部队转移空隙，十区康平村、郑各庄下午首先起事。徐福全（徐老道）、张作春等人利用大乘门、盘古道、混元门、荣华会等会道门纠集会众，裹胁群众千余。一天两夜中杀38人，伤27人，烧毁房屋1222.5间。冀东军区事后迅速调集部队，在当地民兵配合下围歼暴徒，当场击毙徐福全，抓获主犯7人，俘虏千余人。除镇压少数为首者外大部由各村取保释放。因暴徒杀人杀红了眼，群众唤作“红眼队”。

上级对此事件迅速定性：首先认为该事件是阶级性的，是土改中阶级斗争发展至极的产物，是人民民主革命在农村中你死我活的战争，具体表现如“有的一人即杀死十一人，我十区治安员带民兵三人到康平村解决问题，因弹尽也被杀伤，我部队进剿时，竟有十八九岁的姑娘和七八十岁的老头子挺身去抢机枪，有的因小孩老太婆行动不便，他们竟自己杀死自己的父母子女”；其次认为事件有封建性一面，利用宗教迷信扩大团结面，除反动地富外还有想报复的错斗中农、流氓坏蛋乃至个别落后党员；第三肯定问题不是群众性的，大多属被裹胁。

为了平息基层干部群众的情绪，安抚土改中受到各种不正确待遇的群体，保障土改果实，打击潜在暴徒，上级及时总结教训，提出防范措施。文件首先指出该事件早有谣言、开会等迹象，但领导上麻痹，未予重视。其次指出基层领导的政治偏向激化了矛盾：平分中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无原则处理旧干部和党员，使中农和贫雇农、党员和贫雇农及新老干部之间严重不团结，纠偏不力，被斗户情绪激化，“因而造成农村混乱状态，工作几乎停顿，群众团结不巩固，甚至不团结”，从而面对此前数月紧张局势，基层从领导到基本群众却一直未有防范。第三是就党和政府在有关政策上的摇摆及其后果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是提出加强土改后村庄日常管理：“建设村级除奸组织，恢复来客报告，外出开路条的制度，侦察村中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迷信教门组织及其活动情形，监视少数不良地主富农的活动”（48/6/25）。

上级就此开始认识到运动高潮后新上来的基层干部不得力，据对九、十两区的调查总结材料称：为支援解放战争，先后由这地区抽调走一部分党员干部，“搬大石头”又有一部分老干部下台，故大批新干部出任领导，上台后缺乏领导能力和对敌斗争经验。再者，这两个区地处山地，交通不便，封建迷信思想有长期历史：早在36年前后就有大佛教等封建迷信道教传入，利用赶集、唱戏、庙会等公共场所发展扩充组织，总计有9种封建会道门。

其实该地区一直盛行此类宗教组织和预言。该区盛行多神教和动物崇拜。求雨是一大需求。归远一些村求雨先由长辈带上柳条帽子，赤脚到庙中烧香叩头，之后全村乡民都去叩拜，拜完本村龙王庙再去别村（魏宏运 1996P439 以下）。董印介绍了昔日组织求雨的情形：

三官庙是唐王李世民征东留下的，东西村、黑驴沟、应家谷四个庄修的。三官就是刘、关、张。过去，早了就上那儿求雨去，庄里会首、会头组织。裤子绑上，光着膀子，柳条编成帽子，求雨。我一小求过，不求不中。有八路军以后就没有了。那是三几年、二几年的时候。求雨都得去，男的，老爷子、小孩，没有女的，给烧香叩头——迷信。

早在 43 年 8 月就有考察报告指出：该地宗教会门很多，如大佛教宣传“没穷没富”，“以后地也没用了”，“以后要暴动，不在大佛教者全死，那时每人分地 9 顷 26 亩半”；丰滦迁有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认为是共产党（《冀热边社会状况考察》）。44 年秋始该地区即在锄奸运动中广泛开展反汉奸道教会门斗争，先后破获与瓦解许多道教会门，仅归远即自首 1850 名，丰滦大佛教自首 27924 人，逮捕 11 人，杀了 3 人（李文骅 1987）。西村村民其实早知道有这些会道门，但这不等于说他们知道会爆发这事件。不少村民说当时村里就是有几个外来劝道下脚的，群众啥也不懂，就听他宣传。周国珍对红眼队记忆犹新：

郑各庄一个妇女主任，黑间让人弄了去了，下巴这儿这么拉开了……把人弄去，在大缸里扣着，使血敷面，蒸包子吃。那人都到这份上。（是您听说的吗？）听说？那人都眼见了。就那红眼队嘛？那咋不亲眼见呢？这庄没有。组织那时候谁也知不道，知不道它要害人，那说得好听着呢。是捉襟，双联鞋，头顶上顶着“盘古”俩字，黄布，扎在上面，手拿着刀啥的。那有，咋没看见。那阵儿我记着我还傻呢。他们都劝这个道，这好那好的。我跟我爸说，谁谁谁，这说得好，以后又扯大红旗了，又是咱们啥也不用啥的，挺好的。“别听那个啊！不是正事啊，那算邪门鬼道”。我也知不道咋回事儿，傻。闹红眼队了还知不道。两天，合着一天就消灭尽了。预谋时间是不短。一年来着。（出事）前两天闹过顽军。我看着是西边起火了，呼呼的烟……赶到傍黑间，我二舅跑来，吓得撩出来。从郑各庄那儿的郑各山跑下来一群人，喊叫着。我那个姨兄去那瞧，没他的名字，进了庄就给捅死了。然后就进了我二舅的院子，把我二舅子的头发都给刨去了。二舅看着事情不好，偷着往外跑出来：“可了不得了，起了红眼队了。快撩吧。”我说这上哪儿撩？要不上东，先上黑驴沟。还照着跑敌情似的呐。那知道黑驴沟也——各处都是红眼队窝。那时候你说你上哪儿跑去？没处跑。这赶到大康平村这边都闹得挺啥的了，调过部队来了，第二天都调过来了。他们还嚷呢，刀枪不入，刀枪不入，杀呀。我们往回走，正好到这庄里，就听见机枪响了。我说，这咋回事儿呢？不用说，准是又来了情况了。知不道打的是他们。后来就把他们都串上了，一串一串的。后来把大康平村的何进伟拉出来了，他是判官，身上是生死簿，这个账一瞅，哎呀，这咋闹呀，一般的都上了账了。是在他们那账上有名儿的都不杀，没名儿的都杀了。到文化大革命还按着红眼队那底子。

林奎儿子在一旁接着母亲的话说：“这都是地主那反动武装，残余分子”。受过高等教育的林起远说得比他更“全面”：

红眼队发源于郑各庄，属于地主武装。另外敌人龟缩到北京，北京还有一批潜伏（在冀东）的特务。为啥在那时候起呢？大军挺进东北，地方没有部队，他们钻了这个空子。地主向贫农反攻倒算，不服。杀了一批农会干部。（至于西村）红眼队什么的是属于黄宗藩的阴谋。象红眼队、蛤蟆仙啥的觉着西村不会有。第一次征兵才出现这个，是 44 年，日本刚走。那阵儿治安军龟缩在城里。那时候宗藩他们当了干部就有权了，把过去给他提过意见的，和他不对付的，都给人家按扣。扣帽子那时候就是扣个红眼队、蛤蟆仙或者是一贯道，说你这么个词，好象就得管制你，就这么个意思。咱们村没有，但受冤屈的——你象董春，说董春是红眼队，人家能是红眼队吗？还有说过支瑞善，就因为参观的来，他说驴粪球两面光，名儿在外，其实不咋样。说这些对合作化不利的話，最后给他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一直戴了三年。

黄俊兰当时就不信，她也认为红眼队是地主武装，只是话说出来和上两位没法比：

我没入过蛤蟆仙，我不信那个，我啥也不入。该下地下地，该糊弄啥糊弄啥。有人说我也不听讲。咱们穷活该，也不弄那个不是？把我吓坏了。西半拉失火了，之后老老爷子他们跑过来，说了不得了，红眼队杀人了，跑到我们南岭去了我们还知不道啥事儿。就看见冒烟，叮当枪响，往北边去了，知不道是闹红眼队。咱们好人知不道，大地主才知道。知不道的别瞎说话，

细情咱们也知不道。

其实支瑞善当年还真的入过教。不过后来干部拿这事儿来压人。与林起远同属村庄“持不同政见者”的林起明说：

那时候迷信统治人呐。也有尖人，怕挨糊弄的，不那么信的。（咱村您记得谁比较信吗？）那没法说，多了。有龙华会。老支家信，给抓了，钱也被人弄走了。那是多花钱多修好，少花钱少修好，把钱给弄去了。烧香、叩头，还有出地入的，支瑞善。那是骗钱的事儿，那时候人傻，好骗。底下来就不那么好骗了。有个叫支连的，在这儿跟我父亲喝酒来着，他妈找他去，说你快去，快入那个龙华会，我们都入了。可以老变少。我父亲（林银）不是耍钱人吗？他不信那一套，说这纯粹胡说八道，抓他去。支连就去抓他，可能还没逮着，把钱还给弄走了。蛤蟆仙是扯淡的事儿，没那码事儿。都是干部给群众使压力。黄宗藩当家来着，说哪个是蛤蟆仙啦，这个那个的，压着你，就是让你老实，不敢摆邪。哪有蛤蟆仙啊？红眼队有入的来着，不多，也没跟着去。（你知道是谁吗？）那时候干部都知道是谁。

也许因为多年的积习，其他老村民大多一谈红眼队、大佛教之类便闭口不谈或支吾了事，而谈文革之类尚不至此。本年西村还发生了件怪事，五次夜里失火（后来的传闻从较保守的3次到十几岁小姑娘嘴里的15次！），村里民兵巡逻和区里派人调查都不能制止。既然查不出是谁，这事也就成了寻找替罪羊的最好帽子。新干部倒霉后，郑凤同因此被判入狱。董印道：

这庄那会儿失火，五天一把失了五把。最后公安局长说得了，不看了，把西村烧成灰吧。把民兵撤了。最后也不烧了。最后判郑凤同身上，说他烧的。那时老干部上台，打击新干部不是？郑凤同是外边搬来的，整他没亲戚不是？判了七年。这人冤得狠，三次挨押，20来年啊。

冷向仁的说法代表了多数村民的理解：

反正出去救过火来着，细情咱们说不好。咱们摸不透。先是站岗的多加人，越加人越着。区里来，说把岗全给撤了，一个岗不许你们搁。这就没人点了。后来不是冷向仁是武装吗？查岗。就怀疑是他。跟林惠他们家媳妇不知咋轧扭，之后乱七八糟咱们说不清楚。

文革时林奎倒霉，这罪名又安在他头上。而自视机敏过人的董印则向我们宣称，他在文革中查出是林惠妻这老狐狸精指使人干的，这倒符合林惠家人的神秘风格。

8月中旬，驻唐山国民党军从东面分两路再次袭扰归远，直插十区山地，在西村一带会合后又绕道南返。顽军过西村时裹走30多村民，但绝大多数半道撩回。8月下旬冀东区党委召开纠偏会议。刘慎之在大会上作检查：正因三查三整中存有左的偏差，使一些党的干部产生错觉，在法大纲执行中害怕犯立场错误，宁左勿右，“可见左的偏差一经出现，往往是呈现一系列链式性的反应，给工作造成迂回”（马秀山1990）。10月冀东行署指示全区开始统一颁发东北政委会土地执照即土地证（冀东区行政公署1948）。利用冬闲，归远县委重点抓了赔补中农和土地丈量评级的具体工作，要求解决土改“最后”遗留的一些问题，如重建许多被洗刷的班子和群众团体，树立群众已被逐渐搞疲了的热情（分见中共归远县委1948a、b；1949。有关结束土改、弥补失误的同时如何保障土改果实、维护党的威信、把握纠偏火候的问题，参新华社1948c）。49年3月上旬全县开始颁发华北人民政府土地、房产所有证。9月县、区建立端正政策小组，纠正错斗中农成分，对于确有困难，需要物质补偿的，从封存未分的胜利果实和政府颁发的“中农粮”（贴补粮）中予以适当解决。但恢复中农工作进展缓慢，至51年6月方告基本结束，标志土改遗留问题的大致解决，同时完成两证发放。

两证发放到户意味着土改暂告结束——当然，不久农民就会主动或被动地知道，新的土地革命还在等待着他们，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政权将带领他们经此迈向更美好的前程。焚烧旧地契、颁发土地证的一刻，便是新社会的诞生和每一位人民（而不只是村民）的新生。画圈的不再是财主和先生，至少作为阶级，他们似乎永远消失了。除旧迎新的仪式在每个村头展开：过去的象征不会被悄然掩埋或抹除，而须祭献于焚烧的仪式：“新政权是藉着焚烧旧象征的烟灰火焰来彰显其自身的存在”，“只要‘新生’的崇高感仍然是新政权自我庆贺与正当性的来源，仪式性焚烧之火就必须一再被点燃”。但革命政权不能仅凭消除过去来巩固权力，而在于型塑并

支配新的“过去—现在”关系，塑造革命理念和伦理前提，并进而将其自然化（参朱元鸿1994P2-3）。它可直接表现为村头的焚烧，群众的控诉，也可间接表现为档案的纪录和历史的书写。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土改无论是消除的还是带来的，都没有纯粹的界限或性质可言。

抛开历史的书写问题不谈，根据许慧文的总结，土改的目标和后果也很丰富：树立共产党合法性；刺激农业增长，减轻国家负担；摧毁乡村旧权力结构；吸收并培养贫农阶级成员作为新领导力量。关键是要把土改变成农村阶级斗争。阶级成分虽已划分，阶级身份认同却仍需强化，因此大众动员尤为重要，要使贫农敢于领导阶级斗争，要通过斗争阶级敌人使革命的合法性深入人心。诉苦大会就是一种典范形式。尤其在地主剥削并不严重的地区，就更需发起运动来扩大土改，变简单的物品再分配为推翻地方建构的革命。土改中出现的一些农村政治运作方式将会对未来社会结构运行机制产生深刻影响：划分阶级成分成为日后政治斗争的基本；依托树典型来组织和开展运动；吸收地方积极分子成为国家与农民的中间代理人，等等（Shue1980）。

胡素珊的看法也与此类似：华北是抗战时共产党主要根据地，战后也立即开展土改。但当地多数农民早已拥有土地（阶级构成不符合共产党基本判断（以湖南和陕北为据））。因此不能简单说共产党藉土改而壮大，只有通过土改才能发动群众支持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土改的政治意义实际上超过了其经济意义。土改的基本环节就是推翻既有的农村精英阶层，关键不在于这个阶层是否真的封建，是否由每个村庄的地主组成，而在于通过斗倒许多斗争对象，摧毁统治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垄断，这是创建农村新权力机构的必要步骤。土改发明和展开了形形色色的控诉运动。最积极的农民成为共产党和村领导的新成员，分到土地和财产的人纷纷加入农会和村里其他组织。这正是共产党赖以依靠的由农民自己掌管的公共组织，农民由此承担起组织军事运输队和对不愿参军者施加社会压力等任务，使共产党得以从制度上确保把刚刚萌芽的阶级觉悟转变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特殊拥护（1997 第七章，尤 P360 以下）。

至少就意识形态上和面上的总体情况而言，这些看法都很有意思。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具体到每个村庄，具体到土改的各个阶段，具体到村庄内部的斗争和村民本身的反应，情况会有较大的变化。其实，如果原本散漫无组织的小农真象一颗颗“马铃薯”在动员的机制下变成了一袋马铃薯，又怎能径直从它整体上的面目和力量上推断出袋里每一颗马铃薯的遭际和它们彼此之间的碰撞、挤压、变形？

## 二十二 压在心头的愤怒

县长说：“这弄得叫个啥？这样子真不好！”有人说：“好不好吧，反正他不得活了！”冷元道：“唉！咱们为什么不听县长的话？”有人说：“怎么不听？县长说他早就该死了！”县长说：“算了！这些人死了也没有什么可惜，不过这样不好，把个院子弄得血淋淋的！”白狗说：“这还算血淋淋的？人家杀我们那时候，庙里的水都跟水道流出去了！”（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

土改暂告结束，本文开头介绍的西村知名人物也“俱往矣”了。一代年轻人在 20 年代末开始的动荡中逐渐成长起来，接受了战争烽火的洗礼，也在革命的怒潮中各露峥嵘。他们和村民一起，主动或被动地迎接了新的革命方式、组织力量和运动理念。土改胜利了，土地回了家，地主富农低下了头，穷棒子成了硬杆子。但革命无论从内在理念上还是在外在惯性上都还远未结束，不同程度地学会了許多新东西的年轻人也还将自觉不自觉地用这些新东西解决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许早已埋下了种子，或许将在日后事业中一轮又一轮的高潮之下孕育出来或者重新浮出地面。这个逻辑无可抵挡。

在革命高潮来临之前，村庄的状况似乎并不会因战乱、匪乱而彻底改变。不少地富虽不直接劳动，但拥有资本、役畜、农具、技能并熟悉市场，是村中最有活力、经济上最有成效的经营者。阶级划分只能非常粗糙地反映复杂的现实，即使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观念已经渐渐深入村庄，即使穷人确实怨恨那些剥削他们的财主，但社区的传统、调和的习俗及现实的宿命观等等

都阻碍着激进行动，阻碍着被剥削者去“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曾主掌党内高层组织保卫工作的中共领导邓发无奈地对国际友人爱泼斯坦说：

开始，他们时常害怕去做我们建议他们做的事。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们，各种军队来了又走，标语贴了又被雨水冲掉，但地主却始终存在。农民时常是在会上通过了减租规定，事后又去大户人家私下保证他们将仍象过去那样交租。有时，与地主签订了新型契约，却并不要求履行，封建的恐惧传统不可能一天就消除（嘉图 1986P183）。

在土改风潮甚为强劲的张庄也存在“明分暗不分”的状况。控诉地主罪行是容易的，但涉及剥削制度本质，许多人就糊涂了。我租地主地，地主给我工钱，何错之有？有些农民出于恐惧，偷偷地把已经分到手的财产和衣物又给地主送就了回去，种了地主被没收的土地还交租子。村主席的老婆竟到从前租地的地主家白当佣人，图的是在地主势力复辟后得到保护。

旧社会农民的苦难及其对压迫者的仇恨通常表现为对个别地主或富农发泄个人不满和仇恨。通过斗争的胜利，阶级成分的划定，农民逐步学会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共产党并未简单地“引进”阶级斗争，只是设法引导农民透过宗族关系或其他种种“陈规陋习”意识到阶级冲突、阶级斗争的一贯存在。农民起初出于害怕、情谊、旧道德或政治冷漠而不愿直接斗争地富，只想分点地。但和平土改不能根除地主支配权力和农民屈从地位（柯鲁克夫妇 1982 节 1；Shue1980P83）。革命动员的重要任务便是让农民大胆确定自己的阶级地位，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义、消极屈从及社会调和——总之，要行动。每次行动都会使下次行动更加容易并且断绝退路。佃户因为怕报复或为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会一时偷偷补给地主租金。但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这个地主，或许再无退路（费正清、费维恺 1993 下 P746-51）。

农民忍无可忍才行动，一旦行动起来就要走向残忍和暴力的极端，如动手就往死里打，常识和痛苦的教训都告诉他们这样做。而地主螳臂当车的激烈抵抗更激怒了农民，一民兵告诉韩丁，“要让男人说话，只要把铁棍烧红就中，可是地主婆都举得不行，宁死也不肯说出埋藏金银的地方，烙肉也吓不倒她们，非得拿整孩子来吓唬，她们才软下来”。但这些地主婆无论如何还是敌不过激愤的农民，她们相继被迫供出最后一点家产的埋藏地。一批批钱财、绸缎、绣花衣服和珠宝被发现。每一次新发现都大大激怒了人们。而地主出于种种原因往往编造线索，于是挖底财成了捉迷藏，这更使愤怒与日俱增（韩丁 1980 章 4、13、21）。

极端路线的产生有其更深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一些干部往往推波助澜，觉得要让农民真正摆脱旧秩序心理束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其打骂乃至杀死地主（Moise1983P50）。运动的迅速高涨和评价干部工作时的某些标准促成了前文屡屡提及的宁“左”勿右的倾向。而在党的眼里，分散、小私有、小商贩的经济基础则代代滋生了农民作为政治力量的弱点：普遍的个人主义、缺乏远大目光、行动的急性病。在华北，所谓“左”倾的一点重要体现便是土改中一再要求保护中农，但中农一再变成斗争对象，其利益一直受侵犯。坚决满足贫雇农要求和坚决不得侵犯中农利益这两条原则存在根本的矛盾：

贫困状况在华北是那样普遍，所以仅仅分掉地主阶级的财产，也还是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贫农要想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就至少要没收轻微剥削者的一部分财产。在很多农村中，甚至严重侵犯了这种中等家庭之后，也还是满足不了全体贫农的翻身要求。对于中农来说，不要说实行剥夺，即便稍微侵犯一点他们的利益，也会使他们感到惶恐不安。而保护中农，不使他们遭受任何侵犯，却又会使许多贫农感到失望，并且无法解决他们缺驴、少犁、没有大车的困难（韩丁 1980 章 25；另参胡素珊 1997P322）。

那么，是否是华北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导致了这种状况？其实土改时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本地特殊论”：北方一些地区认为本地不如南方发达，所以地主少；南方一些地区认为北方土地多，地主都在那里；甘肃一些地区认为本地土地极贫瘠，地主多占土地无益；浙江一些地区认为本地土地特肥沃，人多贵之而不愿卖，富人买地难，地主奇少。土改时对这些论调大多是从政治上进行批评而非从实证上予以驳倒。而“特殊”者一多，便令人疑其多少带有些普遍性了（秦晖、苏文 1996P102）。

客观的背景、动员的逻辑，这些都需要反思，历史的写作者和研究者会看得清楚些。而许多时刻，革命就在某一偶然的触发下突然间跃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浪潮中的村民在那瞬间被暴露在汹涌浪潮前。张庄的斗争大会上起初谁也没动。突然副村长带头打了原伪村长一巴掌：

这一掌惊动了衣衫褴褛的人群，好象一股电流使每块肌肉都收缩了似的。村里人还没见过农民打村长，大伙不由得吸一口冷气，其中一个老汉还清楚地尖叫了一声……场上的人就象看戏似的都出神了，但他们还没意识到，若想把戏演下去，他们自己也得上台，要把心里话讲出来……群众的发动是缓慢地向外逐步扩展的，就象扔进祠堂的石头在水面激起的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地扩大。这块石头就是被称为积极分子的新的村干部和民兵骨干（韩丁 1980 章 11）。

心头最初的一点悸动而至激动，在日后记忆叠积下，在日渐圆润的历史编织下，慢慢汇入了群体、阶级、国家、历史的宏流，村民、积极分子、工作队员、党员干部都必须选择投入伟大的革命事业，必须选择当家作主，放弃某些自己独有的“情调”和“作风”。仅仅分地不能真正改变农村权力的分配与政治的性质，甚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不能，更深入的手段必须触及人的驯顺的记忆、身体、思维，与之共同参与历史的编织并安于织就的历史之网的萌护。多少年来潜藏于心中的愤怒在斗争中被拨动、激发、释放并交相撞击，最终在革命的怒潮渐退之后，返回心底潜伏，等待新的时机。

阶级划分实际是伦理确认。乡村社会原来恪守的、公认的伦理体系突然被革命带来的运动颠覆。无论重建的具体内容及效果如何，过去的某些东西已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些东西则与新形势汇合。数十年后的西村村民如今对运动又作何想？曾是焦点人物的林起洲说：

村子这事儿很难说，究不清楚你来我去的。都是因为私事，才产生矛盾。一有矛盾，就你向着他，他向着他，产生几派。那阵儿又穷棒子造反团，又战斗团，又红卫兵，这个乱七八糟部门可是多。

他说的是日后文革派性斗争。但文革时的各派英雄也正如当年告状不成、回村后只好躲在大嫂房里学纳鞋底子的林起洲一样，并不象现在这么想。贫农团领袖林凤遗孀林白氏说起丈夫来十分不屑：当家的父亲（被访人公公）勤谨持家，当家的自己懒，耍钱败家。让林凤当法官是高抬他，又不识字。林白氏说当时一有人找他干坏事就打发他去娘家。黄荣是宗藩狗腿子，临死前还说嫂子你管得好，林凤啥坏事没干。只有象林志这样奸滑的才上得去，旁人少有那奸滑的。干部们总撸来撸去，也记不得谁撸谁了。支柱林少年聪慧，唱影尤佳，但在政治上绝说不上长袖善舞，四清时面对认真的工作队员，连几棵韭菜的账也说不清。当我们问他村里谁当过民兵队长，他却说“民兵队长忘了是谁了，反正是宗藩他们几个”。任村里最糊涂的老婆婆也知道，不管哪家浑小子当民兵连长，都不会轮到宗藩。就在我们访谈后几个月支柱林去世，那一刻他或许早已忘了曾有一肚子诗书，忘了谁当民兵队长，但或许忘不了那几棵韭菜的账。

也有自恃了得的逍遥派。多年的干部支瑞万说：

（宗藩对您还不错？）就那么回事。反他也没害巴了我。也害不过我。我比他还硬呢。我挺出去了。我这个人也是这个脾气。生死不怕！我这没错误。我要人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你没法我！（这村还是横一点的就行？你自己得硬点？）谁也这样！哪庄不这样？哪机关、哪部门不这样？你硬他就怕你！

董祥芝在村里是公认的糊涂蛋，当年糊里糊涂被顽军裹挟，还不象村里其他人那样撩回来。不过也不能就说他不精明，他后来在“国军”溃散时被俘虏，糊里糊涂又当了解放兵，回来后成了光荣的复员军人，担任互助组组长。日后又是生产队长，又被“上楼”查了一把：

那时候实行两派，说你上哪派呀？我说我哪派我也不去。你瞅着我，我要人不吃，犯法不做，我也不惹你们。人家都说你啥也没挨着。我说他把我咋的？我也没偷着没摸人家。咋的？当兵的都是自觉自愿乐意去的？这都是抓去当兵呗。

能说会道的董印评点起自家兄弟在运动中的表现来，倒也不乏精彩之语：

那阵儿我们董家挨着黑，董启家是富农，董春是中农，董海是中农。我是贫农，又跟着老干部沾包了，给老干部送信、送饭，挨着管，给看起来，不让我出门了，说我是老干部的狗腿

子。我不爱大架子，象董奎、董启这样的。董奎我没少训他，扳他（让他改的意思）。他法大纲时候啥也没有了，借个镐都没人借他。因为以前他谁也不借，连我也借不出来。我说穷不能总穷，富不能总富。等到法大纲挨复查了，一家子四天一宿没吃，我过去时候，都床上躺着，我拿了小米去。以后他听我的了，我把他救活的不是？董海是新干部一拨的，和我住前后院，见我去送就报告了，说我把你看起来。哥俩，嘿嘿，我俩总反对。法大纲我俩反对，我入老村干，他入新村干。四清我上台，他告我。赶到文化大革命我们俩又两派，我保宗藩，他保林奎。他是个枪，无知，没文化，看不开事。

要说最成体系的运动哲学，还得算冷向义。前面已没少见识过他作为一名普通群众的过人之处，不妨再来详细听听：

你看他们使唤我，让我拴人去喽，看人去喽，我找个绳子拴去。这事儿是上支下干，因为啥我知不道。松着点儿我也得笼着点儿，经我手不紧，反正交给他们中了。那时候也聊这些事儿，我也就是听着，说别那么狠。你赶到说了不听，咱也就不说那个了。和林奎没有说过，人家还使唤咱们呢。宗藩也没说。（您就和下面那些人？）哎。董海？说他也不听。黄臣说他也不听。经哪朝哪代，也得有积极的。再来大运动——小运动不用说——我们这些经过运动的，他使唤不起来。他还有下一代不是？年轻的脾气暴性的？打人这还有挺狠的，他一代一代的出不是？

又是搬大石头啦，又是洗手洗澡啦，又是整风啦。总而言之，八路军都是为了你学好，就是改改名词。都是让你干部学好。还有这个——本村都不够吃，分不了，生让你卖粮食，不卖还不中。啥时候？就平均以后。之后就入社，到生产队里头，分不多点儿粮食，还让你卖了。回来这庄的主任再花俩钱，咱们有钱，买粮食来救济社员。社员吃不饱咋下地？——运动呗。

（您从来就没有提过意见？）我脑筋老。法大纲时候我也没有提过意见。土地法大纲把宗藩他们押起来，我看着他。我说那阵儿我们脾气挺暴躁的，大家出口气。宗藩说我死了死不了？我说死不了。依我眼一个也死不了。反正左右是你们肉皮子得受点儿苦。宗藩说留口气就中。我看得远。老干部拿下去好几遍呢。我说拿下去，以后人家还得站起来。接几天站起来了。这庄就这么来回折腾。东院里周金林是老乡长来着，说冷向义你看这会儿他们还站起来站不起来啊？我说这会儿他们站起来了，这回站起来时间远，得时间长呢。他说那站不起来了，大伙都不服他，把庄里人都惹透了。我说你看站不起来了，我给你摆哧摆哧细拗。村干部，积极肯干的，升到区里去；区干部，积极肯干的，升到县里去；县里的，积极肯干的，升到唐山去；唐山的，积极肯干的，升到中央去。人家跑反时候，这个藏那个躲的——（按：即战乱年代老干部没功劳也有苦劳）这阵儿运动高潮，人家救不了。运动过去了，××给他通行。新干部咋样啊？好的不用提，净抓你缺点。好的还用表？末了又站起来了。我说你看咋样啊？人家来了，看这个老干部挺熟，人家要负责人喽，找这个新干部了，知道是谁呀？

我说总有个积极肯干的。落后的，墙头草，哪边来了往哪边倒。你要到这庄，都杀了，到那庄，都崩了，你会动弹的都得起来呀，弄个把棍子也得起来呀。你争的是地盘，你也得人民拥护。总得有前进的，你都落后，国家还有个前进？（您人缘比较好吧？）嗯——也不说好，反正没伤着闹着的。不偷人家，不摸人家。脑筋挺老的。该前进就得前进，该落后就得落后。事情就是这样。真正把你押起来喽，家里孩子老婆加庄稼地，谁收拾呀？为啥机关厂矿，容易提点儿意见呀？人家好走。你生在西村，长在西村，你往哪儿走啊？外头一点儿指的没有，一点儿工作没有，你就这点儿土疙瘩，你上哪儿去？

确实无处可去。土改暂告结束，村民们获得了土地、房屋和一些“果实”，实践了政治民主，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依托组织和意识形态进行的斗争，他们还将在日后演出一段段更加有气魄的故事。冷向义的智慧是多年积淀的智慧，而非多少文人常爱说的“朴素”智慧。任何学术语言都无法传递个中厚重、切肤的蕴味。本章就此结束。

## 第四章 风波不定

1949—1954

一石滩滩儿杨柳树 一片一片的发了青  
一群一群的受苦人 暖哟哟统统翻了身  
一块一块的好土地 分呀分到咱穷人的手  
一条一条的好牲口 暖哟哟拴在咱圈里头  
一个一个的庄稼汉 生产劲头儿高  
一组一组的弄着种 暖哟哟都说互助合作中  
——《生产小谣》（华北翻身农谣）

### 一 “对政府全不忠实”

又是一年春来到，春风将绿江南岸。华北农民唱着翻身谣，为大军打过长江、解放他们的受苦兄弟贡献着巨大的人力物力。但正史也同样告诉我们，后方并不太平。土改暂告结束，阶级敌人贼心不死，仍在利用种种伪装蠢蠢欲动。49年归远县先后发动反对会道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十区系全县反道教工作重点，而西村又是十区三重点之一（参 49/5、5/30、6）。4月底县委社会部《社情通报（机密）》载，三、四月间十区谣言四起，盛传大军下江南，干部行至江心沉没好多，又有说好多军队到江沿上过不去，等把后方中农都赔补好后才能过江。3月间西村大佛教头子支瑞亭和东主任等去一被斗户家随死人周年份子，借机发展道门和集会，红眼队被剿溃后一在逃头目也在场（消息来源系林同（林惠弟，党员，时任西村治安员）之妻回该庄娘家，听说开小会，谈以上谣言。回来后无意向林惠妻谈起，后者报告十区治安员）。据县里掌握：西村龙华会廿余户，以支瑞亭、支瑞玉、<sup>75</sup>董春、董奎、林宝河为首，红眼队暴乱前造谣说刮七天七夜黑风，家家不兴动烟火等。县区公安部门在西村安插林惠夫妇、林同、冷向权为侦察员。

县里此时对新干部已全无信任，认为“干部队伍不纯洁”，“除治安员林同外，对政府可说全不忠实”。如此评判的一大根据是48年押藏该村2千余斤公粮麦子，顽军袭扰后“该村干部以林志、郑凤同、黄俊峰为首，借损失为名，将此贪污，全体党员干部都在贪污团体之列”。林志是个“粗通文化”的“没落户”，赶大车（跑唐山）出身，“复查时任翻身主任。到平时虽不负责任，也掌握大权”。董春“44年入党后表现不好，48年参军逃跑，在杨庄（并无亲戚）掩藏数月，过去在龙华会，有红眼队嫌疑。于去年（49年）搬至南岭，自搬去后永不大下山”，须重点侦察。<sup>76</sup>支书陈龙孝、战勤委员冷向礼被林志等“拉拢，关系相当密切，任何事情都告诉人家去，并经常一块吃喝。村干部从年关以来大部分赌钱”。村主任林恩“曾被抓过两次参赌。其中必得利，有历史的搞鬼、贪污等”。民兵排长林宝“表现不好，可能是红眼队，去年曾动员林同买黄布”。财粮郑凤同最是不堪，“吸大烟，搞破鞋，贪污”。总之“现该村干部全被林志拉拢过去，干部全不负责任，对政府总是怀抱不满，任何工作全是应付，并联络道教头子毛庆等。该村是大佛教最有基础之地，而林志是首要份子之一”（49/6/30；50）。

此时宗藩在干啥？据 65/5/3 查证结论：宗藩 49 年 2 月前在家务农，后去四卫所姥姥家养病，后来磨面。3 月回家务农，后又去别村某店家打更半年，50 年底方回家。重要的是此时的西村干部确实需要“正式化”（支焕语）了。至于首领，既不能是尚未恢复党籍的宗藩，也不能是扶不起的阿斗陈龙孝，更不能是重大嫌疑分子林志。当此之时，当兵 3 年多的冷向山复员

<sup>75</sup> 支瑞玉是支焕父亲，整风时林惠告支瑞玉是道教头子，到东北传过教。立新公社纪事编写小组 1966P215：支瑞亭是地主贼六子狗腿子，过去凭地主势力想尽办法欺侮老百姓。

<sup>76</sup> 相较以往对南岭住民的态度，此时已表现出对无法直接控制者的疑虑。65 年的登记表上董春被认为是“历史表现积极”。另外，全村除地富反坏分子外最后一个入社的，是住在南岭、迟迟不肯下山的林起明一家。

回村。其妻诉苦典型贾秀兰曾反复诉说是林奎害她当家的去当兵，但在董印说来，冷向山：

大眼珠子一瞪，谁也惹不起，孩子都怕他，村里有名的。林奎是大四，冷向权是小四。都是干部，惹不起。冷向权治保主任爱打人，都怕他……烧金子烧得好。15军区开金矿，归国家管，冷向山在那里烧金子，贪污金子了，15军区把他找下了。把他吊起来，要挖他脚心子，要他交出来。他交不出来不是？卖了，把钱也花了不是？就因为这吓得跑了，当八路军去了。回来就当干部。那阵儿我由县城回来，开烧饼铺子来着，炸果子饼卖。他来吃果子饼，八路军把他叨住了，吊树上了。大伙把他保下来了。那那阵儿穷不是？八路军也没辙，放了。

不管怎样，冷向山带着他48年打天津带伤坚持战斗所获的物质奖回到了村里。群众心中的恶名要到四清时才遭“报应”，而在49年春天，他归来后正好接了陈龙孝的支书。

## 二 该死的林志

十区文化教员韩士林50年被派往西村清理会道门，他在访谈时称当时主要是解决48年红眼队事件问题。到村时龙孝支书，林奎宣委，冷向权治安员。对林惠他没印象，至于宗藩，韩的说法是当时被开除党籍，到外县做小工。

51年元旦始全县开始分批进行农村整党（至54年春全部整完）。本年新干部首领、28岁的林志被公开枪决。罪状如下（注意此时宗藩尚未恢复名誉）：48年春征兵时有破坏嫌疑，红眼队叛乱后列为重点侦察对象；复查时任翻身主任，假积极，和宗藩、黄龙祥等合伙贪污玉米一石五斗，因分赃不均曾在区涉讼，并勾结坏蛋毛庆打击其他干部；平分中领导群众向工作组诬告区委苏远兴为大国民党，村干冷向权与林奎是小国民党（按：宗藩此时还是没落地主身份），并号召群众要回苏远兴企图打死；48年春征兵，鼓动十余人从黑驴沟征兵处跑到山地潜伏。为便于新兵行动，又唆使新兵向村中要出四张通行证，因干部不爱给，夜间把干部抓到山沟威胁。审讯中又供出一些新罪状：腐蚀陈龙孝等人；与唐山黄延清勾结；48年6月敌人反攻时领导村中坏干部群众私分国家寄存公粮三石六斗，等等（据49/6、6/30）。

属于老干部一派的林起洲对自己这位属于对立面的本家叔叔态度复杂：小伙子五官端正，能说会道，但欺男霸女，坏事干尽。支树林说：林志长相在我们庄也是头等。五尺多高大个儿，字眼也中，文化也高。当了30多年大队干部的林起友说：到现在还有为死人喊冤屈。冷向仁则记着这小子土改时的劣迹：这小子是他妈的里外叛，这头咕咕咕，那头咕咕咕，他妈的尽弄这个，两面派。不管怎样，当年在西村河岸举行了公审枪决大会，县公安局长、助理监刑。四下乡里俱来观看。但村民现在记得更清楚的却是一些与当时肃杀气氛不很协调的“逸事”，再就是几个人竞相说自己最后给“候斩”的林志搞了顿饱饭吃。支瑞万道：

林志当庭搭台子崩的。县公安局长把脚还崩烂了呢。讲完话下台崩林志，冲锋枪在上面一跳，“崩”响了，走火，自各打自各脚上了……稀里糊涂那么回事吧！现在谁拉这个？谁也拉不了了！没头没脑的！（林志罪状）我也没见着，我也没看着，那人家说有就有，那咱咋说！

董印详细介绍了林志的一些“罪行”：

林志我和他一小在一起玩，坏，强奸妇女，啥都干。当主任的时候花18担棒子把八区一个闺女给说来了。他给强奸了，然后霸占，把她弄到南山，让我们民兵给站岗看着，他在地里随便鼓捣。后来那娘们受不了，打离婚走了。18担棒子白搭了。15军区一个胶皮车、一个骡子，正在庄西这道口这儿，东村来日本了。赶胶皮车的是个官，就把车子告诉林宝河了，连车带骡的赶到高粱地里去了。日本走以后，林宝河就告诉林惠、林志他们弄了个胶皮车，林惠、林志就用这车做买卖。这边他有权，开通行证，一把手不是？由唐山往这拉货，那趁钱不少。那他到唐山再找这黄延清，又能给开通行证。赶到15军区来要这胶皮车，说没了，让日本给弄走了。49年就押了林志，放回来后不服气，和宗藩他们干。林志在西院，宗藩在东院，好比说“林二爷又回来了，宗藩你把我怎样？”宗藩又往上告。

如此说来，宗藩到底还在村里有着实力。董印说通行证一事确属支恩把着戳子，林金把着

通行证的纸，林志威逼二人。但所为究竟是为了去唐山做买卖，还是如罪状所说便于逃跑新兵行动，如今则不得而知。爱说“怪话”的林起明说得更是让人如哽在喉：

林志犯的错误有，但添的材料也多。一样算犯的国法，好心好意也算犯了国法，就是扩兵时候带着人跑了。就这一样他算不拥护毛主席、共产党了。这是主要一条。其他添得不少。他没人命。有一年差粮库，说是他抢了，那都是给人扣的帽子。要不是那么添，死不了。那时也没人下来调查，就听干部的意见。他带着民兵跑了，哪家哪户不乐意呀？你再好心好意，当干部的犯了国法，不能饶啊，对吧？破坏扩兵这一条就不轻啊。你个人家乐意了，国家不中啊。

最坚定地拥护这类人物被正法的还得算是黄延青：

林志也没得好死。那小子忒坏，比他坏的没有。庄里一批年轻人他给带领着撩回唐山，扩军都给跑了。就实际情况，应该提前就杀了。宽大、宽大，越宽大他不学好，就得来严的。土改时就受林志报复了。还有叫毛庆的，他也死了，也没得好死。人不学好，早晚非得挨押。只图眼前快乐，不管后来结果。后来摊上喽，你哭啊？嚎都不管事。林志那不是玩意儿，抢男霸女。又投敌又叛变。头里押二年，放出来还洋洋得意，说挺好，还有人伺候，比当新姑爷还难受，二回再押进去枪崩喽。当干部，他不拉弄坏人当不成，拉弄坏人犯错误。坏？你能坏几天？正确喽能多活些日子，不正确喽有法律治你。

林志被枪毙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村里“恢复正常”时期的开始，也奠定了日后正史叙述的基调。为更好地理解这段时期的“路线斗争”，不妨来看看正史的叙述。

55年的宣传读物写道：解放后（原文如此）坏分子林志混进党组织，把持村政权，不但常公开歪曲党的政策，暗中还参加什么芦花会、红眼队之类反动会道门组织。土改时煽动部分落后群众故意陷害宗藩和林奎，要挟区政府枪毙他们。政府不答应，他们就想偷偷用火烧死宗藩，幸亏县委书记赶到。林志受到法办后，宗藩和林奎才又当上支委（逯斐 1955）。

到了 60 年代的村史里，林志已成为几乎所有斗争的中心人物，林志两次被抓也有了个说法：林志与唐山特务和徐道士勾结，村里情况日见复杂混乱，一股妖风邪气，谣言传得很多，如“月儿毛草帽，南岭穿灰袍，三月兵马乱，五月血灾到”。当时村支书陈龙孝粘粘糊糊，立场不稳。谣言一多，他已六神无主，有时自己也迷神信鬼，炕头插起柳枝，腋下吊起红布来。宗藩和林奎对他提过几次意见，他都躲躲闪闪，不作明确答复。每次开党的会议都是上来就吵架，林志等人气焰越发嚣张。刚好此时外地工作急需人，宗藩和林奎调离本村。林志等人就此窃取村里大权，煽动群众去区里告老干部状，说毛宽是老干部的电线杆子。毛宽和冷向魁正义凛然地进行抗争。林志欺骗包括黄荣在内的群众以及奚组长为首的工作组，在斗争地主时走过场（原文如此），却把林奎、宗藩骗回庄绑起来。郑凤同出了个借刀杀人之计，让林志找黄荣开贫农团公审会。黄荣只得装病。亏得县委民运部曹部长（后确实任县委书记）来村识破阴谋：

这时林志的真面目还没有暴露，领导上还认为这是干部内部的纠纷，对他严重的违法乱纪、两面三刀的反革命罪行也就认识不够。会上除了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以外，还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另外，也批评了村支部的软弱和缺乏原则性。

后来在（前法警）支富招认下，宗藩、林奎得知林志在村里纠集 18 个人，与张作春、徐老道图谋叛乱。叛乱平定后政府逮捕了林志和郑凤同，查出林志是老牌敌飞驴队派遣特务，将其押回村公审处决。宗藩、林奎分任村长和治保主任（立新公社纪事编写小组 1966 P40-53）。

可以肯定的是，枪毙林志绝不等于斗争的结束，冷向义说：

四清那时候，我们庄死鬼黄生就说：我们庄没好人。刨去地主富农，刨去五道庙子、菩萨庙子，剩下没好人。不是红眼队，就是蛤蟆仙，要不龙华会。没一个好人。不大离就是红眼队。我们庄这老姓都是红眼队。扣的帽子有轻有重，最重的支富、毛满、黄臣、黄俊申，净挨收拾，上刑罚。哪有××那些事儿？好比你在他跟前不好，犯了些错误，这来运动了，他打你，他下去手不是？没仇他下不去手。好不离的我打你一巴掌？真正有恨，我下去这巴掌是重的。末了到这小运动，提点儿意见，人家说：他是红眼队呀。这提点儿意见就是红眼队。

53 年 1 月开始，县委以大佛教和一贯道为重点取缔反动会道门。有六名反动道首被逮捕

法办。3月全县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至8月共从县内和东北、京津等地逮捕反革命分子215名，后来处决了其中69名。曾任民团长的黄延平被从北京押解回归远，在大集上公审枪决。

### 三 土改结束？

随着对反对力量展开的一系列无情打击，政权逐步稳固，局面渐趋稳定，土改也步入收尾。49年11月县委召开各区、村干部扩大会议，讨论结束土改。据行署副专员报告：全区行政村共8395个，已平分5707村，已结束土改332村，未平分590村。遗留问题仍未彻底解决，甚至少数村庄问题还很严重，如定东被斗户占全县人口1/3，归远有的支部党员对党不满。全区有96个党员被打死，有的党员被吊打扣压取消自由，党内特别不团结，对上级有意见，工作推动很费劲。这类村庄有824个（49/11）。50年3月县委在结束土改工作时统计：土改时全县共77188户，内地主1538户（2%，皆被斗）；富农4785户（6%，皆被斗）；平时被斗总户数15544户，占20%。被斗中农9221户，占中农总户数45%。错斗中农占被斗总户数70%。平分后一般党员干部很多躺倒不干。经济上恢复的中农不多，大多只是摘掉帽子道歉了事。不少干部对中农问题不作坚决处理，认为反正贫雇农不向外拿东西，十区干部错误理解“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认为应解决的也可不解决，是为化无（中共归远县委1950）。不过这只是归远的事情。50年6、7月间中央相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sup>77</sup>《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即将在全国展开的土改将有制度化的实施依据。

在西村，自平分后从未三榜定案。被斗户除宗藩、林奎、冷向权外，在纠偏时均未得到补偿。49年7月开始阴雨连绵个把月，冲毁西村90多亩耕地，黄荣分得的11亩地被冲去近半。48至52年西村有11户典卖土地74亩，6户典出房屋15间，4户出去讨饭（《硬杆子精神放光芒》编写组1975P44-5）。整个十区的情况据区委书记孙腾兴日后回忆：49年十区户均不足200斤粮，缺粮户占总户数80%多。区供销社初建一年里连20尺小土布都卖不出。土改后农民生产积极性中还孕育着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贫农林打算把分得的6亩地卖给黑驴沟富户，好换钱买口粮和玉米种子。黑驴沟的人笑话道：“哼，连他们睡的炕都快卖到咱村来了”。此话后来变为邻村的人恶狠狠地说：“过几年把那些穷小子的炕头也给买过来”（逯斐1955）。不要小看这两句话的差别。前者说的是生产力极端落后，标志着无法脱离原始协作纽带，必须恢复换工互助；后者说的是两极分化趋势的危险：地主富农要让刚直起腰来的硬杆子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世世代代做穷棒子。这，怎么行？

土改尚未结束，上下仍需努力，时势呼唤英雄。

### 四 组织起来

48年年底开始，归远县各项组织建设稳固开展。49年3月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县代表大会（按：林起洲年后被区里发展为西村首名团员），11月召开第一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49年9月归远县党员统计12699名，较46年5月土改开始时激增80%。50年4月召开建国后首次县党代会，动员全体党员带头推动大生产运动。

49年1月归远成立县粮食贸易公司，调节市场粮食（有关国家对集市交易价的监控参49/5/3）。10月和12月分别成立县供销合作社和中国人民银行县支行。50年西村地区建立供销合作社。一系列国家行动已经或即将等待着西村村民去接受。西村村民生活逐步纳入国家体系。52年归远和全国人民一样，连续开展了三反、五反、新三反和爱国增产等运动，后又宣传贯彻《婚姻法》。但有许多童养媳妇的偌大西村却仅两户离婚。据周国珍说，一户是有梦游症的黄俊盛；另一户是黄俊满，他贪吃、不会干农活（如前所述，他以前是往外地卖果品的）。不过黄延青说“黄俊满他老婆就叫林志为首的几个欺骗走了”。黄俊满自己说：

<sup>77</sup> 其中有关土改在乡村中的合法执行机关一项已不再提贫农团及其委员会的选举和权威。

有孩子让给挑拨走了。那小孩还没生呢，揣着就走了。那时候干部也没好干部，妈的弄得挺不和美，挑拨她说你不好，挺生性。

日后的查证材料无意间提供了间接证据。54年林奎在作证林同与宗藩是否有私怨时，谈到林同、林起洲、冷向权与黄俊满妻曾去野地里搞掏毛，宗藩说过林同。随后区委结论指出：皆因林同要与前妻离婚，与掏毛女方结婚，宗藩因其作风不正对其批评，因此结下私忿。显然，对于已经死于正义的人民枪下的林志，倘若真如黄延青所说是带头的，林奎根本无须“为尊者讳”。谁让林志这死鬼那么坏！真正需要“为尊者讳”的是宗藩本人。我们在某宣传读物中看到宗藩这样一件极具人情味的事：55年朱柱不在家，媳妇与婆婆不合，恰好婆婆生病。身为一村之长的宗藩请来医生，并称是媳妇替婆婆请的先生，施巧计成功地调解了婆媳关系（全国农业展览馆综合馆1960）。如此体恤群众，不禁让人击节赞叹。不过朱柱本人在访谈时说：

我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法》颁布后国家宣传政策，说你们要是不乐意呢可以离婚。要是同意组合呢国家也不强迫限制。我们父母有个老脑筋，不爱提离婚。就这么一直坚持下来。

我们首先知道了原来国家法律的执行效果也分类型，其次有些疑惑，不过迅速在查证材料中“偶遇”许多细节。整风时林惠揭发宗藩：“58年朱柱去密云修水库，宗藩一天夜间带手枪去朱柱家叫门（意欲强奸），这天毛桂芝（党员）正给她作伴”（62/3/20）。而在四清结论中，与宗藩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宗藩猥亵的另列一类）的名单中赫然有朱柱妻在内（65/6/5）。更有意思的是54年10月林起洲的证词：

50年林同与朱柱妻可能有男女关系，就要和原妻离婚（未离）。又托我去朱柱家给林同介绍朱妻，我和林同将朱妻叫到林兴家里，朱不从。以后就不提了。后宗藩发觉报告区里，区长把林同找去教育了一次。两人因此结仇。林同50年与黄俊满妻通奸，有一次拉拢我去，我不去。林同说他是治安员，没关系，和贾秀英也通过奸（54/11/6b）。

绕了一圈又转回来，原来大伙儿都搅在一起了。此处的贾秀英正是我们熟悉的贾秀英，四清的名单中也有她。其实名单很长，我们亦无窥秘癖。有条不紊的叙述中这只是段插曲，日后查证中大家也都心照不宣地详细谈谈，然后在结论中含糊过去。国家的强大组织无法也无须涉及这些鸡毛蒜皮，时日流逝，历史叠积，当有人为此负责。目光转回，且来看互助组的建立。

51年9月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根据土改后农民中存在的两种积极性以及农村中的两极分化情况，要求各级党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积极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sup>78</sup>

51年西村也成立了11个互助组（临时和常年皆有），参加农户占60%，次年80%农户参加，全部转为常年互助组。<sup>79</sup>52年入团、次年入党的林起友是解放后培养起来的干部，57年就进了支委，58年当了大队长。他虽是林家大店传人，但因上辈败家，被划为贫农：

互助组是上边党支部做工作，下边自愿结合。下边也有三户两户没有入的，有成份问题，也有人缘问题。那时候有人总想自己干，开会的时候就叫他站起来，说现在毛主席号召大家伙儿一起干，你别总想着自己好，往家划拉。也有专门的批斗会，敲山震虎，借批地主、富农来教别人。名义上地主、富农还都有帽子，大伙都躲着他们。（庄里有没有成份错划的？）那时候政策是灵活掌握，干部不能忒死板。

51年12月至52年3月，县委在全县试办首批7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含十区两个），还开了典型示范会。52年3月华北局通报要求防止农业生产合作社盲目发展倾向：反对不看条

<sup>78</sup> 农村集体化步骤和速度一直是党内争论的重大问题。刘少奇此前50年1月公开认为战时变工互助不可能发展成集体农庄，51年5月又指出：“以为目前组织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的农业去，那是幻想……如果认为这样就叫社会主义，并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业合作社，发动群众运动，就要犯大错误，那就叫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1992P41-2）。关于华北互助组类型及各自发展状况；老区互助组的巩固和提高，尤其如何对待组内富农，参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

<sup>79</sup> 参《硬杆子精神放光芒》编写组1975。临时互助组只在春播秋收之类重要农活时劳动互助，一般仍每户各干各，规模常不过几户。常年互助组则在全年主要农活中都互助合作，一般十几到二三十户，仅少数不足十户。春天各农户以小米作价劳力和畜力，齐工时相互结算使用对方多少“人工”、“畜工”，差额按每工数斤小米找齐，是为“齐工找米”。但朱柱说：互助组实际就是换工的发展。谁往外拿米？都是换工。

件，不根据群众自愿，盲目、轻率发展的作法（中共中央华北局 1952）。

此时宗藩在干啥？其实他也参加了示范会。据四清查证结论：宗藩 50 年春去归远汽车站打更，年底回家务农至 52 年，任村长（原文如此）。51 年向区委书记孙腾兴提出要求恢复党籍，孙于 51 年冬月叫其参加党站学习；52 年 1 月区委会批准恢复党籍。其党籍从 47 年底至 51 年底间断 4 年，其间由本人负责，不应称为党员（65/5/3）。而孙腾兴则在回忆录中写道：

宗藩是搬大石头时被过火搬掉的。这次会议是我点名要他参加的。我同他曾一起在日本采金公司当过工人，彼此很熟悉。50 年 6 月我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给父亲买药路上见他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肩上掬个破面口袋。我想起老县委书记苏远兴叮嘱我的话：“过去十区土改搬石头有些过左，伤害了一些干部，要大胆使用”。因此我很同情地问他……他在受打击的情况下还渴求工作，很难得。我这才向县委组织部长阎大兴汇报，经区委调查研究报县委组织部批准后，他又回村当村长，后又恢复党籍。他会后回村串联 20 多户，其中 16 户原扛活、要饭。宗藩是办社带头人，被选为社主任，林奎原是村干部，被选为副主任。

韩士林则在访谈时说：全区在五更庄召开全党大会庆祝，意思是要各村支书、村长学习。宗藩也与会，当时其党籍尚待组织部批准恢复。是孙腾兴提拔的他，俩人曾在四卫所煤矿（前文材料为金矿）一起干活。会后宗藩被直接任命为村长，酝酿办社。龙孝还是书记，林奎是宣传委员。董印则说起先他们 18 户和宗藩各有一互助组，后来他替组长董祥芝去开会，宗藩可能也去了。回来就商议合办一个社。他话里话外有些争功味道，但这也无所谓。据正史所载，52 年 8 月在黄荣家诞生了硬杆子初级社，首批成员有宗藩、林奎、黄荣、黄生、董春、董印、董德、支恩、林亮、林春、林衡、林同、黄林、贾进田、石贺昌、石贺林、费金林、黄金平、董祥芝、陈秀英、田玉莲，后来又加上会管账的董启和孤儿毛存。值得注意的是，董祥芝社中冷向礼、冷向山两位干部未加入宗藩等组织的初级社。<sup>80</sup>

阳有志主动为我们解释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他首先纵览了此前的形势：

土改运动的思潮，这影响是由东北那边影响过来的。东北战争，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实行土改运动，都是苏联的支援，毛主席派去的。过去，东北黑龙江这块儿上，刚一推行土改运动，草草还都杀人。后来国家分析，举国上下富户都有的是，杀不起。国家就不了。苏联夺取政权以后决定推行社会主义，搞这一——那时候也搞这集体化不是？富户抄产，老小杀喽。后来咱们国家推行了一小点儿不中，吃不开。苏联人少，杀这富户，它富户也少不是？咱们这边可能也就是——东北那边可能有个叫郭凤莲的来着，在东北办事，好象是来着吧？咱们那时候，东北解放，推行土改，然后合作化，

大白活的说法煞是“离谱”，还把山西大寨的铁姑娘搬到了东北。但还有更“离谱”的：

那时候，这庄就有爱看报纸的，你象钱惠这户吧，他是富农。有小报、大报，到外头也买，拿来看。看透了，由东北一定要发展到华北。不准将来就到了这边。他就找宗藩、林奎这样的干部不是？跟那农会主动地要交出田产，交出产业，让分给贫下中农。那时候那贫下中农不敢要，这弄来了还兴要回去呢。他就给林奎、宗藩他们念报纸，说集体化道路就要走下去了，合作化运动就要推行开了。我是第一个要这么办。你看宗藩、林奎那样的他不行，还不识字。在他启发下，后来宗藩林奎唱主角，组织起一伙硬杆子。钱惠说我走了。说这时候讲成份，问问成份高，在这里也不中。将来日后也没法和人拉这事儿。富农哪能攀人贫农户呢。后来他就上他儿子那儿去了，他儿子上桂林去了。最后，他儿子媳妇顶了他的户参加硬杆子社了。他要是不看报纸，不找这庄里的干部讲这个道理，一般都想不起这个。没传达那时候他就看报——走咧（自觉言多，托辞走开，访谈员力劝不住）。

我们找到董启，他说互助组原是钱惠管账，后来钱惠去投江西的儿子，只好向他学来旧式簿记，自己来做会计。不过我们知道，董启自己也是富农。日后这成了查证重点。而田玉莲正

<sup>80</sup> 冷向山整风后被贬，文革前夕村史写道宗藩和林奎串联时，冷向山和陈龙孝态度消极，黄荣等积极配合（立新公社纪事编写小组 1966）。而在林奎 73 年死于狱中后的村史里，宗藩串联时林奎消极，黄荣打小算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1975）。

是钱惠儿媳。但那时候，没有人会去细究硬杆子社里任何一个人的成分。所有的正史都会告诉我们 52 年冬合作社上山砍柴、自力起家的故事。问起村民，我们又碰上一位似乎在争功的人：

20 多口到外村砍柴（包括冷向权这样硬杆子社外的），宗藩是哪也不去，林奎是特别胆小。那边是林春他姐夫家。当地人眼红我们趁钱，栽赃我们砍大树，领头的撩回来了，就我去出头解救。后来功劳都归他们，也不提这事儿（林起洲）。

而 75 年的一部村史写道：49 年冬宗藩领一部分贫下中农，满怀革命激情，顶寒风，冒大雪，上山苦战一冬，用卖柴禾钱帮助 50 多户贫苦农民解决了困难，避免了典房卖地厄运（《硬杆子精神放光芒》编写组 1975P46）。是宗藩，而不是实际带头的林奎，更不是可能出头要回了那车换钱的柴禾的林起洲，占据了历史编织的制高点。他是所有光线的聚焦，是所有逻辑的基础。52 年冬被往前挪到了 49 年冬，三年的时间差换来了空间和历史逻辑的和谐，因为 49 年 10 月 1 日是一个历史编织的基本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宗藩社起初异常困难，但得到了支持正确方向的上级的大力支持。韩士林介绍道：

区里以后才给了点支持，还不是种子。宗藩反映社里各家饭都吃不饱，孙腾兴给支持了点钱。准数不记得（应为 50 元），粮食能吃几个月。这样社才没垮，冬天才砍柴，后又给了贷款买牛、车。要没这笔支持，连维持生产都困难，没种子。只有林奎家里有十几天富裕，有牲口，后来也给大家伙分了。宗藩家也不行。他们家就他一个劳动力，还有妈、媳妇和俩小子。

只要方向对头，吃点苦真算不了什么。当年宗藩被圈时，冷向义不就对他很有信心嘛。

历史的发展立刻证明乃至提升了冷向义的论断。53 年 2 月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4 月《华北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简章》出台（分见《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 1992P115-9、122-3）。5 月县委决定以十区为基点区，西村乡为基点乡，县委书记直接指导，副书记在村蹲点。10 月、11 月毛泽东在中央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前后连续强调：不要小脚女人走路，“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要不得，要的是提倡农民直接办社。会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1 月，归远县委传达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在全县实行粮食、油料（不久又包括棉花）统购统销，取缔粮商粮贩。12 月全县私人医生开始合作经营。本年西村建起村信用社。54 年西村有了供销合作社分销点，同时建起乡信用社。5 月县委指示恢复含西村在内的多个粮食市场，但只许农民调剂余缺，严格取缔粮贩，购量限额 100 斤。9 月全县开始计划供应布票，农村每人每年 14.5 尺（直至 72 年增为 17.3 尺，84 年取消）。55 年 1 月全县首次征集义务兵……

在短短的时间内，不仅粮油棉布这四项重要物资被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体系，而且在农村商业、信贷、医疗以及对农民有特殊意义的征兵等方面，无论是实际运作方式，还是基层村庄与整个国家的关系，也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与合作社的顺利建立和发展壮大又存在相互促进、互为前提的关系。公社体制下的村史写道：西村取消了粮油棉布等产品的自由市场，沉重打击了私商投机，限制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提高了农民社会主义觉悟，使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断巩固壮大（《硬杆子精神放光芒》编写组 1975P74-5）。

回头来看，中央政府的这些措施都可谓是对土改后出现的农业工具和资本分散趋势的反拨。共产党号召成立互助组是为了把农民组织进一个经济上更有效、政治上更方便执行中央计划的单位。华北农村固然有互助传统，但互助组绝非只是一个自组织性的经济单位。其结果正如许慧文所言：农业生产适度扩张，农民更好领导。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合作化的高潮与农村经济环境尤其是商品、信贷市场的重建实际同属一个过程。统购统销实际上完全限制了独立致富的通道，富农经济已经不可能死灰复燃。土改后地富、放高利贷者已经失去了投资放贷的能力乃至资格，农村原有信贷体系瓦解，而贫下中农既无力填补空白，又害怕被指为剥削，所以只有由政府来填补信贷真空。信用社使农民个人利益能够（也应该）被整合进集体的发展，个人收入增加必须有助于整个社会进步的目标（参 Shue1980），比如爱国储蓄。

在国家逐步控制基层经济生活的过程中，把握稀缺资源的村干部就此又多了条控制村民的渠道，在西村，信用社主任黄俊峰正是口碑最坏的干部，董印说他“是我们队最坏一个，嫖老

婆，是胸前都摸到。老百姓谁借不走钱，赶老婆去借就中。”

## 五 清理内部敌人

回到西村的宗藩社。阳有志的那段故事是否属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土改被打下去几年后宗藩东山再起，而且内外环境都有利于他和他的社的发展。显然，社的命运将决定宗藩未来的命运和他过去的评价，决定对西村土改中各种势力的重新定位。革命高潮已过去，但更需要塑造新的革命形象，它不象过去那样打打杀杀但依然有斗争对象，依然轰轰烈烈，而且其胜利者应更加熟练地掌握逐渐定型的革命话语，无须自己动刺刀便可见红。土改确认了一次新的乡村秩序，但有生产技能的农民从土改到合作化期间迅速致富，加之其他种种原因，又一次重新调整关系势在必行。而合作化正好可行，宗藩社可谓应运而生。

54年宗藩社迅猛扩到大半个村。3月发生黄悦办社事件。较中立的说法是他策划串联了14户中农和富裕中农。次年的一本宣传读物说黄悦串联了3户在社群众、7户未被批准入社的中农和1户三心二意的军属（逯斐1955），作者原意是要说黄悦企图从宗藩社内部离间，同时在外另拉人马。但五年后以该读物为原本、由唐山市委宣传部某官员执笔改写的村史中，却成了10户未被批准入社的中农和一户犹豫不决的军属（全国农业展览馆综合馆1960）。无论实情如何，“犹豫不决”当然比“三心二意”更能维护军属形象，而已成典型的首批硬杆子内部又怎能出现动摇分子？所以，3户在社群众变成未被批准入社的中农就使历史更润滑了（实际可能是3户在社群众、10户未被批准入社的中农和1户反正有些想法的军属）。不管黄悦出于什么目的，不管他究竟联络到哪些成分的人，总之那年春天他找到支书冷向山要求办社。而当时整个气候决定了他的下场。就在次月，华北区如此总结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教训：

无视富农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影响，缺乏必要警惕，或为富农某些经伪装的“积极性”所迷惑，误认为富农也积极拥护互助合作运动，便吸收其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甚至任其在合作社中占居领导地位，这显然有悖于党限制富农剥削的政策。导致部分合作社组织不纯。事实证明，这些已混入合作社的富农在社中进行了许多公开和秘密的破坏活动，特别在合作社遭遇较重大困难时这种破坏更为突出和显著（《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1992P187-92）。

冷向山佯作答应，回头汇报区里。接下来一切顺理成章：5月黄悦“因历史罪恶和现行罪行”被逮捕，劳动改造（立新公社纪事编写小组1966P111，另逯斐1955：黄悦在林志上台时是个小坛主，把村里5个党员全吊在梁上，还用火烧着宗藩棉袄，把他烫得浑身燎浆大泡，连头发也烧了）。一年后，郑凤同老账新账一起算，“因反对硬杆子社及贩毒（大烟）、破坏新兵工作”被抓。林起远以洞若观火的口气对我们说：

那阵儿讲搬大石头嘛，农会当家，对过去这干部——过去干部当得再好，也避免不了有伤人的地方，这就是那个运动。搬大石头过去以后，政府又作了几次纠正。他们重新又站了起来，和农会的干部就形成了对立。郑凤同属于农会这边的财粮，跟老干部也一直有矛盾。现在看也就是互相残杀。

至此，五名主要新干部中除方顺早早离村，黄荣是首批硬杆子外，另三人悉数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我们且不细说当时村里的斗争（如果有的话），因为正史已写了好多，上至路线斗争，下至黄悦的街头打赌、地头施肥；更因为进入正史逻辑、纳入国家机器后，这些斗争都已失去了原有村庄内部斗争的许多意义，宗藩等可直接把黄悦等交给“上面”，以后的事就无须管了。而黄悦等一旦落入正史逻辑，其个人轨迹也就由不得自己了。日后他们会一再成为路线斗争的另一面，成为人民的敌人。不过，表面悖谬实际合乎逻辑的是，他们的队伍会一再扩大，日后在村庄权力斗争中的落败者也将一个个步入此行列。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趋势将愈益明显：落败者所使用的权力技术和思想逻辑其实与胜利者几无二致。

几十年后人们对此又作何回忆？孙腾兴在回忆录里写道：

西村富裕农民黄悦和地主黄延藩等自称建社。当时以乡为单位，建立互助合作保卫工作研

究站，召集各村治安员每月一次会议。后帮助西村党支部，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戳穿了黄悦等户的假社。其实土改后各村党支部普遍存在问题，西村党支部长期不过组织生活，党员不工作。

与黄延藩的“勾搭”如果属实，那就明显是和硬杆子社的社会主义阳关道对着干；而党和政府显然对地富分子破坏合作化早有防范。当然事件并非偶然，“路线斗争”的种子早在新老干部战西村时即已埋下。但韩士林的说法和区委书记就不太一样了：

黄悦也想得贷款，故假说办社，如有贷款，加上自己有种子、养猪造粪，产量会更高。这样就挤了别的社。当时我就住在黄悦家，了解情况，未批贷款（要报经区里再经县里批）。他就比着干。54年离开西村时黄悦未被打成反革命，不至于吧？

比着干和对着干性质当然迥然不同。韩教员尚觉黄悦错误不至如此，村民们至今更是普遍对黄悦印象甚好，对郑凤同则只是觉得他挺倒霉。林起远则明显冲着宗藩去了：

实质上黄悦在群众中威信不错。他是个老实厚道人，我们观点看。家里也不是那么挺好，就是说了个媳妇，那边日子可以过，就给了他一些羊啊，牛啊。由于黄悦勤快，把牛羊经营好了，把自各那点儿地经营好了，这样富裕起来了。到互助组那阶段，黄悦是自各干，没有入互助组。互助组跟他在生产上有点儿竞争，看谁庄稼长得好。黄悦那时候为什么不愿意入呢？觉着自己又有牛又有羊，还有地，入了大互助组自己吃亏，有点儿想法。后来他自己那个互助组很快一年就垮了。要说起来这个人属于发家致富，自各有一套经营。不仅下狱，还一直打成反革命。也是黄宗藩整的。名义就是破坏合作社。他和林奎他们要组织互助组，他也要组织——以这个为借口。实际上是以前农会新老干部不和落下的。

黄延青虽很同情黄悦，但他的话非常耐人寻味：

黄悦这人不离，入社那会儿他老婆脑筋老，跟干部干架，不入。黄悦比较着还不错，他一拨子羊，还有一拨子牛，一年能卖多少钱？入社？是跟着他老婆子沾光了，应该抓他老婆子。共产党、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道路，大伙都同意那么走，她绊脚石把你绊住，让你不痛快。（黄悦当初不也当过干部？）农会主任，那算啥干部？（他是和林志一起当过干部吗？）没有。他就是脑筋老，当不了老婆子家。干部领着走，你就痛痛快快地跟着走。你想扭转就扭转了喽？你这臭老百姓扭转啥呀？有点资格的还不中呢。说过多少回应向上面请示给老爷子平反。人死了管啥呀？有的人，命啊！命到他死他躲啥呀！

庄里坏人不少，当下也是那样。把这庄坏人都他妈枪崩喽！非得下狠心，狠打，抓到就枪崩。不狠打没有一帆风顺的。不学好的人都应该枪崩，崩一个少一个。坏！狠狠地打，抓一个活埋一个、抓一个活埋一个，一个别留。水流天边归大海。不管你干啥工作，你把良心搁裆下？别把它路支窝一搁，管自己吃喝玩乐，日子长了还有不漏马脚的？只许你一心一意，为集体、为国家、为党、为农民。

黄延青父母、本人都是被村庄正史抛弃的对象，他也极其痛恨坏了心眼的村干部，但他的运动哲学却显然蕴含着某些逻辑，在此之下，无论是他和他的家人，还是他所同情和反对的人，其命运都在相当程度上是注定的。自认老革命后代的黄延青几十年郁郁寡欢地放牛，我们想再次访谈他时，他已作为富农子弟离开了人世，至死对其运动哲学内的悖谬无所认识。

从38年大暴动到52年宗藩建社，西村走过了十五年，这是从革命走向革命的十五年。暴动大潮中挣脱束缚的年轻人在经历种种性质各异的斗争洗礼后，终于又站到了一个新的风云际会的形势之前。这一次，一个差点儿被投票处死的人看准了新一轮革命的方向。他有充分的理由和机会赢得历史。国民政府和日本人为村庄带来了警察、学校、公路，也逐渐消抹了庙会、族坟、祭祖。但共产党的影响要远为宏大，远为丰富，不仅带来外在的政治组织、军事组织、医疗组织、经济组织、信贷组织，而且还带来挥之不去的组织观念、组织技术乃至被组织的技术。十五年的风雨铸就了新的武器，在新的革命征程上，武器已经准备就绪，就看谁会用了。

## 第五章 风烟无尽

1955—？

有首长 来参观  
小闷子车真叫欢  
左边瞅 右边看  
首长看了真喜欢  
参观以后回单位  
要登报 开大会  
各州府县学经验  
保证粮食夺高产

——《农忙歌》（归远新乡谣）

清理掉阶级敌人，宗藩社高歌猛进。55年西村全村入社（除7户地富反坏分子）。56年东西村、大应家谷、黑驴沟联合成立立新（“立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高级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取消土地分红，全部按劳分配。宗藩当选社务管理委员会主任。联村调整插花地时西村调出526亩，调进311亩，表面上吃了亏，被东村割去大片平川好地，但西村成为周围各村行政管理中心，日后随着西村成为更大范围内的典型村，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平调源源流入。

合作化时期主要村干如下：宗藩、林奎分任正副主任；支书冷向山；村长陈龙孝；会计董启；治安主任冷向荣；民兵队长冷向权；团支书林起友。以上皆党员，除董启为中农外皆贫农（65/9/10d）。林奎妻在访谈时如此解释丈夫当时为何是副手：

林奎不识字，上哪儿都带着宗藩。让林奎当社长，不要，让给宗藩当。

在当时的宣传读物中，西村除却内外敌人，一派稳定祥和、团结奋进的蓬勃气象：

副社长林奎说得好：“有党的领导，有我们的双手，三五年后的西村，一定是人人丰衣足食的山村！”谁能说这是梦想？不，不！亲爱的黄宗藩同志、林奎同志，你们已经用双手证明给我们看了。你们勤俭办社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国农业合作社的方向，就是全中国人民努力的方向。伟大的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几十年内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和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建立起一个富强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一个人人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国家（逯斐1955结尾）。

数年后“我们”与“老大哥”暂时疏远，而林奎也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此为后话。57年8月中央指示在全体农村人口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西村也开展了社会主义大辩论。除黄悦、郑凤同外，又有林起洲因贪污被判三年，支瑞善因诽谤硬杆子社被定为坏分子。58年县里平调大量人力物力建成小型水库，为西村田地灌溉水源，并开始在西村举办村史展览，布置村史馆，后又动员各方力量建招待所、化肥厂，修柏油路等。60年春节前夕县城和西村首先接通唐电网，此后国内外参观访问者络绎不绝（包括斯诺、韩丁、韩素音等国际友人）。<sup>81</sup>

### 一 “一定要实事求是”

但西村围绕宗藩的种种问题始终风波不断。伴随着控告、查证，宗藩的历史、党籍、成分

<sup>81</sup> 归远县革命委员会接待站 1972：正当西村广大贫下中农高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时，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河北省的代理人把黑手伸向西村，以支持“四化”为名，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胡说：“物，你们随便用。钱，你们随便化。国家用钱堆也要把你们堆出个‘四化’来。”西村大队广大贫下中农严辞拒绝，自力更生搞“四化”，硬杆子精神大发扬。60-62年，因赫鲁晓夫集团破坏和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乘机攻击人民公社，妄图拆散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刮“三自一包”黑风。隐藏党内的西村大队走资派林奎积极贯彻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要向社员多放自留地，极力鼓吹单干。

问题及西村过去十来年的主要事件（从特定的意义而言，它们也就是在查证之下成为了“事件”）也逐渐被反复回忆、书写。54年年底，县、区就林同“诬告”宗藩一事进行了解放后首次查证。据十区区委结论：林同修路时大声喧嚷，说报纸宣传宗藩社，我就不满意，他那点东西我不知道？是地主，还向农民反攻倒算。经查宗藩纯属贫农成分，林同身为党员，攻击我区合作化旗帜，纯属污蔑（54/10/9）。林奎作证道：林同和林起洲曾说宗藩贪污麦子，宗藩妻与林惠妻闹不合（54/10/7a）。这都为判定林同出于私忿控告宗藩提供了证据。在东村办事员周永清、西村支书冷向山的证词中，宗藩42年任村支书。47年村里成立工、农会即“停止工作”。49年秋又在村负村长责任（注意非“任村长”）（54/11/6a）。林同最后是受到县纪委处分。

58年秋支瑞善去女儿家走亲戚，对亲家说“立新社好啥呀，分钱少，粮食不多，驴粪球外面光”，后两家失和被检举，次年春被定坏分子。62年整风时对此附带查证后召开群众大会，县公安局长赔情道歉，认为属于人民内部正常反映情况，不应被定为坏分子。

公社化时期主要村干如下：宗藩、林奎分任正副社长；支书冷向山；大队长林起友；会计董启（成分有修改）；民兵连长支瑞万；团支书支焕；妇女主任贾秀英。

61年起贯彻中央60条，全县整风整社。对宗藩、冷向山、黄龙祥、贾进田（当时在大队管牲畜、买牲口、漏粉）倒卖木材（原拟建招待所，国家认为占耕地形象不好）给予查处。据林起友说：整风时黄荣、毛存、黄贺保（大队现金会计）、林奎反宗藩。黄荣、林奎使劲最大。

继54年林同控告不成之后，林惠父子在62年发动了新一轮努力。林惠向上反映龙孝曾“投诚”入感化院，回来混进党内；还指诉宗藩曾猥亵其妻。林惠对县公安局长摆出破釜沉舟之势：

这问题原我不想和李局长你说，想和李县长、公社李书记他们集体去谈，写两份，交你们一份留先备案，另一份留我找老首长说下。老首长们如不叫说回来就搬家。如不处理回来就上告。非跟他干不行。他对我们还敢这样做，对别人更不用说了。

林惠还指诉宗藩调戏自己儿媳和其他多名妇女，“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他还质疑村里继林起友后的又一颗政治新星支焕：“支焕父是道教头子，去东北传过道，不知支焕怎样入了党，又是模范又是代表的。他干啥来着？我黑夜白天干不如他呢”（62/3/18、20、23）。

在归远县长同林起远座谈时，林系统地“汇报”了意见，从宗藩社有负于对它的宣传，宗藩等干部贪污腐化，宗藩家属搞特殊化，到西村对自己的“迫害”（冷向山说起远在西村铁人也捏软了，黄主任说我是被开除回来的），最后到自己父亲当年下江南被阻一事及宗藩党籍问题。由公到私，由枝节到根本，步步进逼，洋洋21条。他对前段整风效果不满，认为群众不敢提意见，如董祥芝说：“提意见吧，立新社还是立新社，黄主任还是黄主任”。开整风会队长先发言，都是些鸡毛蒜皮。“好象提意见就是拔西村红旗，就不要黄主任了。这不是报复？干部不是脱了裤子下水，领导在这他不敢，走了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就把你整了”（62/3/17）。

上级在西村广泛查证，但证词普遍对林惠父子的指诉不利，至少留下的书面材料如此表明。陈龙孝等关键人物皆称当年宗藩确被划为贫农。上级对林惠反映宗藩问题作出结论：林惠所谓宗藩小时使过奶妈、母亲坐过轿子及土改后曾往回要园子和房子之类，更疑宗藩有其他组织活动等等，经查证基本不属实。林惠对黄贺保说解决问题要从政治上看问题，从根子上闹。宗藩男女关系问题尚未查证，林惠妻一事现林已回避不谈（62/4/6）。总之，能查的不属实，搞不清的不便查，告状的自己却露出了别有用心的马脚。县委对宗藩问题全面的正式结论指出：土改前全家5口人（未算二大娘），瓦房4间，地10亩，32年因生活所迫出4亩，土地平时只6亩地。33年前年幼上学，土地出租或分收，每年需借钱或粮，后积累债务将4间房契借钱50元。34至40年每年与黄立礼、董印等伙种10来亩地，有时做短工。每年仍需借粮。41—43年在村工作。平时全家6口，又得地7亩。与林奎等三户合分一小树行子。平分后共13.72亩地。虽与林奎合伙雇过小活，自己也雇短工，但主要因工作关系。从剥削和被剥削比重看，受地租、债利、出卖劳力的剥削是长期的，主要的。应定为贫农（62/5/3）。

宗藩本人问题查清了，接下来便是其立身之本——硬杆子社。这个贫雇农社如今被人指出阶级成分不纯，这是个大问题，不仅关系到宗藩、西村的荣誉，也关系到培养典型的区委、县

委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形象。焦点是董启的成分。县委书记就查证方针作出全面指示：

由支部定，定富农就是富农，不要以为周书记（唐山地委书记）不满意才纠正。一定要实事求是，有缺点则定缺点。可以公开。上级比咱们考虑周到，一些材料还出国。共产党讲实事求是，不迁就，错了改过来。硬杆子是骨干，过去不够注意，这回划错了则定下来了。真是富农也倒不了这个旗帜。不是富农划了富农，也不是实事求是。支部党员统一，短工不要数 40 户、50 户的，土改前后董启表现怎样？群众有没有意见，真正是富农，看他表现（62/10/3）。

这份字字珠玑的指示被工作队心领神会，四日后，经过对原稿的精心修改，有关董启成分问题的正式通过稿出台：首先，董启家不是富农。工作队通过精心核算，细至一斤柴草值多少钱，最后得出全年总收入 373.7 元。土改前 3 个劳力。雇一长工，经营 20 亩地，收入 100 元，剩余价值 53.32 元。短工原按 100 个，此次定为 60 个（修改前为“原来按每年 100 个，可能计算多些，这次又座谈，每年按 60 个计算”），相当半个长工剥削量。即每年劳动收入 50 元，剩余价值 34.64 元。合计长短工剩余价值 87.96 元。占全家全年总收入 23.54%，较原调查剥削量 29.78% 下降 6.24%，这样则不够富农（按：界限为 25%）。这位兢兢业业的队员明智地在正式稿后附上了演算纸，他先拟定短工为 100、60、40、50，然后分别算出剥削量为 29.78%、23.54%、20.44% 和 21.97%。我们看到了对县委书记指示的回应：

这个顾虑即除了……这次定下来，建社十周年无论如何弄清楚。支委会、干部个别访问，先后工作差不多再开全党会，个别人个别谈。林惠一家等。也不屈一个人，也不迁就。

但数字不能完全遮盖董启家当年被斗的事实，也不能说因他父亲给伪保长当先生（而非因富农）才被斗，如此岂不歪曲运动方向，何况伪职人员毕竟也不好听。故正式稿同时指出，董启家当年挨复查别有原因：“这个户过日子孽道，从不往外借什么。过去在村中来往关系的相处上，不受欢迎。但没有什么坏的表现。被斗后，全家搬出要了几天饭吃，就回去了”。现在不划富农，因其家中以农为主，不出租放债，“群众没啥意见”（62/10/7）。各方如释重负。

真相大白，整风结束。因社队干部确有些问题，经公社批准，冷向山被降为副大队长，大队现金会计黄贺保、二队长黄荣和民兵连长兼大队支委毛存分别被撤销职务。余者无事。在重新登记阶级成分时，黄贺保由贫农变成了下中农。

## 二 “还是咱们贫下中农的带头人”

64 年 1 月全县开始社教，12 月后开始了漫长的四清。干部统统上楼，由大队干部、小队干部、会计，最后到饲养员。支柱林卖韭菜说不清楚账，会计黄贯洲被逼上吊，甚至出大粪的都被盘查。宗藩又一次成为查证重点。我们无从知道宗藩当年的检讨究竟是怎么写的，只好来看看干部群众对其检查的讨论。

妇女副主任孙美容（传为宗藩相好）说：宗藩到省里开会（实为全国人大）我同意。开会说开会，问题说问题。硬杆子支恩道：硬杆子成立社时棉花生虫子，宗藩叫我们烧香。黄俊申哪壶不开提哪壶：打击黄悦、郑凤同应说清楚。新村干怎样打击老村干，老村干又怎样打击新村干，应说清。费金林接着火上浇油：检查的打击报复都是 62 年整风以后的事，以前的检查不多。如黄悦办假社，就因黄悦的羊和碾子没入社。村史馆的画说黄悦如何坏，请打听一下是否是实际。郑启财话里有话：61 年我老婆有病在唐山住院，宗藩给去了封信，不知什么内容……（65/3/8a、b、c）。

其他人也不是说就没事，比如与“大眼”冷向山齐名的“小四”冷向权。他的检查在群众“雪亮的眼睛”前也毛病多多：放火是咋回事？以前为啥被开除党籍、被押几年？冷向荣给捎信说林同给你提了不少意见，你说不怕，等工作队走后再说；两性关系；62 年从中控制黄贺保；政府临杀林志时你说这样人杀了多可惜……（65/3/27）。一时间众干部都成了泥菩萨：

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揭发了干部大量四不清现象。经贫下中农、工作组对干部说服教育，启发自觉革命，他们在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交待了四不清问题。根据实事求是的精

神，对干部的问题，工作队、贫协筹委会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逐人逐问题地弄清了事实，分清了性质，做到了三对口三落实（群众揭发、本人交待、查账查证）。并对干部贯彻了三定三允许。贫协筹委会……本着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退赔既不能马马虎虎，又要合情合理的精神……（65/5/14）

国家发动，群众配合，党领导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这完全不同于林惠等个人发动的攻击。发动群众的根本目的当然是要使群众自己产生“发动”的“积极性”乃至“创造性”，但谁是群众谁不是群众，谁拥有代表群众说话的权利和权力，这是必须首先得到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对干部面上多吃多占的情况进行了处理后，工作队汇报了宗藩问题的总体情况：运动中中共揭发宗藩错误意见 650 条。查明其土改前三年剥削率为 20.5%，62 年隐瞒少报土地 21 亩，房 5 间。错误严重，再定贫农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但工作队的建议仍很谨慎：“划富裕中农或中农较宜”。汇报还举出许多很严重的问题，如土改时分得东村地主黄某座落西村一松山，群众耕作一年后嫌次，宗藩、林奎、龙孝、冷向山、林恩五人私分。汇报还就宗藩“乱搞不正当两性关系”甚至猥亵分别开出了两份不短的名单（无林惠妻）。

不过这些要么是个人历史问题，要么是生活小节，要命的（或让上级更敏感的）是阶级界限不清问题。汇报指出，首批硬杆子里的董启和田玉莲都不是贫农。董启在宗藩社成为典型后，由富农改为贫农，并于 54 年入党，担任大队会计；为怕暴露，连带其兄的成分也由富农改中农；王玉莲本是富农钱惠的儿媳，只是因婚后受虐待，常年与长工一起干活，未享受富农生活，土改后离婚，但该村始终以富农相待。当年她积极报名，参加了硬杆子社。在社外，富农黄立仁之子黄贯东 53 年在外面教书，因成份问题不能参加选举，回来找同家族的宗藩，宗藩让其找冷向山，冷知宗藩同意，即开出中农证明书。

汇报还指出，硬杆子社成为典型后宗藩骄傲自满好虚荣，有几次各地上西村参观时，确曾布置大人小孩不穿新衣服不准出门，傻子藏起来，疯子锁屋里或送上南岭等。62 年整风后还打击报复（65/6/5）。

董启成分再次成为焦点，最后结论是“土改前父亲过日子孽道，有点万事不求人，向他找借也不往外借，群众来往关系不受欢迎外，全家是老实的，没出租、放债”。这和三年前没啥差别。但报告特别指出，土改后特别 52 年合作化以来董启表现积极，为党工作多年，故维持原结论。此时计算具体剥削量时，三年前结论中雇的一个长工不见了，短工由 60 降为 40，每天吃粮则涨了半斤（如此则成本上升，剩余价值下降）。最后算出土改前三年平均剥削量为 3.7%，仅为三年前 16%。即便如此，有剥削量仍不可否认，因此报告煞费苦心指出：“硬杆子贫农中也有二户不是贫农是中农（原稿‘也有阶级成份不纯的现象’被抹）”，认为应划中农，但考虑解放后贡献，就低不就高，维持整风时贫农结论不动（65/7/5）。

在查清上述错误后，领导上对西村问题定了性，在某领导致工作团负责人的信函里，援引了西村某村民的话：

使咱们村成为一面红旗，与宗藩为首的党支部领导也是分不开的。虽然他有错误，但已经检查了。因此，他还是个好领导，还是咱们贫下中农的带头人（65/7/15）。

10 月工作团递交了总结报告：作为四清工作重点突破口，帮助宗藩“洗”了三个多月“澡”。总结出十条错误。认为土改时划富裕中农较合适，51 到 62 年不应自报贫农成分。在棘手的男女关系方面，报告指出：宗藩同志 62 年整风后“仍然不改，继续不断，直到这次四清前，才断绝了关系”。此问题虽在西村有一定社会性，但其身为党员，又是著名劳模、人大代表，“搞的数量如此之大，并带有一贯性，影响很坏”。总的结论首先认为宗藩所以犯上述四不清错误，有其阶级、社会和思想的根源：宗藩同志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主持家业后又处于富裕中农的经济地位，受剥削阶级思想熏染较深，虽入党二十多年，但其旧思想意识未彻底改造，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侵袭，因而犯了上述图虚荣、对党不忠诚、动摇自首、乱搞两性关系及经济不清等较严重错误。另一方面，因工作中有些成绩，受到党的重视，领导的表扬和鼓励及群众和其他方面的称赞和颂扬，逐步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功臣自居，摆不正自己和群众的关系，过高估

计自己作用，认为西村家业是他创造的，国家支援是他要来的，“红旗是我，我是红旗”，放纵自己，组织纪律观念松弛。但基层上级也对此严重失察：

从客观上分析，对他也失于教育和监督。领导上过去对他缺乏一分为二……特别是公社党委……或者是由于本身手脚也不干净，或者是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就没如实地向上反映……甚至帮助他掩盖错误，这就实际上纵容了宗藩同志的错误，使他的错误不能及时纠正。这不仅使宗藩同志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有损他在群众中的声誉和模范形象，而且给党造成了不良影响。

当然，宗藩的功过必须三七开。搞清宗藩同志的某些错误正是四清运动的伟大胜利，过去党领导人民从革命走向了革命，而今，党更要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总的看，西村大队虽然也存在着四不清问题，但社会主义方向是坚定明确的。生产连年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集体经济日益巩固和发展。西村仍然是一面优秀的红旗。自力更生、勤俭办社的“硬杆子精神”成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光辉榜样。这面光辉旗帜的树立，虽然首先是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西村广大群众的艰苦努力，但黄宗藩同志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清结束，改选后的主要村干如下：党支书兼政治指导员宗藩；副支书林起友；副支书兼文教主任支焕；支委兼大队长林奎；支委兼治保主任冷向权；落选的有原副大队长冷向山；民兵副排长黄贺保；六队副队长郑启财，政治工作员林同，会计支柱林等。

### 三 却道天凉好个秋

66年5月16日通知发出时归远仍处于四清。8月县文化大革命办公室成立，不久遭造反派冲击撤销。西村成立了两个造反团，朱柱、毛存造反团（反宗藩，林起远在幕后策划，70多人），黄荣、黄顺造反团（拥宗藩，含董印、贾秀英、支焕及偏中间的林起友，50多人），战斗队（黄贺保为首），红卫兵，共四派。67年2月中央某最高领导陪同外宾参观西村，到过朱柱、黄贺保家，让搞联合，并留下观察员。反宗藩的造反派扣留观察员，军管部队派到。全县开始三支两军，以支左解放军为主先后建立县生产委员会，旋改建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随后成立县贫下中农代表会常委会，宗藩任副主任。8月全县群众组织形成三代会和三革联两派，支左解放军公开支持前者。朱柱造反团倒台。林起远、郑凤同、黄悦被抓。据称黄远顺为林起远一派干将，图谋串联其叔叔反革命黄悦（而黄荣也是其叔叔），因此落下口实。被抓的还有黄贺保、毛存（因属硬杆子只受村内管制）、朱柱。11月成立县革委会，宗藩任副主任。68年3月起全县大办“学习班”。5月建立县清理（阶级队伍）指挥部，12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大队斗批改。69年2月“在清队、整党基础上”成立新的党支部，宗藩任支书。70年2月开始一打三反。林奎入狱，宗藩8月起任县革委会主任。72年的宣传读物漫卷诗书，豪情万丈：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围绕西村这面红旗展开了“树”与“砍”的激烈斗争。广大贫下中农高举革命大批判旗帜，揪出隐藏在党内和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夺回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西村这面红旗经历阶级斗争暴风雨考验，更加鲜艳夺目，放射光彩。实践证明，“硬杆子”精神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硬骨头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精神，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是归远人民的传家宝。“外学大寨、内学西村”：先后发现和培养学西村典型100多个，“一面红旗带一片，百面红旗带全县”，大寨精神处处开花，“硬杆子”精神发扬光大（归远县革命委员会接待站1972）。

75年5月归远县“吴、李、陈篡权复辟”案发，涉及2名县委副书记、1名县委常委暨宣传部长。宗藩由书记改任第一书记，并任地委书记。76年10月文革结束。两年之后，78年10月至12月在中组部和省、地委工作组参与下县委整风，揭发批判宗藩主持县委工作后所犯严重错误，讨论通过县委处理报告：“他搞打击报复，制造冤假错案；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

专行，称王称霸；违反财经纪律，大搞计划外工程（参 78/2/24）；生活腐化，脱离群众，给归远县的革命事业造成很大损失”（归远县档案馆 1986），提出对待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不能护短。同时省委决定免去宗藩地委书记、县委、公社、大队各级书记暨革委会主任等职。79年2月纠正“反西村红旗”有关案件，80年村史馆撤销，全部展品销毁。12月县委批“左”倾、肃流毒，总结以西村为榜样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认为学习硬杆子精神艰苦创业是对的，但在学大寨运动中对西村无限拔高，极力颂扬，涂脂抹粉，锦上添花（原文如此），特别是动员县直单位无偿投资和平调其他社队人力物力无偿支援，以塑造典型，造成不良影响（参 78/3）。81年1月县委为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致死”的原西村大队长林奎平反。84年9月省委决定，鉴于78年已免去宗藩一切职务，整党中不再重新处理，享受县水利局顾问待遇。

林奎遗孀周国珍说：林奎是70年四月初一被逮捕的，罪名是带领水库移民拦路劫车，“扛着红旗反红旗”。在这之前就老挨斗，有一次在南岭一天挨了七遍揍。都是宗藩手下一拨人。把西村放火、写宗藩十大罪状（实为工作组总结宗藩十条错误）等都算在他身上。73年四月初二林奎遗体运回西村。治保规定三不准，直接拉到地里埋。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治保冷向权拘留她56天。偷跑后被抓回，开批斗大会后被判二年徒刑，狱外执行，78年被解除，“反正也是到了”。中央组织部、省里、地区中级法院来主持平反。宗藩在会上做检查时说尽管中央有文放林奎，还是坚持下令把林奎给整死了。而平反结论是病死。最后大队同意拨款建房但扣去木料钱，强制儿媳节育。现下是换汤不换药，省长还给宗藩盖房。林起远是第一见证人：

林奎在里面被批斗了半个月，最后不行了，人事不知了。两个犯人往地下一扔，趴在地下了，吐了一地白沫。后来把饭也给摆在地下了，谁会吃那个？后来不行了，不行又拽到3号批斗了一阵儿。在夜里10点多钟，总务室的郑凤同出来告诉我说林奎不行了。我在2号。郑凤同是我们同案犯，在总务室里，就是给犯人打个水，挑个饭啥的。

数十年的战友最后反目成仇。西村村民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支瑞万说：

宗藩一小也不富裕，家里也不趁啥，才念六年书。他家那时就念不起书。他就受文化浅的病。他当过县委书记，让人捅吧捅吧把他告下来了。谁知不道啊，文化浅，不中啊！你没这么大能耐。林奎（比划）这么大字一个字都不认得。他就是好占小便宜。分粮食称高点才乐意，分柴禾多给他二斤才乐意。那！你说那算啥呀？以后林奎让宗藩把他害巴了，大狱押死了。那有啥法呀？那文化大革命以后，林奎儿子干啥？不干啥！那不是四人帮吗？推四人帮身上。法院硬来人看着来。人家仨儿子不干，见天上宗藩那跟他干架去。这么前儿不了。你说你们俩么一入社，我们都在一块的。你们俩入社一个正主任，一个副主任，以后成了正式开名的正社长，副社长，你把他鼓捣进去，让他入法院？宗藩啊，不够意思啊！当下我也恨他。不够意思。

黄延青则完全是不同的见解：

林奎是为了争功。当不上一把手，他是副主任。他也有一股子人保他为正的。正副这上面翻来覆去的闹。正的有权，你副的那不一样吗？你总闹那个正角？你瞎字不识，连横平你都写不好。你担得起？挑子你担得起？咳，人啊，都为了这个权。宗藩也有错误。不管咋说，这个大家庭，领导着大家伙把日子过好。他是全国闻名。早先那领导的道没错。按照主席的革命道路往前走。

当然，虽然在我们所写的这个村庄里，发生了许多和《大国寡民》（卢跃刚 1998）中极其相似的故事。但我们重点不在具体的人和事——如秦晖所言，在这背后发生的，是革命扫荡了传统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纽带，革命中作为工具的农会土改后也消亡了（四清时才重新搞了“贫协”以对干部形成制衡），农村组织空前一元化（秦晖 1998）。

透过战争的炮火、私利的权争；透过阶级敌人的覆灭和新生政权的成长，一条绵延的纽带把每一个村民的个人生活纽带在某些全新的东西上，来听听林家大店辈分最高的传人、自称思想落后的林忠是怎样从抗战年代走到今天的：

成天不是开这个就是开那个会。武装部来喽开武装会，民兵会。区干部搞工人增长工资，放高利贷的减息，地主减租。征鞋征袜子，咋斗地主。成天开，不闲着，黑间也开。三七五交

租，二五减租，还有啥呀？活苦了地主。成天组织开会。区里刚开完，武装部的又来了，咋配合部队打仗，咋放哨，咋抬担架，咋站岗。行署来也开会，县里来也开会，都是一码事儿。也兴在庄里一个屋里开，也兴在庄南大坑里开。开着开着有敌人来了，就往南山跑。我那时候思想落后。我们那时候人尽受罪了。没时间干活。撩吧，上外头找个饭碗吃去吧！出去比在庄里自在，开会开不起。家里又没地，净开会。我后来到古冶（下煤窑）去了，这里老开会。也没人雇我，地主都被斗了，成天开会玩。家里没事儿干。在火车站那扛包，干了二年多。要解放时候，八路军在唐山铁道上下地雷，后来在南苑那里把铁道给掀了。火车站没啥事儿，搬运工没活计，我就撩回来了，回家种地吧。47年土改我没在家，在家也害怕，打人受不了，在外面安全点儿。庄里净打人呐。法大纲，斗地主。新干部起来打击老干部，老干部起来了又打击新干部，来回打。在外边消停点儿，哪儿也挨不着，不惹人。回来也总开会，天天尽开会。入互助组，入合作社，当了队长，也还是开会。64年细线条核算，队长、保管啥的都成四不清干部了。成天开会，白天干活计，黑间睡不着觉，说也说不清。后来拉倒了，把四不清给结束了。当队长麻烦，黑间把你找去开会……拉那时候，没想到活到这么前儿。今儿也跑，明儿也跑。现在好了，好起来我们也该死了。土改快50年了吧？我们在拉磕，年轻人没人爱听，没人爱和我们呆着。这辈子一天闲没得着，现在又老了，当下年轻人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

但并非只有国家对村庄的渗透。西村后来成了典型村。西村人说：我们都知道这是假的，但可以给我们村带来好处，所以我们支持他。这是很基本的逻辑。没有简单的被作用方。

两位解放后多年的大队干部深解其中滋味：

西村是国家的形象，东村有锅盖大事不算事，西村有芝麻大事就算事。上面的态度是西村总体是好的，只能给红旗添色，不能给红旗抹黑。怕群众中产生消极态度（林起友）。

那时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现在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吗？那时候黑间儿半夜的开会学习，当下是——一时有一时的中心，都有难处（支焕）。

在多年的运动中曾成为被斗对象的林起洲和黄延青分别说：

区里这干部都挺重视这，原先上级扶着咱们，咱们也得好好弄不是？本质上别忘了本（林起洲）。

按照主席的革命道路往前走。这条道，你还没走到呢，人家在头里，事业，早就给你走到了。没歪，这就是正确的。不管你在农村也好，在机关也好，一定要掌握好方向。在哪个部门也好，不管干啥工作，要听党的话，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条道你必须得这么走，不这么走不中（黄延青）。

林奎的儿子和妻子看得也很宽广、很远大：

子：宣传黄荣要饭24年。西村这么大，为什么别人都不要饭，就他要饭24年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认为这是西村的一个形象，可也不能把这事情过于夸大了。那时候也就是越穷越光荣，越穷越有理。现在不一样了。就拿西村来说，几百万，几十万，几千，几百，甚至没有的，都有。妻：你要现下搞阶级斗争，更多了。

.....

我们迅速走过了解放后的几十年，它离我们太近，使我们的眼睛无法看得更清。土改后30年，一度东山再起并一飞冲天的宗藩走了一个轮回，又被“撸”回西村。土改后40年，新村史写道：西村所在十区是个山多地少、石厚土薄的山区。解放前“糠菜半年粮，祖居破草房，全家一条被，三载着一装”。每年饿死30多口。土改前西村伤痕累累，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挖壕沟，建据点，大搞烧杀抢，实行惨无人道的无人区政策。战争的创伤和地主富农的残酷压榨，把这里农民推进水深火热之中。47年5月至48年3月，轰轰烈烈的土改在西村展开，农民们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每人平分了1.6亩土地，可是到了50年就开始出现两极分化。52年9月，上级传达要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村党支部委员宗藩和林奎在群众中一宣传，很快激起农民入社热情。10月26日晚上，宗藩、林奎、黄荣等召开初级社成立大会，后来又加上会管账的贫农董启和孤儿毛存。在此后的公社化、放卫星一直到文革前期，宗藩等都一直保持着—

定的清醒头脑，经济稳步增长。78年11月宗藩回到了家乡。82年底村里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年轻的新任党支部书记找到老书记宗藩……（李保文等1989）

法大纲50年后，我们走进西村，昔日老干部大半过世，土地经历了分分合合的轮回，村办企业在“船小好调头”和“上规模、上档次”之间左右为难，高中毕业的新领导正带领全村在改革大潮中艰难摸索。当年的风云人物中只有宗藩硕果仅存，但也是中风在床，无言度日。活着的老村民留给访谈员的除了皱纹，也只有脸上淡然的微笑。无论在街角墙根冬日的阳光下，还是在屋内炕头烟幕的昏暗中，我们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被言语的沉默和回忆的空白所淹没。

但他们也属于这个世界。当世界历史成为存在境况，成为放大的个人境遇，人也就有必要成为主体。他人的目光变成他人对自我的凝视与倾听，通过履历、自陈、揭发、自辩，在“保护”自我的同时，也延长并巩固了落实到具体个人身上的国家权力。如果这等塑造不太成功，其结果或成为所谓“动员不成功”的农民，或在社区中丧失包括自己生平在内的故事讲述者地位，成为“失去”记忆的沉默者。

但我们有时也能捕捉到被抽取成一生中最后一个枯瘦然而倔强的记忆框架的那个闪光，那沉入往昔极为清晰的某一画面或无画面的意向，那无以名状的痛。透过不合逻辑的逻辑和缺乏时间的空间，透过“就那么着”的事件记忆和“都过去了”的人物印象，我们的心总会时不时被遥远时空中什么细微的东西触摸一下，牵动着我们和他们一起，去度过那些连小猪都会条件反射地跟着主人跑敌情的日子，去象蜘蛛一样编织记忆之网结上的历史事件。

本文虽然在时间跨度上远远超出了土改的短短几年，但不如此不能揭示那几年风起云涌的“前因后果”。实际土改过程虽然寥寥数年，但在村民的记忆中，在生活的空间里，土改都早已越出历史书上的那个事件概念所占据的固定时空，在线性时间的坐标轴上向前向后冰冷地伸展，在改变触角所及的同时，也改变了自身。必须认识到，本文书写下的只是一部分书面纪录、证词和口述记忆，它和它的素材本身一样，都存在自觉和不自觉的挑选、组织、勾联和遗忘。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许多真实的人物和生活，也有意无意地把一些人物和事件谱写成历史或历史的主线。既然我们尚未确知自己应尽和能尽的职责，就权且尽量效仿冰冷而倔强的蜘蛛，去编织记忆之网、历史之网。至于村民讲述时的种种冷漠、兴奋、激忿和释然，以及所有那些无以言表的麻木，就都留给读者自作怀想吧。试想，无论是作为研究者和窥视者的我们，还是作为经历者与回想者的村民，如果企望同时追索记忆之网、历史之网上所有的脉络，那么整张网是否将不堪重负，轰然坍塌？我们只能就此觉察到既往史料和学者认识的无力之处，又怎能宣称，自己已经完全可以替他（她）们去理解、叙说乃至担当长久岁月积淀化成的那种无可言说的苦痛，去体察、领受甚或化解与几十年前的仇人在街上相遇时那种哭笑不得的搔动？

走出西村，阳光依然打在我们自认又多领略了几分历史沧桑的脸上，而街角墙根下聚集的老农无言的目光，也打在我们装载着收获后的自得的后背上。下次去，他们又会有几个永远地丧失回忆的能力和求？又会怀着怎样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埃·勒华拉杜里曾满怀深情地描述他研究的那个村庄——蒙塔尤：“这个村子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却没有历史，只有许许多多故事……它是小人物创造的历史，是生命的颤动”（1997P643-4）。其实那村庄只活在他的素材里，活在数百年前的时空中。而我也将满怀深情地描述我笔下（请原谅这样的自我定位）的村庄，它没有漫长的岁月，却人为地有着厚重的历史。我们栖居的大地上有许许多多这样或许还沉睡着的村庄，就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藕断丝连。它们和蒙塔尤一样，也有着许许多多的故事，只是被逐渐筛选、转型、重组。西村作为一个典型村，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比所谓“普通”村庄有了更多机会通过更多的渠道展示日常生活中的面貌，尤其是留下了更多层面上的历史写作和叙说。但本文尽量避免将它们汇同。重要的不是提供一个干净平滑的生活史，而是展现生活本身的空白和冲突（李猛1998b）。我唯有希望别被永远束缚在固定网结上，而能找出新的可能性，重新捕捉“小人物创造的历史”，捕捉那“生命的颤动”——那是经由“残酷的合作”留下的证词，那是被历史定格为小人物的“黯淡而倔强的尘埃”。

## 附 论

### 革命编织下的历史风貌

我们的时空旅行暂告结束，到该做结论时却颇有些踟躇。虽然在前面各章的结尾处以及一些小节的论述中，都已经有一些类似做理论概括的行文，但无论如何，本文为读者提供的只是一个村庄的一面历史。限于篇幅，有许多议论最终让位于村民自身的回忆或证词，毕竟他们才是村庄百年来上演的戏剧的主角。留下的研究者的议论更多地是提出一些思考的方向，辟出一些原本被落叶覆盖的空地，也许在扫除的过程中扬起了一些灰雾，尘埃尚未落定，更多的结论还须对各地区村庄进行一些比较，本研究只是计划的一小部分。在附论中，我们将要来交代一些研究视角上的考虑背景，即所针对的国内外已有研究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考虑给研究实施、理论总结和论文写作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原本应该放在论文开篇的“文献综述”中来写，以便交代整个研究的思路框架。但是，进入村庄、面对村民之后，我们原有的思路显得那么笨拙，当初设计的许多问题，而今却依然很不明朗。也许，这是所研究的村庄的特殊性？通过附论，我们也希望使这部“村史”远不仅限于一部村史，而与更多的理论问题挂起钩来。

#### 一 村庄民众中的革命

对于中国革命的研究，尤其是针对主要位于华北的农村根据地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曾访问过农村根据地或在当地生活过的新闻记者和观察家，如斯诺、史沫莱、贝尔登、贝特朗、韩丁等，通过记叙一手见闻，集中探讨中国农民为何会跟随共产党，共产党如何赢得农民拥戴，并以高超的组织技巧和游击战术来动员农民，从而奠定胜利的基础。而在战后的冷战高潮时，中国革命普遍被描述为以前苏联为样板的政党行为。Johnson 破除了纯政治论，但简单将革命胜利和动员成功的原因归之于日军入侵和农民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1962）。60年代末后的研究更注重综合多方面因素、视角，深入具体运作方式和过程，并注重比较不同根据地区域（如 Chen Yung-fa 1986；Perry 1980；Selden 1970；Thaxton 1983 等）。学者们开始注意将中国革命放在整个世界革命历史进程中理解，吸收各派农民及其革命的理论，引述较多的有斯科特、波普金、斯考克波尔、巴林顿·摩尔及蔡雅诺夫等。而黄宗智、杜赞奇对华北农村的研究近年影响较大，可以说较彻底地突破了费正清模式。

回头来看，战后历史变迁、政治格局变化、社会经济转型、学术取向演变乃至中国自身情势（尤其是文革期间国内局势变动及大批移民外迁和 80 年代以来资料开放），国内外和知识界内外诸般因素综合起来促成了中国革命研究的演变，从国家、政治到社会、经济，乃至个人信仰和感情变化，而考察的个人又从革命领袖到普通革命者，再从革命者拓展到日常生活中普通农民。有学者认为研究地点的选择表现出从“延安模式”转到“华北模式”，注重点也就由革命领袖个人力量和党内运作转到社会经济背景和大众动员过程（刘一皋 1995）。

但资料的运用始终存在问题，在实地进入大为便利后的今天，情况也改善有限。新一代中国研究学者开始意识到必须反思传统研究对象范围，否则有碍于正确提出问题（比如黄宗智提出：要具体分析贫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怎样转化为“自为阶级”，必须掌握更多的中共档案和参与革命的农民口述资料（1986P316））。而由于满铁资料局限，大多数以其为参照的研究都只做到 30 年代中期，我们只是隐约看到所谓国家“入侵”村庄的大略趋势，尚未能够较长远地把握（也许准确地说是“切入”）这一“历史的入侵”给村庄带来的深远后果乃至村庄自身反应。自抗战爆发到共产党革命政权的建立，华北农村从 3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这段历史是不太

清楚的。

研究农民运动的视角可以有許多，如阶级冲突、国际政治、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我们重点谈谈阶级冲突论的角度，即认为运动主要是被压迫阶级从政治上对阶级利益冲突和剥削的反应。此观点前提有三，一是乡村社会确实存在以财产所有制为基础的客观对立的利益关系；二是被压迫一方已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意识到自身的处境和“使命”；三是出现革命性政党，并有足够的组织、动员能力，能提供意识形态。但这种研究视角不能充分考察非阶级矛盾的因素在农民运动的缘起、演变中的作用。而且我们还可以问：农民在哪个层面上意识到与他人有着共同身份、共同处境、共同利益？在哪个层面上意识到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所谓阶级自觉是就哪个层面上的“共同人群”来说的？阶级冲突论径直推论以所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关系上的矛盾会导致阶级意识出现，但首先政治动员过程很复杂，涉及地方经济、文化、社会和宗教等诸多因素；其次，地方“阶级”利益与更高层次（全省、全国）“阶级”利益可能差距甚大。不过必须承认，20世纪的农民运动更多地具备了明确以阶级斗争和革命政治为内容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并拥有强大的推行者；还伴随着现代政治组织形式的发展（上参 Little 1989）。

实际上，无论如何评价阶级冲突、国际政治、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视角，在分析大众动员过程的兴起及演变时，都不妨探索如何综合考虑地权分布、村庄社会关系、群体凝聚力、精英权力政治、农民革命潜能、乡村对革命的卷入等分析因素，避免单纯的精英权力政治取向或大众动员政治取向，既分析精英参与的过程及作用，也关注大众政治能力。

对于共产党的农村动员究竟在整个革命中起到多大作用，也有许多看法。如 Thaxton 对晋绥的研究指出：农民有很大的能动性，革命动力植根于民间文化，共产党在初始阶段并不具备可交换的资源，而是通过适应乡村环境获取合法性，并稳固其基层政权（1983）。而 Levine 对东北的研究则反对乡村内生革命说（1987P197 尤其 P229 以下），认为党不只是简单引导革命，而是创造革命。党的动员是用（许诺的）物质利益交换农民政治支持，况且组织化的结构本身即一种资源。且不评说孰是孰非，问题在于：如何考虑研究的根据地的不同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对于前者，要考虑在民间文化中（先不考虑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侵入）缺乏农民集体行动传统的乡村地区，革命的组织过程如何发动？对于后者，不能只从革命的胜利会使对信任和义务的投入计算及预期产生质变这个角度来思考，因为农民也会对村庄与外界可能具有的关系、对个人乃至群体的行动可能有的社会意义产生新的认识。

在研究共产党的组织动员对农村革命的作用时，不能泛泛地谈意识形态和国内外局势，不妨对党在实施动员时逐步摸索出的一些具体技术细加考究。比如，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一般不以整套方式全面贯彻，而是随着控制范围的扩大和加深分步进行并相互促进。每次变革都应加强党对基本群众的控制，以利下一步变革的推行。在具体步骤上有许多“经验”，一般会先在精心准备的示范区或试点区推行，打“歼灭战”或“攻坚战”，务求政策成功。为使作为动员对象的普通农民和具体实施动员的基层干部（往往是先一步动员的对象）易于理解，党的基本学说和主要文件的表达都尽量简化，以诸如对话、格言、顺口溜乃至漫画的形式出现，琅琅上口，形象生动，很容易被动员对象拿来继续运用。在实际工作中更多地采用直接灌输和斗争会，而非更符合党的政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党性表现好坏的典型以供仿效或谴责。一有机会就召开会议。根据农事季节灵活安排干部培训、民兵训练和其他运动，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比如收获季节最利于发动减租减息，冬闲时可安排选举，征兵最好在春荒，等等（参费正清、费维恺 1993 下 P745-6、804-5）。可以研究这些技术的创造、示范、推广、演变，研究上级、具体执行者和群众之间在这些技术方面彼此作用的过程。

以往中国研究的各色解释有意无意地预设了传统与现代、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对立。只有那些与预设有关的现象如通商口岸、教案斗争、市场冲击等才会进入考察视野（柯文 1989）。在帝国主义、国家与由无数面目苍白的村庄组成的“基层社会”的对峙之下，农村内在的活力成了一潭死水，个中细微的权力机制被掩盖。我们不太清楚学者揭示的国内外局势如何在基层导向革命？从原有政权崩溃到新政权确立，在基层村庄的具体过程是什么？与农民日常生活及

心态有何关系？新的合法性和新的精英构成有何质的不同？以韩丁 1980、柯鲁克夫妇 1982、黄树民 1994（Huang Shu-min 1998）、陈佩华等 1996 为代表的村庄革命过程纪实性描述，使人们开始反思以往对共产党革命的研究。单纯关注政党内部机制和自上而下的大众动员，其实是将社会运动简单地看成精英引导动员——民众回应行动的过程。

要将有关中国革命和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史研究推向深入，还须把问题从革命爆发的原因引向其后果，某些客观背景也要求我们尝试从战争中的革命过去几十年后（但许多重要的运动机制一直在延续）的今天研究过去的革命，从在世的普通个人的口述资料中研究当年的革命对个人（包括不同时期的精英和普通群众）行为和心理的影响。可进一步思考：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对普通民众在公共政治方面的各种观念（如公家、上面、国家、政府、办公人、干部、管事的……）的形成有什么影响？“精英”的实质、构成和活动方式有何质的变化？如何透过无数微观叙事寻求国家—精英—民众关系的新视角（参晋军 1998；应星、晋军 1999）？这样，村庄才能有属于自身的历史，而历史中的人也只能从“文化傀儡”转为富于策略的行动者。

在研究的操作上，研究层次由国家到省域到市县再到村庄，乃至村庄各群体（家族、地缘、阶级、业缘等）、个人；研究对象由精英团体的精英活动（政党、士绅等）到精英个人再到普通个人的日常生活，从属于精英的思想文化、政治事件到无特征统计个体的经济、人口分析再到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从阶级划分、团体活动、家庭家族结构到文化网络、个人精英行为再到集体日常行为，乃至个人日常生活和个人叙事，在充分理解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权力互动关系的前提下树立常人叙事的合法性；在研究素材方面，从经典文本到传统意义上的文献资料（报章、书籍、文件档案、统计数据），再到更广义的文献资料（家谱、日记、村规民约、家训族规等），再到访谈资料（精英访谈—集体结构式访谈—个人结构式访谈—个人无结构式访谈—口述资料本身的分析）。鉴于我们面对的是日渐久远的时代和沉默不语的人民，诸如时间与记忆、身体与病痛、权力关系与事件—叙事等视角也应成为关键的建构因素。

“士绅社会”模式是以往非常流行的考察农村精英（及与国家的关系）的视角，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在此方向上卓有建树，只是大体未能摆脱传统政治史观，对日常生活的忽视使我们无法充分理解基层社会复杂的权力结构和背后的制度框架，以及近代社会变迁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基层社会成员各种复杂的策略性反应。因此，地方精英理论的探索是富有意义的（李猛 1995）。传统中国研究很少深入分析县以下最基层社会结构状况（这与文献资料的可获取性及实地调查的可进入性有关）。六七十年代以来地方史研究更深入广泛地分析县以下地方社会，以乡或市镇为分析焦点，兼顾县城和村等。施坚雅对四川市镇的分析多少有所突破，而黄宗智、杜赞奇等则将村作为基本分析单位（但并不只是单纯“解剖麻雀”），并提供国家—村庄—士绅的三角关系。在资料利用（如欧大年用民间流传宝卷研究帝制晚期民间宗教）和考察人群（如韩书瑞利用叛乱者供词研究叛乱）方面也有所突破，都明确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内视”最底层人民思想与行为，用当事人的体验取代局外人“客观”的评价。此外，有关精英活动与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关系（及这种思考维度分析中国社会的适用性），近些年来有关争论已不胜枚举，在此不予评述。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对上海、汉口之类通商口岸和天津、苏州等地商会的研究与对村庄精英活动的考察完全是两码事。

还有一种思路较偏于制度的考察。按张静对当代农村基层政权研究思路的设想，可以考察以下问题：国家与基层间如何维持有效联系？或国家体制和基层民意如何连接？基层相对稳定自治与国家行政权力渗入是否一向矛盾？从国家与社会之间巨大的结构阻力和非正式性关系网络来考察基层结构：基层政权是国家行政向下的延伸即基层管理的科层化，还是农民利益的聚合上达机构？它又如何影响农村其他社会力量（如家族、宗族等）的分布？基层政权的结构性位置和活动机会如何？它是否在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效连接的渠道？如果没有，则其活动领域是什么？更大的体制环境为基层政权提供了怎样的行动空间？这些行动制度化水平如何？（张静 1996）。不过，要了解目前农村基层政权的某些根本起因，了解制度背后的细微操作和行动者的体验、变通，还需要结合其他的思考角度。

## 二 土改实践中的革命

以往中国革命整体研究中土改并未成为独立研究对象，而只是作为证明革命为何成功的一个要素，寻求对中国革命成功的某种决定论的客观解释。<sup>82</sup>一种是强调在土改时期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建立过程：共产党通过提拔和培养一批新的精英在基层社会确立权力，他们往往缺乏任何传统类型的精英资本，只有依靠对组织的绝对忠诚，成为一个有权力的组织的“载体”，才能维持其新获得的权力身份。该模式过于强调正式组织的结构强制性，精英蜕变成正式组织和制度的“结构载体”，全无能动性。再一种是强调共产党通过对普通民众的宣传教育等唤醒其利益和觉悟，赢得民众对革命的完全支持。精英尤其地方精英也基本消失在中央直接发动的宣传和教育的符号过程的背后。还有一种则视土改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步骤（考察技术革命和制度变迁如何互为条件）或新型农业剩余占有制的建立过程（考察如何通过改变资源抽取方式以满足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对资本积累和投资的需求），土改成为同经济现代化相联系的一般历史进程，土改中重构的各种关系被化减为经济资源占有关系的调整。这样一来，按照经济关系确定农民身份和关系的土改正式话语也就非常正当。如此，土改中出现的种种偏差就被视为“教训”、“问题”，应予总结、警惕、纠偏。

落实到土改实践过程中精英的更替过程，可从以下三个角度综合考虑：一是精英的形成与其掌握的各种资本的关系；二是普通社会成员与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外在权威在基层精英发育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土改前，农村精英以土地支配（及一般在此基础上树立起来的在文化权力网络中的重要位置）为主要资源，即使在道义经济倾向较重的社区，士绅或更广义庇护关系中的庇护者的文化资本也由经济资本兑换而来。不过这种兑换关系并非绝对对应（见前文对单纯阶级冲突论的疑问），经济从属关系不一定直接对应于文化或权力关系，实际经济关系与人们的认同之间也还存在一定距离。结合了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与外来基层干部的土改工作队在消灭旧精英的同时，又在全体农民普遍小农化的前提下从贫农积极分子中扶持新精英。这不仅是精英组成人员的更迭，不仅是阶层相互地位与关系的变更，更重要的是成为精英所应具备的资本类型的变化，是精英活动方式的质变，是精英与外界关系、与民众关系的质变，是村庄公共活动（精英的活动区域）的转型。新精英至少表面上须掌握国家权力话语；在统一的意识形态、阶级划分、动员技术、调查技术及组织技术下，精英原有区域差异趋于消失，至少不能在话语中体现出来。

但是，如前所述，这并不能简单地推出“大一统”的结论。具体地方、村庄和个人都会在纯粹的意识形态面前表现出各自有意无意的策略选择（而各自的理性选择能否汇聚成集体的理性结果也需具体分析）。按照一般推论，新政权将挑选、培养和利用各类能表现出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他们土改前常无资本基础，在村庄传统权力结构中处于附属地位。换言之，替代旧精英的是一些并无原有意义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有形资本的人，“无资本”是真正的资本。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并非表面上的阶级身份，而是能否掌握并运用官方话语与上级打交道。积极分子争取成为地方精英的策略也体现能动性。新型地方精英因缺乏传统精英的资本基础，除了借助各级党组织的力量，常常需要依靠与普通村民间建立的特殊庇护关系来巩固自己的精英地位和支配基础（Oi 1989）。不过，在革命高潮过后转入日常管理（革命中形成的运动机制将逐渐变成持久的运作机制汇入日常管理）时，这些高潮时起来的精英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按照大众动员依据的意识形态，这些新型精英与普通社会成员不应处于对立两极，而是在广泛群众动员基础上形成，是真正从基本群众中选拔出来、代表群众利益的。但政治斗争中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虽然在可公开表达的话语上，精英更替过程所依据的新型资本、替代方

---

<sup>82</sup> 以下参照了 96 年以来围绕土改与农村精英关系的几个课题的设计报告，无法细列出处，谨对参与设计、撰写和讨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深致谢意。本文实际上也在极大程度上建立在几年来的集体合作基础上，增删发挥不妥之处当由本文作者负责。

式、活动方式等均须由外在力量界定，但在具体社区中，新的话语类型会迅速成为争夺的对象，掌握这套新技术的精英将为自己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塑造一个安全隔离地带，既“代表”国家、政党、政府、军队向民众说话，塑造上述抽象范畴的具体形象，也“代表”民众向上述抽象范畴的各级代理机构或个人（各级干部）负责，塑造民众形象（社区阶级分布、工作执行情况、斗争开展进度、基本群众组成）。

面对现实中的复杂情形和传统看法中的一般印象，我们的问题不得不转向对土改宣传和研究的研究。韩丁记叙了他在街头随处可见的场面：

很多演剧队都表演一个恶霸地主企图破坏分田地，一个富农与他同谋，一个中农害怕新土地法会侵犯自己的利益，一个农村政工人员出卖穷人，讨好富人。但是，一个雇农在一个党员的帮助下，最后总是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地主及其帮凶缩成一团，受到控诉（1980引子）。

这正是我们习见的土改描写。这就是土改的普及教育版（按郭金华概括），它尽可能面向最普通的大众广泛实现宣传效果，教给大众这段“历史”的“基本情况”，事件过程曲折但主线分明；人物性格鲜明，对比强烈；思想、态度、行为等皆有模式化的突出表现：土改前地富阶级统治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各方面束缚、剥削。压迫乡村大众；土改中共产党（早期地下党、外来工作队、基层干部）发动乡村贫苦下层，使之认识到自身苦难处境及根源（旧封建剥削制度），并领导他们组织起来斗争并彻底打倒地富旧势力，获得土地和其它财产，政治上也翻了身，当家作主，掌握乡村政权；土改后原乡村受苦人、现主人翁在党领导和指引下发展生产，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感情色彩强烈：控诉罪恶旧社会，赞颂幸福新社会。

而学术研究中的土改则从较为贴近现实的角度描述土改背景、党的政策推行及乡村实际情形，过程和人物也更具体、复杂，更具多面性；基本承认土改是一个长期过程，具有地域差异，在不同地区的革命进程中位置不同。既承认存在旧精英延续为新精英的情况（不论是新政权出于现实考虑吸纳旧精英，还是旧精英投机或拥护革命而主动进入新政权）；也承认新精英存在许多问题，乡村下层受苦者一跃为掌权者后，也有些暴露出暴力、贪污、偷窃等行为。

一旦我们承认口述资料的重要性并正面通过口述调查的方法去研究，一旦我们努力去揭示留存下来的种种书面文献背后的“书写”过程，当年的调查过程、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以及数十年积淀下来的查证方式和效果也就无可回避地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这绝不单纯是方法论的问题。革命动员之深入人心，革命效果之自然化，都与此大有关联（参方惠容1997）。

调查者一方作为乍到的外来者，不熟悉自己进入的社区，不可能清楚认识到该社区被赋予（或自身生产出来）的一套话语表征中建构的成分，面对这套虚构的现实表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话语）在推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只能归之于自己调查不深入，上级也如此推断。而土改也就在对执行者不断的批评（非左即右）中，在调查者不断的自身检查（调查的不深入、检查的不彻底被归结为调查者思想认识不纯、不深刻）中，不断趋于深入。极端主义之所以不断出现，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不断“纠偏”造成的。在这种话语实践中，调查者对社区的陌生和“经验不足”是土改得以进行的条件而非障碍。土改并不会因为执行者（如工作队员）“不纯”的阶级成分和认识局限而受挫，或不去使用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反要在工作中，在轰轰烈烈的真正的群众斗争中，放手锻炼并彻底改造其身、心。

而被调查者也将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调查行为（从最初的调查走访、扎根串联逐渐演变为蹲点示范、查证等）的重要性，它将决定被调查者在新的权力网络下的新身份、新地位。重要的是要学会按某种话语逻辑“说出”自己和他人 在阶级序列中的身份，解释自己和他人 在阶级序列中的处境。在阶级成分合格的前提下，能否按照这套新的话语逻辑“说话”，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能否成为新的精英（是否具有一定的阶级觉悟、是否具备相当的可培养性），能否在新秩序里实现或相对维持自身利益（当然其表现形式会发生变化），甚至能改变原本固定的阶级成分。

尤为重要的是，随着类似调查研究行为（它逐渐成为运动开展的准备、检查、总结手段）的普遍推行，普通村民将在一定程度上越过基层精英的中介，同外部权威（上级、党、国家、

政府)发生某种直接联系。是否直接“深入基本群众”，这一点从派遣工作队员入村扎根开始就逐渐成为检验调查研究是否成功的标准。在各成员利益直接相关(并且常常相互冲突，比如物资分配、阶级比例规定、斗争表现等等)的相对封闭的社区中，民众、精英、外部权威之间这种新型遭遇逐渐扩散并制度化，形成一套新的遭遇(外界)规则、支配(与被支配)技术和反抗策略。民众开始逐步树立起对外界权威抽象范畴的具体观念，上级以此实施对基层精英的控制；而正如我们在本文具体分析中所见，基层精英也不会完全被动，可在相当程度上控制民众成为“民众”的资格，而这自然决定着具体群众被调查的资格及其证词的可信度。任何意识形态和运动机制皆须融入村庄本身的特定权力网络(与此前不同的是，它已成为权力组织网络，须依托外界塑造的组织权威)，基层精英完全可以反作用于对证词特定事实的性质判定。

### 三 革命编织下的精英—民众关系

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我们愈益明显地看到外界政权对华北基层村庄的渗入(冀东则更清晰地体现出多方争夺的影响)。各种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内蕴的现代组织形式(党组织、民兵、妇女会、儿童团等)在村庄中扩散；村庄公共活动从形式、组织者到对参与者的要求和影响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松散的、朝向村庄(共同体)的花会、家族活动，到有组织的、朝向外在国家、陌生的“子弟兵”、“上级”的交公粮、纳鞋、派工等战勤“义务”，到一直持续到和平年代日常管理的开会、参加组织。

在组织与精英的关系方面，除了我们习知的严密的组织对精英的塑造作用，还应看到意识形态之下地方精英对组织的利用。但同时，精英的非组织性活动与组织性活动也都逐渐依附组织资源。与此类似，在外界(上级)与精英的关系方面，外界(上级)在利用组织、调查研究等手段控制精英的同时，精英也会依附并借用外界(上级)的力量。但无论是精英依托外界的外联型活动，还是依托村内既有权力网络的内生型活动，都依赖外来的组织话语。

由于对口述资料的重视、对书面文献的利用在广度上的开拓和对其“书写”过程的关注，我们可以开始研究个人在成为精英的过程中，其叙事与行为的塑造过程，以及这种塑造(无论其是否自觉)反过来对其成为精英的深厚影响。简略地说，在叙事话语的内容方面，会更强调组织性、政治性，更关注大事件、外界、上级、党等超越村庄生活的抽象范畴。在叙事结构的特征方面，更体现出逻辑性、因果性，更有能力以独立、连贯、一致的线索叙说闭合的事件。在记忆的形态方面，体现出从身体感性的记忆到思维理性的记忆，从情节场面的记忆到事件逻辑的记忆，等等。

本文其实远未能充分利用丰富的材料，尤其未能多角度地挖掘各种材料之间的复杂关系。上面提出了许多思考的角度，更综合地说，必须从个人在具体事件中所处的具体位置来分析其口述资料，处理好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坚持过程性的视角，分析土改的推进与阶段的划分，考察外界、上级、公共、精英等观念如何通过土改推进而形成、演变以及各自之间的关系；在分析由上而下的组织动员的同时，考察精英如何利用既有的权力网络和自身资源，创造(维持)活动空间，开拓(维持、变通)新的合法资源，等等。

在普通农民方面，有许多角度的问题实际可以采取和精英研究类似的提法。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只有不局限于精英，才能更好地理解精英的行为和心理，才能更全面深入地捕捉整个组织机制的细致微妙之处(当然，由于西村土改前后的精英在访谈时几乎全部都已经过世，这种“窘迫”的研究处境也促使我们做此尝试。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村庄研究进行比较)。比如，除了经济活动、社会关系外，还必须从政治参与、组织意识、自我认同等角度，考虑农民由村内谋生转向持续参与村外制度(即使留在村中也被动介入)的过程与实际后果；农民对政治社区(政治活动范围)的认识和政治行为的性质所发生的变化；激发或强迫农民参与全新政治关系的原因和动机。总之，考察在什么意义上，什么条件下，可以说大量不关心政治的农民(日益主动地)成为新制度一员？共产党动员群众路线如何逐渐落实、明确与调整？对村庄旧有精英

类型的改造如何影响普通村民（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调整）？动员效果与个人实际背景（阶级/层、文化、职业经历、受动员经历）是否对应？运动中的实际参与（含被迫参与）与事后态度（含历史事件评价的变更）如何关联？

本文重点考察的 3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前期的生活，远不止是政权更替或地方精英构成群体转换。地方精英活动类型的转换；以现代政党、意识形态、行政网络为代表的外来因素对乡村的逐步渗透和侵入；农民在心理、行为、认同上的转换；以及动员方式、组织方式、政治参与等的建构（许多研究将这些原本是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范畴作为讨论的基础），彼此联系、融汇。我们的精英研究是从精英历史中的精英研究到大众回忆下的精英研究，考察世界历史、意识形态、现代国家等观念渗入农民心中的过程和演变，以及农村社会和政治组织本身发生了何等变革，以适应乃至促使村民增强与外界社会制度的相互依赖。

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是比日常管理含义丰富全面得多的过程，它的实现必须以个人接受治理技术和学习被治理的技术为前提。同时，权力组织网络的形成也不能被简化为地方精英的培养问题。革命者通过宣传、组织或符号操纵，不仅在外在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和社会制度上，在乡村基层社会建立了新型统治，而且还细致地努力建立起足以治理常规行为模式和日常心理认同的权力技术和组织方式。在这些特定的权力技术和组织方式下，大量不关心政治的农民（日益主动地）成为新制度的一员。农民不再是突发性地参与，而是持久参与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党充分培植和利用农民不断增强和自觉化的组织能力和被组织能力，把农民并入比村庄更大的社会，创造出比以往更强大的系统性体制。共产党在基本群众中塑造通向精英的技术，使群众有了学习被治理的技术、意识形态话语、被组织的能力的需要，权力的组织网络才可能真正落实到群众，不至于造成单纯是共产党或作为共产党代表的各级基层政权干部与村级精英之间的关系即可左右权力组织网络的假象，不至于成为单纯的制度建构。革命动员的有效性体现在真正把农民大众改造为面向政党、面向组织的群众，时刻准备去接受动员或拒绝被动员。对村庄和村民实现治理的过程也就是从断续性的管理到连续性的管理；从政治运动开展时的管理到持续动员、随时准备掀起新的运动的日常生活的管理；从卡里斯玛式运动高潮的管理到革命常规化后的管理；从生杀予夺的消灭阶级敌人的死亡管理，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不断寻找隐藏在人民内部的新的阶级敌人的生活管理，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把西村十五年（那只是两次重大“事件”的发生时点的间隔，实际完全超出了这个范围）看作从革命走向革命的历史进程。在战争、土改宣告结束后，革命走向常规化，国家在运动高潮后重新开始控制陷入混乱的村庄，扶植适应革命常规化的精英：各种组织形式趋于稳定。但各种“事件”仍然会被精英利用国家赋予的组织权威来控制村民，内部仍然会出现“叛徒”；查证模式逐渐牢固建立，对村民心理产生深远影响；整风模式将一再继续；村庄中反对的各方都将相互利用这段时期内逐渐习得的政治话语；对革命前或革命高潮中的历史仍将有反复的查证，重写历史的权利和权力仍然需要争夺。一切硝烟散尽之后，留下的是否是最深层的动员、组织技术？

总之，从 30 年代末开始到 50 年代初，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民主建政、土地改革、合作化等运动，共产党对乡村社会进行动员，乡村社会对此做出反应。在这种双向过程中，出现了多种权力技术和组织发明（开会、诉苦、汇报、查证、扎根、群众团体）。它们相互支持，相互转化。共产党利用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种群众组织建立起新型的精英上升渠道，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和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由此完成了从保甲制以来旧统治者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制度创新：创造一个忠实于国家的组织，而这一组织又牢固地扎根于自然村之中，扎根于农民的心中。但这并不只是村庄向外开放的过程：党在通过新的基层精英实现村庄与国家的沟通的同时，赋予了这些精英更强的组织权威，从而使某些精英拥有了“特殊”的垄断机会，典型村尤其如此。村庄新精英会反过来利用国家为了更好地控制基层所发动的新的组织机制，为自己在村庄中建立相较旧精英更稳固、更具合法性的地位，以国家共同体为背景的新式的村庄共同体还将延续下去，精英的活动逻辑仍将带有不少传统活

动的性质。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没有纯粹的胜利者——除了日益繁复、细密的权力机器。

#### 四 历史：记忆、时间、权力

本文写法上虽大致以时间为顺序，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史（至少本意非此），而是随时穿插日后的回忆（包括证词、口述、记叙、传说），对比其中的差异，突出历史的不同层面、写法和记忆积淀，以及这些差异的归同机制。

我们企望如实刻划的客观世界，其实是由无数个行动主体的内心体验和实际行动交接而成的网络。事实俱在但数量无穷，沉默不语，一开口又往往相互矛盾甚至无法理解（柯文 1989 前言 P1）。在追溯过去时如果不想自欺欺人或偷工减料，我只能倾听这些事实发出的分歧杂乱、断断续续的声音。雷蒙·阿隆说，历史是社会的一种自我意识，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利科 1992P10）。在恢复历史事实这一现代圣职面前，面对素材我首先必须承认，记忆是一种认识工具，历史行动者通过它（并且必须借助社会环境）来解释现实，人们的历史意识就象一个战场，各种思想体系在此展开竞争，各种权威的正当性在此受到考验。选择讲述哪些自身的直接经历，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如何看待，都体现着个人的历史观念（参王明柯 1996）。

但汤普森说：我们绝不只是追求一种不要诠释的纯粹的“人民的历史”。因此须将口述资料置于经济结构变迁的宽泛情境中。但前者又能帮助我们理解情境本身如何被构成。我们只是强调讲述是一种表述过去的特定方式，要凸现人们可能误记、删略或隐瞒记忆的方式，而不再压制（努力消除）记忆的影响，不再试图使记叙下的历史圆润无碍、线条分明。在历史当中，人们想像已经发生或相信可能已经发生的东西，与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东西有着同样的重要性。集体记忆的建构同样可能产生巨大的历史力量（参汤普森 1999）。

在写作中我象一个孩子，进行着并抗拒着记忆社会化的过程（研究者总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定位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我寻觅各种社会记忆工具留下的痕迹，如文件、故事、照相、实物、证词、声音等，它们各施所长，努力促使我形成一种记忆传统。在我脑子里发生的，也在许许多多的村民和村外的人脑子里发生过、发生着，这是一场“记忆战”，体现着不同政治力量对过去社会遗产的争夺（参李放春 1999）。当然它们有些是始作俑者，有些只是二道贩子，有些则是战争的失败者或受害者，甚至还有罹难者，但当我翻腾它们时，某种力量还会复燃。

我只能说是更关注记忆与村庄政治的关系，关注国家控制的记忆与村庄共同体的记忆；以及个人记忆结构与个人在群体结构中位置的关系（参 Jun1996）。历史要被纳入有关民族、国家、运动、思潮的知识乃至意识形态，就需要由一些专门的人（有意或无意）挑选、撰写、描绘、推销并加以制度化（Hobsbawn & Langer1984）。这一点上我不否认自己也属于这样的人。

我们来到村庄，来到每个老人炕前，“强迫”她们开口或启动或许我们无法察觉的记忆机器。无论她们是否听清、听懂乃至接受了我们的设问，都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回到与他人的遭遇或假想遭遇中，诉诸记忆。我们则将记忆定位于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根据她们在群体中的位置理解发生于个体思想中的每一点记忆。哈布瓦赫说社会设置的路标定位了记忆。事件越突出（符号性），路标越密集（哈布瓦赫 1999）。而从选择访谈对象开始，到问题的设计和理解，一直到本文的安排，也选择了一些关键的事件来引导她们的回忆（常常是被迫的），根据这些素材写出的东西也就相对集中于这些事件。在“客观效果”上，它们就此成为村庄历史的路标。

我们相信，口述资料尽管在特殊而生动的细节上叙述可能彼此矛盾，但共同经历会通过类似的故事结构呈现出来，虽说叙述结构只是通过个人大量不同的、许多明显是在日后构建的“情节”得以呈现（参李放春 1999）。否则，我们的写作又何其困难！但是我们也尴尬地体会到：叙述者又出于各种目的有意无意地准备好认为研究者会询问的问题、会乐意听到的回答。这是口述史研究本身难以避免的互动权力关系（参方惠容 1997）。

其实对此也不必回避。即如布迪厄所言，我们需要做的是设法将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

的“客观化距离”和使其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如观察者的外在客观性、使用的对象化技术等，转化为客观研究的对象（即对象化）（参布迪厄、华康德 1998P14、40）。表面很“干净”的历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及其捕捉的现实本身就是历史建构过程的产物：只是这些过程很大程度上已被人淡忘。用过去的历史证明支配及组织社会的方式的正当性乃至“自然”得无须证明，这样的过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叠合。

本文有意识地强调了时间技术的某些体现。统一、精确、无限细分的时间成为各类社会制度尤其是以各类组织形式和组织技术为特征的制度的核心和象征。如何设计各种时间符号，运用不同的叙事时间，从而既不动声色、又有效地巩固国家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关键的并且常常是隐蔽的问题（李猛 1997）。不同的社会人群原本各有其理解和体验社会时间的方式以及各自的活动节奏。但支配阶级只要保持对公共生活和思想的实际控制，则其社会时间自然就被广泛使用（并反过来增强前两者）。统一的时间可对共同体起到凝聚和稳固作用（古列维奇 1988；1991P166-74）。统一化的结果是处于社会主导时间制度边缘的人们将沦为没有历史的人们。但时间抽象化的历史并不简单地表现为压迫性权力逐渐增长，通过时间技术的发明、散布、组合和利用，新的权力知识体制将逐渐取代旧的权力知识体制（李猛 1997）。

在我们的村庄里，兵匪入侵普遍成为口述者叙事中公共部分（世界历史的入侵）的开端。此后传统经济生活周期和民间节日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农民时间处境逐渐历史化：

“历史”作为一种抽象时间制度，最初并首先是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产物，是诉苦等一些特殊的集体化技术的结晶。这种历史（时间）有各种复杂的表现形态，但这些形态都动用了一些话语技术和叙事技术来支撑自身。而英雄传奇作为当时一种比较典型的叙事文类，则将公共性的历史时间和私人性的历史时间有效地结合起来，通过后者的形象性掩盖并强化了前者的自然性和合法性，塑造了后者的现实效果（李猛 1997）。

此后的深远效果是我们都领略了的。但兵匪入侵之所以成为公共历史开端（如此也使历史的写作更为便利），是否是访谈者集中于此提问的效果或关注“大事件”的过滤作用？所访谈的这一批人的年龄是否恰好以那个时间为真正的公共记忆开端？况且，传统时间被破坏与新型历史时间逐渐完备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我们仍可肯定地指出：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对治理对象时间的治理：创造利用时间的需要、占有经历时间的主体、刻划度量时间的尺度、分配关于时间的行使、核查消费时间的绩效。治理对象在逐渐学会掌握时间的同时也逐渐掌握了自身，而权力也就此充分实现其广度和深度。不仅是统一的行政时间，而且是统一行使行政时间。村头广播、一起下地、开大会、填履历、“想当年”、“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咱庄的情况也不例外”……时间的统一与公共权威相互支持，自我生平的塑造成为统一的治理任务。

昆德拉说，人反对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反对遗忘的斗争。但这是对“精英”人物，对已然身处表现出来的历史的人而言的，似乎可以通过用“事件”形式记住一些“事件”来求得抵抗的自我安慰。而对许多置身历史之外（而不仅是阴暗面，更非对立面）的所谓“普通”人来讲，可以说人反对权力的斗争倒是遗忘反对记忆的斗争。这种斗争绝不轰轰烈烈，也不见血。参与者是不肯搬下南岭、不知整天干啥的家伙，是福柯所谓的“危险个人”，而非直面权争的勇士或殉道者。这样的斗争更多地表现为效果而非目的。

但在本文所描述的时代里，无论是谁，他的生活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革命者通过其语言、形象和日常实践重构了社会和社会关系。通过日常生活的政治化，革命极大地增加了权力生长点，繁殖了产生权力和应对权力的策略。各种位置上的人们学习和创造新的政治“微观技巧”，权力就此不断延伸（即使在人们的反抗中）（参 Hunt 1984）。

在革命的政治中，说话不仅展示自身立场，而且将自身与公共的或外在于生活共同体的某种权威联系起来，成为展示并证明自身具备此类知识的途径。在这种新型表达形式中，个人通过努力获得开口的权利和能力而争取通向某种资格，而国家、阶级、政党或真理就这样在活生生的个人身上出场了。革命塑造了“压迫—复仇—解放”的主线，个人命运必须经此与集体命运相联结，并获得被诉说、被倾听、被理解的权利与可能；所有与之不相容的个人经验皆须沉

默。更重要的是：这些被排除于公开表达之外的经验也将逐渐丧失其真实性，集体遗忘逐渐形成（朱元鸿 1994P5、16）。事件得以连续，发生得以必然，历史的救赎和解放的真理得以确立，而部分现实将丧失继续留在历史上乃至记忆里保持真实性的权利。

但这里并不存在纯粹的被控制或被蒙骗。在逐步汇入权力控制的同时，日常生活政治化，或者说以往“神圣”的政治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即政治的日常生活化：神圣性的象征变成庙宇中的偶像，虔诚者变成嘲弄者。

## 五 历史：事件、叙事、分层

从起初那一刻的行动到最后的“故事”，间隔了事件的记忆过程。人们在“讲故事”的时候，会赋予那些不可预期的事件以意义（几十年后，这些出乎预期的遭遇实际上已经成为可以被圆润地放置在某一序列中的事件，意义成为遭遇者自己当时所赋予的了），给直接经验建立以一贯之的线索，从而产生并非中立性的“现实效果”。在这一点上，村头的“讲古”和许多学术研究的潜意识是一致的。实证史学叙事强有力的现实效果不仅取决于它以编年次序来安排事件的文本次序，也不仅取决于场景叙事强烈的故事性，还在于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简结所建立的一套事件等级制和相应的单一线性时间系列（参李猛 1996）。

方惠容指出：在土改乃至以后革命运动进程的正史写作中，一方面是将地方史纳入跨地方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以地方史隐喻跨地方的历史进程（按：本文写作是否也如此？）。在历史叙事中，事件的时间标志是确保历史叙事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叙事策略。时间不仅指涉了事件的真实，而且在线性历史因果观中指涉了情节因果的真实性。村事件只有在能被纳入跨地方历史事件划分的历史分期时才成为值得记载的事件（参方惠容 P6-11）。方惠容因此要处理村民无事件境与线性事件因果观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事件等于线性事件吗？如果说存在私人事件和村事件等，则村民所谓无事件境并非没有事件，只是在特定的写作、访谈和叙述权力策略下无法言说、说明、解释、归类（归因）而已。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权力运作下，线性历史观屏蔽了一切在其之外的“事件”，则村民或许可以说是生活在“无事件境”中，但这种矛盾又存在于何处？会被什么人认为是矛盾？显然，既非善为归类的“权力写作实施者”，也非略通奥秘的研究者，更非“自在”生活的村民。

方惠容承认自己面临一个窘境：我们不得不用现代意义上的“事件感”下的概念来说明无事件和似事件现象。这或许是她的回答。比如苦感的“感”的绵延性与诉苦的“诉”的事件性的矛盾（P19 注）。更明确的回答是：“无事件境”指一种特殊的事件记忆心理。重复事件序列中的各种事件，不但由于其高重复率（精确制度时间的缺乏）导致事件记忆上难免的事件之间各种细节的互涵和交迭，并且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种状况下的村民心理上也“无意”将这些众多的重复性事件理解为分立有界的事件（P21）。那么，无事件境的村庄又是如何谱写历史（包括正史之外的“野史”）的呢？方惠容指出：是“叙事转化”构成了村民的集体记忆。村民记住的已经不是发生的事件“本身”，而是叙事者在重复讲述中制造出的事件。在这种集体记忆的生产中，具有权威性的只是有能力有趣地叙述的叙述者。不具有故事讲述能力的村民逐渐失去讲述能力和欲望乃至权力，也就使自己的私人事件在自己记忆中淡去（P25）。

在正史和某些村庄叙事者那里，村事件被插入跨地方的事件序列，西村的历史就是朝向某一必然历史结局发展的线性历史，村史与国家史吻合，西村是整个国家的缩影。文本外信息提供者的权威性要求在文本中出现一些极局部甚至极私人性的事件，以此作为历史叙述文本“可靠性”的重要衡量指标。而跨地方历史进程的权威性要求这些琐碎、局部和微不足道的事件能够汇入甚至构建这一历史进程。地方史隐喻跨地方历史进程的叙事手法可以成功消除这两种权威性给文本带来的紧张，但查证乃至查证式调查研究的权力实践激化了事件时间定位的矛盾，并强化了前述各过程。事实上，证词是否反映“事实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证人能否掌握建立“事实真相”所需的特殊的叙事—话语技术：通过历时性事件次序确立事件的性质和因果

关联，实质是将“无时间”的局部性“事件片段”纳入具有线性时间的跨地方事件序列，赋予事件“事件”记忆（参方惠容 P12-15、57）。

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种种在特定学术标准、特定叙事转化技术下写就的正史或村庄叙事？如何面对看起来散漫无序的叙谈（乃至根本就是沉默）？村庄历史与国家历史的交接点究竟在哪里（兼及考虑不同人群差异）？国家历史、民族历史、地方史、村庄史、个人史……这些似乎只是范围不同但线索统一的历史，究竟是如何生成又如何相互绞缠、混融、扭曲乃至遮蔽的？可以说，这些区分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历史是研究者、叙事者、讲述者和不出场的权力机器的代表的共谋产物，这些力量又在一起构建、推动、维持和改变着权力机器。在历史的中心，话语的最密集处，我们听到的只是声音而非噪声。但在被思及的东西背后还有未被思及的东西，被记忆的东西背后还有未被记忆的东西，被遗忘的东西背后还有被“遗忘”所遗忘的东西，在它们交错的地方，正是国家权力、历史积淀和个人生活寂静无声的战场。

杜赞奇告诉我们分叉历史的思路，但本文的实例显示出，从“历史是分层的”角度思考，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东西：

村庄中的人们度过的是一种村庄历史，不过其中的精英人物有时能够与超村庄的历史发生关联……任何事件都是这些不同历史之间的一次遭遇。村庄精英与超村庄历史的关联，就在于他们将布迪厄所谓的“身体化的历史”转变为一种可以讲述的历史、一种历史叙事时，不得不借助超村庄的历史来为他们的故事提供“参考框架”。在叙述村庄的历史进程中，时间关系、历史因果关系这些必不可少的历史转换器，都是精英们掌握的基本话语技术（李猛 1998c）。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对精英生成的考察。而对于更大多数被迫沉默的人，他们的叙述又如何看待？如本文对许多“事件”的介绍所显示的那样，同一历史事件往往交汇着不同层次的历史生活。“但许多时候，即使在同一事件中，不同的生活现实也仿佛擦肩而过，互不理睬”（李猛 1998c）。搜集到的这些素材也只是所谓的“素材”，尤其当我带着研究精英的意识，着重考察组织机制、考察重大事件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就更容易经过过滤。毕竟被访人（特别是声称能提供更多细节、故事从而更多地为访谈员所欢迎、所采纳）很可能有意无意地通过其陈述，争夺对历史的解释权，争夺自己在某一具体场景中的中心地位。

过去对人的个案研究有三种潜在的假设：首先，就共时性而言人是整体而全面的，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故此在研究中应了解人物尽可能多的信息，包括其外表、说话方式、行动方式，这些信息可以彼此解释；其次，就历时性而言人是具有自我生平的，而这种生平也势必具备逻辑一致性，合乎线性时间的序列，从而需要了解人物的过去，从中找出其现在行动的动机；第三，可以客观地从外部对其加以描述乃至所谓“设身处地”的理解（人物有完全的独立性，作者及其自己的看法则应隐去而不影响读者）。口述史要面对的人大多不是这样，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确定是否如此的需要——自我生平叙事和自我认同（危机）是现代性、主体化从而达到治理效果的产物。我面临的困境或陷阱是：口述史引导我们遭遇更多细致、沉默、琐碎的素材，但我们这些好不容易挣脱束缚、发现新大陆的孩子，却潜在地希望组合出更精致、全面（即使更复杂）的场面来，这是否是把知识逻辑的暴力触角无情地、自以为是地伸向民众最后的领地？

按李猛的说法，处于历史生活等级制另一端的人们（与世界历史相对的日常生活）常难以弄清其命运究竟由哪些事件引发，掌握的信息总难以拼凑出一完整画面，生活中各事件间缺乏他们可理解的关联，因为将这些事件关联起来的事件外在于其生活范围，需在分层历史的阶梯上爬得更高（也就是在更具超越性的框架中，在更接近世界历史的地方）才能看见。当然他们一样可讲述一些广泛流通的大事件历史叙事，这些往往是在历史分层中处于更高地位的人生产的话语产品（李猛 1998b）。那么剩下的问题是：另一端的他们为何需要或想要去拼凑出一幅完整画面？又如何知道自己的画面不是完整画面？研究者又如何知道或判定这画面的完整性？事件形成前谈何关联？这，也许就要反思自身写作的立场和目的了。

表一：西村老党员一览表（含自称者，据多种登记表、档案、查证材料和本人各时期口述整理）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成分	入党时间	入党介绍人	备注（简历参人物谱系）
董祥明	男	1903	—	1939	包 森	未及定成分，被认为是烈士
冷萌清	男	1904	下中	1939	董祥明	后一直离村，其子文革后开始任村干部
林 惠	男	不详	贫农	1939	苏林燕	组织关系不在村里，与上层关系密切
黄龙春	男	1901	富农	1940?	不 详	曾任办事员、维持会长，无人承认其党员身份
黄宗藩	男	1919	贫农	1941	苏林燕	入党时间系自称，现中风卧床在家
林 奎	男	1917	贫农	1941	苏林燕	73年被宗藩指使害死狱中
周子明	男	1917	贫农	1941	苏远兴、林 奎	赴朝当兵后在外，回村后未进干部核心
冷向权	男	1924	贫农	1944	黄宗藩、林 奎	长期主要干部，民怨较大，87年去世
陈龙孝	男	1914	贫农	1944	黄宗藩	人缘好，疏权谋，解放后淡出
黄俊峰	男	1909	贫农	1944	冷向权、林 奎	民怨极大，已死
董 春	男	1923	贫农	1944	冷向权	红眼队嫌疑，解放后未任村干部
林 志	男	1922	贫农	1944	不 详	50年被公审枪毙，现褒贬不一
冷向山	男	1911	贫农	1946	在部队入党	民怨较大
林 恩	男	1914	下中	1947	陈龙孝、林 志	新干部，后未受大打击
林 凤	男	1903	贫农	1947	林 志	新干部，后未受大打击
陈秀英	女	1924	贫农	1947	钱国×（？）	妇女积极分子，后随夫去外省
贾进田	男	1914	贫农	1947	陈龙孝	“苦大仇深”
林 金	男	1917	贫农	1947	林 志	
支瑞万	男	1924	贫农	1947	林 志、奚仁贤	现看仓库
黄龙义	男	1917	贫农	1947	陈龙孝	做文教工作，后提携一批新人
钱相田	男	1906	贫农	1947	在大兴县入党	
贾秀英	女	1923	贫农	1948	奚仁贤	妇女积极分子
林 同	男	1926	贫农	1948	林 奎、陈龙孝	屡次告宗藩状，后被排挤
周 国	男	1923	贫农	1948	在部队入党	曾任小队政治指导员
冷向礼	男	1921	贫农	1948	不 详	曾任治保员、战勤委员
冷向荣	男	1918	贫农	1953	陈龙孝、黄龙义	
林起友	男	1931	贫农	1953	黄宗藩、冷向山	善于平衡
支 焕	男	1934	贫农	1954	冷向山、黄龙义	
江长顺	男	1936	贫农	1954	黄俊峰、冷向山	曾任治保
林 宝	男	1924	贫农	1954	黄宗藩、林 奎	解放后曾任会首式职事
董祥芝	男	1919	贫农	1954	林 奎、冷向山	
董 启	男	1925	富农	1954	黄宗藩、冷向山	成分几经修改和查证
黄龙雨	男	1906	不详	1954	黄宗藩、林 奎	
黄贺河	男	1934	贫农	1954	冷向山、林 奎	
林起兴	男	1934	不详	1954	林 奎、冷向山	1992去世
毛桂芝	女	1935	不详	1954	林 奎、冷向山	孙合春妻
孙合春	男	1929	贫农	1954	在部队入党	
毛 存	男	1933	贫农	1955	黄龙义、林 奎	孤儿入社，文革反宗藩，现境况不佳
毛淑珍	女	1936	贫农	1955	冷向山、林起友	钱得林妻
黄贯洲	男	1931	贫农	1955	林 奎、林起友	父为土匪，本人长期任会计
林 亮	男	1933	贫农	1955	冷向山	
钱桂芝	女	不详	不详	1955	林 奎、贾进田	
董秀青	女	1934	不详	1955	吴秀英、黄龙义	支焕妻
董 印	男	1924	贫农	1956	黄宗藩、黄龙义	董祥明子
孙 柱	男	1935	下中	1956	林 宝、林 恩	文革反宗藩
林 衡	男	1932	贫农	1956	黄宗藩、支 焕	
韩玉珍	女	1933	中农	1956	黄龙义、冷向山	周坤妻，妇女积极分子
支 平	男	1931	中农	1956	黄龙义、冷向荣	现村一把手兄
孙合衡	男	1935	贫农	1956	冷向山、林起友	
支桂香	女	不详	上中	1956	林 奎、黄龙义	现村二把手妹
黄子泽	男	1935	贫农	1956	董祥芝、林 宝	
支 文	男	1938	贫农	1958	江宇清	支瑞善子，其父58年被定坏分子
孙美荣	女	1933	中农	1958	支 焕、林起友	周存妻，与宗藩私人关系密切

表二：土改结束划定阶级成分时阶级比例对照表

（资料来源：同附表六）

	总户数	地 主		富 农		中 农		贫（雇）农	
		户数	比例	户数	比例	户 数	比例	户 数	比例
全县	68109	1440	2.1	4089	6.0	19249	28.2	43331	63.6
十区	4251	43	1.0	283	6.7	1012	23.8	2913	68.5
西村	153	3	2.0	5	3.3	23	15.0	122	79.7
东村	108	4	3.7	7	6.5	41	38.0	56	51.9

**表三：西村抗战时期主要干部**

(据 65/9/10b、c 及口述资料)

姓名	出生	成分	职务	入党情况	备注
董祥明	1903	—	办事员	1939	首位党员和办事员，40年牺牲于日军
黄龙春	1901	富农	办事员	1940?	曾入感化院，兼任保长、维持会长
林惠	不详	贫农	情报站长	1939	组织关系在村外，与军区等上层交往密切
干同	原名周圣征，人称大神，出身外庄没落地主家庭，曾任军阀团长，以乡绅身份于治安军驻西村时任维持总会长，做地下工作				
黄宗藩	1919	贫农	党小组长	1941	后填党支部书记，据称任办事员
林奎	1917	贫农	爆炸班长	1941	周围数村游击小队指导员
冷向权	1924	贫农	战勤委员	1944	
董春	1923	贫农	财粮委员	1944	后因红眼队嫌疑未任干部，65年登记表缺填
黄龙祥	1911	贫农	村长	非党员	当时似无村长一职
陈龙孝	1914	贫农	战勤班长	1944	曾入感化院，管号房等杂务
支瑞善	1909	贫农	财粮委员	非党员	65年评语：劳动较好，为人尖滑
周金林	不详	中农	日伪乡长	非党员	为人老实被推举，反奸清算挨清查
郑玉田	1880	贫农	日伪保长	非党员	因勇武被推举，反奸清算挨清查，85岁去世
董祥庆	不详	富农	日伪财粮	非党员	为人吝啬，反奸清算挨清查

**表四：西村土改高潮时期主要干部**

(新干部，根据多种登记表、档案、查证材料和本人各时期口述整理)

姓名	出生年份	阶级成分	政治面目	土改高潮时最高职务	贫农团	分地委员会	人民法庭	备注(简历见人物谱系)
林志	1922	贫农	党员 反革命	农会、翻身委员会主任		委员		50年被公审枪决 现褒贬不一
黄悦	1911	中农	反革命	翻身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两次受押 普遍评价较好
林恩	1914	下中	党员	村长	主席	委员		曾定为贫农
陈龙孝	1914	贫农	党员	支部书记		委员		入感化院成历史疑点被告 发查证，解放后淡出
黄荣	1907	贫农		农会副主任	委员	委员	法官	外号老显，圆滑 解放后常年不倒
郑凤同	1916	贫农	反革命	翻身委员会财粮委员		委员		52年因反革命被押六年， 57年释放回乡监督生产， 文革又受押
林凤	1903	贫农	党员		副主席	委员	副法官	
方顺	不详	贫农				委员	副法官	土改后因结怨过多回郑各庄， 现评价很低
支瑞万	1924	贫农	党员	民兵连长	委员		负责提人	新老干部时都负责民兵
毛瑞财	1900	贫农		翻身委员				48年亡，传被老干部吓死
贾进田	1914	贫农	党员		委员	委员		
支恩	不详	贫农			委员	委员		
林金	1917	贫农	党员		委员	委员		
费金林	1917	贫农			委员	委员		
支振声	1918	贫农				委员		
贾秀英	1923	贫农	党员			委员		
黄生	1909	贫农				委员		黄荣弟，
方子合	1929	贫农					法警	方顺子，后参军离村
黄臣	1927	贫农					法警	现较谨慎
董海	1925	贫农					法警	后参军，现孤僻
支富	不详	贫农					法警	已故

**表五：土改前后西村土地占有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土改前后数据分据《硬杆子精神放光芒》编写组 1975P6、P34；另 5 户地主中有 3 户土改时逃亡在外，占有的 1240 亩耕地不含在外村的地产)

阶级或阶层	户数		占总户数比		占有耕地亩数		占耕地总面积比	
	土改前	土改后	土改前	土改后	土改前	土改后	土改前	土改后
地主	5	2	3.2	1.3	1240	48	57.4	2.2
富农	4	4	2.6	2.6	175	62	8.1	2.9
中农	34	34	22.1	22.5	420	623	19.4	28.8
贫农	111	111	72.1	73.6	325	1427	15.1	66.1
雇农		0		0		0		0
合计	154	151	100.0	100.0	2160	2160	100.0	100.0

**表六：归远十区各村土改时平分情况**

(资料来源：49年12月《十区各村土改时平分情况》及77年1月县办公室统计数字，内大康平村、五更庄曾为区委驻地，郑各庄和大康平村为红眼队事件首发地)

	五更庄	黑驴沟	郑各庄	大康平村	西村	东村
总户数	404	125	63	254	153	108
地主	7	0	0	7	3	4
全部没收	7			7	3	4
比例	1.7	0	0	2.8	2.0	3.7
富农	15	7	3	6	5	7
全部没收	15	6	1	6	5	4
没收一部		1	2			3
比例	3.7	5.6	4.8	2.4	3.3	6.5
中农	41	22	37	44	23	41
全部斗光	6				2	2
没收一部		5	7	17	1	1
出多进少			3			2
出少进多			10	2	9	
未出未入		9		25		8
只入未出	35	8	17		11	28
比例	10.1	17.6	58.7	17.3	15.0	38.0
贫农	321	96	23	197	122	56
全部斗光	3					
没收一部						
出多进少						
出少进多						
未出未入				6		
只出未入	318	96	23	191	122	56
比例	79.5	76.8	36.5	77.6	79.7	51.9

**附一：主要参考文献（正式出版物及收入正式出版物的各类文件）**

- Bianco, L.  
1971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Univ. Press.
- Chen Yung-fa  
1986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Duara, P.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Univ. of Chicago Press.
- Esherick, J. W. & M. Rankin  
1990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Friedman, E, P. Pickowicz, M. Selden, K. Johnson et al.  
1991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Yale Univ. Press
- Gamble, S.  
1963 *North China Villag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efore 1933*.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untry*, Stanford Univ. Press.
- Hobsbawm, E. & B. Ranger  
1984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 Press.
- Hofheinz, R, Jr.  
1977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Harvard Univ. Press.
- Huang Shu-min  
1998 *The Spiral Road: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 2<sup>nd</sup>. Westview Press.
- Hunt, L.  
1984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Johnson, C. A.  
1962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Univ. Press.
- Jun, Jing  
1993 *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Univ. Press
- Kung-chuan Hsiao  
1960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 Levine, S.  
1987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Columbia Univ. Press.
- Little, D.  
1989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Yale Univ. Press.
- Marks, R.  
1984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 Mayers, R.  
1970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Harvard
- Moise, Edwin  
1983 *Land Reform in China and North Vietnam: Consolidating the Revolution at the Village Level*. The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Oi, J.  
1989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Perry, E.  
1980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Univ. Press
- Selden, M.  
1970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 Shue, V  
1980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s Socialism 1949-1956*.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tr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 Stanford Univ. Press.
- Skocpol, T.  
1979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 Press.
- Thaxton, R.  
1983 *China Turned Rightside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Yale Univ. Press.
- Wolf, E.  
1969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rper & Row.
- Wou, O.  
1994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Univ. Press.
- Yang, M. C.  
1945 *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dong Province*. Columbia Univ. Press.
-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硬杆子之乡斗争史》编写组  
1975 《硬杆子之乡斗争史》，农业出版社
- 贝尔登  
1980 《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
- 贝思飞  
1992 《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李俊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本书选编组  
1987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193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薄一波  
1947 “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2/18），中央档案馆 1981P51-5  
1991 《若干重要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布迪厄、华康德  
1998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 常佩池  
1947 “冀东土地会议汇报”（11/15），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329-45
- 陈佩华、赵文词、安戈  
1996 《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
- 陈平  
1992 《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
- 成汉昌  
1994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中国档案出版社
- 从涵香主编  
1995 《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6 《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  
1992 《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 董边  
1946 “归远二区发动群众的几点经验”（7/18），原载冀东区党委研究室 46 年出版冀东《工作通讯》第一期，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494-500
- 杜赞奇  
1994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 方惠容  
1994 “‘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系列工作论文 No. 1
- 费孝通  
1985 《乡土中国》，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 费正清、刘广京编  
1992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费正清、费维恺编  
1993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刘敬坤等译，同上
- 冯和法编  
1933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

- 1978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上、下），台北
- 阜平中央局
- 1948 “关于平分土地的指示”（2/9），中央档案馆 1981P248-54
- 高纯秀
- 1989 “义和团运动在归远的兴起与失败”，政协归远县委员会第六辑 P73-9
- 高粮
- 1956 《华北农民翻身歌谣》，通俗文艺出版社
- 高振刚、徐绍元编
- 1986 《归远民间歌谣谚语集》
- 公孙旬
- 1987 “孙永勤与民众抗日救国军”，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7 — P378 以下
- A·古列维奇
- 1989 《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李学智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 归远县档案馆编
- 1986 《归远县大事记》
- 归远县革命委员会接待站
- 1972 《归远县情况简介》，归远县革命委员会接待站印
- 归远县文教志编纂委员会
- 1991 《归远文教志》
- 归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 1990 《归远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
- 哈布瓦赫
- 1999 《论集体记忆》，毕向阳、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韩丁
- 1980 《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惊等译，北京出版社
- 何基洋
- 1987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7 — P371 以下
- 河北省档案馆
- 1989 《河北减租减息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 1990 《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同上
-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1994 《河北省志·第 65 卷（人事卷）》，同上
- 1997 《河北省志·第 59 卷（妇女运动卷）》，同上
-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 1983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下），同上
- 河北省税务局、山西省财政厅税务局、河北省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编
- 《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三辑：征收管理与其他部分）》，河北人民出版社
- 胡素珊
- 1997 《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王海良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
- 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
- 1939 《保甲条例》（7/26），南开大学历史系等 1992P327-34
- 黄树民
- 1994 《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译，台湾张老师出版社
- 黄宗智
- 1986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 1992a 《1368—1988 年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同上
- 1992b 《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冀东区党委暨行政公署
- 1948 “关于目前生产与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五一指示），河北省档案馆 1990P403-7
- 冀东区党委、行政公署暨军区
- 1947 “联合布告（第一号）”（12），同上 P346-7
- 冀东区新农会临时委员会
- 1947 《告农民书》（12/26），同上 P342-6
- 冀东区行政公署
- 1948 “关于执行东北政委会统一颁发土地执照（即‘土地证’）的指示”（10/10），同上 P518-21
- 《冀东日报》
- 1947 “复查工作五条经验”（5/28 第 478 期据常佩池汇报），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36
- 1948a “归远各区召开农代大会商讨春耕移民及联村检查”（3/3），同上 P655-6
- 冀东行政公署
- 1947a “关于发行土地债券的指示”（1/20），河北省档案馆 1990P135-7
- 1947b “关于土改复查的第五号布告”（4/1），同上 P171-2
- 冀东自治政府民政厅
- 1936 《冀东各县乡镇居民联保规则》（7/14），转据朱德新 1994
- 冀光
- 1949 “归远扩军工作经验”，原载冀东区党委研究室 47 年出版冀东《工作通讯》第三期，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515-9
- 《冀热边社会状况考察》
- 1943 （8），魏宏运 1984 — P745-84
- 冀热辽区党委
- 1945 “关于减租运动的简单总结”（3/27），同上二 P129-31
- 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 1987 《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共 3 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 冀中妇委

- 1948 “关于平分工作中妇女运动总结”（7/15），河北省档案馆 1990P461-80
- 嘉 图  
1985 《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 1937—1945》，杨建立等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 姜 宇  
1943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冀热边情况报告”，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7 二 P69-93
- 强世功  
1999 “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陕甘宁边区的审判与调研”，未刊稿  
《解放日报》  
1946 “争取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12/14 社论），中央档案馆 1981P37-40
-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  
1943 “关于贯彻减租政策的指示”（10/28），《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等 1989 下 P388-97  
1944 “关于一九四四年改造与健全村政权工作的指示”（2/25），同上下 P421-27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1991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二册（回忆录选编）；第三册（大事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合编  
1989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上、下（文献选编），同上
-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  
1997 《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河北人民出版社
- 晋 军  
1998 “精英逻辑与灾民逻辑——对大河电站农民长期集体上访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系列工作论文 No. 2
- 柯鲁克夫妇  
1982 《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安强、高建译，北京出版社
- 柯 文  
1989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
- 米兰·昆德拉  
1992 《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
- J·勒高夫、R·夏蒂埃等主编  
1989 《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埃·勒华拉杜里  
1997 《蒙塔尤：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
- 李保文等  
1989 “‘硬杆子’创业史——归远县西村合作化历程”，《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第 5 期
- 李楚离  
1943 “坚持冀东游击战争，为创造大块游击根据地而斗争（1940—1942）”，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7 三 P1-86  
1946 “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及土地改革初步总结”（11/19），河北省档案馆 1990P108-14  
1947a “日寇投降后冀东的群众工作”（6/28），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50  
1947b “在冀东区工作团第二次队长会议上的结论”，原载 9 月 4 日《冀东日报》，同上 P315-18
- 李大钊  
1925 “土地与农民”（署名守常），原载 12/30《政治生活》第 62—67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 1981P40-53
- 李放春  
1999 “强权与记忆”，《往事》第一辑，中央编译出版社
- 李景汉  
1986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 猛  
1995 “从‘士绅’到‘地方精英’”，《中国书评》总第五期  
1996 “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迈向一种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1997 “关于时间的社会学札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五音》总第四期  
1998a “德勒兹的福柯”札记，未刊稿  
1998b “在日常生活与历史之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五音》总第五期  
1998c “拯救谁的历史？”，《二十一世纪》总 49 期 P128-33  
1999 “口述历史中的声音与记忆”，《往事》第一辑，中央编译出版社
- 李世瑜  
1948 《现代华北秘密宗教》，成都
- 李文骅  
1987 “冀东公安组织的建设及锄奸保卫工作”，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7 三 P282-4
- 李运昌  
1944 “冀热边的财政经济工作”，同上三 P112-4  
1987 “冀东抗日大暴动”，同上一 P25-53
- 保罗·利科  
1992 《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立新公社纪事编写小组  
1966 《硬杆子社的故事——河北归远立新公社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
- 刘少奇  
1947a “询问土地改革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10），中央档案馆 1981P43-4  
1947b “转发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报告的批语”，同上 P49-50  
1947c “关于老区土改方针的讲话”（7），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302-4  
1947d “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的报告”（8/4），中央档案馆 1981P71-9  
1947e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 1982 上 P384-95

- 1948a “关于土改整党问题给薄一波等的指示”（1/23），中央档案馆 1981P132-3  
 1948b “关于土改分三类地区的讲话”（2/22），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412  
 1948c “关于工委情况致毛泽东的报告”（3/19），中央档案馆 1981P265-6  
 1982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
- 刘慎之  
 1946 “关于土地改革与各阶级政策”（11/30），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256-64  
 1947a “冀东区工作团组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原载 9/6《冀东日报》，同上 P319-24  
 1947b “冀东土地会议汇报”（11/23），同上 P346-70
- 刘一皋  
 1995 “中国改革与农村社会——读《中国的乡村，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书评》总第 4 期
- 刘震云  
 1991 《故乡天下黄花》，中国青年出版社
- 娄平  
 1987 “打‘治安军’战役”，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7 二
- 卢跃刚  
 1998 《大国寡民》，中国电影出版社
- 鲁文曾  
 1990a “归远县执行‘五四指示’的情况”，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26-34  
 1990b “归远县土改‘复查’情况”，同上 P35-42  
 1990c “归远县土改‘复查’时侵犯工商业的典型调查”，同上 P43-58  
 1990d “归远县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运动的情况”，同上 P59-68
- 路易·加迪等  
 1988 《文化与时间》，邓乐平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 逯斐  
 1955 《黄宗藩勤俭办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 马建国  
 1995 《冀东书报刊史料》，河北人民出版社
- 马秀山  
 1990 “归远县区级以上干部的‘三查’整党”，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69-73
- 毛泽东  
 1945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 1991P1243-63  
 1948a “就土地改革的政策与经验教训的关系问题致刘少奇”（3/6），中央档案馆 1981P261-2  
 1948b “晋绥干部会议讲话”（4/1），毛泽东 1991P1305-17  
 1982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1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同上
- 毛泽东、刘少奇  
 1946 “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5/8），中央档案馆 1981P7-8
- 米格达尔  
 1995 《农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 巴林顿·摩尔  
 1987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译，华夏出版社
- 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市档案馆合编  
 1992 《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
-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1983 《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 彭寿生  
 1987 “冀东军民是怎样恢复基本区的”，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7 二
- 彭真  
 1941 “在许、姚考察后对冀东、平北工作意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等 1989 下 P122-5、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7 二 P54-8  
 1997 《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乔志强主编  
 1998 《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
- 秦晖  
 1998 “人民公社与传统共同体”，《中国书评》总第 13 期
- 秦晖、苏文  
 1996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
- 全国农业展览馆综合馆编  
 1960 《黄宗藩办社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农业出版社
- 任弼时  
 1948 “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12），中央档案馆 1981P103-26
-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1982 《华北治安战》（上、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1937 《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12/2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 1982 上 P66-73
- 邵清华  
 1946a “归远县补军工作经验的补充介绍”（8/6），原载冀东区党委研究室 46 年出版冀东《工作通讯》第一期，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508-9  
 1946b “归远发动群众中领导方式的一个经验——具体指导与村骨干会相结合”（8/14），原载处同上，转引同上 P510-4
- 史靖  
 1988 “绅权的继替”，吴晗、费孝通 1988
- 孙伟主编

- 1992 《包森传奇》，作家出版社
- 孙腾兴口述、韩士林整理  
《硬杆子精神的回忆录》，手抄原稿，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藏
- 保罗·汤普森  
1999 《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 唐斯文编著  
1966 《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 硬杆子精神开花结果》，农业出版社
- 王国斌  
1998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 王 昆  
1988 《冀东革命史大事记 1919—1949》，河北人民出版社
- 王兰亭等  
1962 《立新人民公社》，人民美术出版社
- 王明珂  
1996 “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思与言》V34（3）P147-84
- 魏宏运  
1984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共四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  
1996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 吴晗、费孝通等  
1988 《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
- 习仲勋  
1948a “关于检查绥属各县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1/4），中央档案馆 1981P99-102  
1948b “（向毛泽东）报告西北土改情况”（1/19），同上 P128-31
- 萧阿勤  
1997 “集体记忆理论的检讨：解剖者、拯救者、与一种民主观点”，台湾《思与言》V35. 1P247-96
- 萧 铮主编  
1977 《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与美国中文资料中心出版  
1984 《中华地政史》（亦名《中国人地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 谢忠厚等主编  
1994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
- 新华社  
1948a “把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提高一步”（7/25 社论），中央档案馆 1981P394-402  
1948b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7/27 信箱），同上 P403-9  
1948c “在结束土地改革的地方纠左必须防右”（11/10 社论），同上 P498-501
- 徐连治、张祥云  
1989 “归远县黄金开采史”，政协归远县委员会第六辑 P91-4
-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  
1995 《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
- 燕山樵  
1972 《硬杆子精神绘新图——河北省归远县人民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农业出版社  
1975 第 2 版《硬杆子精神绘新图——河北省归远县人民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事迹》，同上
- 阳翰笙主编  
1989 《柳江怒涛：柳城县土改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 杨耕田  
1947 “大规模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12/3），河北省档案馆 1990P322-38
- 杨懋春  
1980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台湾远流图书公司
- 杨尚昆  
1941 “党的建设”，选自“根据地建设的几个问题”，原载《战线》杂志 2 月第 52 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等 1989 下 P18-26
- 杨文汉  
1987 “丰滦迁联合县的创建和发展”，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7 二 P152-70
- 应 星、晋 军  
1999 “集体上访中的问题化过程”，《社会学研究》即刊  
《硬杆子精神放光芒》编写组  
1975 《硬杆子精神放光芒——西村大队的经济发展》，人民出版社
- 俞文元  
1957 《黄宗藩社的奇迹》，河北人民出版社
- 张葆文主编  
1993 《玉田农民暴动》，中共党史出版社
- 张 达  
1946 “土地复查报告”（4/18），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293-5
- 张 静  
1996 “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的有关问题”，《中国书评》总第十期
- 张明远  
1980 “冀东早期的农民运动”，《冀东革命回忆录》编辑组《河北革命回忆录》（第二辑）：《冀东革命回忆录专辑》，河北人民出版社
- 张 朴  
1960 《黄宗藩的故事》，同上
- 张汝林、李永春  
“大神——周庆林同志革命片断”，政协归远县委员会第一辑 P153-62
-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研究室编

- 1994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 张祥云  
a “日伪时期归远县伪政权机构概况”，政协归远县委员会第二辑 P10-22  
b “归远县新民会基本情况”，同上第二辑 P76-8
- 张永生  
1990 “1948 傅作义部队两次进扰归远县境”，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184-92
- 张永生、鲁文曾  
1990 “一九四六年九月国民党军队进占归远始末”，同上 P175-83
- 张仲礼  
1991 《中国士绅：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赵树理  
1980 《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
- 赵效民主编  
1990 《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
- 政协归远县委员会编  
《归远史话》（一至六辑）
- 政协归远市委员会、中共归远市委党史办公室  
1992 《归远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专辑》
- 中共丰润县委办公室编  
1995 《丰润革命史（待定稿）》
- 中共丰润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迁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87 “岩口暴动”，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7 一
- 中共归远县委  
1946 “归远城附近减租运动初步报告及村中党政民建设的一些意见”（2/20），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220-5  
1947a “关于领导的检讨与今后改进的初步意见（机密）”（2），同上 P267-75  
1947b “对复查的初步检讨”（4/26），原载《冀东日报》47/5/8，同上 P520-3  
1948a “结束土改工作示范村（侯家寨）的总结”（8/12），同上 P449-53  
1948b “新寨村颁发‘土地执照’典型示范材料”（11），同上 P464-78  
1949 “归远县发土地证示范村的总结”（2/7），同上 P479-89  
1950 “结束土改工作报告”（3/9），同上 P490-3
- 中共归远县委组织部等  
1990 《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归远县组织史资料》，河北人民出版社
- 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1990 《归远党史资料（第三辑）：1945—1949》
-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1993 《长城线上无人区》，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冀东武装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冀东土地制度改革》，同上
- 中共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内蒙古、唐山市市区委党史（委）研究室、丰润县委编  
1995 《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研究论文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同上
- 中共冀东区党委  
1946a “关于普遍纠正偏向给各地县委的指示”，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226-7  
1946b “根据 15 分区发动群众的经验给各级党委的指示”（7/15），同上 P242-7  
1946c “为解决土地问题中几个重要问题给归远县委的指示”（7/20），河北省档案馆 1990P44-53  
1947a “为巩固群众既得利益加强中贫雇的团结 关于赔偿中农土地问题的决定”（1/10），同上 P132-3  
1947b “关于复查土地进一步建立基本群众巩固优势的决定”（4/25），同上 P172-9  
1947c “给归远县委的指示并作各地重要参考”（7/20），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305-13  
1947d “给各地县委的指示信”（8/1），同上 P314  
1948a “关于放手发动群众推进平分土地运动高潮的指示”（1/9），河北省档案馆 1990P357-60  
1948b “关于土改复查情况致中工委并转毛主席的报告”（2/16），中央档案馆 1981P308-9
- 中共冀东区第 15 地委  
1947 “关于执行区党委复查土地决定的意见”（5/1），中共归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90P296-301
- 中共冀热边特委  
1944 “关于进行减租运动决定”（9/1），魏宏运 1984 二 P126-8
- 中共冀中区党委  
1946a “关于老解放区内检查政策纠正错误的指示”（6/18），河北省档案馆 1990P30-4  
1946b “关于土地改革第一阶段几个问题的经验介绍”（12/1），同上 P121 以下
- 中共滦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87 “港北起义前后”，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7 一
-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1991 《冀东革命人物（第三辑）》  
1993 《冀东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 中共中央  
1946a “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刘少奇起草，中央档案馆 1981P1-6  
1946b “关于土地问题给冀热辽分局的指示”（5/11），同上 P9  
1946c “关于深入清算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给冀热辽分局的指示”（5/17），同上 P11-2  
1946d “对热河处理土地问题的几点指示”（6/5），同上 P14  
1946e “关于研究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7/19），同上 P15-8  
1946f “对山东地区土地改革的指示”（9/21），同上 P35-6  
1947a “关于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和收集发动妇女经验的指示”（2/9），同上 P47  
1947b “关于发表和实行土地法大纲问题给中共中央工委、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10/9），同上 P83  
1947c “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10/10），同上 P84

- 1947d “中国土地法大纲”（10/10），同上 P85-8  
 1947e “关于重发《怎样分析阶级》等两文件的指示”（11/29），同上 P90-1  
 1948a “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2/11），毛泽东 1991P1280-2  
 1948b “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2/15），中央档案馆 1981P172-227  
 1948c “关于讨论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通知”（2/16），同上 P228-9  
 1948d “转发华北局具体执行中共中央 1948 年土改和整党工作指示的计划的批语”（6/8），同上 P347-8  
 1948e “关于晋绥整党工作的指示”（6/28），同上 P352-65
-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  
 1941 “关于冀东工作向北方局的报告”（6/19），《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等 1989 下 P82-5  
 1942 “对于冀东工作的指示”（3/25），同上下 P351-60
- 中共中央东北局  
 1948a “关于纠正冀东土改中左倾错误给程子华的指示”（4/30），中央档案馆 1981P321-3  
 1948b “关于执行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土改和整党工作指示的情况与计划”（6/23），同上 P382-6
- 中共中央工委  
 1947a “关于彻底平分土地问题的报告”（9/5），中央档案馆 1981P81  
 1947b “关于树立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及召开各级代表会等问题给晋绥分局的指示”（12/18），同上 P92-5  
 1947c “关于阶级分析问题的指示”（12/31），同上 P96-7  
 1948 “关于纠正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给热河分局的指示”（3/15），同上 P300-1
- 中共中央华北局  
 1951 “关于互助组问题的报告”（7/25），《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 1992P38-40  
 1952 “关于注意防止农业生产合作社盲目发展倾向的通报”（3），同上 P89-90
-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  
 1947 “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2/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等 1989 下 P408-10
- 中共中央热河分局  
 1948 “转报冀东区党委关于土改情况的报告”（2/23），中央档案馆 1981P310-1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  
 1981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
- 中央档案馆编  
 1981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中央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1998 《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档案出版社
-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1986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上、下）》，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1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三）：解放战争时期》，同上
- 周文彬  
 1943 “关于冀东工作的补充报告”，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7 三 P86-111
- 周锡瑞  
 1995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 朱德、刘少奇  
 1947 “关于彻底完成冀东土改的指示”（5/6），中央档案馆 1981P56-7
- 朱德新  
 1994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朱其文  
 1940 “在敌人远后方日益壮大中的冀东抗日政权”，原载《边政导报》5 月第二卷第 19—20 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等 1989 上 P263-83
- 朱元鸿  
 1990 “实用封建主义：集体记忆的叙事分析”，《中国社会学刊》第十六期

## 附二：内部参考档案资料

（主要来源：唐山市档案馆；归远市档案馆及党史办。不含已收入正式出版文件集的资料。本目录仅保留原制档部门及主要卷宗名称。时间按原件注明，不详者依内容大致推断排列顺序）

- 1945  
 7/7 《十五专署第一次民政科长会议记录》
- 1946  
 11 《干部自述履历大纲·宜山》  
 12 《归远县十区农民部杜贵华自述书》  
 12/13 《冀东区归远县第二区孙继峰自述书》  
 12/2× 《归远县第十区董洽清自述书》
- 1947  
 2/28 《冀东区党委会议记录（土改问题）》（区党委民运部长阎达开发言），党史资料卡片第 96 号文 627
- 1948  
 6/25 《提高警惕严防蒋特勾结地主反攻暴动》（绝密发区级），中共归远县委
- 1949  
 2a 《冀东区归远县 1948 年各种作物播种面积产粮调查表》  
 2b 《归远县三十七年度经济状况及征收分配登记表》  
 4/28 《社情通报》（机密），归远县委社会部  
 5 《归远县公安局九、十区重点反道教工作总结》，归远县委社会部  
 5/3 《归远县集市物价表》，归远县贸易分公司制  
 5/5 《（归远）十区干部登记表》，冀东区党委组织部制

- 5/30 《归远县各区道教首要份子统计表》，同上
- 6 《破获大佛教林志案总结》，同上
- 6/2 《归远县各区道教会员统计表》，同上
- 6/30 《前年侦察工作总结》，同上
- 11 《土改与结束土改工作》，行署周副书记报告
- 12 《十区各村土改时平分情况》
- 1950 《西村情况总结报告》
- 1954
- 10/7a 《黄自顺调查林奎证明材料》，归入《62年整风黄宗藩档案材料》
- 10/7b 《黄自顺调查黄宗藩家世》，同上
- 10/8 《黄自顺调查林起洲证明材料》，同上
- 10/9 《为控诉林同污蔑西村社主任黄宗藩地主成分及反攻事呈归远县委纪委会监委会》，归远县十区公所区委会，同上
- 10/12 《林同同志谈》，同上
- 11/6a 周永清、冷向山《黄宗藩家庭成分及出身历史》，同上
- 11/6b 林起洲《关于林同反映问题的主要原因》，同上
- 11/6c 贾进田《证明材料》，同上
- 11/6d 林衡《证明材料》，同上
- 11/6e ××《证明材料》（名字被遮），同上
- 12/2—4 《林同的检讨摘要》及县委书记等的批示，同上
- 1958
- 12/12 《归远县立新公社黄宗藩自传书》，同上
- 1960
- 1/15 黄宗藩自填《干部简历表》，同上
- 1962
- 2/28 林起友《支瑞善事证明材料》，归入《62年整风黄宗藩档案材料第四卷》
- 3/1a 冷向荣《关于宣布支瑞善是坏分子的问题》，同上
- 3/1b 支瑞善《自述》，同上
- 3/1c 陈永让《证明》，同上
- 3/1d 冷秀青《口头证明》，同上
- 3/3 《郑树林谈和宗藩换房问题》，归入《62年整风黄宗藩档案材料》
- 3/4 《贾进田谈和宗藩的房子问题》，同上
- 3/5a 黄自顺《证明》，归入《62年整风黄宗藩档案材料第四卷》
- 3/5b 《县公安局长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稿》，同上
- 3/7 《任子志同志介绍关于黄宗藩和林奎两个同志的情况》，《62年整风黄宗藩档案材料》
- 3/12—14 《县公安局长与林同谈黄宗藩问题》，同上
- 3/14a 《通过林同对证郑献福妻被吊经过》，同上
- 3/14b 《黄俊峰谈郑献福妻被吊问题》，同上
- 3/17 《县长与林起远座谈笔录》，同上
- 3/18 《宗藩有关的问题》（县公安局长总结汇报），同上
- 3/20 《县公安局长与林惠谈黄宗藩问题》，同上
- 3/23 《县公安局长在公社子林同志屋和林惠同志座谈》，同上
- 3/29a 《黄龙祥谈平分被斗》，同上
- 3/29b 《支瑞善谈宗藩等被挨整和被斗》，同上
- 3/29c 《黄荣谈宗藩被斗》，同上
- 3/30 《毛宽谈宗藩等几个人挨打的经过》，同上
- 3/31 《冷向权谈宗藩他们复查以后受打击和宗藩平分被斗》，同上
- 4/4 《冷向仁谈关于划宗藩成分的经过》，同上
- 4/6 《关于林惠反映宗藩的几个主要问题和查证的情况》，同上
- 4/7 《贾秀英证明黄宗藩买贾进田西厢房问题》，同上
- 4/23 《陈龙孝谈宗藩划成分问题》，同上
- 5/3 《关于黄宗藩同志的历史、成分和党籍问题的调查对证总结》，归远县委，同上
- 5/15 《关于支瑞善如何被宣布为坏分子问题的查证和处理情况的典型材料》，归入《62年整风黄宗藩档案材料第四卷》
- 9/6 《通过黄荣了解董启被斗情况》，同上
- 10/3 《县委书记就调查董启成分一事给调查人员的指示精神》，同上
- 10/7 《关于董启成分的问题：西村群众座谈和支部委员会通过稿》，同上
- 1965
- 3 《关于群众揭发黄宗藩、林奎、冷向权打击毛瑞财、毛因此得疯病不久而死的情况座谈会》，归入《西村大队群众揭发材料》
- 3/8a 《讨论黄宗藩检查——大队组记录》，同上
- 3/8b 《讨论黄宗藩检查——干部组记录》，同上
- 3/8c 《六队讨论黄宗藩检查记录》，同上
- 3/27 《四、五、六队党员干部对董启、董印、冷向权检查的讨论》，同上
- 4/7 《关于黄宗藩阶级成分不清和土改前家庭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的调查报告》，归入《西村贫委对大队干部经济问题的意见和黄宗藩成分问题》
- 5/14 《西村大队贫农、下中农筹备委员会关于大队主要干部经济问题三定、退赔的初步意见》，同上
- 5/24 《西村大队复议前后阶级成分的变化情况表》
- 6/5 《关于黄宗藩同志所犯四不清错误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共唐山地委四清工作团21分团西村工作队
- 7/1a 《关于黄宗藩阶级成分问题的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中共唐山地委四清工作团21分团
- 7/1b 《归远县西村、西下营、沙石峪、周桥子四个大队的四清运动情况》，同上
- 7 《西村大队地富反坏份子情况登记表》
- 7/5 《中共唐山地委四清工作团驻西村工作队关于董启家庭成份问题调查的情况和复议报告》，归入《西

- 村贫委对大队干部经济问题的意见和黄宗藩成分问题》
- 7/12 《西村大队“三结合”领导班子讨论黄宗藩阶级成分记录》，同上
- 7/15 安×峰致黄石、马力、子明函（关于黄宗藩阶级成分）
- 7/17 《西村大队、生产队干部选举后花名登记表》
- 8/1a 《关于立新公社西村大队和黄宗藩同志一些情况的调查报告》，省地县委工作组
- 8/1b 《归远县王市庄地区和孙腾兴同志一些情况的调查报告》，同上
- 8/2 《西村大队农村干部犯政治不清情况统计表》
- 9/4 《关于黄宗藩同志一些情况的报告》，中共唐山地委四清工作团 21 分团
- 9/10a 《抗日时期主要干部登记表》，归入《归远县立新公社西村生产大队基本情况调查表》
- 9/10b 《土改时期主要干部登记表》，同上
- 9/10c 《土改时期贫农团成员登记表》，同上
- 9/10d 《合作化时期主要干部登记表》，同上
- 9/10e 《公社化时期主要干部登记表》，同上
- 9/10f 《大队四清后生产队以上主要干部登记表》，同上
- 9/10g 《大队贫协委员会成员登记表》，同上
- 9/10h 《党员花名登记表》，同上
- 9/10i 《团员花名登记表》，同上
- 9/10j 《大队地富反坏分子登记表》，同上
- 9/10k 《四清中有问题干部登记表》，同上
- 9/10l 《村基本经济情况一览表》，同上
- 10 《关于西村黄宗藩同志四不清问题的摘要》，中共唐山地委四清工作团 21 分团
- 10/5 《关于黄宗藩同志所犯四不清错误和解决情况的报告》，同上
- 1977
- 1/15 《全县各区阶级成分表》（与 49/12 件同附）
- 1978
- 2/24 《关于归远县计划外基建情况的初步调查》，中共归远县委
- 3 《关于归远县对西村大队支援情况的调查》，中共河北省委

### 附三：口述录音资料索引

访谈时间：96 年 4-5 月，11-12 月；97 年 8 月；98 年 8 月

姓名	盘数	出生年份	原籍	入村年份	备注
陈宝权	1	1951	西村		陈龙孝次子，现邻乡党委书记
陈秀莲	1	1925	四卫所	1941	陈龙孝妻
刁凤兰	2	1917	陡岭子	1930	毛庆、贾进田妻
董春	3	1923	西村		外表和善，有顾忌，“官方发言者”
董海	2	1925	西村		孤僻
董启	4	1925	西村		有顾忌，“官方发言者”，记忆力好
董祥芝	2	1919	西村		被村民认为糊涂
董印	10	1924	西村		活泼爱说
方子合	1	1929	郑各庄	1946	外调，48 年参军离村
费竹林	1	1943	西村		曾全国各地旅游，因病辞去村长，
韩士林	1	1928	疙瘩村		外调，非村民
韩玉珍	1	1933	大寨	1948	周坤妻
何永生	1	1949	西村		现村治保，“追求上进”
黄臣	2	1927	西村		心善，仍多有顾虑，同妹黄玉兰一同受访
黄贺保	1	1938	西村		现村副治保
黄俊存	1	1923	西村		同妻周秀英一同受访
黄俊兰	5	1910	西村		黄海妻，同其长女一同受访
黄俊满	1	1923	西村		被村人认为废物，不善农事
黄俊盛	1	1927	西村		据笔录整理
黄龙席	1	1935	西村		同妻孙淑莲一同受访
黄龙雨	2	1906	西村		村人尊敬的老寿星
黄延青	4	1929	西村		孤傲，1997 病故
黄应氏	2	1917	大于沟	1942	黄顺母
黄宗平	1	1928	西村		黄宗藩堂弟，较乃弟和善
黄宗智	1	1930	西村		黄宗藩堂弟，自诩精通世故
贾翠萍	2	1920	石门	1925	林江、支振声妻，“木讷”
贾秀兰	2	1919	姚家峪	1935	冷向山妻，耳近聋
贾秀英	2	1923	西村		1977 离村改嫁，一贯积极
冷向清	2	1920	东村		外调，无人搭理的老干部
冷向仁	2	1915	西村		慈善
冷向义	5	1918	西村		骄傲，爱讲战斗故事
冷向有	2	1926	西村		
冷朱氏	2	1928	接官厅	1942	老实，冷向权妻
林白氏	2	1912	阎家峪	1926	林凤妻，1998 病故
林贺	2	1926	西村		
林起明	2	1936	赵庄子	1940	村口修自行车，与林宝妻李春兰一同受访
林起友	3	1931	西村		
林起远	1	不详	西村		林惠子，退休后偶尔回村
林起洲	5	1928	西村		其子富殷且孝顺

林兴	2	1922	西村		被村民认为糊涂
林忠	6	1923	西村		
毛存	2	1933	小厂村	1933	在村口开早点铺
钱德	2	1930	西村		同阳有志等
钱得泉	3	1930	西村		
钱周氏	1	1917	赵庄子	1931	开朗，同其儿媳、女儿、孙女一同受访
强万和	1	1934	迁西村	1938	性孤僻，僵硬
孙合春	2	1929	西村		
孙继峰	1	1926	亢港	——	外调，非村民
孙美花	3	1918	白庙	1936	独自生活困苦，子女也艰难
孙伟	1	不详		——	外调，非村民
郑启财	1	1914	西村		郑玉田子
郑树林	1	1934	西村		
郑文华	1	1928	地北头	——	外调，非村民
支焕	2	1934	西村		村中看厂子闲职，舒适
支瑞万	3	1924	西村		无法进食，终日喝酒，看仓库
支树林	2	1930	西村		光棍
支柱林	2	1922	西村		同妻支李氏一同受访，分别于96、97年病故
周存	1	1932	西村		同妻孙美蓉一同受访
周国珍	4	1925	东村	——	林奎妻，同其子林起树一同受访
周义	3	1924	西村		被村人疑为精神病
朱柱	3	1935	吴家沟	1948	现帮助些治保民调之类

#### 附四：所涉人物简要谱系

此谱仅含本文所涉人物之有助于理解本文内容的信息，详细谱表收于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直接访谈对象用下划线注出。注意西村土改划成份时贫农、雇农不分，另外下中农与中农、上中农与中农之间易混。生卒年未标明“至今”者表明已去世或不明。凡标明长子、次子等的皆系亲兄弟，标明行×的为叔伯兄弟，标明老×的为不详。以林、黄、支、董、冷、钱、周、毛、郑、费、杂姓顺次排列

#### 1、林 姓

老家宁河县，分别落在片石峪和西村，迄今 480 多年，共分三门  
大门林增，外号林老福，开南北大店，生十子

次子林×河

次子林田：贫农，外号瞎林田，光棍

三子林×河

三子林富

长子林起洲：1928 至今，下中农，土改因替老干部上区里告状被打击，57 年因贪污被判 3 年

六子林×河

长子林连：在四卫所赶集时让日机扫死

三子林盛：？至 1941，死于日机轰炸西村

四子林有：？至 1941，死于日机轰炸西村

七子林×河

独子林恩：1914 至约 1990，贫农，后改下中农，47 年入党，土改任村长、贫农团主席、分地委员

八子林齐河

长子林真：出走关外

次子林志：1922 至 1950，下中农，46 年入党，土改任翻身主任、农会主任，被枪毙，妻改嫁周义

三子林仁：出走关外

九子林茂河：？至约 1928，林家大店传人

长子林伸：60 岁死，贫农

次子林起友：1931 年至今，贫农，53 年入党，多年任大队长

三子林忠：1923 年至今，贫农

二门

老大林印河

长子林惠：贫农，自称 39 年入党、军区情报站长，后为公社兽医站长，与上层多交往，屡告宗藩

长女林起英：贫农，早期团员

独子林起远：1936 至今，贫农，早期团员，大学毕业，文革因反宗藩入狱多年，后为中学教师

次子林青：贫农

三子林同：1926 至？，贫农，首批硬杆子，48 年入党，曾任治安员，多次控告黄宗藩

四子林衡：1932 至？，贫农，首批硬杆子，56 年入党

老三林宝河：1893 至？

长子林兴：1922 至今，贫农

次子林春：贫农，首批硬杆子

三子林亮：1933 至今，贫农，首批硬杆子，55 年入党

老四林海河：原为土匪，八路军收编后让日本抓走，刺刀挑死于大寨

二门

老大林金河

子古兴得：后妈带来，曾与林起洲等去区里告状，48 年当兵，死在外头

老二林玉河

次子林贺：1926 至今，贫农

三子林明：贫农，派去修密云水库时因偷东西被遣返，回来一两年后病死

四子林彬：1941 至？，贫农，文革时因反革命言行被村里监管

老大林满河：84岁死  
子林凤：1903至1982，贫农，47年入党，土改任贫农团副主席，人民法院副法官（副庭长），分地委员会委员～妻林白氏：1912至1998，1926由阎家峪嫁入  
干儿子钱家光  
老二林景河：？至1940，会首，人称景二爷  
次子林凤：过给大爷  
三子林芝：出走关外  
四子林奎：1917至1973，贫农，首批硬杆子，41年入党，抗战时任爆炸班长，土改时被打击，解放后任村二把手，后逐渐失势，文革入狱，后死于送回家路上  
～前妻周国芳：1919至？，东村  
～后妻周国珍：1925至今，1955年由东村嫁入，周国芳妹  
三子林起树：1956至今，文革后曾出走关外

老大：人称二美子  
独子林升：上中农  
长子林起华：上中农  
次子林起国：上中农，当兵赴过朝

老三

独子林月  
子林起东：去唐山下窑

老五林诚存：曾任会首

长子林银：1904至？～妻孙美英1914至1995（1940陡岭子）  
子林起明：1936至今，1939年由赵庄子随母改嫁到西村，现任“会首”

次子黄俊峰：过出

三子林金：1917至1965年后，贫农，47年入党，土改任贫农团、分地委员会委员

四子林宝：1924至1996，贫农，54年入党，曾任会首，民兵连长

～妻李春兰：1933至今，1948由大田庄嫁入

瞎三双

长子林海：14岁结婚，贫农～妻：1909至？，先后改嫁林伸、钱白、黄林家，聋

次子林江：1905至八十多，贫农，惯偷～妻贾翠莲：1920至今，1924由石门收为童养媳

林××：外号狼咬，曾任会首，1941年因饥饿服毒而死～妻与应得义（195×死）同居

## 2、黄 姓

宝坻香河店黄

黄思善：黄家大院地主，分东西院和南院

东院：行大黄玉书：地主，人称黄大和尚

长子黄延田：地主，土改被斗，肉头

次子黄延清：1907至？，地主，抗战时在唐山日本航空部队任秘书，后潜逃，68年被抓回

行二黄文照：地主，人称二巡警

子黄延藩：1902至1966后，地主，人称歪脖子，土改被斗

行三黄文屏：人称三貔

子黄立智：过继，土匪，行四

子黄贯周：1931至？，贫农，55年入党

行四黄××：人称四先生

子黄立礼：富农，行三

小四？黄俊元：地主，人称大棒子

子黄延平：？至1953，地主，被枪决～妻张静秋：1900至1966后，地主，强万和大姨

行六黄继亭：地主，贼六子

西院：老大黄××：人称福大先生

子黄立仁：富农，行大，过继，告发董祥明，后死于八路军～妻：1898至1966后，富农

子黄贯东：1925至1966后，富农～妻骆玉莲：1925至1966后，富农

南院：黄凤林/宣？：人称黄三秤、米蛀虫，二巡警弟，在归远县城开三处买卖

黄思忠：独子，人称大耳朵，94岁，至约1935～妻秦氏：家里是北京翰林

子黄继清：秀才，51岁死

长子黄伯英：36岁死，无子，事业归黄季英

次子黄仲英：32岁死，无子，事业归黄叔英，留下寡妇二大娘跟黄宗藩过，活到80多

三子黄叔英：1900至1927，小名保顺～妻：四卫所人

子黄宗藩：1919至今，没落地主，后改贫农，首批硬杆子，41年入党，抗战时党小组长，土改被打击，后独揽各级大权数十年，文革后被解职，现中风在床

四子黄季英：抽大烟败家，69岁死，贫农

长子黄宗平：1928至今，贫农

次子黄宗智：1930至今，贫农

罗秀庄黄（三百多年前由罗秀庄搬到归远县城，再到西村，祖坟还在罗秀庄，先分两大支，后分三坟头，其中一坟头又分三坟头）

黄德保

长子黄忍

子黄龙朝

长子黄坤：1922年20多岁让奉军打死

次子黄海：1907至1984，下中农，后改贫农～妻黄俊兰：1910至今，1914由本村童养入门

三子黄悦：1911至？，中农，土改任农会副主任，53年被判8年，62年被放，文革再次入狱

三子黄勤

子黄龙德：1898 至？，贫农  
长子黄臣：1927 至今，贫农，土改任人民法庭法官  
三女黄玉兰：1940 至今，贫农，长期任妇女主任  
黄玉  
长子黄龙明  
长子黄广：行大，贫农  
长子黄贺余：47 年当兵后杳无音讯  
次子黄贺保：1938 至今，贫农，四清告宗藩未成被压，文革任造反派头头被压，现副治保主任  
次子黄林：行四，贫农，首批硬杆子  
次子黄龙山：？至 1933  
长子黄荣：行二，人称老显，1907 至？，贫农，首批硬杆子，贫农团、分地委员，人民法庭法官  
次子黄生：行三，1909 至 1993，贫农，首批硬杆子，土改分地委员会委员  
老大黄德×  
独子黄×  
独子黄龙春：1901 至 1966 后，富农，办事员，保长，1940？入党，遭清算～～续妻黄徐氏：富农  
独子黄延青：1929 至 1997，富农  
老二黄德×  
长子黄秀  
长子黄龙启：1909 至 1998，下中农～～妻黄应氏：1917 至今，1942 由应家谷嫁入  
长子黄顺：1943 至今，下中农，70 年代始任公社书记  
三子黄富  
长子黄龙席：1935 至今，下中农～～妻赵淑莲：1932 至今，1949 由赵庄子嫁入  
老大？黄力  
长子黄龙奎：？至 1945～～妻钱周氏：1917 至今，1931 由赵庄子嫁入，后嫁钱保秀  
次子黄龙和：人称麻子五，土匪，无子  
老三黄德来：  
长子黄魁：？至约 1922  
长子黄龙云  
子黄有：1928 至今，贫农，人称黑子，文革打林奎时打手之一  
次子黄龙雨：1906 至今，54 年入党  
三子黄龙仁：1912 至？，下中农  
四子黄俊林：过出  
次子黄和  
长子黄龙祥：1911 至 1995，下中农，抽大烟，抗战时任村长，土改前任战勤，被打击，非党员  
次子黄龙义：1917 至 1995，贫农，47 年入党

#### 黄老庄搬来的黄

老大黄祥生：早于 1942 年死，不到 70 岁  
长女黄俊兰：1910 至今，黄海妻  
次子黄俊存：1923 至今～～妻张秀英：1924 至今，1942 由东村嫁入  
四子黄俊盛：1927 至今，因梦游妻离婚  
老二黄祥山  
独子黄俊满：1923 至今，原名黄俊实，外号大号凉粉，九岁过继入，文革打林奎时打手之一  
黄祥凤  
长子黄俊林：1918 至 199×，贫农  
～～妻贾秀英：1923 至今，贫农，48 年入党，土改任分地委员会委员，多年妇女主任  
兄贾进田：1914 至约 1991，贫农，首批硬杆子，47 年入党，土改任贫农团、分地委员会委员  
黄祥瑞：土匪  
黄俊峰：1909 至？，贫农（南山），44 年入党，解放后曾任林业队长、信用社主任，口碑极差

老大黄得发：开烧饼铺

老二黄得兴：老俩口开小卖铺，绝了

黄玉满：东村扛活

子黄金平：1928 至 1963 后，贫农，首批硬杆子

黄金太：黄金平叔伯哥哥，土匪，后归编八路军，盘山战役让日本打死，媳妇改嫁冷向仁

### 3、支 姓

一门：大大爷支×

长子支瑞棉：行大，支瑞辈 24 个，30 年代四大吹

子支连：短期保长

长女支秀英：文化高，早期团员

次子支瑞义：行二，30 年代四大吹

二大爷支满：？至 1940

长子支瑞亭：行三，中农，无子，大佛教头目

次子支瑞荣：行四，贫农～～妻：抽大烟

长子支恩：贫农，首批硬杆子，土改任贫农团、分地委员会委员，约 1993 和儿媳生气上吊死

三子支瑞玉：行五，贫农，30 年代四大吹，41—45 年曾举家出走关外

子支焕：1934 至今，贫农，54 年入党，多年大队书记～～妻董秀青：1934 至今，55 年入党

二门：三大爷支同

次子支瑞万：行八，1924 至今，贫农，47 年入党，抗战后任民兵基干班长、连长等，多有结怨

三门：支振声：1918 至 1965 后，贫农，土改任分地委员会委员～～妻贾翠萍：原林江妻

支振海：抽大烟

支振和：行二，字儿深

四门：四大爷支×

长子支瑞兴～～妻黄淑珍：传原与林奎交好，后因宗藩强逼，含羞自尽

次子支瑞泉：活到八十多，三几年就去归远县城跑堂

老大支×

长子支瑞恒

子支富：早于 1928 至 1990 前，土改任人民法庭法警

次子支瑞善：1909 至 1966 后，贫农，抗战任财粮委员，土改被打击，人缘不好，曾被定坏分子

长子支文：1938 至 1997，贫农，58 年入党～～妻冷秀香：1937 至今，西村人

次子支合：1940 至？贫农，肝炎早死，文革打林奎时打手之一

老二支瑞：？至 1939，60 多岁死，家开香油坊

长子支柱林：1922 至 1996，上中农，读书多～～续妻支李氏：1917 至 1997，1936 由房家峪嫁入

长子支国：现副村长、副支书，村医

女支桂香：56 年入党，现妇女主任

次子支树林：1930 至今，光棍，自称下中农

支瑞忠：老大，中农～～妻李秀兰：1913 至今，由房家峪嫁入

长子支平：1931 至今，中农，56 年入党

次子支信：现村长、党支书、企业集团总经理

支科：30 年代与支瑞棉等并称四大吹

## 4、董 姓

老大

长子董瑞

次子董祥凤：行二，下中农

四子董祥和：行五，？至 1971，贫农

长子董春：1923 至今，贫农，首批硬杆子，44 年入党，红眼队嫌疑

次子董顺：？至 1937

独子董祥庆：行四，富农，反奸清算被斗

长子董奎：人称董大架子，富农

次子董启：1925 至今，富农，后改贫农，又改回，首批硬杆子，54 年入党

老二

长子董财：？至约 1936

子董祥成：下中农

子董海：1925 至今，下中农，土改任人民法庭法警，后与古兴得、方子合当兵

次子董发：？至 1926～～妻：茅山人氏，活 90 多

长子董祥明：1903 至 1940，西村首位党员、办事员，被黄立仁告发，死于日军～～妻：活到 86 岁

子董印：1924 至今，贫农，2 首批硬杆子，56 年入党

次子董祥恒：无子，在唐山当裁缝，后给八路军秘密运送机器，死于日军～～妻陈秀莲：改嫁陈龙孝

三子董祥山：1917 至 1940，日军搜查董祥明当天连病带吓死

四子董祥芝：1919 至今，贫农，首批硬杆子，54 年入党

## 5、冷 姓

老大冷如连

长子冷恒发：贫农

独子冷向山：1911 至 1966 后，贫农，46 年在八路军金矿入党，因偷窃被开除，47—51 当兵，复员后接任村支书，人称冷大眼～～妻贾秀兰：1919 至今，1935 由姚家峪嫁入

三子冷恒海

长子冷向仁：1915 至今，贫农～～妻沈桂英：1913 至 1994，1942 由鞭子峪嫁入，黄金太拐来

二子冷向义：1918 至今，贫农

三子冷向礼：1921 至 1963 前，贫农，48 年入党，曾任治安员、战勤委员

冷如银（发）〈？〉

老大冷恒合：上中农，89 岁死，人缘极好

三子冷向有：1926 至今，上中农

老四冷恒财：夫妻都早于 1945 年死

长子冷向魁：贫农，50 多岁死

三子冷向荣：1918 至 1995，贫农，53 年入党

四子冷向权：1920 至 1987，贫农，44 年入党，抗战任战勤委员，土改被打击，后长期任治保主任，

人称小四～～妻冷朱氏：1928 至今，约 1945 由接官厅嫁入，母亲为林忠姐

老大冷萌清：1904 至 1994，号子合，下中农，1939 经邻居董祥明介绍入党，后在县城做情报工作，离村

子冷耀宗：1937 至今，下中农，文革始任团支书、副大队长

## 6、钱 姓

钱×天，到东北做买卖发家

子钱惠：富农，与董祥明是表兄弟，据说是开明士绅，首先主张组织硬杆子，后被斗

长子钱家光：1926 至 1966 后，富农，曾任秦皇岛交通局长，64 年被定反革命，文革被遣送回村斗

子钱铁生：文革前后遣送回村，人缘很好

次子钱家武：解放时去江西～～妻田玉莲：首批硬杆子

陡岭子迁来的钱家

钱四义：？至约 1935，人称钱四赋

长子钱家海：中农

长子钱德：1930 至今，中农

次子钱家江：上中农

三子钱家泉：中农

钱存旺爷爷在庄上置地，父亲 1941 年搬来南岭西谷种树发家，哥六个，老五

长子钱得海：1927 至 1960，中农，大饥荒时吃杏仁被药死

次子钱得泉：1930 至今，中农

四子钱得林：1937 至今，中农~~妻毛淑珍：1936 至今，本村人，55 年入党

五子钱得果：1948 至今，中农

钱振秀：当兵~~妻陈秀英：1924 至 1966 后，贫农，47 年入党，首批硬杆子，后随夫去四川

钱振华：土匪

钱相田：1906 至 1966 后，贫农，47 年在大兴入党

## 7、周 姓

周××：？至约 1928，70 多岁死

长子周金林：中农，40 年代乡长，反奸清算被斗，俩子由周金祥抚养

次子周坤：行四，中农~~妻韩玉珍：1933 至今，中农，1948 大寨嫁入，56 年入党，多年妇女干部

次子周金祥：贫农

长子周忠：行二，1920 至 1991，贫农~~妻孙美花：1918 至今，贫农，1936 由周家峪嫁入

次子周义：行三，1924 至今，贫农，曾当兵~~前妻林志遗孀，旋离

三子周存：行五，1932 至今，贫农~~妻孙美容：1933 至今，58 年入党，1951 由廖高庄嫁入

周焕：先生，卖药兼教书

长子周任：东村，中农

次子周棉：卖药，人称二先生

三子周在：人称三先生

周子明：1917 至 1966 后，贫农，41 年入党，后赴朝当兵，后任四川某县公安局长，回村后未进干部核心

周宝武长子周让：抽大烟

三子周果：1923 至今，贫农，48 年在部队入党

## 8、毛 姓

老大毛瑞林：贫农

长子毛庆：1924 至 199×，贫农~~妻刁凤兰：1917 至今，1930 由陡岭子嫁入，后嫁贾进田

老二毛瑞×：贫农

子毛宽：贫农，土改被打击，据说儿子是八路军团长

老五毛瑞祥：去东北当兵，据说是蒋介石卫兵队长

老八毛瑞财：1900 至 1948，贫农，传被老干部吓死~~妻：？至 1948

子毛存：1933 至今，1937 过入西村，贫农，首批硬杆子，55 年入党，文革反宗藩被压

## 9、郑 姓

老大郑玉田：？至 196×年，自白马峪迁入，扛活，85 岁死，贫农，40 年代保长，反奸清算被斗

次子郑启财：1914 至今，贫农

三子郑启仁：48 年去唐山下窑

老二、老三皆死在黑龙江

郑宪福：贫农，30 年代末日本制造无人区时迁来

子郑树林：1934 至今，贫农

郑凤同：1916 至 1973 后，贫农，土改时财粮委员，52 年因贩毒、破坏新兵、纵火等罪被打成反革命被押 6 年，大跃进和文革又被押两次~~妻贾素兰：1920 至 1966 后，富农（疑系其夫为反革命）

## 10、费 姓

费泰：东村，人称费小人，包办佃户与地主立契，是费竹林的孙辈

费远禄、费远如、费远义：三兄弟，30 年代吃大户时领头，可能是费远盛的兄长

费远盛：？至约 1951，富农，人称费老四、二县长、衙门，包办诉讼，手眼通天，但护庄，人缘好，被斗未受苦~~妻费杨氏：1900 至 1966 后，富农

西村一门老大费春：1887 至 1963 后，贫农

次子费金林：1917 至 1992，贫农，首批硬杆子，土改任贫农团、分地委员会委员

西村二门老大费泉：？至约 1951，贫农，30 多岁过给费远盛，实是长工，土改前又被赶出

子费竹林：1943 至今，贫农，前任村长，因病离任

## 11、杂 姓

老大石贺林：1898 至 1963 后，贫农，首批硬杆子

老二石贺昌：1898 至 1962，贫农，首批硬杆子

长子石海：1930 至今，光棍，贫农

次子石坤：1949 至今，贫农，现副村长

陈龙孝：1914 至 1985，父 1921 死，贫农，44 年入党，抗战时战勤班长，土改后支部书记，贫农团委员，

老实~~妻陈秀莲：1925 至今，1941 由四卫所嫁入董祥恒家，约 1946 改嫁陈家

次子陈宝权：1951 至今，现在邻乡任党委书记

孙家太爷从雷家沟迁来

次子孙合春：1929 至今，贫农，当兵多年，54 年入党~~妻毛桂芝：1935 至今，54 年入党

三子孙合衡：1935 至今，贫农，56 年入党

江大成子江宇山：1923 至今，贫农，曾任贫协主席

江长顺：1936 至 1993，贫农，由稷子峪迁入，54 年入党，多年治保主任

老大秦景如

老二秦景明：1913 至 1996

方顺：从郑各庄搬来，给地主看树，土改任人民法庭副庭长、分地委员会委员，旋因结怨过多回郑各庄

子方子合：1929 至今，1946 到西村入赘，土改任人民法庭法警，48 年避走当兵，后回郑各庄

阳有志：1952 至今，村中大白活~~姥姥家支瑞亭

应得义：玉田人，治安军驻村时伙夫，后和林双来母亲姘居

朱柱：1935 至今，1948 吴家沟迁入，下中农，56 年入党，表姐夫黄龙启，文革反宗藩，曾任治保主任  
~~妻孙淑芹 1932（小厂 1943）

强万和：1934 至今，贫农，约 1937 随母从洒河迁来（黄延平妻系其大姨），40 年代地主走后看房

齐瑞春：太困难，没分地，俩儿子，被干部强迫征兵并捉弄，土改后搬走

## 后 记

本文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已有讨论和研究基础上的某种总结，虽然在原始资料的整理上较全面些，但理论思考角度，各种关系的发散、交错与聚合的捕捉，大多都是我两位共同研究者——方惠容和李猛的心得，除了她（他）们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论文，还有更多非学术规范所能表示的交流。在许多我无法注明出处的地方，哪怕是他们认为有所不同或有误之处，也大多发源自对两位合作者的读解。此外，我更多地以问题而非定论来作结，以企盼更多的研究和比较。

我在北大转眼过了六年，两次写完论文，在喜悦和轻松之余，其实最大的感觉还是惭愧。自己每一天都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周围朋友的进步，每一次暂时的了结都只能让我看到明日更多的工作，而我也因此倍感充实。感谢我六年来的导师王思斌老师和孙立平老师，感谢他们在本论文的选题确立和展开、课题立项与实施等方面的悉心指导，感谢他们以及其他许多老师对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多方面的爱护。平心而论，本论文离我自己和许多关心我的师友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这当然有一些客观因素，但最主要还是学力局限所致。写法上时空范围和次序的协调、理论和素材的比例（如果存在这样的分野的话）都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比如我原本可以将各人的口述、查证材料进行更多的综合，以使文气更顺畅，线索更分明，但为保存口述资料的原貌（其韵味是我无力也不可能全部传递的），我宁愿将破碎、重复、歧异留在文中。还有，限于篇幅，也为了保留一些潜在的东西，本文留下许多问题，许多空白。也许这些都不太符合博士论文的定规，但愿能对自己与他人的更多思考有所刺激。面对大量鲜活的材料，不免强抑胸中浮躁之气，在文中大段的引述——当然，我绝无意于以此为自己阐述的散漫、分析的贫乏辩解。

在各种参考文献中我努力搜集了许多“遗物”，但在一定程度上，本论文也无非再一次（只不过或许是在不同方向上）将这些“遗物”变成了“文献”。表面的许多缝隙被我弥合，即使我有意指出了这些漏洞，但对它们进行挑选、组织、表达、关联，本身就是将其弥合的过程。然而，无论历史的书写是多么困难、玄妙，无论自己多么意识到自己的眼、手和大脑充满了多少自觉不自觉的欲望，历史总是要被书写的。因此，我最后颇有些自我安慰地想到：如果本论文是通过挑选和组织一些材料而不是另一些材料（或某些材料的这些而非那些部分，或通过这一些而非那些方式），提供了另一幅历史画面，或许也正可以证明这一点。在面对历史的废墟时，不是去清理、美化，也不只是去挖掘，而是首先去扬起灰尘，让原本已尘埃落定的晴朗天空重新回复争战时的场景，回复胜负未卜时的弹性。废墟之下不是金子，而是世界的原材料，被消耗殆尽或尚存余烬。但我们总想把空白填满，要真正放弃自己的英雄定位是很难的。尤其在跌宕的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渴望迎接新的曙光的人面对这些久远也不久远的声音，总情不自禁地扮演某种传统上不允扮演的角色——好在《这个冬天不太冷》，不，是“这个夏天不太热”。

感谢校内外关心本论文、本课题的各位老师以及为此项研究铺路的基层人物。感谢毕向阳、程秀英、顾杭、郭金华、何江穗、强世功、晋军、李放春、李猛、渠敬东、舒炜、吴飞、应星、郁宁远、赵晓力……等，他们在我数年来参加的各种读书会上的发言对我多有启发。文中许多地方直接或间接采用了他们的看法、论文或读书报告。最后允我引一段话，以此自警自励并纪念（又“纪念”了一把）我们共同渡过的学术中的生活：

口述史拥有自身的危险，但也有自身微小的梦想：用没有侵略性的目光来观看。这种观看也许对他们毫无意义，但却能象一次通往未知方向的旅行改变我们自己。当我们的目光越过录音机，停留在口述者的面孔上时，我们是否有信心对自己说，我们，没有在毁灭什么？

1999年6月4日 北大燕园